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西域史汇考（上）

总策划 张余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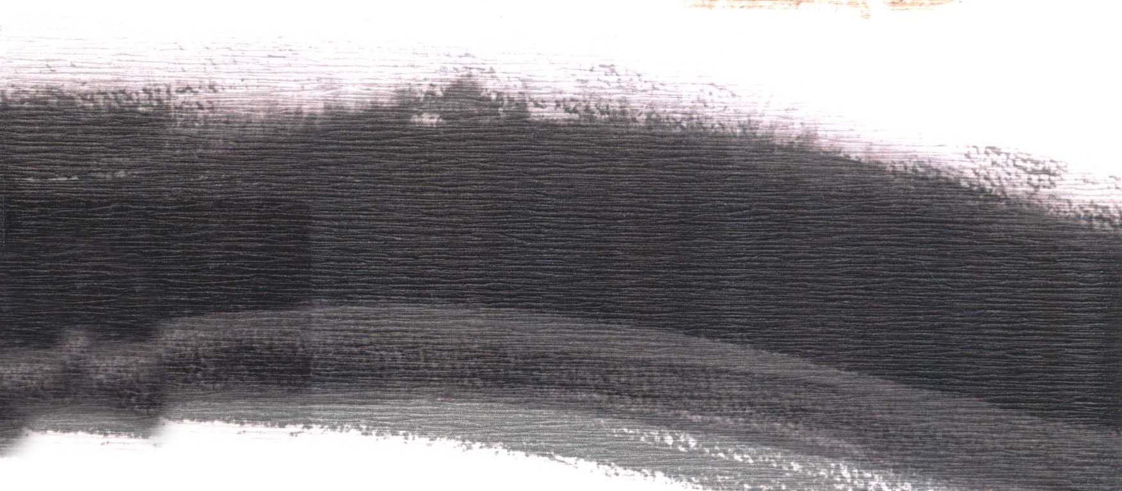


丛书主编 余太山

薛宗正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总策划 张余胜

兰州大学出版社

西域史汇考

（上）

丛书主编 余太山

薛宗正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史汇考 / 薛宗正著. -- 兰州 : 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12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 余太山主编）
ISBN 978-7-311-04665-1

Ⅰ. ①西… Ⅱ. ①薛… Ⅲ. ①西域—地方史—研究
Ⅳ. ①K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1851号

策划编辑 施援平
责任编辑 武素珍 施援平
装帧设计 张友乾

书　　名 西域史汇考(上)
主　　编 余太山
作　　者 薛宗正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网上销售 http://lzup.taobao.com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00 mm×1000 mm 1/16
印　　张 22(插页2)
字　　数 295千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665-1
定　　价 136.00元(上、下)

出版说明

随着20世纪以来联系地、整体地看待世界和事物的系统科学理念的深入人心，人文社会学科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熔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中、东欧历史文化研究于一炉的内陆欧亚学于是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内陆欧亚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人类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当下，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呼声，既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也强调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我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之一，加之20世纪末欧亚大陆桥再度开通，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是责无旁贷；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亦使得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和迫切。因此，将针对古代活动于内陆欧亚这一广泛区域的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者，不仅是实现当今该地区各国共赢的历史基础，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共同进步与发展的需求。

甘肃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

成部分，历史上曾经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锋面，是多民族历史文化交融的历史舞台，世界几大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域内多民族文化在此融合。同时，甘肃也是现代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内陆欧亚商贸流通、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基于上述考虑，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将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确定为2009—2012年重点出版项目，依此展开甘版图书的品牌建设，确实是既有眼光，亦有气魄的。

丛书主编余太山先生出于对自己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学科的热爱与执著，联络、组织这个领域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给了各位读者，其兢兢业业、如临如履的工作态度，令人感动。谨在此表示我们的谢意。

出版《欧亚历史文化文库》这样一套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立足学术与教育出版的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本着重点图书重点做的原则，严格于每一个环节和过程，力争不负作者、对得起读者。

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学术出版在这个领域里与学界的发展相偕相伴，这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不懈追求。当然，我们最根本的目的，是向读者提交一份出色的答卷。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回声。

总序

本文库所称“欧亚”(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的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做一个整

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

中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其历史进程从一开始就和内陆欧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只要注意到历代王朝的创建者中有一半以上有内陆欧亚渊源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可以说，今后中国史研究要有大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内陆欧亚史研究的进展。

古代内陆欧亚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中国与位于它东北、西北和北方，乃至西北次大陆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无疑是古代中外关系史最主要的篇章，而只有通过研究内陆欧亚史，才能真正把握之。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既饶有学术趣味，也是加深睦邻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因而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由此可见，我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责无旁贷。

为了联合全国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力量，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内陆欧亚学这一新学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适应打造学术精品的战略要求，在深思熟虑和广泛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本文库所收大别为三类：一，研究专著；二，译著；三，知识性丛书。其中，研究专著旨在收辑有关诸课题的各种研究成果；译著旨在介绍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研究专著；知识性丛书收辑有关的通俗读物。不言而喻，这三类著作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构建和发展中国的内陆欧亚学，任重道远。衷心希望全国各族学者共同努力，一起推进内陆欧亚研究的发展。愿本文库有蓬勃的生命力，拥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

最后，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支持这一文库编辑出版，确实需要眼光和魄力，特此致敬、致谢。

余太山

2010年6月30日

目录

卷二 历史地理考证

卷三　佛教北弘西域、神州

卷四 西域汉人与汉文化

卷一　流沙东、西的政治凝合

1 西汉的使者校尉与屯田校尉

校尉是西汉领兵一方的高级军官通称。在西汉开拓西域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创立了使者校尉和屯田校尉。使者校尉演变为西域都护,屯田校尉演变为戊己校尉。汉、晋以来主管西域的二元化军政体制由此形成。这两大军政建置都同西域屯田有关。本文就重点研究这一复杂的历史演变进程。[1]

1.1 西域屯田的起源与首任使者校尉赖丹

西域屯田始于何时?史书中存在两种不同说法。

(1)《汉书》卷96《西域传》下记:

> 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2]

据此,使者校尉似乎始于武帝太初四年(前101)李广利大宛返师之后。

(2)《汉书》卷97所收桑弘羊奏议中则云:

> 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乏。臣愚以为可遣屯田

---

〔1〕原载《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2〕类似记载还有《汉书》卷70《傅常郑甘陈段传》:"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伐大宛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犁。"《资治通鉴·汉纪十三》:"自大宛破……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二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史记》卷123《大宛列传》:"汉已伐宛立昧蔡为宛王而去……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条、《册府元龟》卷429《将帅部》拓土条内容也大体相类,似为辗转相抄,实出一源。

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臣谨遣征事臣昌分部行边,严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选士马,谨斥候,蓄茭草。愿陛下遣使使西国,以安其意。臣昧死请。[1]

桑弘羊亦武帝时人,征和年间任搜粟都尉,此疏亦非纯出桑弘羊个人建议,而是此人同当时丞相、御史联合申奏。据此,则使者校尉似乎设于征和年间。以上两种说法虽略有不同,却都共同记载主持西域屯田的使者校尉乃初置于汉武帝时期。但"李广利大宛返师之后"所指乃一广袤的时间概念,并非确指太初四年,难以为据。桑弘羊等倡议西域屯田的上奏非但未被武帝采纳,而且寻即颁发轮台罪己诏。可见西域屯田绝非始自汉武帝时期。然以上二说都同西汉所授首任使者校尉赖丹有关,并非空谷来风,考定西汉初设使者校尉的时间必须以首任使者校尉赖丹为突破口。

赖丹本西域扜弥国王子,入质龟兹,"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扜弥,扜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龟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扜弥质?'将赖丹入至京师。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2] 据此可知,赖丹乃太初四年随李广利入汉,昭帝时期重新审议桑弘羊西域屯田奏疏,久居汉朝的赖丹被册拜为首任使者校尉,受命出屯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3] 《资治通鉴》卷23,系此于昭帝元凤四年甲辰(前77):"初,扜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贰师击大宛还,将赖丹入至京师。霍光用桑弘羊前议,以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其文前加"初"字,显然属追述

---

〔1〕《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条所记内容、文字略同。唯"捷枝"作"台枝","不乏"注云"言以锥刀及黄金采缯与此旁国易谷食可以给田卒不忧乏粮","因骑置以闻"注云"骑置今之驿马也","累"注云"累谓妻子家属","畜积"下注"畜读曰蓄"。

〔2〕《汉书》卷96《西域传》下,页3916。原标点作"以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窃以为非,特改其标点。

〔3〕《汉书》卷96《西域传》下,页3916。

性质。参稽《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条:"昭帝即位初,用桑弘羊前议,以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昭帝继位于始元元年乙未(前86),赖丹屯田轮台应始于此年。赖丹所任官职史书仅泛记为校尉,前缺定冠词,应加"使者"二字。"使者"乃王命的传达者与执行者,使者校尉乃由文官"使者"和武官"校尉"共同组成的官名。说明这是一个集军事、外交职能为一身的军政建置,使者校尉主持的西域屯田主要目的是为出入西域的汉朝和西域朝汉使者提供粮食和武装护卫。据此判断,赖丹应即姓名可考的第一位西汉使者校尉。自此揭开了汉军西域屯田的历史新篇章。

1.2 从使者校尉到都护西域使者校尉

汉朝初置之轮台使者校尉存在时间不长,其地东邻西域强国龟兹,赖丹降汉前又本扜弥国抵押龟兹的人质,熟悉龟兹国情,对龟兹构成极大威胁,所主持的轮台屯田时间不长,就被毗邻的西域大国龟兹派兵摧毁,屯田汉军全部被杀,赖丹也以身殉汉,使者校尉创而复废。

使者校尉再次建置已进入昭帝、宣帝易代时期。常惠就是第二位姓名可考的使者校尉。昭帝末年,匈奴与车师联兵向汉朝的西域大本营乌孙发动反攻,解忧公主与坚持亲汉的乌孙昆弥联名上书汉廷求援,常惠第一次以汉使身份出使乌孙,传送求救信件,因昭帝猝死,宣帝初继位,未能及时驰援。本始二年(前72)公主、昆弥再次通过常惠告急[1],宣帝五路发兵进攻匈奴,以减轻乌孙的军事压力。与此同时,又"以惠为校尉,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至右谷蠡庭[2]",战大捷,追随匈奴的车师也同年降汉。引人注目的是,此役常惠的身份非常特殊,既领"校尉"官名,又是"使者",所达的王命就是发乌孙兵击匈奴。由此可见,常惠所领官衔全名就是使者校尉,直接代表朝廷处理一切西域军政事务。此战之后,常惠入朝述职,

[1]《汉书》卷70《常惠传》,页3003。
[2]《汉书》卷70《常惠传》,页3004。

同年封长罗侯，复返乌孙。临行前“惠因奏请龟兹国尝杀校尉赖丹，未伏诛，请便道击之，宣帝不许。大将军霍光风惠以便宜从事。惠与吏士五百人俱至乌孙，还过，发西国兵二万人，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从三面攻龟兹，兵未合，先遣人责其王以前杀汉使状……王执姑翼诣惠，惠斩之而还”。[1] 不但尽雪汉屯田校尉赖丹被杀之辱，而且进一步控制了丝路北道重镇龟兹。当时霍光全权辅政，常惠此行得到霍光的批准，实质上也就是上承王命。这足以证实，常惠实即西汉皇朝所任命的首任使者校尉。参稽名将辛庆忌初本常惠部将，“随长罗侯常惠屯田乌孙赤谷城，与歙侯战，陷陈却敌。惠奏其功，拜为侍郎，迁校尉，将吏士屯焉耆国。还为谒者，尚未知名”。[2] 据此又知，常惠任使者校尉时期还在赤谷经营屯田。

西汉第三位姓名可考的使者校尉就是一代名将郑吉。“郑吉，会稽人也，以卒伍从军，数出西域，由是为郎。吉为人强执，习外国事。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黎，积谷，因发诸国兵攻破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3] 按“侍郎”乃朝廷散官，常出为使者，也可加入羽林，从事军事活动[4]，郑吉以侍郎而屯田西域，说明具有使者和校尉的双重身份，所领官衔必定是使者校尉。其屯田地点渠犁，地近轮台，中经龟兹屠戮，本始三年(前71)才为常惠收复，郑吉主军渠犁最早只能追溯至此年。据此判断，郑吉大约同辛庆忌一样，曾为常惠部将。地节二年(前68)，率领所部渠犁屯兵进攻已移都交河的车师王，克之，以功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而《汉书》卷96则记云：“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所记官名乃“护鄯善以西使者”，又《汉书》卷96：“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条也

〔1〕《汉书》卷70《常惠传》，页3004。

〔2〕《汉书》卷69《辛庆忌传》，页2996。

〔3〕《汉书》卷70《郑吉传》，页3005。

〔4〕李大龙：《西汉的郎官及其在治理西域中的作用》，载《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记:"神爵三年(前 59),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以上四条史料所记地节二年郑吉新领官名有所不同,一是"使护鄯善以西南道",另一则是"护鄯善以西使者"。二者孰是孰非呢?迄今学术界大都采信"护鄯善以西使者"的记载,笔者则更倾向于"使护鄯善以西南道",这一郑吉所领新官衔的确切含义乃特指"护鄯善以西"中的"南道",言外之意,鄯善以西的北道则不在其职权之内,远较"护鄯善以西使者"更为明确。但是,这一新官衔仅为简称,并非全名,其全名应为"护鄯善以西南道使者校尉",参稽《汉书》卷 80 记冯奉世:"以卫候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至伊脩城,都尉宋将言莎车与旁国共攻杀汉所置莎车王万年,并杀汉使者奚充国。时,匈奴又发兵攻车师城,不能下而去。莎车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与歃盟畔汉,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都护郑吉、校尉司马熹皆在北道诸国间。"根据传文所叙内容判断,郑吉擢升为护鄯善以西南道使者次岁(地节三年,前 67)就是冯奉世到达伊循城的时间。是年匈奴发动全面反攻,重新控制了车师,并与郑吉、司马熹所率汉屯兵在丝路北道展开激战。下距西域都护府成立的神爵三年整整八年,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史书所记"使护鄯善以西南道"或"护鄯善以西使者"实际上都是一种简称,其官衔的全称应是"护鄯善以西南道使者校尉"。至此,汉朝已基本上控制了车师前国,达到了"独护南道[1]"的战略目标。这已是西域都护创建之前,郑吉所拥有的最大权限了。

至元康四年(前 62)匈奴接连"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后二岁,匈奴遣左右薁鞬各六千骑,与左大将再击汉之田车师城者,不能下[2]",说明西域汉军与匈奴的实力对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车师的分化有利于汉而不利于匈奴,汉朝的势力得以自南而北,次第推进。神爵二年(前 60)日逐王降汉,被郑吉护送长安,封

[1]《汉书》卷 96《西域传》上,页 3873。
[2]《汉书》卷 94《匈奴传》上,页 3788。

归德侯,同年,郑吉领西域都护。神爵三年郑吉返回西域,正式就任西域都护:

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即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二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1]

汉、唐两代的都护性质迥异,唐代安西与北庭两都护、两大都护都是具有法定品阶的官名,《唐六典》卷30中明确记载:"大都护府:大都护一人,从二品。上都护府:都护一人,正三品。"遍查汉史官制,主兵一方的军官通称校尉,绝不见"都护"之名,可见"都护"在西汉时期还不是正式的官名,而是正式官名前加之定冠词。《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记云:"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说明事实上早在地节二年郑吉加"护鄯善以西使者"时,所享有的实际俸禄,都已相当于西域都护,其区别仅在于前者的职权为"护鄯善以西"的"南道使者校尉",而"都护"的含义已是由"独护南道"发展为"并护北道",性质属于加官。可见,"西域都护"实乃"护鄯善以西南道使者都尉"职权的扩大和进一步定型化,官名全称实乃"都护西域使者都尉"的简称,"都护"二字不过是这一官名的前置定冠词而已。可见西域都护仍是使者校尉的历史延续,西域都护府实乃汉朝主管西域全境的使者校尉府。

1.3 屯田校尉与北胥鞬屯田

屯田校尉之名见于《汉书》卷96《西域传》,传文曰:

至宣帝时……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

屯田校尉与使者校尉性质有别。使者校尉职在保护、迎送使者,屯

[1]《汉书》卷96《西域传》上,页3874。

田校尉职在主管汉军屯田、供应军食。“始属都护”四字明确兆示，屯田校尉起初并不隶属特加“都护”之名的使者校尉，只是此后才改隶其管辖。屯田校尉乃由“屯田”与“校尉”二词合组而成，绝非始置于神爵二年郑吉出任西域都护，兼护南北道之后。在此之前，主持北道屯者，皆为使者校尉，南道由于楼兰梗阻丝路，素无屯田。最早为汉军开辟的屯田地点就是伊循城，事在楼兰降汉、更名鄯善之后。据笔者判断，屯田校尉就发源于此。易言之，这一重大事件就是楼兰改名鄯善与伊循校尉的创置。

汉初的楼兰基本上仍是一个两面政权，分别送质子汉与匈奴，反映匈奴的政治影响仍很强大。贰师道行军结束之后，一度被俘的楼兰王返国，征和元年（前92）楼兰王死，国人本来打算迎立入质汉朝的王子，而此人在汉犯法，被处宫刑，难于册立，更立他王，再送质子，此王又死。消息先传到匈奴，抢先护送入匈奴质子尝归返国，立为楼兰王，与前王后妻都力主亲匈奴，汉朝召其入朝，借故不行，全力投倚匈奴，多次截杀汉使，其弟尉屠耆乃楼兰亲匈奴首领，逃亡归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大将军霍光主政，壮士傅介子任平乐监，自荐为使，伺机刺杀楼兰王，得到霍光的准许，顺利完成了预定政治目标，刺杀了匈奴册立的楼兰王，“驰传诣阙，悬首北阙下。封介子为义阳侯。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祖而遣之”。[1] 楼兰改名鄯善是汉与匈奴在争夺丝路南道斗争的胜利里程碑。当年，屠耆在汉军的护送下返国。楼兰臣属匈奴已久，国内存在着强大的亲匈奴势力，屠耆成为楼兰王，全凭汉朝支持，担心一旦汉军撤回，很难维持自身的统治，上书汉廷言“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2] 在霍光的主持下，汉朝很快批准了这一奏请，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

[1]《汉书》卷96《西域传》上，页3878。
[2]《汉书》卷96《西域传》上，页3878。

矣。[1]

汉军在伊循的屯田与楼兰改名鄯善同年,都是昭帝元凤四年屠耆被册立为鄯善王的历史产物。最初主持伊循屯田的汉军长官本为伊循司马,其后始晋级为校尉,那么,这个"其后"究为何时呢?史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而在近年发现的悬泉汉简中却多次出现"伊循城都尉"的名号,如"伊循城都尉大仓上书"(Ⅱ90DXT0114④:349)、"敦煌伊循都尉大仓谓过所县传舍,从者如律令"(Ⅰ90DXT0111②:73)、"伊循城都尉大仓谓过所县传舍,从者如律令"(V92DXT1312③:6)、"敦煌伊循都尉大仓上书一封,甘露四年六月庚子上"(Ⅱ90DXT0216③:111),说明伊循都尉全称应作伊循城都尉或敦煌伊循城都尉,受敦煌太守领属,具有属国都尉和部都尉的双重性质。参稽《汉书·冯奉世传》所记:"奉世以卫侯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至伊循城,都尉宋将言莎车与旁国共攻汉所置莎车王万年,并杀汉使者奚充国。时,匈奴又发兵攻车师城,不能下而去。莎车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与歃盟畔汉,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都护郑吉、校尉司马熹皆在北道诸国间。"至迟此时,伊循城已设都尉了。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系此事于元康元年(前65),具追述性质,此岁仅乃冯奉世官拜光禄大夫之岁,并非护送大宛诸国使臣至伊循城之年。[2]《汉书》卷71"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黎,积谷,因发诸国兵攻破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3]",同书卷97记载此事发生于地节二年[4],据笔者判断,伊循城都尉的创设应与攻破车师,解除了鄯善以北的军事威胁,郑吉始

[1]《汉书》卷96《西域传》上,页3878。

[2]李炳泉:《西汉西域伊循屯田考论》,载《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

[3]《册府元龟》卷375《将帅部》褒异条也有同样记载:"郑吉宣帝时以侍郎田渠黎积谷,因发诸国兵攻破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

[4]原文是:"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收秋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王闻汉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王来还,与贵人苏犹议欲降汉,恐不见信。苏犹教王击匈奴边国小蒲类,斩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车师旁小金附国随汉军后盗车师,车师王复自请击破金附。"

加“护鄯善以西南道”名号同年[1]。不是地节二年至三年间(前68—前67),而肯定发生于地节二年,宋将则是西汉册拜的首任伊循城都尉。根据敦煌太守府的下行文书,汉元帝初元年间悬泉汉简12下发对象不但有敦煌郡的部都尉,还有伊循城都尉,二者平级,俱隶于敦煌郡[2]。这进一步证实伊循校尉的全称就是敦煌伊循城屯田校尉,易言之,宋将就是西汉册拜的首任屯田校尉,在性质上同北道的使者校尉划然有别。可见神爵二年(前60)日逐王降汉之前,西汉皇朝在西域的屯田实质上实行二元化管理体制。北道所设使者校尉直隶于中央朝廷,而南道所设之屯田校尉则别属于敦煌郡。

地节二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原本屯田渠犁一带的使者校尉郑吉及其副将司马熹也突然率兵东向,进攻车师。《汉书》卷97记此年:“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匈奴闻车师降汉,发兵攻车师,吉、熹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熹即留一候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归渠犁。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而见杀也,乃轻骑奔乌孙……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匈奴复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城中……围城数日乃解。后常数千骑往来守车师,吉上书言……愿益田卒。公卿议以为道远烦费,可且罢车师田者。诏遣长罗侯将张掖、酒泉骑出车师北千余里,扬威武车师旁。胡骑引去,吉乃得出,归渠犁。”按此役地节二年郑吉进军车师,占领交河,遣兵三百“别田车师”必与此同年,“匈奴复益遣骑”反攻,汉军退守车师城(交河)中则为三年至四年,“后常数千骑往来守(狩)车师”则指四年至元康元年,至匈奴大举犯车师,常惠驰救,围解,罢车师屯田,举众返回渠黎事,《资

[1]李炳泉:《西汉西域伊循屯田考论》,载《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根据他对冯奉世出使伊循城的时间,判断伊循城都尉最先创置于地节二年至三年。

[2]李炳泉:《西汉西域伊循屯田考论》,载《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

治通鉴》卷25,页827明确记为元康二年事[1]。说明朝廷委令使者校尉主持的第一次交河屯田失败。

正是在这一深刻的历史背景下,敦煌郡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派兵进入比胥鞬,设立屯田校尉,主持比胥鞬屯田。

北胥鞬屯田究竟置于何地?由于史料中"田于北胥鞬"乃与"披莎车之地"相对举,很容易产生北胥鞬屯区就在莎车国故境的错误理解[2]。然而自西汉以迄东汉,汉军从来没有进驻莎车,更无任何蛛丝马迹足以支持屯田莎车的记载,以考释敦煌悬泉汉简知名的胡平生、张德芳则认为北胥鞬屯田仍为渠犁屯田的历史继续,应在轮台、沙雅之间的某地[3],其说也仅为一种推测。其实清人徐松早就指出"披莎车之地"实为"披车师之地"传抄之误[4],汉军屯田所在的北胥鞬城或北胥鞬屯区绝不会在莎车国境,而是在汉军有效控制的车师故境,但究竟是在车师前部的吐鲁番还是远置于天山北麓的车师后部,又有各不相同的说法。黄盛璋认为北胥鞬本作比胥鞬,就是汉名高昌城的本地胡名[5]。岑仲勉则认为其地就在天山北麓的北庭故城,北胥鞬亦即突厥语别失八里的突厥语音译,亦皆属于妄测[6]。殷晴别创高昌—柳中说[7],仍未能正确解释其胡名的起源及与此音相对应的古代遗址。

---

[1]"元康二年……匈奴大臣皆以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由是数遣兵击车师田者。郑吉将渠犁田卒七千馀人救之,匈奴所围。吉上言:东怀去渠犁千馀里,汉兵在渠犁者少,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遣长罗侯常惠将张掖、酒泉骑往车师,迎郑吉及其吏士还渠犁。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以郑吉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张维华《西汉都护通考》,载《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页245~308,以为在元康四年,查无实据。

[2]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族群研究所集体编著:《新疆简史》第一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方英揩《新疆屯垦史》皆将比胥鞬置于莎车。

[3]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页123~124。

[4]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

[5]黄盛璋:《关于"田于比胥健"》,载《论高昌最早之地望胡、汉名时地对应,与胡语原名考》(吐鲁番绿洲历史地理考古学族群学研究之四上篇)。

[6]王素早就正确指出"高昌"之名是敦煌高昌里名在西域的移植,本来就是汉名,并无另外胡名。突厥语名之别失八里意为五城之地,起源于南北朝之世,天山北麓的汉城皆在天山北坡山前地带,已知金蒲、疏勒、且固诸城都与比胥鞬或北胥鞬的对音不合。见薛宗正:《北庭春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

[7]殷晴:《西域屯垦与吐鲁番盆地的开发》,载《吐鲁番学研究》,2000年第2期。

最先将北胥鞬屯区置于今鄯善县境内的学者当推钱伯泉。在其1985年发表的《北胥鞬考》一文中率先提出北胥鞬即蒲昌的同音异译，并同南北朝时期的白棘城（白芳城）和清代的辟展存在着渊源关系。可惜这一正确论断却是以今音测拟古音的非规范方式推衍而来[1]，难免质疑，有必要重新考订其上古音值。

“北”，上古音帮纽，职韵，pe(k)，中古音：《广韵》博黑切，帮纽德韵，开口呼一等，入声。读音基本相似，皆为pe(k)。“胥”，上古音心纽、鱼韵，音值为sia，《广韵》相属切，心纽鱼韵，开口呼三等，平声遇韵。Sio，“鞬”，上古音见纽元韵，《广韵》，居言切，见纽、元韵，开口呼三等、平声三等，音值为kian。据此，北胥鞬上古音值为pe(k)siakian，北胥鞬中古音值为pe(γ)siakian[2]，则比胥鞬亦即莫贺延。所指应当也是汉之北胥鞬，唐之蒲昌城。

古代汉音，无论是上古汉音，还是中古汉音，都存在清音、浊音的区别，而现代汉音则没有这种区别，一切浊音都变为清音，并发生了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分化，又入声字尾的p、t、g亦可不予读出，如此，北胥鞬的实际读音pe(k)siakian亦可变为pesian，与蒲昌的实际音值pasiang基本相同。足证北胥鞬亦即蒲昌[3]，当时蒲昌的城名尚未出现，北胥鞬之名显然因蒲昌海而得名，乃蒲昌之名的前驱。其地名的本身

[1]钱文的特征是以今音beixujian，略加变通成为beiyijian，径自比附古音，并谓“北胥鞬三字急读时，bei - yi - jian前面两个音就合二为一，其中bei字的双元音中的i与后一音节的yi自然重合，于是，yi音自然消失，剩下了北鞬（beijian）二音……无疑就是辟展”，又说“白，音同北，棘音近健，白棘就是北胥健的异译”，以此遭到不少学者的指责。近年来，刘国防再次提出比胥鞬屯田应在今鄯善境内，大量征引了悬泉汉简中有关记载，主要在地理方位考证上下功夫，却回避了古音演变问题，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有关古音学的查韵，主要根据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参阅周法高主编：《汉字古今音汇》香港中文大学1974年初版，1982年再版。关于古音查纽，主要参稽沈兼士主编：《广韵声系》（上，下），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并参阅了王力师《汉语语音史》关于上古音、中古音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

[3]伯希和在《钢和泰卷》中发现phūcamni一词，考定就是唐之蒲昌（今之辟展pitç' an或pitç' an）见其名文：《塞语中若干西域地名》，《通报》。Phūcamni与pesian，pasiang的基本词干也大体相同，可证北胥鞬亦即蒲昌的同名异译。复据马承钧《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0年2月版，页75亦记“Phūcamni的唐蒲昌县《魏书·高昌传》之白棘城……《西域行程记》之必残……清代之辟展，同为一地……今鄯善县治”。

似乎就有大沙海的含义,而与具有湖泊意义的"海"字无关。其具体地点就在今鄯善境内。史书中汉军屯田比胥鞬的记载在悬泉出土汉简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简1内容是:

口守府卒人,安远侯遣比胥鞬……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二匹,私马。口名藉(籍)畜财财物。(A)……口口辛酉日出时受遮要御。……口行。(B)(Ⅱ0214:83)

证实比胥鞬屯田士卒确乃出自安远侯郑吉部下,可见神爵二年(前60)之后,屯田校尉已正式纳入西域都护治下。简2内容是:

我儿得毋有如是者,罪误如是,而以为谓充知是,谁类?充曰:类比胥鞬校尉。(Ⅱ0115:35)

该简牍证实主持比胥鞬屯田的最高长官是级别很高的校尉。依制下领校尉丞、校尉史,其下又各领司马、候等属官。作为屯区长官的驻所,必定随之兴建城堡,比胥鞬城应当乃今鄯善境内最初出现的汉军城堡。可见西汉宣帝时期汉军屯田的中心并非吐鲁番的高昌壁,而是今鄯善的比胥鞬城。自此,随着郑吉升任都护西域使者校尉,兼护南北两道,屯田校尉也改隶其统辖,西域屯田管理的二元化体制解体,"屯田校尉始属都护"的一元化管理体制正式成型。

1.4 屯田校尉演变为戊己校尉

戊己校尉是继西域都护之后,汉朝在西域创立的另一高级军政建置,其全称实即戊己屯田校尉。虽然形式上戊己校尉创立之后,屯田校尉随即废止,但其实质上就是戊己校尉的历史继承。不同的是,初置之屯田校尉上隶于敦煌郡,戊己校尉则已直隶朝廷。屯田校尉的主要屯区是在今鄯善县境内的胥犍,而戊己校尉的屯区已西移高昌壁。因此,戊己校尉的创立标志着北胥鞬屯田的罢废。

关于戊己校尉的始创时间,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本已明确记载"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前48)置,有丞、司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然在同书《西域传·总叙》中又说:"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

尉。"《西域传》正文中更明确记载"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前王庭,应指今吐鲁番,说明高昌屯田才取代了北胥鞬屯田。那么,元帝初元元年戊己校尉究竟是初置还是复置呢?对此,侯灿认为既存在"复"字,戊己校尉不可能初置于元帝时期,而应在此之前,并引证《汉书·西域传》车师条所记汉使殷广德赴乌孙要求引渡车师故王乌贵事:"是岁元康四年也,其后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推断戊己校尉始创于宣帝元康四年(前62),元帝初元元年(前48)仅乃复置。其主张仅备一说,现在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仍是采信《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认为同书《西域传·总叙》中"复"字乃是衍文,戊己校尉初置于元帝初元元年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关于戊己校尉之名的寓意,显然同古代汉人盛行的五行学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应劭《汉官仪》解释为:"戊己中央,镇覆四方,又开渠播种,以为厌胜,故称戊己焉。"《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云:"甲乙、丙丁、庚辛、工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无常居,故取戊己为名也。"但似乎都说不通。冯承钧《高昌事辑》[1]注一中认为"戊己校尉初名屯田校尉,元帝时复置屯田校尉,特改名为戊己校尉",这是非常正确的。依笔者判断,西汉时期五行学说盛行,且为历代帝王虔信,绝不可轻易予以否定[2]。按照传统理论,五行各有所属,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土为农稼禾黍所出,中央与汉人自称中国的方位暗合,且土能克水,而匈奴位于北方,属壬癸水,兼有压胜作用,故改此名。

元帝时期(前48—前33),由于匈奴的衰落和分化,南匈奴降汉,北匈奴西迁,汉朝在西域的政治权威进一步巩固,西域都护、戊己校尉

---

〔1〕《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12月。

〔2〕例如《史记》卷28《封禅书》记武帝"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集解徐广曰:"外戚传曰赵之王夫人幸,有子,封为齐王"。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於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索隐案:乐产云"谓画青车以甲乙,画赤车丙丁,画玄车壬癸,画白车庚辛,画黄车戊己。将有水事则乘黄车,故下云'驾车辟恶鬼'是也"。)

双重政治体制进一步加强。其中由使者校尉演变而来的西域都护直接经营的屯田逐渐减少,而由屯田校尉演化而来的戊己校尉经营的屯田范围日益扩大,其中车师屯田乃其经营重点,高昌壁本西汉屯田诸壁之一,《北史》卷97记云:"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汉之前部地也。东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人庶昌盛,因名高昌。"这就是有关高昌建壁的最初记载,高昌壁由此起源。王素指出,其命名高昌实乃因敦煌有高昌里,因而得名[1],又有记载,张掖郡昭武县也有高昌里[2],则最早屯驻高昌的汉军率多原籍敦煌或张掖高昌里。至于传文所记因"地势高敞"而被命名高昌云云,早已为学术界所否定,不必深究,更不必因此错误而对该条史料予以全盘否定。初为屯田校尉屯田地点之一,故《初学记》卷8陇右道事条注引阚骃编著《十三州志》记云:"高昌壁,故属敦煌。"至西域都护府创建之后,改隶都护,汉军车师屯田的中心,已非位于今吐鲁番境内的高昌壁,而变为今鄯善县境内的北胥鞬(比胥鞬),直至元帝初元元年戊己校尉取代屯田校尉之后,汉军屯田的中心逐渐西移,悬泉汉简中叙及戊己校尉时还经常在前加"车师"二字,更足以证实戊己校尉的屯田范围主要在车师故境。自此高昌壁才从车师屯田诸壁中脱颖而出,成为戊己校尉的治所。

长期以来,学术界大都认为高昌壁的具体地望就是今高昌古城,但西汉平帝元始年间(1—5)车师王姑句自戊己校尉治所高昌壁顺利逃入匈奴的记载,令我们对这一传统说法产生了怀疑:

> 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车师后王姑句以道当为拄置,心不便也。地又颇与匈奴南将军地接,曾欲分明其界然后奏之,召姑句使证之,不肯,系之。姑句数以牛羊赇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谓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气

[1]王素:《高昌得名新探》,载《西北史地》,1992年3期。

[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破城子探方四第55号,文物出版社1990年。

也，利以用兵。前车师前王为都护司马所杀，今久系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驰突出高昌壁，入匈奴。[1]

据此可知，当时西汉戊己校尉普所驻高昌壁北距匈奴势力控制的天山北麓不远，其具体位置应在贯通前后、部的车师古道（唐之他地道）南端的山前地带，而高昌古城在今吐鲁番的平原地带，距山较远，车师王姑句即使逃出高昌壁北奔匈奴也必被追兵捕获。由此推断，高昌古城未必始建于两汉时期，初建的高昌壁规模不大，并非高昌古城。侯灿最早撰文指出，高昌壁故址应在高昌古城北边不远的胜金门[2]，理由是此处有两座佛寺及一古代建筑遗址，其中还有汉代壁画残存[3]。侯灿所说的胜金门，亦即高昌国时期的新兴县故址，奉命北却突厥，后与之议和的麴斌所领官衔就是"折冲将军，新兴令"，说明其地毗邻山北，橘瑞超吐鲁番所获大谷文书 2855 号有"[高昌]城北二十里新兴屯亭"的记载，3377 号有"[高昌]城北二十里新兴满水潢"的记载。《麴斌造寺碑》中也明确记载"乃于所领城（麴斌官为新兴令，所领城即新兴县城）西显望之处，磬（罄）舍珍财，建兹灵刹"，其地在今高昌古城北约 10 公里，三堡之东，地当他地道口。初建的高昌壁的真正位置应当在此，两汉时期所建屯城大都建于天山南北的山前地带也足以为此参证[4]。

20 世纪吐鲁番学的研究成果证明，除高昌壁之外，还出现了"交河壁"的名称，时间约为西汉成帝时期（前 32—前 7）。其后又出现了"交河曲仓守丞衡，移居卢訾仓""河平四年十一月庚戌朔辛酉，别守居卢訾仓、车师戊校"等记载，说明汉军屯田已深入到车师前王都交河城附近，交河壁之下还有"交河曲"，曲有"仓"，仓有"守丞"。敦煌汉简中

[1]《汉书》卷 96《西域传》下，页 3924

[2]黄盛璋也有类似见解。

[3]《高昌壁、高昌郡、高昌国》，载《新疆日报》，1982 年 8 月 21 日。又，《汉代的高昌壁考》，载《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第 5 号，1989 年 1 月 1 日，页 2。

[4]例如东汉戊校尉耿恭所治之金蒲城故址即今吉木萨尔小西沟古城，所守之疏勒城在今奇台半截沟石城子，皆在山前地带，则初建之高昌壁亦必在今吐鲁番高昌古城、交河古城之北的山前地带。

还常见“居卢訾仓”的记载,应即《汉书·乌孙传》中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通渠转谷的“居庐仓”,地在玉门、楼兰间[1],是丝路始途重要粮草供应站。说明交河壁也同高昌壁一样,成为车师屯田诸壁之一。西汉徐普在任时期的戊己校尉,曾以高昌壁为其治所,并不意味着戊己校尉的治所始终不变,唐长孺[2]、松田寿男[3]都曾有过类似主张,看来并不正确。王素撰文论证,汉军在车师的屯田乃始自交河壁,平帝元始中始迁往高昌壁[4],所据无非前引成帝时期书有“交河壁”的简牍,余太山的意见颇相类似,他们的功绩在于揭示了交河壁的存在,但并无确证说明戊己校尉治所就在交河壁。

(原刊于《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

〔1〕孟凡人认为汉金满城即今北庭故城,见所撰《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薛宗正认为汉金满,应作金蒲,地在今吉木萨尔小西沟古城,见《北庭春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

〔2〕唐长孺:《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

〔3〕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

〔4〕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

2 大行令、大鸿胪与鸿胪卿

——汉唐时期主管外事、蕃务的行政建制

自汉至唐,随着中原的华夏人与周邻各古代族群之间政治、经济、文化来往的日益频繁,及其由相互间的碰撞到相互融合,中国概念的外延日益扩大,主管外事、蕃务的行政建置越来越完善。从西汉时期的大行令、大鸿胪到唐代的鸿胪卿反映了这一历史演变。这是我国边政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就是一个初步尝试。[1]

2.1 西汉时期的大行令

西汉时期主管外事、蕃务的官员名为大行令。对此,以《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中的记载最为简赅、全面:

> 鸿胪寺周曰大行人,秦曰典客,汉景帝曰大行,武帝曰大鸿胪。梁置十二卿,鸿胪为冬卿,去"大"字,署为寺。后周曰宾部,隋曰鸿胪寺。龙朔改为同文寺,光宅曰司宾寺,神龙复也。

又《汉书》卷19上,《公卿百官表》页730中的记载可为其详细补充:

> 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为大行令,初置别火。王莽改大鸿胪曰典乐。初,置郡国邸属少府,中属中尉,后属大鸿胪。论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为军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门者,卫尉大行主;诸从蛮夷来归谊及以亡名数自占

〔1〕原载《新疆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者，内史县令主。

“行人”在古代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天子死未有谥，称大行”，见于服虔《史记集解》中的解释，故死去的皇帝多名为大行皇帝。另一种是主管外事、蕃务的官名。首见于韦昭《史记索隐》中的解释：“大行，官名，秦时云典客，景帝初改云大行，后更名大鸿胪”。[1] 身膺朝命、外出四方的使者又名为“行人”，其最高级别的行人则名为“大行人”或“大行令”，简称“大行”。其中大行人是周代的官名，秦朝一度改名为典客，至汉又恢复了周代的官名而略有改变，名为大行令，属于礼官的范畴。故《史记》卷23《礼书》中明确地记为“大行礼官”，又同书引公孙瓒注“大行是官名，掌九仪之制，以宾诸侯”。可见自周至汉，统称这种总管四境诸侯、藩国、接聘使者的礼官为大行是一脉相承的，其中秦朝是否一度改名为典客也颇有异议，因为《史记·礼书》除引用韦昭的解释之外，还别引了司马贞《索隐》中另一说法则是“大行，秦官，主礼仪。汉景帝改曰大鸿胪。鸿胪，掌九宾之仪也”，则秦朝也曾存在掌管九宾之仪的礼官大行，改名为典客，似乎已是秦朝中、后期的事。但汉初仍沿袭典客，至景帝始恢复大行的记载未必完全值得信赖，因为有史料证明，早在汉高祖时期就存在着大行的官职。见于《汉书》卷44，汉高祖七年（前200）：

>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戍卒卫官，设兵，张旗志。传曰“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2]

又《资治通鉴》太祖高皇帝中七年辛丑也有同样的记载，可见汉初就存在着大行令的建置。至汉景帝时，大行令因参与了宫廷废立而被杀。《汉书》卷97《外戚传》中记：

〔1〕《史记》卷11《景帝本纪》，注13，引韦昭云，页447。

〔2〕《汉书》卷43《郦陆朱刘叔孙传》，页2127～2128。

长公主日誉王夫子男之美，帝亦自贤之。又耳曩者所梦日符，计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号宜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当言邪！"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

《史记》卷59《五宗世家》中也有相同的记载。参稽《资治通鉴》卷16，此事发生于景帝六年（前151），这位被杀的大行就是这一官名初见史册。

大行的地位很高，仅次于丞相、御史大夫，而与大司农等平列，景帝时期佚名大行敢于参与宫廷的废立足以说明其权力不小，而主管外事往来更是其首要职责。担任此职者必须练习边事。武帝前期力主抗匈奴派领袖人物王恢所任官职就是大行令。"大行王恢，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事。"[1]并曾多次统兵，战功赫赫。如"建元六年（前135）大行王恢击东粤，东粤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粤"。[2] 又有记载"建元六年……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3] 其后匈奴来请续和亲，王恢在廷议中慷慨陈词，力主"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4] 其勇气和胆识，很快为抗匈奴派所宗，名将李广、李息等人，无不是他的忠实追随者。著名的马邑伏击战，就是由他全权主持、精密策划的。元光二年（前133）戊申他在廷议上战胜主和派首领韩安国，取得了武帝的支持，御史大夫韩安国、卫尉李广、太仆公孙贺、大行王恢、太中大夫李息、汉兵总30余万都归他统一指挥。夏六月，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别遣马邑壮士聂壹假扮成逃亡者入匈奴诱敌："于是单于穿塞，将十万骑入武州塞。未至马邑百馀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雁门尉史，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5]

---

[1]《史记》卷108《韩长孺列传》，页2861。
[2]《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页3839。
[3]《汉书》卷6《武帝本纪》，页160。
[4]《史记》卷108《韩长孺列传》，页2861。
[5]《资治通鉴》卷18，武帝元光二年（前133），页582。

由于被俘雁门尉史的叛卖,伏击计划失败,王恢获罪自杀,但汉朝反击匈奴的战争自此拉开了历史序幕。

王恢死后,继任大行令似李息。"李息,郁郅人也,事景帝。至武帝立八岁,为材官将军,军马邑;后六岁,为将军,出代;后三岁,为将军,从大将军出朔方。皆无功。凡三为将军,其后常为大行"。[1] 此人亦乃力主抗匈奴的将领,曾与王恢一起,参加了马邑的伏击行动,元朔五年(前124)春又参加了卫青主持的对匈奴北伐。是岁,汉武帝"令青将三万骑出高参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贤王当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骑数百驰,溃围北去"。[2] 李息出任大行期间所建最大功勋乃迎迓浑邪王的降汉。"其后,单于怒浑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亡数万人,以票骑之兵也,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道边。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即驰传以闻。上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去病将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与浑邪众相望。浑邪裨王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去病乃驰入,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遗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人,号称十万。"[3]参稽《资治通鉴》卷19,此事发生于元狩二年庚申,即公元前121年。至元狩六年(前117)冬,卫青、霍去病率军大破匈奴,"攻祁连,绝大幕,穷追单于,斩首十余万级,还,大行庆赏"[4],举国欢庆,而这场凯旋庆典也由大行主持。大行的职责还有主持册封大典,如元光五年(前130):"春,正月,河间王薨……大行令奏:'谥法:聪明睿知曰献,谥曰献王[5]。'"大行府衙中除最高官员大

[1]《汉书》卷55《卫青传附李息传》,页2491。又《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页2942亦记李息"凡三为将军,其后常为大行"。

[2]《汉书》卷55《卫青传》,页2475。

[3]《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列传》,页2482。

[4]《汉书》卷27《五行志中之下》,页1409。

[5]《资治通鉴》卷18,武帝元光五年(前130),页587。

行令外，还有大行丞、治礼丞等附属官吏，如："［张］敞与萧望之、于定国相善……时望之为大行丞。后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国后至丞相，敞终不过郡守。"[1]"平当字子思，祖父以訾百万，自下邑徙平陵。当少为大行治礼丞。"[2]苏武使匈奴归国后，初任之典属国似乎也是大行令的下属官员。

李息之后，张骞继为大行令。"将军张骞，以使通大夏，还，为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博望侯。后三岁，为将军，出右北平，失期，当斩，赎为庶人。其后使通乌孙，为大行而卒，冢在汉中。"[3]"骞还，拜为大行。岁余，骞卒。"[4]

大行的建置至汉宣帝时期仍存。虽然大行令的姓名失考，而大行丞萧望之之名则赫然见于史册。《资治通鉴》卷 25 明确记载地节三年："京师大雨雹，大行丞东海萧望之上疏。"

2.2 大鸿胪的创立及其取代大行令

西汉末年，"大行"的职权逐渐被大鸿胪卿所取代，《史记》《汉书》的有关志书中也是如此记载。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当大行令存在期间，根本不存在大鸿胪。其实并非如此，参稽二书的有关列传，早在西汉中期大鸿胪就已同大行令同时存在。最早见于汉景帝时期，《汉书》卷 5，《景帝本纪》记："中元……二年春二月，令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国，大鸿胪奏谥、诔、策。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谥、诔、策。王薨，遣光禄大夫吊襚、祠、赗，视丧事，因立嗣子。"《资治通鉴》卷 22 武帝征和四年（前 89）又记："春，正月，上行幸东莱，临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群臣谏，上弗听；而大风晦冥，海水沸涌。上留十馀日，不得御楼船，乃还。三月……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

［1］《汉书》卷 76《张敞传》，页 3223。
［2］《汉书》卷 71《隽疏于薛平彭传》，页 3048。
［3］《史记》卷 111《卫将军骠骑列传·附张骞》，页 2944。
［4］《汉书》卷 61《张骞、李广利传》，页 2693。

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夏,六月,还,幸甘泉……丁巳,以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无它材能、术学,又无阀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数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然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至魏、晋时期,大行、典客等官名尚存,但已下降到大鸿胪属官的位置,见于《晋书》卷24,《职官志》。"大鸿胪,统大行、典客、园池、华林园、钩盾等令,又有青宫列丞、邺玄武苑丞。及江左,有事则权置,无事则省。"

大鸿胪起初似乎只是一种纯粹的礼官,然自田千秋担任这一官职以后,就开始插手原本应由大行令主管的外交、蕃务工作:"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由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1] 自此大鸿胪开始干预大行令的职权。至始元元年"武帝初崩,赐诸侯王玺书。燕王旦得书不肯哭……天子遣大鸿胪丞治,连引燕王。有诏,以燕王至亲,勿治;而泽等皆伏诛"。[2] 这本来也属于大行令的职权,张骞任大行期间,就曾受命侦察、处理过一个藩王的案子,如今已为大鸿胪所取代。不久,大鸿胪又被授予兵权,昭帝始元四年(前83)"西南夷姑缯、叶榆复反……冬,遣大鸿胪田广明击之"。[3] 始元五年(前82)"秋,大鸿胪广明、军正王平击益州,斩首、捕虏三万馀人,获畜产五万馀头"。[4] 元凤元年(前80)"春,武都氐人反,遣执金吾马适建、龙頟侯韩增、大鸿胪田广明将三辅、太常徒,皆免刑,击之"。[5]

看来田广明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在他出任大鸿胪时期,多次统兵,立有赫赫战功。大鸿胪兼领军事的制度遂逐渐定型化。至西汉末年,随着大行令的废除,大鸿胪完全取代了包括外事、蕃务、领兵在内的

---

〔1〕《资治通鉴》卷22,武帝征和四年(前89),页738。

〔2〕《资治通鉴》卷23,昭帝始元元年(前86),页751。

〔3〕《资治通鉴》卷23,昭帝始元四年(前83),页755。

〔4〕《资治通鉴》卷23,昭帝始元五年(前82),页756。

〔5〕《资治通鉴》卷23,昭帝元凤元年(前80),页760。

全部职权。《资治通鉴》卷23记载昭帝元平元年(前74)汉武帝薨,"即日承皇后诏,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乘七乘传诣长安邸。光又白皇后,徒右将军安世为车骑将军"。[1] "王到霸上,大鸿胪郊迎,驺奉乘舆车。"[2]至汉宣帝时期,大鸿胪卿的权势益盛。元康四年(前62)"扶阳节侯韦贤薨……以次子大河都尉玄成为后。玄成深知其非贤雅意,即阳为病狂……以狂不应召。大鸿胪奏状,章下丞相、御史案验"。[3] 神爵二年(前60)记乌孙昆弥翁归靡上书求续和亲,"诏下公卿议,大鸿胪萧望之以为乌孙绝域,变故难保,不可许"。[4]元帝竟宁元年(前33)"在位多举逡兄大鸿胪野王;上使尚书选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心辨善辞,可使四方。"绥和元年(前8)"使执金吾任宏守大鸿胪,持节征定陶王"。[5] 哀帝元寿二年(前1)"秋,七月,遣舜与大鸿胪左咸使持节迎中山王箕子以为嗣"。[6] 平帝居摄二年(7)"莽复拜卫尉王级为虎贲将军,大鸿胪、望乡侯阎迁为折冲将军"。[7]

王莽始建国元年(9)"莽策命群司各以其职,如典诰之文。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与三公司卿分属三公。置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诸职"。[8]

东汉继承了西汉官制,仍以大鸿胪主礼九宾,兼理外事、蕃务。大鸿胪的地位更加提高,逐渐与丞相、御史大夫平列,不少大鸿胪还升为司空、司徒,备列三公。仅据《资治通鉴·汉纪》所记,可考者已为数不

---

[1]《资治通鉴》卷24,昭帝元平元年(前74),页775~776。
[2]《资治通鉴》卷24,昭帝元平元年(前74),页780。
[3]《资治通鉴》卷25,宣帝元康四年(前62),页835~836。
[4]《资治通鉴》卷26,宣帝神爵二年(前60),页860。
[5]《资治通鉴》卷32,成帝绥和元年(前8),页1041。
[6]《资治通鉴》卷35,哀帝元寿二年(前1),页1125。
[7]《资治通鉴》卷36,孺子婴居摄二年(7),页1162。
[8]《资治通鉴》卷37,王莽新朝始建国元年(9),页1172。

少。如“大鸿胪尹融”[1]光武帝建武二十年(44)“乙未……以郭况为大鸿胪,帝数幸其第,赏赐金帛,丰盛莫比,京师号况家为‘金穴’”[2]。章帝建初六年(81)“帝以沛王等将入朝……使大鸿胪窦固持节郊迎。帝亲自循行邸第,豫设帷床,其钱帛、器物无不充备”[3]。章帝元和元年(84)、章帝元和二年(85)间的“大鸿胪韦彪”[4],和帝永元十六年(104)以“大鸿胪陈宠为司空”[5]。安帝永初三年(109)“夏,四月,丙寅,以大鸿胪九江夏勤为司徒”[6]。安帝永初四年(110)“庞雄还,为大鸿胪”[7]。安帝延光二年(123)的“大鸿胪耿宝”[8],安帝延光三年(124)“秋,八月,辛巳,以大鸿胪耿宝为大将军”[9]。顺帝永建元年(126)“二月……大鸿胪京兆朱宠为太尉,参录尚书事”[10]。顺帝永建四年(129)“十月……癸酉,以大鸿胪庞参为太尉,隶尚书事”[11]。顺帝阳嘉二年(133)“八月,己巳,以大鸿胪施延为太尉”[12]。顺帝汉安二年(143)“六月,丙寅,立南匈奴守义王兜楼储为呼兰若尸逐就单于……诏太常、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城门外祖会,飨赐、作乐、角抵、百戏”[13]。质帝本初元年(146)的“大鸿胪杜乔”[14]。桓帝延熹二年(159)“大鸿胪梁国盛允为司空[15]”“大鸿胪陈蕃”[16]。桓帝延熹四年(161)九月“以大鸿胪东莱刘宠为司空”[17]。灵帝建宁元年(168)十月

---

[1]《资治通鉴》卷43,东汉建武十二年(36),页1375。
[2]《资治通鉴》卷43,东汉建武二十年(44),页1399。
[3]《资治通鉴》卷46,章帝建初六年(81),页1489。
[4]《资治通鉴》卷46,章帝元和元年(84),页1496。
[5]《资治通鉴》卷48,和帝永元十六年(104),页1560。
[6]《资治通鉴》卷49,安帝永初三年(109),页1578。
[7]《资治通鉴》卷49,安帝永初四年(110),页1584。
[8]《资治通鉴》卷50,安帝延光二年(123),页1626。
[9]《资治通鉴》卷50,安帝延光三年(124),页1631。
[10]《资治通鉴》卷51,顺帝永建元年(126),页1641~1642。
[11]《资治通鉴》卷51,顺帝永建四年(129),页1654。
[12]《资治通鉴》卷51,顺帝阳嘉二年(133),页1672。
[13]《资治通鉴》卷52,顺帝汉安二年(143),1696。
[14]《资治通鉴》卷53,质帝本初元年(146),页1707。
[15]《资治通鉴》卷54,桓帝延熹二年(159),页1747。
[16]《资治通鉴》卷54,桓帝延熹二年(59年),页1751。
[17]《资治通鉴》卷54,桓帝延熹四年(161),页1707。

以"大鸿胪许栩为司空"[1]。灵帝建宁三年(170)"八月,以大鸿胪梁国桥玄为司空"[2]。灵帝熹平元年(172)"十二月,司徒许栩罢,以大鸿胪袁隗为司徒"[3]。灵帝光和元年(178)的"大鸿胪刘合"[4],灵帝光和二年(179)三月,"以大鸿胪刘合为司徒"[5]。灵帝中平六年(189)"融为大鸿胪。纪,寔之子;融,韶之子也"[6]。《晋书》卷30记献帝兴平二年(195)有"大鸿胪荣合"[7],汉献帝建安元年(196),有"大鸿胪陈纪",献帝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进军江陵……以[韩]嵩为大鸿胪"[8]。

2.3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鸿胪

魏晋上承汉制,大鸿胪与大行、典客等汉代官名大都保存了下来,但大鸿胪早已完全取代了大行令的昔日地位,大行、典客则已降为大鸿胪的属吏。《三国志》卷3《魏书》记汉献帝的丧礼中以"司徒、司空持节吊祭护丧,光禄、大鸿胪为副",可见大鸿胪的地位仅亚于号为三公的司徒、司空、司马。《资治通鉴》卷72所记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出为大鸿胪的刘晔,《三国志》卷3《魏书四》本纪中所记大鸿胪邓芝。《晋书》卷24《职官志》中也明确记载大鸿胪的地位与"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并列,"皆为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员"。同书卷25记大鸿胪出门"驾驷",固定仪卫"钺吏六人"。魏、晋皇朝国势远衰于汉,外事、蕃务活动不多,其礼官的职责更为突出了。《晋书》卷21《礼志》中引古佚书《咸宁注》详细记载了大鸿胪在主持朝仪中的重要作用:

---

[1]《资治通鉴》卷56,灵帝建宁元年(168),页1812。
[2]《资治通鉴》卷56,灵帝建宁三年(170),页1824。
[3]《资治通鉴》卷57,灵帝熹平元年(172),页1832。
[4]《资治通鉴》卷57,灵帝光和元年(178),页1847。
[5]《资治通鉴》卷57,灵帝光和二年(179),页1850。
[6]《资治通鉴》卷59,灵帝中平六年(189),页1906。
[7]《资治通鉴》卷61,献帝兴平二年(195),页1960。
[8]《资治通鉴》卷65,献帝建安十三年(208),页2084。

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设。夜漏未尽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贺,起,谒报,又贺皇后。还,从云龙东中华门入,诣东阁下,便坐。漏未尽七刻,百官及受贽郎官以下至计吏皆入立其次,其陛卫者如临轩仪。漏未尽五刻,谒者、仆射、大鸿胪各奏群臣就位定。漏尽,侍中奏外办。皇帝出,钟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导皇帝升御坐,钟鼓止,百官起。大鸿胪跪奏"请朝贺"。掌礼郎赞"皇帝延王登"。大鸿胪跪赞"籓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贺"。太常报"王悉登"。谒者引上殿,当御坐。皇帝兴,王再拜。皇帝坐,复再拜。跪置璧御坐前,复再拜。成礼讫,谒者引下殿,还故位。掌礼郎赞"皇帝延太尉等"。于是公、特进、匈奴南单于、金紫将军当大鸿胪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当大行令西,皆北面伏。鸿胪跪赞"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贺"。太常赞"皇帝延公等登"。掌礼引公至金紫将军上殿。皇帝兴,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坐前,复再拜。成礼讫,谒者引下殿,还故位。

西晋皇朝时期的历代大鸿胪也都是名臣宿望。诸如《资治通鉴》卷 81 所记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出任大鸿胪的甄德,《晋书》卷 20 所记太康七年,出任大鸿胪的郑默。在西晋皇朝尚未实现全国统一时期,吴、蜀二国也各有大鸿胪建置,显然沿袭三国遗制。重要的外交来往,仍由大鸿胪负责,有的还由大鸿胪亲往。如晋武帝泰始二年(266)"三月,戊戌,吴遣大鸿胪张俨、五官中郎将丁忠来吊祭"。[1]

晋朝的制度深刻影响到十六国乃至南北朝,其中包括不少边裔族群所建立的政权。例如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匈奴刘渊初建政权[2]:"改元曰元熙。追尊安乐公禅为孝怀皇帝,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以右贤王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左于陆王宏为太尉,范隆为大鸿胪。"[3]在这个政权中丞相以下,诸如御史

[1]《资治通鉴》卷 79,晋武帝泰始二年(266),页 2496。

[2]这个政权,史称前赵,实际上刘渊自己建立的国号却是汉。

[3]《资治通鉴》卷 85,晋惠帝永兴元年(304),页 2702。

大夫、太尉、大鸿胪等都由汉人充任。继范隆之后，见于史册的还有田崧和孟毅。前者见于《资治通鉴》卷92，元帝太宁元年(323)："赵主曜以大鸿胪田崧为镇南大将军、益州刺史，镇仇池。"后者见于《资治通鉴》卷94成帝咸和五年(330)："六月，赵遣鸿胪孟毅拜[张]骏征西大将军、凉州牧，加九锡。骏耻为之臣，不受，留毅不遣。"南方的东晋当然更是以中朝正统自居，大鸿胪的建置不仅存在，而且继续在处理对外邦交、册封藩国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成帝咸康七年(341)东晋就曾"诏遣兼大鸿胪郭悕持节诣棘城册命燕王，与翔等偕北。公卿饯于江上"。[1] 在此期间，无论是以自居华夏正统的南朝还是号令江北的诸汉化边裔族群所建政权，无不沿袭着大鸿胪的建置。如哀帝兴宁二年(364)"六月，秦王坚遣大鸿胪拜张天锡为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2] 海西公太和四年(369)"燕主𬀩遣大鸿胪温统拜袁真使持节、都督淮南诸军事、征南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宣城公"。[3] 安帝隆安元年(397)"燕主[慕容]宝南还，宝于是大简士马，将复取中原。遣鸿胪鲁邃册拜德为丞相、冀州牧，南夏公候牧守皆听承制封拜"。[4] 进入南北朝时期，有关北魏时期的记述尤为详尽，其中不少涉及大鸿胪。如《资治通鉴》卷120，记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十一月，魏主遣司马公孙轨兼大鸿胪，持节策拜杨玄为都督荆、梁等四州诸军事，梁州刺史，南秦王。"同书卷121记宋太祖元嘉七年(430)"魏主以大鸿胪阳平公杜超为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太宰，进爵阳平王，镇邺，为诸军节度"。同书卷122记元嘉十年(433)"九月……戊午，魏主遣兼大鸿胪崔赜持节，拜氐王杨难当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宋明帝泰始五年(469)"遣大鸿胪持节奉诏责祎，因逼令自杀"。[5] 齐武帝永明十年(492)"魏司徒尉元、大鸿胪卿游明根累表请老，魏主许之。引见，赐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纱单衣，及被服杂物

[1]《资治通鉴》卷96，晋成帝咸康七年(341)，页3045。
[2]《资治通鉴》卷101，晋穆帝兴宁二年(364)，页3195。
[3]《资治通鉴》卷102，晋海西公太和四年(369)，页3221。
[4]《资治通鉴》卷109，安帝隆安元年(397)，页3460。
[5]《资治通鉴》卷132，宋明帝泰始五年(469)，页4023。

等而遣之”。[1]《资治通鉴》卷141记明帝永泰元年(498)“魏主疾有间,丙午,发悬瓠,舍于汝滨,集百官,坐徐謇于上席,称扬其功,除鸿胪卿,封金乡县伯,赐钱万缗”。

《资治通鉴》卷147记梁武帝天监七年(508)“五月,己亥,诏复置宗正、太仆、大匠、鸿胪,又增太府、太舟,仍先为十二卿”。《资治通鉴》卷168记陈文帝天嘉元年(560)“以中书令赵彦深代杨愔总机务。鸿胪少卿阳休之私谓人曰:‘将涉千里,杀骐驎而策蹇驴,可悲之甚也!’”同书同卷记同年“敕[王]晞与尚书阳休之、鸿胪卿崔昕等三人,每日职务罢,并入东廊,共举录历代礼乐、职官及田市、征税,或不便于时而相承施用,或自古为利而于今废坠,或道德高俊,久在沉沦,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详思,以渐条奏。朝晡给御食,毕景听还”。可见直至南北朝末期,大鸿胪仍然作为朝廷一个重要官职一直延续着,只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分裂,真正的外事活动与蕃务处理较之两汉盛世要少得多,因而有关这方面的记录也较少,而实质上,这一职能仍然继续存在。

2.4 隋朝的四方馆与唐朝的鸿胪寺

隋唐时期随着我国的版图空前扩大,外事往来与边疆蕃务明显增多,作为主持这一事务的礼官地位空前重要。大鸿胪进一步演变为鸿胪卿,所主持的机构称为鸿胪寺,其组织日益复杂和完善。

隋朝的帝系传承严格说来只有文帝、炀帝两代,其存在时间非常短暂,但所建功业却非同凡响。其创业主文帝杨坚在位时期,不仅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分裂,重新实现了我国的政治统一,而且击败了一度雄霸北亚、中亚大陆的强大突厥汗国,催化了东、西突厥的正式分裂,重新确立了我国在东亚大陆的政治主体地位。至迟自此开始,大鸿胪的官号已正式改为鸿胪卿,其所主衙署已正式命名为鸿胪寺。当时

[1]《资治通鉴》卷137,齐武帝永明十年(492),页4322。

战事频繁，鸿胪卿除主管蕃务、宫廷礼仪以外，还大都兼领兵事，成为朝廷的肘臂重臣。例如《资治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四年壬寅(582)页5454记："辛酉，隋置河北道行台于并州，以晋王广为尚书令；置西南道行台于益州，以蜀王秀为尚书令。隋主惩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主一方。以二王年少，盛选贞良有才望者为之僚佐；以灵州刺史王韶为并省右仆射，鸿胪卿赵郡李雄为兵部尚书，左武卫将军朔方李彻总晋王府军事，兵部尚书元岩为益州总管府长史。王韶、李雄、元岩有骨鲠名，李彻前朝旧将，故用之。"至隋开皇三年(583)击败突厥第二次犯隋以后，正式改革官制："隋改度支尚书为民部，都官尚书为刑部。命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废光禄、卫尉、鸿胪寺及都水台。"[1]随着鸿胪寺建置的日趋完善，除鸿胪卿以外，又设置了其副手鸿胪少卿。"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信任杨素，素复任情不平，与鸿胪少卿陈延有隙，尝经蕃客馆，庭中以马屎，又众仆于毡上樗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樗蒲者皆杖杀之，棰陈延几死。"[2]文帝、炀帝二朝易代之时，又西败吐谷浑，在西域创建且末、鄯善、伊吾三郡，一度有睥睨强汉的气势，其国势尤臻于辉煌的顶点。继鸿胪寺进一步完善后，又创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建置：四方馆。对此，《隋书》卷28有一段重要的记载：

> 鸿胪寺改典客署为典蕃署。初炀帝置四方馆于建国门外，以待四方使者，后罢之，有事则置，名隶鸿胪寺，量事繁简，临时损益。东方曰东夷使者，南方曰南蛮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每使者署，典护录事、叙职、叙仪、监府、监置、互市监及副、参军各一人。录事主纲纪。叙职掌其贵贱立功合叙者。叙仪掌小大次序。监府掌其贡献财货。监置掌安置其驼马船车，并纠察非违。互市监及副掌互市。参军事出入交易。

[1]《资治通鉴》卷175，陈宣帝至德元年(583)，页5464。

[2]《资治通鉴》卷178，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页5556。

鸿胪寺主管外事,一切往来国书都先送交鸿胪寺,然后才转呈皇帝。[1] 鸿胪寺设有招待四方蕃客在京居留的庞大馆舍。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之母向氏入隋,"遂留长安,舍于鸿胪寺"。[2] 宁长真乃隋炀帝任命的最后一任鸿胪卿。隋末先附于萧铣,后又降唐,拜钦州总管。[3] 其后,洛阳的隋皇泰帝也有自己任命的鸿胪卿崔善福,曾受命出使李密大营,转递皇泰帝的招降书。[4] 严格地说,崔善福才是隋朝册拜的最后一任鸿胪卿。

四方馆乃鸿胪寺下属的重要机构,虽然名义上仅仅是管理入境商胡市场贸易,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侦察机构,尤其当裴矩出任西戎使者的时候,其职责几乎是外交部的西域司,而总隶于鸿胪卿管辖的鸿胪寺。参阅《新唐书》卷48,还有一个名为互市监的机构,专管胡商入境贸易。"互市监……每监监一人,从六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下。掌蕃国交易之事。隋以监隶四方馆。唐隶少府。"隋朝还创立了一个专管翻译的机构谒者台。《文献通考》卷50《职官五》通事舍人条云:"炀帝置鞴台,乃改通事舍人为谒者台,职谓之通事谒者,置二十人。"乃是与四方馆经常密切协同工作的政府机构。

关于唐朝鸿胪寺的建置,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马国荣研究员有一篇题为《唐代鸿胪寺述论》一文已论述得非常详尽。本文在充分肯定和继承马先生首创成果的同时,予以进一步史料上的补充和内容上的阐释。

《旧唐书》卷42《职官志》记:"高祖发迹太原,官名称位,皆依隋旧。及登极之初,未遑改作,随时署置,务从省便。"史书中所记最早为高祖李渊册拜的鸿胪卿有隋晋阳乡长刘世龙,以杀隋将王威、高君雅有

---

[1]如《资治通鉴》卷181记大业四年(608)三月日本国倭王多利思比孤遣使入唐,由于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炀帝读后,非常不快。"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无礼者,勿复以闻。'"

[2]《资治通鉴》卷180,隋大业元年(605),页5622。

[3]《资治通鉴》卷185,唐高祖武德元年(618),页5790。

[4]《资治通鉴》卷185,唐高祖武德元年(618),页5799。

功，“授银青光禄大夫。从平京城，累转鸿胪卿，仍改名义节”[1]，与刘文静、裴寂等14人共为第一批唐朝开国功臣。其副手名张德侯，曾受任册拜河西地方势力首领李轨：“令鸿胪少卿张侯德持节，册拜为凉州总管，封凉王，给羽葆鼓吹一部。”[2]高祖从父弟永安王李孝基也曾出任鸿胪卿，[3]“历陕州总管、鸿胪卿，以罪免”，大约是刘世龙的继任者。高祖时开国功臣中书侍郎温大雅之弟温大有，死后“赠鸿胪卿”。[4] 鸿胪卿与鸿胪少卿主持的官署名为鸿胪寺。武德七年(624)定制与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司农寺、太府寺并列为朝廷九寺，官仅亚于三公、六省及御史台。鸿胪寺的建置名称历史上曾有数次变动。依《唐会要》卷66，鸿胪寺所记龙朔三年(663)改为司宾寺。而依《旧唐书》则谓此年改为同文寺。咸亨元年(670)，复为鸿胪寺。光宅元年，又改为司宾寺。神龙元年(705)，最后定名为鸿胪寺。《旧唐书》卷42则记光宅元年九月一度改鸿胪寺为司文寺，改鸿胪卿为司文卿，景云二年(711)又恢复旧名。都属武周朝建置，至迟中宗朝复唐以后已恢复旧名。

根据两唐书的记载，历任鸿胪卿都是谙熟蕃务的资深重臣。如太宗时多次出使东突厥的著名外交家郑元璹释归后“拜鸿胪卿”。[5] 如“江夏王道宗……贞观元年，征拜鸿胪卿[6]”，曾护送文成公主赴吐蕃和亲。贞观三年(629)，李靖伐东突厥，“大战于白道。突厥败，屯营于碛口，遣使请和。诏鸿胪卿唐俭往赦之。”[7]太宗婿阿史那社尔从征辽东“师旋，兼授鸿胪卿。十一年，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征龟兹”。[8] 显庆三年冬十一月“鸿胪卿萧嗣业于石国取贺鲁至，献于昭陵”。[9]中宗

---

[1]《旧唐书》卷57《刘世龙传》，页2295。

[2]《旧唐书》卷55《李轨传》，页2250。

[3]《旧唐书》卷60《永安王孝基传》，页2339。

[4]《旧唐书》卷61《温大有传》，页2362。

[5]《旧唐书》卷62《郑元璹传》，页2380。

[6]《旧唐书》卷60《江夏王道宗传》，页2354。

[7]《旧唐书》卷67《唐俭传》，页2479。

[8]《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页3289。

[9]《旧唐书》卷4《高宗纪》，页78～79。

景龙元年五月“丙午,假鸿胪卿臧思言使于突厥,死之”。[1] 名将王晙也出任过此职“再转鸿胪大卿,充朔方军副大总管,兼安西大都护,丰安、定远、三城及侧近军并受晙节度”。[2] 玄宗时代名将郭知运破吐蕃于九曲,归朝献捷“拜知运为兼鸿胪卿、摄御史中丞,加封太原郡公”。[3] 另一名将王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寻迁鸿胪卿,馀如故”。[4] 开元十七年(729)“户部侍郎兼鸿胪卿宇文融为黄门侍郎。”[5]碛西猛将来曜“开元十八年,为鸿胪卿同正员、安西副都护、持节碛西副大使、四镇节度使……名著西陲。宝应元年……赠太子太保”。[6] 开元十九年春正月,唐与吐蕃重开边界谈判,“辛卯,遣鸿胪卿崔琳入吐蕃报聘”。[7] 安西名将高仙芝受命主持对大食的全面反攻,天宝六载(747)“六月,制授仙芝鸿胪卿、摄御史中丞,代夫蒙灵詧为四镇节度使”。[8] 同年,另一名将哥舒翰取得积石军大捷,擢“以为鸿胪卿,兼西平郡太守,摄御史中丞,代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9] 天宝年间于阗名王尉迟胜,“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改光禄卿,皆同正”。[10] 玄宗时期出任鸿胪卿的还有宠姬杨贵妃的“从兄銛,鸿胪卿”。[11] 宝应元年肃宗薨,太子监国,“延和郡主婿鸿胪卿潜贬郴州司马,舅鸿胪卿窦履信贬道州刺史”。[12] 肃宗时的鸿胪卿康谦,亦乃精通夷务的大员,曾任安南都护。《四道记》的作者贾耽,精通夷务,代宗大历年间,自汾州刺

---

〔1〕《新唐书》卷4《中宗纪》,页109。
〔2〕《旧唐书》卷93《王晙传》,页2986。
〔3〕《旧唐书》卷103《郭知运传》,页3190。
〔4〕《旧唐书》卷103《王忠嗣传》,页3199。
〔5〕《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页193。
〔6〕《旧唐书》卷114《来瑱传·附来曜》,页3364。
〔7〕《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页196。
〔8〕《旧唐书》卷104《高仙芝传》,页3205。
〔9〕《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页3212。
〔10〕《旧唐书》卷144《尉迟胜传》,页3924。
〔11〕《旧唐书》卷51《杨贵妃传》,页2179。
〔12〕《旧唐书》卷52《肃宗张皇后传》,页2186。

史“入为鸿胪卿，时左右威远营，隶鸿胪，耽仍领其使”。[1] 直至大历十四年(779)十一月，才调转梁州刺史、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上元元年(760)五月“辛丑，以鸿胪卿、赵国公管崇嗣为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充北京留守、河东节度副大使”。[2] 永泰二年(766)八月“甲辰，以开府仪同三司、右监卫大将军、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神策军兵马使、上柱国、冯翊郡开国公鱼朝恩加内侍监、判国子监事，充鸿胪礼宾等使，进封郑国公”。[3] 唐代可考的鸿胪卿还有德宗朝的郭锋，顺宗元年(805)调任京兆尹的王权[4]，长庆二年(822)兼任御史大夫判度支的张平叔[5]，开成二年(837)六月转天德军都防御使的“鸿胪卿李逵”[6]，大中十二年(870)的鸿胪少卿郑汉卿[7]等。此外，南诏王子凤伽异，玄宗诏授入朝宿卫后，也担任了鸿胪少卿之职。

鸿胪寺是一个庞大的衙署，对此，《通典》卷26、《旧唐书》卷44、《新唐书》卷48都有详细的记载。综辑以上资料，鸿胪寺的职责是“凡四蕃之国，经朝贡之后，自相诛绝，及有罪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存者，七十余蕃。其朝贡之仪，享宴之数，高下之等，往来之命，皆载于鸿胪之职焉”，[8]设鸿胪卿、鸿胪少卿、鸿胪丞等官员，下领典客署、司仪署两个常设机构，以及庞大的鸿胪客馆建筑群。其中鸿胪卿乃其中的最高主官员。“掌宾客、凶仪之事及州诸蕃。”[9]“率其官属，供其职务。少卿为之贰。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凡诏葬大臣，一品则卿护其丧事，二品则少卿，三品丞一人往。皆命司仪，以示礼制。”[10]法定官阶鸿胪卿从三品，鸿胪少卿从四品上，鸿胪丞从

[1]《旧唐书》卷138《贾耽传》，页3783。

[2]《旧唐书》卷10《肃宗纪》，页261。

[3]《旧唐书》卷11《代宗纪》，页283。

[4]《旧唐书》卷14《顺宗纪》，页406。

[5]《旧唐书》卷16《穆宗纪》，页494，长庆二年正月“以鸿胪卿，兼御史大夫张平叔判度支”。

[6]《旧唐书》卷17《文宗纪》下，页570：“六月……己亥，以鸿胪卿李逵为天德军都防御使。”

[7]《旧唐书》卷18《武宗纪》，页644：“前鸿胪少卿郑汉卿，并起复授本官。”

[8]《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页1832。

[9]《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页1832。

[10]《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页1885。

六品上。这似乎是玄宗朝之前的建置,而依《旧唐书》卷42《职官志》,进入玄宗开元年间,正式规定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国子祭酒、殿中监、少府监、将作监、诸卫羽林等官员皆入正三品。唐朝官制中三品是一个重要的分界,三品以上皆属朝廷的一级重臣。鸿胪少卿晋升为从三品,并根据临时需要增置"假鸿胪卿",或"假鸿胪少卿"名号,其中"假"即代理之意。鸿胪丞下还设有主簿、录事。"丞掌判寺事。主簿掌印,勾检稽失。录事掌受事发辰。"[1]其从属衙吏还有"府五人,史十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2] 在以上官员中,除鸿胪卿、鸿胪少卿以外,鸿胪丞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这似乎是一种类似鸿胪寺中的秘书长职务。"蕃客赐宝钿带鱼袋,则授鸿胪寺丞、主簿。"[3]

其下尚有赞相,乃主持仪式的官员。鸿胪寺的下属机构有典客署、司仪署,各有固定的人员编制。加之唐代外事工作空前频繁,四境属邦、外国使臣、入朝者常以千百计。因此,鸿胪寺还下领专门用以接待入朝使节和蕃客的馆舍建筑群,称为鸿胪客馆。《新唐书·回鹘传》云:"自乾元之后,使者相蹑,留舍鸿胪。"《唐会要》卷98回纥:"其宰相大首领等至者,馆于鸿胪寺。"说明其招待规模非常可观。如贞元四年(788)咸安公主和亲,回纥可汗遣公主"及使大酋领等妻凡五十六妇人来迎可敦,凡遣人千余,纳聘马二千。德宗令朔州、太原分留七百人,其宰相首领皆至,分馆鸿胪[4]",人数多达数百。鸿胪客馆中门禁森严。《唐会要》卷66,鸿胪寺条记载"开元十九年十三敕:鸿胪当司官吏以下,各施门籍出入。其译语、掌客出入客馆者,于长官状牒馆门,然后与监门相兼出入"。从中可知,鸿胪客馆中设有监门、译语、掌客等官员。监门掌门禁,没有状牒、门籍,严禁出入。掌客,即客馆中的管理、服务人员。译语乃译语人的简称,即翻译人员。有时蕃使、蕃客不服鸿胪寺门禁约束,酿成重大事端。如代宗大历七年(772)就曾发生了这么一

---

[1]《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页1885。

[2]《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页1885。

[3]《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中尚署,页1270。

[4]《旧唐书》卷195《回纥传》,页5208。

件事。“七年正月……甲辰，回纥使出鸿胪寺劫坊市，吏不能禁止，复三百骑犯金光、朱雀等门。是日皇城诸门皆闭，慰谕之方止。”[1]为避免华、蕃混杂难辨，大历十四年七月特颁严令，“诏鸿胪寺，蕃客入京，各服本国之服[2]”，不许蕃客穿华人服装。为此，鸿胪寺还拥有维持治安的武装。《旧唐书》卷12，本纪记“建中元年六月……壬申，以鸿胪寺左右威远营隶金吾”，说明鸿胪卿所统辖的兵力有两营之众，直至此岁，才正式并归皇宫卫队金吾军统一指挥。至于鸿胪寺客馆中也存在着大批翻译人员，级别不是很高。

关于唐代鸿胪寺的职责，马国荣《唐鸿胪寺述论》[3]一文做了详尽的论述，其主要担负着“接待周边诸蕃入朝使者的繁重任务。诸蕃派往唐朝的使者，主要有朝贡、和亲、告哀、求请、贸易、献捷等”。具体而言，包括提供食宿，委派导译，赐赏钱物，报奏授官，供给资粮，管理留学生，处理蕃使，蕃客的婚姻、丧葬、遗产，乃至主持唐朝与周邻诸邦间的围棋、马球、拔河等比赛等，无须笔者再窃裘续貂。只需补充以下几点：

其一，唐代还有礼宾院的建置。《唐会要》卷66中记载自“天宝十三载(754)二月二十七日敕：礼宾院自今后，宜令鸿胪句当检校，应缘供拟，一物已上，并令鸿胪勾当检校，应缘供拟，一物以上，并鸿胪勾当”。马国荣在引证了以上引文后，推断礼宾院即鸿胪客馆，[4]恐怕证据尚不充足。遍查唐代各种史料，玄宗朝以前有关礼宾院的史料唯此一见，此后则仅在宪宗元和九年六月复置“乙未，置礼宾院于长兴里之北。”[5]这个建置的来历尚不清楚，现在可以肯定的仅仅是，到了天宝十三载，礼宾院也已划归鸿胪寺管辖了。

其二，与鸿胪寺有关的建置还有“互市监……每监监一人，从六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下。掌蕃国交易之事。隋以监隶四方馆。唐隶少府。贞观六年，改交市监曰互市监，副监曰丞，武后垂拱元年曰通市监。

[1]《旧唐书》卷11《代宗纪》，页299。
[2]《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页322。
[3]《西域研究》，1999年第2期。
[4]《唐鸿胪寺略论》，载《西域研究》，1999年第2期。
[5]《旧唐书》卷15《宪宗本纪》。

有录事一人,府二人,史四人,价人四人,掌固八人”。这一建置也是接受书省与鸿胪卿双重管辖的单位。因为“宾礼”就是“以待四夷之君长与其使者”的意思,乃鸿胪卿的主要职责。对此,《新唐书》卷16《礼志》有详尽的记载。这意味着鸿胪寺在各地方虽不设直属办事机构,与鸿胪寺业务有密切关系的蕃客贸易等事项,原则上悉由地方处理,却也同鸿胪寺并非毫无干系。可见唐代的鸿胪寺继承了汉大行署、晋大鸿胪的职能,又予以新的发展,在我国行政建置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原刊于《新疆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3　护羌校尉考

护羌校尉乃我国古代管理西部地区的重要军政建置,始创于汉代,秩比二千石,级别很高,初本主政河西。至魏晋以降,多由凉州刺史兼任,管理范围及于西域,位在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之上,河西诸凉王朝之所以名义上都拥有代行中央政府治理西域的政治主权,就是因为这些地方王朝的首领都兼领护羌校尉的名号。其在我国边疆建置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3.1　护羌校尉的起源

西羌乃我国古代西部大族,其分布范围从河西走廊直到西域。周穆王万里西巡,就是旨在联羌制戎,东方的商人世与羌人战争,俘其人为牧羊奴,造羌字示其音义。周王姬姓世与西羌联姻,秦厉公伐西羌,华夏族才开始有效地控制关中平原,将羌人首领无弋爰剑排斥到河湟地区。秦汉时期青海一带有卑禾羌,西域有婼羌、葱茈羌、黄牛羌、赤水羌,河西尤为羌人的聚居地,有烧当羌、先零羌、钟羌等名目。汉初匈奴强大,河西诸羌大都归其役属。景帝时有留何等少数羌人部落最先归降于汉,被安置在狄道、安故、临洮、氐道、羌道诸县境,设官管理,但尚无护羌校尉名号。这一名号初见于西汉,乃汉武帝开河西的历史产物。对此,《汉书》记载不详,《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中却有明确的记载:

> 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

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

先零羌暴动一度危及汉朝河西的统治,匈奴也与之呼应,史载"元鼎五年(前112)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围枹罕。匈奴入五原,杀太守"。[1] 次岁,汉将李息出解枹罕之围,平定了先零羌之乱。对此,《资治通鉴》卷20有明确的记载:

元鼎六年(庚午,前111)……冬,发卒十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

可见护羌校尉就创设于元鼎六年,李息即汉朝册拜的首任护羌校尉。"李息,郁郅人也,事景帝。至武帝立八岁,为材官将军,军马邑;后六岁,为将军,出代;后三岁,为将军,从大将军出朔方。皆无功。凡三为将军,其后常为大行。"[2] 李息是资深汉将,早在元光二年(前133)就以材官将军与王恢、李广、韩安国等人一起参加了对匈奴的马邑伏击。元光六年(前129)参加了卫青为帅的对匈奴正面出击,率兵出代郡。元朔二年(前127)以卫青副帅北伐,逐楼烦、白羊王,始取河南地,留汉将苏建率十余万人兴建朔方城,修缮秦将蒙恬所筑长城,因河为固。至元朔五年(前124)已升为大行,随卫青大破匈奴右贤王,封关内侯。元狩元年(前122)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折兰王,斩卢侯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初定河西。元狩二年(前121),单于咎浑邪王、休屠王连为汉军所败,将加罪,浑邪王率先谋降汉,其时李息正以大行筑城河上,得浑邪王使,驰传以闻。霍去病亲往迎迓,"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人,号称十万"。[3] 自此,河西全境归汉。这次平定西羌之乱也是由他完成的,功业彪炳,因而被汉朝册拜为首任护羌校尉。"护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西羌。"[4] 初置之护羌校尉治所似在

---

[1]《汉书》卷6《武帝纪》,元鼎五年(前112),页188。

[2]《汉书》卷56《李息传》,页2491。

[3]《汉书》卷55《霍去病传》,页2482。

[4]《后汉书》卷28《百官志》,页3626。

枹罕。

李息所任护羌校尉止于何时,其下任为谁,已无记载。至宣帝神爵二年(前60)名将辛武贤小弟辛汤又被举荐出任此职。“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诏举可护羌校尉者……四府举辛武贤小弟汤。”自此,护羌校尉的治所已改徙金城,即今兰州。辛汤主政时激起了西羌暴动,又改任辛庆忌之子辛通:“庆忌……为国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亲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长子通为护羌校尉。”[1]同卷又记:“时,平帝幼,外家卫氏不得在京师,而护羌校尉通长子次兄素与帝从舅卫子伯相善。”[2]开罪外戚王莽,“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诛杀之。辛氏繇是废”。[3]《资治通鉴》记此为元始三年,即公元3年事。辛汤、辛通就是迄今可考的西汉时期仅有的两位护羌校尉。

王莽柄政时期可考的护羌校尉还有窦况。《汉书》卷99《王莽传》记载居摄六年(11)“西羌庞恬、傅幡等怨莽夺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诛永,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参稽《后汉书》卷23所记“从祖父为护羌校尉”,应即东汉名臣窦融的从祖父。参稽《后汉书》卷87《西羌传》,建武九年(33)隗嚣死后,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旧制:益州部署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署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署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说明护羌校尉的治所已由金城西徙凉州。

3.2 东汉时期的护羌校尉

东汉是西汉宗室刘秀重建的刘氏家族世袭政权,史称后汉,因国都不在长安而在洛阳,习称东汉。共传承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献帝,总12帝,共194年。在此期间,东汉王朝为了巩固河西走廊的政治统治,保证丝路贸易的畅通无

[1]《汉书》卷69《辛庆忌传》,页923。

[2]《汉书》卷69《辛庆忌传》,页925。

[3]《汉书》卷69《辛庆忌传》,页926。

阻,进而重开西域,与西羌各部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护羌校尉的建置日益制度化与完善化。

东汉初建时,河西仍为地方割据势力隗嚣所统治,其所领官号就是护羌校尉,温序则是被东汉光武帝最早册拜的护羌校尉:"建武……六年(30)拜谒者,迁护羌校尉。"[1]但当年就被隗嚣所杀,并未有效地行使其职权。至建武九年(33)隗嚣死,天下大定,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旧制:益州部署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署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署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2]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乃"省关都尉,复置护羌校尉官"。[3] 首任校尉乃狄道人牛邯。"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气,雄于边垂……大司徒司直杜林、太中大夫马援并荐之,以为护羌校尉。"[4]牛邯死后一度罢废,"及邯卒而职省"。[5] 至明帝继位,复置护羌校尉,"永平元年(58)……以谒者窦林领护羌校尉,居狄道。林为诸羌所信,而滇岸遂诣林降"。[6] 此人乃东汉功臣窦融从兄子,执政至明帝永平二年十二月,窦氏家族衰而耿氏家族兴,《后汉书》卷19中记"耿氏自中兴已后迄建安之末,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明帝朝取代窦林出任护羌校尉者似即手柄重兵,曾出征车师的名将耿秉。章帝以后,历代护羌校尉的记载更加清晰,章帝建初元年(76)册拜原度将军吴棠出任护羌校尉,至二年(77)烧当羌首领迷吾率卢水胡等起兵叛乱,吴棠镇压失利,免官。改委武威太守傅育继任,遣将马防等出征,迷吾兵败,一度归降。傅育企图利用羌、胡之间的矛盾,假手河西胡人帐落消灭烧当羌。这种挑拨政策并未生效,章和元年(87)烧当羌联兵河西诸胡,再次发动叛乱,傅育统兵进讨,至三兜谷,陷入埋伏,战死。

---

[1]《后汉书》卷81《独行列传》。

[2]《后汉书》卷87《西羌传》,页2898。

[3]《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下,页55。

[4]《后汉书》卷13《牛邯传》,页531。

[5]《后汉书》卷87《西羌传》,页2878。

[6]《后汉书》卷87《西羌传》,页2880。

其继任者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依《后汉书》卷3《章帝纪》应为金城太守刘盱,"章和元年(87)春三月,护羌校尉傅育追击叛羌,战殁……烧当羌寇金城,护羌校尉刘盱讨之,斩其渠帅"。而《资治通鉴》卷47则记载傅育战殁的当年"诏以陇西太守张纡为校尉,将万人屯临羌"。似以前说为是,张纡则乃刘盱的下任,看来刘盱任护羌校尉只有短短的数月,同年就为张纡取代。此人初履任时战功颇显,"羌豪迷吾复与诸种寇金城塞,张纡遣从事河内司马防与战于木乘谷。迷吾兵败走,因译使欲降,纡纳之。迷吾将人众诣临羌,纡设兵大会,施毒酒中,伏兵杀其酋豪八百馀人,斩迷吾头以祭傅育冢,复放兵击其馀众,斩获数千人"。[1]张纡任职至章和二年,开始遇到烧当羌新首领迷唐的严峻挑战。"迷吾子迷唐,与诸种解仇,结婚交质,据大、小榆谷以叛,种众炽盛,张纡不能制。"[2]至次岁"章和二年,护羌校尉张纡绣诛烧当种羌迷吾等,由是诸羌大怒,谋欲报怨,朝廷忧之。公卿举训代纡为校尉",[3]改任东汉名臣邓禹之子邓训继为护羌校尉。

邓训标榜仁义,赴任后一改对羌、胡一律不信任的政策,先争取小月胡的归心。史载"邓训代张纡为护羌校尉。迷唐率兵万骑来至塞下,未敢攻训,先欲胁小月氏胡。训拥卫小月氏胡,令不得战。议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不宜禁护"。[4]而邓训则下令将月氏人的家眷都迁入汉城中,严兵保护,烧当羌掠无所得,取得了湟中胡的信任,"小大莫不感悦。于是赏赂诸羌种,使相招诱,迷唐叔父号吾将其种人八百户来降。训因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迷唐于写谷,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颇岩谷,众悉离散"。[5] 至永元元年(89)"春,迷唐欲复归故地。邓训发湟中六千人,令长史任尚将之,缝革为船,置于箄上以渡河,掩击迷唐,大破之,斩首前后一千八百馀级,获生口二千人,马牛羊三万馀头,一种殆尽。迷唐收其馀众西徙千馀里,诸附落小

[1]《资治通鉴》卷47,章和元年(87),页1518。
[2]《资治通鉴》卷47,章和元年(87),页1518。
[3]《后汉书》卷16《邓寇传》,章和二年(88),页609。
[4]《后汉书》卷16《邓寇传》,章和二年(88),页609。
[5]《资治通鉴》卷47,章和元年(87),页1518。

种皆畔之。烧当豪帅东号稽颡归死,馀皆款塞纳质。于是训绥接归附,威信大行,遂罢屯兵,各令归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馀人,分以屯田、修理坞壁而已",[1]成功地安定了河西,任职期间(88—92)政绩突出。邓训这套办法,虽以德治相标榜,实为恩威兼施。及和帝永元四年(92)蜀郡太守聂尚取代邓训继为护羌校尉,傻头傻脑地照搬"以恩怀诸羌"[2]的政策,放心地发遣已被分散安置的烧当羌返回大、小榆谷故居,又将作为人质留汉的迷唐祖母卑缺以厚礼遣还,迷唐已无任何后顾之忧,再次发兵反汉,这位好心的校尉聂尚当年免官,烧当羌复强,另委贯友为护羌校尉。

永元五年(93)贯友不惜金帛,成功地离间了以烧当羌为首的西羌部落联盟,"遣兵出塞,攻迷唐于大、小榆谷,获首虏八百馀人,收麦数万斛"。[3] 筑城坞,造河桥,"羌乃遁去"。[4] 永元八年(96)一代名将贯友死后,改任汉阳太守史充继为护羌校尉,史充赴任后立即征发"湟中羌、胡出塞击迷唐"。[5] 兵败,另以代郡太守吴祉代之。永元九年(97)烧当羌迷唐率众八千人攻犯陇西,杀大夏长。汉朝遣将刘尚、赵世、寇盱,会同吴祉所部,四面合围,迷唐向临洮南逃窜,"永,大破之,斩虏千馀人,迷唐引去,汉兵死伤亦多,不能复追。乃还"。[6] 十年(98)汉朝再次遣将王信、耿统兵攻烧当羌,冬十月"迷唐恐,乃请降;信、谭遂受降罢兵。十二月,迷唐等率种人诣阙贡献"。[7]

永元十二年(100)"九月……烧当羌豪迷唐既入朝。其馀种人不满二千,饥窘不立,入居金城。帝令迷唐将其种人还大、小榆谷;迷唐以汉作河桥,兵来无常,故地不可复居,辞以种人饥饿,不肯远出。护羌校尉吴祉等多赐迷唐金帛,令籴谷市畜,促使出塞,种人更怀猜惊。是岁,

---

[1]《资治通鉴》卷47,永元元年(89),页1519。
[2]《资治通鉴》卷48,永元四年(92),页1537。
[3]《资治通鉴》卷48,永元五年(93),页1539。
[4]《后汉书》卷4《孝和帝纪》,页177。
[5]《资治通鉴》卷48,永元八年(96),页1545。
[6]《资治通鉴》卷48,永元九年(97),页1547。
[7]《资治通鉴》卷48,永元十年(98),页1549。

迷唐复叛，胁将湟中诸胡寇钞而去。王信、耿谭、吴祉皆坐征”。[1] 由此，吴祉被免官，改任周鲔继为护羌校尉。永元十三年(101)迷唐再次犯边，“护羌校尉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及诸郡兵、属国羌、胡合三万人出塞至允川。侯霸击破迷唐，种人瓦解，降者六千馀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迷唐遂弱，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久之，病死，其子来降，户不满数十”。[2] 自此，烧当羌衰落，先零羌代为诸羌盟主。

和帝末年，河西局势基本平静，有关战事的报告较少，周鲔的下任似为侯霸，其后易将段禧，至永初四年(110)秋，七月“护羌校尉段禧卒，复以前校尉侯霸代之，移居张掖”。[3] 由此可见，护羌校尉的治所还很不稳定，一般在凉州，但此时却又移至张掖。侯霸两任护羌校尉，在同先零羌的战争中屡建军功。“永初七年(113)秋，护羌校尉侯霸、骑都尉马贤破先零羌。”[4] 至安帝元初元年(114)改任庞参，对叛乱诸羌推行招抚政策，“明年(二年，115)，烧当羌种号多等皆降，始复得还都令居，通河西路”。[5] 唯先零羌仍割据北地，继续反汉，庞参奉命率降羌及湟中降胡与征西将军马钧分道合击，兵败失期，被免官。“以马贤代参领护羌校尉。”[6] 元初四年(117)护羌校尉易为任尚，马贤仍以骑都尉协助其河西的军事行动，“九月，护羌校尉任尚复募效功种羌号封刺杀零昌；封号封为羌王。冬，十一月……甲子，任尚与骑都尉马贤共击先零羌狼莫，追至北地，相持六十馀日，战于富平河上，大破之，斩首五千级，狼莫逃去。于是西河虔人种羌万人诣邓遵降，陇右平”。[7] 永宁元年(120)马贤第二次出任护羌校尉，“六月，沈氐种羌叛，寇张掖，护羌校尉马贤讨沈氐羌，破之”。[8] “斩首千八百级，获生口千馀人，馀

[1]《资治通鉴》卷48，永元十二年(100)，页1551。
[2]《资治通鉴》卷48，延光元年(122)，页1551。
[3]《资治通鉴》卷49，永初四年(110)，页1685。
[4]《后汉书》卷5《孝安帝纪》，页220。
[5]《后汉书》卷51《庞参传》，页1689。
[6]《资治通鉴》卷49，元初二年(115)，页1593。
[7]《资治通鉴》卷50，元初四年(117)，页1599。
[8]《后汉书》卷5《孝安帝纪》，页231。

虏悉降。”[1]建光元年（121）“春，护羌校尉马贤召卢悤斩之，因放兵击其种人，获首虏二千馀，忍良等皆亡出塞”。[2] 入秋又叛，这次叛乱反映了烧当羌的复兴。八月，马贤率降汉的先零羌与烧当羌初战于金城牧苑，不利，烧当首领进犯武威、张掖，马贤率兵追至鸾鸟，招抚原来降汉的羌人部落，“诸种降者数千，麻奴南还湟中”。[3] 延光元年（122）春三月，汉再次追剿烧当羌首领麻奴“护羌校尉马贤追击麻奴，到湟中，破之，种众散遁”。[4] 汉顺帝永建元年（126）四月“陇西钟羌反，校尉马贤击之，战于临洮，斩首千馀级，羌众皆降；由是凉州复安”。[5] 此后，马贤又先后于永建三年（128）十月平定了攻犯陇西的钟羌与攻犯金城的烧当羌，永建四年（129）再败陇西钟羌与金城的烧当羌。马贤被视为继邓训之后，又一位大有作为的护羌校尉。

永建五年（130）马贤卸职后，继任者为韩皓，永建六年（131）“护羌校尉韩皓转湟中屯田置两河间，以逼群羌。皓坐事征，以张掖太守马续代为校尉。两河间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见图，乃解仇诅盟，各自儆备；续上移屯田还湟中，羌意乃安”。[6] 阳嘉二年（133）另任胡畴出任护羌校尉，“时西羌反叛，征西将军马贤与护羌校尉胡畴征之，而稽留不进”，[7]劳而无功，复以马续出任护羌校尉。阳嘉三年（134）“秋七月庚戌，钟羌寇陇西、汉阳。冬十月，护羌校尉马续击破之”。[8] 马续乃东汉名将马援的后裔，在任期间也饶有建树。此后马贤再次出任护羌校尉，顺帝永和四年（139）“烧当羌那离等复反；夏，四月，癸卯，护羌校尉马贤讨斩之，获首虏千二百馀级”。[9] 顺帝汉安元年（142）又平定了陇西钟羌的叛乱，护羌校尉易为赵冲。“以赵冲为护羌校尉。冲招怀

---

[1]《资治通鉴》卷50，永宁元年（120），页1606。
[2]《资治通鉴》卷50，建光元年（121），页1608。
[3]《资治通鉴》卷50，建光元年（121），页1617。
[4]《资治通鉴》卷50，延光元年（122），页1619。
[5]《资治通鉴》卷51，永建元年（126），页1642。
[6]《资治通鉴》卷51，永建六年（131），页1656。
[7]《后汉书》卷60《马融传》，阳嘉二年（133），页1971。
[8]《后汉书》卷6《顺帝纪》，阳嘉三年（134），页264。
[9]《资治通鉴》卷52，永和四年（139），页1685。

叛羌，罕种乃率邑落五千余户诣冲降。于是罢张乔军屯。唯烧何种三千余落据参□北界。三年夏，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掩击之，斩首千五百级，得牛、羊、驴十八万头。冬，冲击诸种……于是诸种前后三万余户诣凉州刺史降。"[1]汉安二年(143)夏四月庚戌，"护羌校尉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击烧何羌于参䜌，破之"。[2] 至顺帝建康元年(144)"三月，护羌校尉赵冲为叛胡所杀"，[3]战殁于鹯阴河。其部将卫琚追叛羌，大捷，代为护羌校尉。史载："冲虽身死，而前后多所斩获，羌由是衰耗。"[4]

桓帝时期著名的护羌校尉乃段颎，桓帝延熹二年(159)"十二月，己巳，上还自长安。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种羌寇陇西金城塞，护羌校尉段颎击破之，追至罗亭，斩其酋豪以下二千级，获生口万馀人"。[5] 延熹三年(160)"闰月，烧何羌叛，寇张掖，护羌校尉段颎追击于积石，大破之"。[6] 延熹四年(161)秋，先零羌别种零吾羌等叛乱，段颎镇压不力，一度免官，"以济南相胡闳代为校尉。胡闳无威略，羌遂陆梁，覆没营坞，转相招结，唐突诸郡，寇患转盛"。[7] 不得已委任名将皇甫规暂领护羌校尉，对此，仅见于《后汉书》卷65本传，且仅存"再转为护羌校尉"只字片语。从时间上判断，只能存在于此时。至延熹六年(163)段颎又被重加起用。"西州吏民守阙为前护羌校尉段颎讼冤者甚众，会滇那等诸种羌益炽，凉州几亡，乃复以颎为护羌校尉。"[8]七年(164)"护羌校尉段颎击当煎羌，破之"。[9] 延熹八年(165)二月"护羌校尉段颎击罕姐羌，破之"。[10] 永康元年(167)"春正月，先零羌寇

---

[1]《后汉书》卷87《西羌传》，页2896。

[2]《后汉书》卷6《顺帝纪》，汉安二年(143)，页273。

[3]《后汉书》卷16《五行志四》，页3336。

[4]《后汉书》卷87《西羌传》，页2897。

[5]《资治通鉴》卷54，延熹二年(159)，页1752。

[6]《后汉书》卷7《桓帝纪》，延熹二年(159)，页306。

[7]《资治通鉴》卷54，延熹四年(161)，页1760

[8]《资治通鉴》卷54，延熹六年(163)，页1767。

[9]《后汉书》卷7《桓帝纪》，延熹三年(160)，页306。

[10]《后汉书》卷7《桓帝纪》，延熹八年(165)，页314。

三辅,中郎将张奂破平之。当煎羌寇武威,护羌校尉段颎追击于鸾鸟,大破之。西羌悉平"。[1] 灵帝建宁元年(168)春正月"使护羌校尉段颎讨先零羌"。[2] "初,护羌校尉段颎既定西羌,而东羌先零等种犹未服,度辽将军皇甫规、中郎将张奂招之连年,既降又叛。"[3]但这已属于河西羌人叛乱的尾声了。总的来说,通过东汉二百年间与羌人的激烈斗争,已基本上稳定地控制了河西走廊。

灵帝初年河西局势比较平静,有关记载不多,熹平年间可考的护羌校尉有田晏。此人主政至熹平六年(177),此岁"护羌校尉田晏坐事论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请中常侍王甫求得为将,甫因此议遣兵,与育并力讨贼。帝乃拜晏为破鲜卑中郎将"。[4] 其后的护羌校尉似为第五访:"第五访,字仲谋……迁南阳太守,去官。拜护羌校尉,边境服其威信。卒于官。"[5]此人在职时间失载,明显属东汉末年人。其在职时间宜在这一时期。再下任应为泠征,中平元年(184)"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群盗反,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泠征"。[6] 此年黄巾起义,天下大乱。汉朝继拜夏育为护羌校尉,同年"叛羌围校尉夏育于畜官,勋与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为羌所败"。[7] 灵帝时,中常侍张让专朝政,以金帛厚赂张让:"让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8]其后可考的凉州刺史兼护羌校尉还有董卓,其后改委其部将杨瓒接任护羌校尉。及董卓入京,中平六年(189)汉司徒王允设计除董卓,"乃上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以讨袁术为名,实欲分路征卓,而后拔天子还洛阳。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内瑞为仆射,瓒为尚书"。[9]

---

[1]《后汉书》卷7《桓帝纪》,永康元年(167),页318。
[2]《后汉书》卷8《灵帝纪》,建宁元年(168),页328。
[3]《资治通鉴》卷56,建宁元年(168),页1803。
[4]《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传》,页2990。
[5]《后汉书》卷76《循吏传·第五访》,页2476。
[6]《资治通鉴》卷58,中平元年(184),页1873。
[7]《资治通鉴》卷58,中平元年(184),页1874。
[8]《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页93,引《三辅决录》文。
[9]《后汉书》卷66《王允传》,页2175。

这已是东汉年间最后一任护羌校尉了。

3.3 魏蜀相争时期的护羌校尉

历史上曹魏王朝的建立虽然从魏文帝曹正式篡汉算起,实际上,从汉献帝被扶立为政治傀儡,曹操以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时起,汉朝就已名存实亡了。因此,称这段时限为三国时代是正确的。在三国之中,尤以拥汉以号令天下的北曹操政权与以刘汉正统自居的蜀汉政权更为重要。正因为这两个政权都争以汉朝正统自居,各自都任命了自己政权的护羌校尉,并成为蜀汉北伐与曹操制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蜀汉创业主刘备一直以出身刘汉王室、兴汉灭贼为政治号召。当其攻占巴蜀、占有荆州之后,就一直策划北伐,其中汉中尤为其北伐的根据地。最早被刘备委以重任的将领魏延就兼领凉州刺史名号。而凉州刺史一般都兼有护羌校尉名号。《三国志·蜀志》卷4《魏延传》记载:"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先主践尊号,进拜镇北将军。建兴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三国志·蜀志十》诸葛亮文中也明确提及"使持节前军师征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南郑侯臣魏延"。至诸葛亮主军初期,对魏延仍非常信任,丞相司马,乃仅次于丞相的二号北伐主将。"五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谿,延大破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1]但很快因北伐战略不同,关系日趋紧张。魏延是单纯地从军事角度看问题,反对诸葛亮制定的正面取河西、迂道攻长安的北伐路线,力主出子午谷,沿秦岭,突入关中,不被采纳之后,又力主两路分兵,自请走此路,与大军主力会师潼关。诸葛亮六次北伐都

---

〔1〕《三国志》卷40《蜀书十·魏延传》,页1002。

取祁山路,而拒绝了先主刘备深为器重的汉中主将魏延所主张的兵出子午谷的建议,采纳了马谡的“攻心为上”的北伐战略,重在争取广泛分布于河西至陈仓(今宝鸡)汉中一带的羌人。诸葛亮自己挑选的接班人姜维本身就是一个羌人,足以说明争取羌人在蜀汉北伐中所占的重要位置。被诸葛亮破格起用,后来成为其政治、军事接班人的姜维就是一位汉化很浓的天水羌人。“十二年,亮卒,维还成都,为右监军辅汉将军,统诸军,进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随大将军蒋琬住汉中。琬既迁大司马,以维为司马,数率偏军西入。六年,迁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十年,迁卫将军。”[1]另有记载:“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每欲兴军大举……十九年春,就迁维为大将军。”[2]由此可知,姜维之所以在蜀汉得到空前的重用,正在于他那汉化羌特殊身份与习“练西方风俗”,有利于争取河西羌、胡民心的缘故。姜维又是继魏延之后第二个身兼凉州刺史的蜀汉将领,虽然凉州实际上并不在蜀汉的控制之下,而凉州刺史多同时兼有护羌校尉身份,因此,蜀汉设置这一名号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其目的无非是争取河西羌胡的支持。

相对于蜀汉的积极进攻态势,后来被追封魏太祖的曹操则自赤壁之败以后,一直奉行化攻为守、与民休息的方针。针对蜀汉的北伐重点,对河西地区也投入了特殊的关切,明确继承了东汉时期的护羌校尉制度,并有了新的发展。据《晋书》卷14《地理志》所记,初期的护羌校尉本由秦州刺史兼领,“秦州。案《禹贡》本雍州之域,魏始分陇右置焉,刺史领护羌校尉,中间暂废”。至今仍有不少研究护羌校尉的学者援此为依据。其实,这一记载非常片面,远不足反映曹魏时期护羌校尉的历史沿革。详加考核,在曹操为汉相时期,任命的护羌校尉乃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太祖以畿为司空司直,迁护羌校尉,使持节,领西平太守”。[3] 这时,护羌校尉还未必一定由凉州刺史兼领。及

[1]《三国志》卷44《蜀书十四·姜维传》,页1064。

[2]《三国志》卷44《蜀书十四·姜维传》,页1064。

[3]《三国志》卷15《魏书十六·杜畿传》,页493~494。

曹操死，曹丕初篡汉正式创立曹魏王朝。西平麴演率先叛乱，自立为护羌校尉，为魏将苏则兴兵讨灭，魏文帝立即册拜苏则为护羌校尉。这是曹魏王朝时期最先册拜的护羌校尉。“文帝即王位，初置凉州，以安定太守邹岐为刺史。张掖张进执郡守举兵拒岐，黄华、麴演各逐故太守，举兵以应之。既进兵为护羌校尉苏则声势，故则得以有功。既进爵都乡侯。”[1]此后，随着蜀汉北伐威胁的加深，凉州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羌人的叛附关系着河西地区的存亡，凉州刺史兼护羌校尉遂成为定制。可考的主政官员有温恢：“温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文帝践阼，以恢为侍中，出为魏郡太守。数年，迁凉州刺史，持节领护羌校尉。道病卒，时年四十五。”[2]孟建：“[温]恢卒后，汝南孟建为凉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东将军。魏略曰：建字公威，少与诸葛亮俱游学。亮后出祁山，答司马宣王书，使杜子绪宣意於公威也。”[3]徐邈，“字景山，燕国蓟人也……明帝以凉州绝远，南接蜀寇，以邈为凉州刺史，使持节领护羌校尉。至，值诸葛亮出祁山，陇右三郡反，邈辄遣参军及金城太守等击南安贼，破之。”[4]《三国志》卷23记“[吉]茂同郡护羌校尉王琰，前数为郡守”。王浑：“涿郡太守王雄……子浑，凉州刺史。”[5]牵弘：“牵招……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风，以陇西太守随邓艾伐蜀有功……弘后为扬州、凉州刺史，以果烈死事於边。”[6]

据此可知，护羌校尉的设置始于曹魏，驻节凉州，由凉州刺史兼任，同时兼领戊己校尉，职在“护西域”，亦即主管西域，西域长史则乃其麾下属吏，至晋沿袭魏制不变。

[1]《三国志》卷15《魏书十五·张既传》，页474。
[2]《三国志》卷15《魏书十五·温恢传》，页479。
[3]《三国志》卷15《魏书十五·温恢传附孟建》，页479。
[4]《三国志》卷27《魏书二十七·徐邈传》，页739。
[5]《三国志》卷24《魏书二十四·崔林传附王雄传》，页679～680，引《魏名臣奏》。
[6]《三国志》卷26《魏书二十六·牵招传附牵弘》，页732。

3.4 西晋、前凉时期的护羌校尉

晋承魏制,据《晋书》卷24《职官志》记载:"元康中,护羌校尉为凉州刺史,西戎校尉为雍州刺史,南蛮校尉为荆州刺史。"可见至迟元康年凉州刺史兼任护羌校尉已成定制。

又《晋书》卷14《地理志》记:"凉州……案《禹贡》雍州之西界……魏时复分以为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如汉故事,至晋不改。统郡八,县四十六,户三万七百。"据此,西晋时凉州刺史、护羌校尉、戊己校尉这三种官职实际上是三合一的。易言之,凉州刺史除肩负安抚羌人的重任之外,还兼管西域屯田事务。西晋时期最先见诸史册的护羌校尉有马循。见于《晋书》卷3《本纪·武帝纪》:

> 咸宁元年……六月,鲜卑力微遣子来献……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二年……鲜卑阿罗多寇边,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之,斩首四千余级、获生九千余人,于是来降。

这里马循的官职仅记为"西域戊己校尉",实际上也兼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武帝时期的护羌校尉还有胡广,字宣祖,"位至散骑常侍、少府。广子喜,字林甫,亦以开济为称,仕至凉州刺史、建武将军、假节、护羌校尉"。[1] 又有司马伷"司马伷为宁北将军,镇邺,以憙为军司。顷之,除凉州刺史,加扬威将军、假节,领护羌校尉,绥御华夷,甚有声绩"。[2]

西晋永宁元年(301),张轨出任凉州刺史、护羌校尉,"于时鲜卑反叛,寇盗从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斩首万余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3] 不久八王乱起,五胡逐鹿,中原形势已极端恶化,而此人才干超群,"关洛倾覆,凉土独全……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4] 凉州成

---

[1]《晋书》卷57《胡奋传附胡广》,页1557。

[2]《晋书》卷41《李憙传附司马伷》,页1189。

[3]《晋书》卷86《张轨传》,页2221。

[4]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70《张轨》。

为北方汉族移民的中心，张轨"上表请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统武兴、大城、乌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监等县。又分西平界置晋兴郡……元帝徙居江左，轨乃控据河西，称晋正朔"。[1] 其后裔世袭凉州刺史兼护羌校尉，并都得到江南的东晋王朝的正式册封，因此，为后世史家定名的前凉，并非其自称，本质上仍应视为两晋王朝下属河西飞地的地方官吏，护羌校尉仍应视为两晋王朝的重要边政建置。及张轨卒，子张寔得到晋愍帝的册立，授为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西平公，令其"阐弘先绪，俾屏王室"。[2] 张寔任护羌校尉期间，在河西地区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体制改革：其中的一项是"分金城之令居、枝阳二县，又立永登县，合三县立广武郡"。[3] 另一项是，护羌校尉不再兼领戊己校尉，而将戊己校尉与西域长史降为护羌校尉的下属组织，这意味着护羌校尉不仅是河西地区的政治首脑，而且其号令权限远及西域。张寔卒，张茂继为护羌校尉，分武兴、金城、西平、安故为定州。张氏家族中最有作为的护羌校尉应推张骏，受愍帝册拜为"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领护羌校尉西平公"[4]，其在任期间，击败了羯赵的大举进犯，成功地保卫了河西，进而遣将平定了戊己校尉赵贞的叛乱，始置高昌郡，这是西域地区郡县化的历史开端。分武威、武兴、西平、张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晋兴、广武合十一郡为凉州，兴晋、金城、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成、汉中为河州，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张骏假凉州都督，摄三州，并开始全面规复西域，晋咸康元年(335)遣将杨宣、张植西征焉耆，焉耆王龙熙率其众四万人，肉袒诣宣降。于是西域诸国及前部、于阗并遣使诣姑臧奉贡。[5] 晋咸康八年(342)又以和璘、谢艾为将，"讨南羌于阗，大破之"[6]，重新实现了流沙东西的政治

---

[1]《晋书》卷14《地理志》，页434

[2]《晋书》卷86《张寔传》，页2227。

[3]《晋书》卷14《地理志》，页434。

[4]《晋书》卷86《张骏传》，页2232。

[5]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72《张骏》。

[6]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72《张骏》。

整合。鄯善、焉耆等国都来朝贡,西域奇珍,咸集姑臧。张氏宫廷,名玩珍宝甲天下。后凉吕纂咸宁二年(晋隆安四年,400)有人盗发张骏墓,得真珠帘箔、云母屏风、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马脑钟、黄金勒等西域贡品。其政治建树空前辉煌。张骏死,张重华继位,所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名号如旧。张重华死后,张灵耀立,不久被谋杀,张祚继为护羌校尉,改敦煌郡为商州,置汉阳县,而政事荒怠,残暴,杀名将谢艾,自毁长城,激起内部政变,旋亦身亡。重华少子张玄靓立,年幼,实由张瓘秉政,不久为宋混所诛,劝玄靓去凉王称号,复为凉州牧、护羌校尉,在此期间,汉阳县改置为祁连郡。张氏家族最后一任护羌校尉名张天锡,别置临松郡。前凉的疆域日益拓展,跨有河西、湟中、西域三地,仍领都督陇右关中诸军事、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西平公名号,理应将张氏政权继续视为两晋王朝护羌校尉合法的历史延续。

3.5 十六国时期的护羌校尉

前凉亡于氐族所创建的前秦,太元元年(376)八月苻坚遣梁熙、姚苌等诸路大军西征,同月,攻占姑臧,张天锡兵败迎降,九月,"秦王坚苻坚册拜梁熙为持节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西羌校尉,镇姑臧"。[1]苻坚于统一河西之后,又派遣大将吕光率兵远征西域,胜利地占领了龟兹,进一步统一了西域。但苻秦的武功不过是昙花一现,由于南征东晋,太元八年(383)兵败淝水,众叛亲离,终于败亡,其部将羌人首领姚苌攻占长安,建立后秦,梁熙则割河西,据凉州为基地。已占领龟兹的吕光闻苻坚兵败,急率师东归勤王,梁熙封关闭境,阻其东返,被吕光击败,"光入姑臧,自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2],取代了梁熙昔日的地位,及苻坚死后,在凉州创建了后凉王朝。这一地方政权本质上就是前秦政权的政治继续,护羌校尉的名号仍然继续。

后凉政权为政苛暴,至其末年,激起了河西各族人民大暴动,继而

---

〔1〕《晋书》卷113《苻坚载记》,页2898。

〔2〕《晋书》卷122《吕光载记》,页3056。

兴起的河西汉族首领李暠据酒泉为都,创建地方政权,自称晋臣,史称西凉。李暠,字玄盛,陇西成纪人,汉将李广之裔,其父祖皆为前凉时期臣僚,暠拜后凉敦煌太守。后凉龙飞二年(396),"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玄盛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1]晋昌乃晋末中州移民的聚居区,晋大兴三年(320)晋王保所率关中豪宗大族万余人大部分安置于此,汉族势力相当强大,李暠为众推立,成为河西汉人的首领。晋隆安四年(400)据酒泉创建西凉政权。建元庚子,遣军"东伐凉兴,并击玉门以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持久之计"。[2] 晋义熙元年,即西凉建初元年(405)正月李暠正式自称大都督、大将军,领秦凉二州牧,遣使间道通晋,表述效忠晋室、尊王攘夷之志,疏称:"自戎狄陵华,已涉百龄……今帝居未复,诸夏昏垫,大禹所经,奄为丘墟,五岳神山,狄污其三,九州神都,夷秽其七……微臣所以叩心绝气,忘寝与食,雕肝焦虑,不遑宁息者也,江凉虽辽,义诚密迩,风云苟通,实为唇齿,臣虽名未结于天台,量未著于海内……今天台邈远,正朔未加……冀仗宠灵,全制一方,义诚著于所天,立风扇于九壤,殉命灰身,殒越慷慨。"[3]此书未报,似乎其使未必能顺利到达江东。建初二年(406)李暠亲率精骑二万出征至建康东、鄯善、车师前部等后凉所属诸藩,俱改向西凉称臣、贡献方物,于是移治酒泉,张掖、武威以东汉人纷纷投诚其境。李暠分前秦所虏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未余一万二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但事实上西凉已发展成为河西汉人势力的中心。建初三年(407)为了打通与江东晋朝的政治联系,遣法泉利用僧徒的身份,再次秘密奉表间道诣晋,此行大约也没有取得成功,使未报。李暠在位 18 年,始终未得到东晋朝廷的正式册命,恢复东土的壮志也未实现,而鲜卑南凉首领秃发傉檀已入据姑臧,沮渠蒙逊的势力也日益壮大。建初十三年(417)二月,李暠死,子李歆继位。现在一般史书上,虽然都把李氏家

---

〔1〕《晋书》卷 87《李玄盛传》,页 2259。

〔2〕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 93《西凉·李暠》。

〔3〕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 93《西凉·李暠》。

族在河西的统治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地方王朝，但事实上，李氏家族虽然受河西汉民的拥戴，而且始终没有同江南的东晋皇朝建立起真正的联系，但却始终以晋臣自居，虽建年号，但只表明不承认北方胡人政权所谓的“正朔”，因为他们已不知东晋的年号。李氏家族同前凉张氏家族一样，非但不敢自居为帝，甚至连王号也不敢自僭。因此，当李歆继立时，以顾命元勋宋繇为首的西凉宰臣共同上的尊号也不过是“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凉州牧、护羌校尉”[1]而已。改年号为嘉兴元年（417），尊母后尹氏为太后，以宋繇为军谘祭酒，录三府事、武卫将军、广夏太守。李歆初立，北凉沮渠蒙逊统兵三万进攻西凉，李歆亲自率众迎敌，并“贯甲先登”，亲临战争，结果大败北凉军，俘斩七千余级，旗开得胜，保住了西凉的偏安一隅的汉人地盘。当年得到晋朝的正式册封对于西凉士气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振奋，它意味着尽管早已偏安江南，却被河西汉人始终视为本民族正统皇朝的东晋予以正式承认，自此一切行动都已合法化为朝廷行为了。

但是，河西李氏政权存在时间不长。嘉兴四年（北凉玄始九年，420）李歆引军东伐，为北凉所败，精兵丧亡殆尽，沮渠蒙逊乘机反攻，破酒泉，李歆遇难，弟敦煌太守李恂继位。北凉玄始十年（421）春三月，河西李氏家族在流沙以东最后的据点敦煌也被攻陷，嗣主李恂被俘，李暠孙李宝在舅唐契、唐和兄弟的拥戴下逃亡伊吾，西凉的河西领疆全部为北凉接管。

北凉为杂种匈奴沮渠氏所建，创始人沮渠蒙逊本张掖临松卢水胡人，匈奴有左沮渠、右沮渠的官职，蒙逊先世曾任此职，故号沮渠氏。时至晋末，已是一个汉化很深的河西杂胡世家。蒙逊之父曾为苻坚中田护军，伯父罗仇任吕光西平太守，鞠粥为三河太守。后凉龙飞二年（395）吕光遣鞠粥伐吐谷浑，败绩，杀鞠粥及罗仇，于是蒙逊及其从兄晋昌太守沮渠男成相率起兵，先推举建康太守、汉人段业为盟主，不久蒙逊假段业之手杀男成，又借为男成复仇为号召，讨杀段业，吞并诸军。

---

〔1〕《晋书》卷87《李歆载记》，页2268。

是年六月，建元建安，称凉州牧、张掖公，署置百官，与西凉李暠、秃发傉檀南凉争夺河西。蒙逊为人雄杰多谋略，先称臣于后秦，结好西秦，对西凉取守势，集中力量对付南凉，击败秃发傉檀，义熙七年（411）沮渠蒙逊攻占姑臧，自称河西王，创建北凉政权。“以敦煌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擢拜中书侍郎，委以机密之任。以其弟挐为护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镇姑臧。旬余而挐死，又以从祖益子为镇京将军、护羌校尉、秦州刺史，镇姑臧。”[1]

东晋本来已将护羌校尉的名号授予汉族李氏家族，但随着刘裕等北伐派将领逐渐掌权，出于战略上的需要，玄始三年（义熙十年，414）十二月，晋益州刺史率先遣使结好沮渠蒙逊，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立即遣使报聘，向晋称臣。此举在争夺河西广大汉族民心的支持中起了显著的作用。与此同时，沮渠蒙逊又兼臣于铁弗夏，以解东顾之忧，而与西秦反目，出兵打开碛西通道。史载玄始六年（417）“夏四月，西贡吞刀、吐火秘术”[2]即为其证。七年（418）晋将刘裕北伐，灭后秦姚泓，遣使授蒙逊为凉州刺史。北凉既得到晋朝的正式册封，全靠兴晋为号召的西凉李氏迅速失去了对河西汉族的号召力与吸引力，很快趋于崩溃。八年（419）蒙逊大破刘歆，攻夺酒泉。九年（420）进克敦煌，李恂败没，河西一统，“于是鄯善王比龙入朝，西域三十六国皆诣蒙逊称臣贡献”。[3] 蒙逊遂告捷江东。而是年宋已代晋，冬十月，宋遣使册拜“凉州胡帅大沮渠蒙逊为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4]从这一册命中可知，至刘宋王朝建立之后，晋朝的旧制护羌校尉的官名已不复存在了。

综上所述，“护羌校尉”的建置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这一官号始创于西汉，完善于东汉，至魏晋王朝定制为以凉州刺史而兼护羌校尉、戊己校尉，统领河西、西域。至晋末前凉开始，护羌校尉的名号已高于戊

〔1〕《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附张益》，页3195。

〔2〕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4《沮渠蒙逊》。

〔3〕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4《沮渠蒙逊》。

〔4〕《宋书》卷3《武帝纪》下，页58。

己校尉、西域长史，成为凉州割据势力首领除凉州刺史之外的另一尊号。前秦、后凉、西凉皆因其旧制，至沮渠氏北凉建立，护羌校尉的官职又进一步下降成为凉州刺史的下属官员。至此，护羌校尉已进入历史的尾声，并随着东晋王朝的灭亡而罢废。

4 河西诸凉、北魏王朝与西域

河西诸凉指汉族张氏的前凉、氐族吕氏的后凉、汉族李氏的西凉、匈奴沮渠氏的北凉，以及鲜卑秃发氏的南凉。其中除南凉以外，其余四凉王朝的政治主权都及于流沙以西，继续行使西域的政治主权。这些皇朝的统治者虽然族别各异，然其行政管理体系纯然汉、晋旧制，书面行文，通用汉语，典章制度，一如中原。这一时期河西与西域区域性的政治统一，维持了我国对西域的政治主权的历史连续性，进一步加强了边疆各族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1]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4.1 前凉对西域主权的维护与开拓

前凉是汉族张氏在河西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其始祖张轨本为晋末凉州刺史，持节护羌校尉，"关洛倾覆，凉土独全"。[2]

"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3]"，凉州成为北方汉族移民的中心："于时天下既乱，所在使命，莫有至者，张轨遣使朝贡，岁时不替。"[4]晋朝遂授之为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子张实继受晋封，此后，晋室南渡，朝贡隔绝，张氏父子世袭其位，仍奉晋朝正朔，末代君张天锡为前秦所俘以后，仍效忠晋室，乘淝水之战，亡奔江东，以晋臣终老。可见史书中所称的"前凉"，本质上仍然是晋朝在西北边疆的地方行政组织之一，与其他拥兵自立、割据称王的军阀是不一样的。

[1]原载《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5 年第 7 期。

[2]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 70《张轨》。

[3]《晋书》卷 86《张轨》，页 2225。

[4]《晋书》卷 86《张轨》，页 2223。

张氏政权既以晋臣自居，边疆一切行政建置悉守晋制，在碛西仍设西域长史、戊己校尉。前者总统政事，安抚属藩，驻节楼兰；后者管理屯田，供应军食，驻节高昌。晋太宁元年(323)，据有中原的匈奴前赵主刘曜亲统28万大军西征，为凉将陈轸所败。咸和五年(330)五月凉主张骏乘刘曜政权亡于羯石后赵之际，出兵东征，收复河南地，与石勒分疆。招致西域商贾，“是时，西胡致金胡饼皆拂菻，作奇状”，[1]说明上铸人物肖像的东罗马金币已在凉州通行。是年六月，后赵石勒自称天王，以大军压境，迫之称藩。张骏自度实力不敌，不得已暂时屈从，于是丝路贸易复通于京洛。据崔鸿《十六国春秋》记载，“时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此仅见于中原的西域贡物，可知此前丝路贸易仅至凉州为止。后赵建平元年（晋咸平五年，330）九月，石勒称皇帝，“高昌、于阗、鄯善、大宛遣使献方物”。[2] 这些使者也都是穿越前凉国境而来。而在此之前，这些国家都名义上称臣于晋，而实为前凉属邦。羯赵势力的强大，一度引起张氏政权西域政治主权的危机。前引史料中透露石勒称帝之岁，本属前凉戊己校尉驻地的“高昌”也混迹于西域诸国行列，向羯赵独立遣使纳贡，这意味着张骏治下的戊己校尉已发生叛乱。“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请诛之。骏曰：‘吾每念汉世宗之杀王恢，不如秦穆公之赦孟明。’竟以减死论，群心咸悦。”[3]这位李柏签署的文书业经日本大谷探险队在楼兰发现，可知楼兰、高昌一带都属前凉的有效领疆。前凉西域领疆之所以发生叛乱，并非孤立事件，它肯定同西域诸国响应羯赵政权有关。龟兹、鄯善皆叛前凉即为其证，赵贞也卷入了这一风潮，乘机据高昌自立，张骏明智地不责李柏败军之罪，旨在收拢人心，养精蓄锐，选择有利时机，博取部下为之矢忠效力。晋咸康五年(339)夏四月，又击败赵将王擢于三交城，进而规复西域，遣西胡校尉沙州刺史杨宣率军伐龟兹、焉耆，以张植为先锋，率奋威将军

[1]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张轨》，商务印书馆1958年，页486。

[2]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13《后赵石勒》。

[3]《晋书》卷86《张骏》，页2235。

牛霸、蛮骑校尉张冲等引军西征,“时值六月,至于流沙,无水,士卒渴甚”,[1]幸逢大雨,张植杀所乘马祭天,始过流沙。于是,“所向风靡,军次焉耆,国王龙熙拒战于贲仑城,为植所败,进屯铁门。未至十余里,熙又率众先要之于遮留谷。植将至,或曰:‘汉祖畏于柏人,岑彭死于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将有伏。’植单骑觇之,果有伏发。植驰击败之,进据尉犁。熙率其众四万人,肉袒诣宣降。于是西域诸国及前部、于阗并遣使诣姑臧奉贡”。[2] 赵贞似亦于是役平定。史载,“初,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3] 高昌郡的设立是西域郡县化的历史开端。这是前凉政权的极盛时代,尽有陇右、碛西之地,下领凉、河、沙三州,凉州下属武威、武兴、西平、张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晋兴、广武等十一郡;河州下属金城、兴晋、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城、汉中等八郡;沙州下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尉、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个郡级行政单位。张骏治姑臧,自称大都督、将军、假凉王,督摄三州诸军事,向晋称臣。此后西域局势仍似不靖,又继续进行了两次西征平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一是晋咸康八年(342)春正月,以和璘、谢艾为将,“讨南羌于阗,大破之”[4],另一次为“永和元年(345)冬十月,骏复遣兵伐焉耆,降之”。[5] 于是西疆大定,葱岭以东除龟兹以外,尽归前凉版图。在此期间,又增设狄道郡,归凉州,其州所属增至十二郡,鄯善、焉耆等国都来朝贡,西域奇珍,咸集姑臧。张氏宫廷,名玩珍宝甲天下,后凉咸宁二年(晋隆安四年,400)“凉州(一作即序不知何解)人胡据(一作胡安枚)盗发张骏墓,见骏貌如生,得真珠帘、云母屏风、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马瑙锺、黄金勒,水陆奇珍,不可胜纪[6]”。这些显然都是西域贡品。

张骏死,张重华嗣位,后赵石勒派大将麻秋统兵大举西讨,凉土震

[1]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74《张植》。
[2]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72《张骏》。
[3]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72《张骏》。
[4]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72《张骏》。
[5]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72《张骏》。
[6]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82《后凉录三·吕纂》。

动，张重华起用曾出征过于阗的谢艾为将，大破赵军，凉土转危为安。冬十月，乙丑，晋康献太后遣侍中御史俞归至凉州，授重华侍中、大都督、大将军、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假节西平公，奖其破羯之功，寄以光复关中、佐兴晋室的重任。“永和四年（348）天竺国重驿（译）来贡，其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圆、都昙、铜钹等九部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又有天曲。”[1]这种乐器组织类似后世盛行的龟兹乐，可见印度音乐的影响对于上述乐种形成的作用不可忽视。

张重华死后，张灵耀立，不久被谋杀。张祚立，政事荒怠，残暴，杀名将谢艾，自毁长城，激起内部政变，旋亦身亡。重华少子张玄靓立，年幼，实由张瓘秉政，不久为宋混所诛，劝玄靓去凉王称号，复为凉州牧，佐政精勤。宋混死，宋澄秉政，为张邕所杀，张天锡又杀张邕，弑玄靓自立，遣江南求册命，并告绝于前秦，立意整顿，颇有一番中兴气象。但此时氐人苻坚所建立的前秦已非常强大，剪灭群雄，一统北方，晋室又无北图恢复之志，以凉土一隅相与抗颉，势非其匹，终为前秦所灭。张天锡一度化为阶下囚，获释后随同苻坚南伐，乘淝水之败南奔江东。晋拜之为金紫光禄大夫，袭西平郡公虚衔。桓温北伐，起用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冀谋借其威望，号令西土，然功未成而身已殁。前凉政权共存在76年，传八主，直至张天锡时代，西域校尉等职仍存，先后任此爵者有张植、张硕等，为领导西域政事的最高机构。戊己校尉仍司西疆屯垦，玉门大护军则屯田碛口，有急则出师救应，高昌郡内陆续流入大量内地移民，课农桑，收租税，对发展边疆生产和传播华夏文化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4.2　吕光西征与前秦、后凉号令西域

前秦、后凉继承了前凉在西域的历史遗产，并有所进一步的拓展，二政权皆为氐族所建，它们一脉相承，不容分割。前秦是西晋灭亡以

---

〔1〕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73《张重华》。

来，我国北方出现的第一个统一政权。尽管存在的时间短促，其历史意义却是不可低估的。其始祖为略阳氐人苻洪，乘永嘉之乱，聚族起兵，先后依附于匈奴刘曜、后赵石季龙。及石遵继为赵主，罢其都督职位，乃起兵反赵，遣使称臣于晋，授为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广州（武）郡公，其子苻健继立，假晋将名义东伐，平定关中，遣使告捷江南，晋册为侍中，都督关中诸军事，大单于，秦王。苻健嫌所封官太小，永和七年（351）自称天王、大单于，建国号（前）秦，建都长安。苻健死，子苻生嗣位，荒淫暴虐，骇人听闻，苻坚在氐人吕婆楼、梁平老，汉人王猛等人的辅佐下，杀苻生，夺得政权。其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取得氐、汉各族人民的拥护，又善于利用形势，先联合鲜卑慕容燕打败兴师北伐的晋将桓温，继而吞灭前燕，尽并关东，又复进军河西灭前凉，一统江北。任命梁熙为凉州刺史，遣使西域各国，通知中原大定，并以大量丝绸馈赠诸国邦君，以招徕贡使商贾，史称"朝献者五十余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1] 当时苻坚还有所节制，退回了千里马[2]，苻坚命群臣作止马诗以示"无欲"。但随着统一事业的步步进展，就已不再满足于此了。"坚自平诸国之后，国内殷实，遂示人以奢，悬珠帘于正殿，以朝群臣，宫宇、车乘、器物，悉以珠玑琅玕奇宝珍怪饰之"，[3]这同中西交通大开，西域商品大量东来有关。例如前秦建元十七年（晋太元六年，381）春二月，"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这次不退了）……天竺献火浣布（按即石棉布，乃罗马特产，印度商人不过为转贸者）、康居（实为康国，与汉之康居异类）及海东诸国（指西海即里海以东）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方物"，[4]规模气象都已远远超过了两汉的鼎盛时代。其中鄯善、车师前部二国与前秦之间明显存在着宗藩关系。史载建元十八年（晋太元七年，382）九月"车师前部王弥

[1]《晋书》卷113《苻坚》，页2900。
[2]《晋书》卷113《苻坚》，页2900。
[3]《晋书》卷113《苻坚》，页2904。
[4]《晋书》卷113《苻坚》，页2904。

窴、鄯善王休密驮朝于坚，坚赐以朝服，引见西堂。窴等观其宫宇壮丽，仪卫严肃，甚惧，因请年年贡献。坚以西域路遥，不许，令三年一贡，九年一朝，以为永制[1]”。“是以西夷宾服，辏集关中，晋人为之题目，谓胡人为侧鼻，东夷为广面、阔额，北夷为巨脚，南蛮为月熏蹄，无以类名也。”[2]这种盛况也是空前的。

前秦的西部领疆承自魏、晋、前凉，仍以高昌为据点，臣下罹罪，多发往高昌流放。史载晋太元七年苻坚兄苻法之子东海公苻阳与王猛之子散骑侍郎王皮串通谋反，事泄，皆赦不诛，徙阳于高昌，皮于朔之北。[3] 说明高昌仍在前秦版图之内，而“阳勇力兼人，寻复徙鄯善，后劫鄯善之相，欲求东归，鄯善王杀之”。[4] 则又说明鄯善也直属前秦。此时大宛势力东进，汉代龟兹、焉耆皆不闻产善马，而此时该二国所产马与大宛无殊，这似乎意味着龟兹、焉耆王统已由汉之月氏人易为塞种，因而引起鄯善、车师前部二王的不安。前秦建元十八年九月，二王入朝奏请“大宛诸国，虽通贡献，然诚节未纯，乞依汉法，置都护故事。若王出师出关，请为乡导”。[5] 于是，苻坚决定出师西域，委任骁骑将军吕光为统帅，率凌波将军羌飞，轻骑将军彭晃，将军杜进、盛康及四府将陇西董方、冯翌、郭抱，武威贾虔，弘农杨颖等“总兵十万，铁骑七千（一说步兵五万，铁骑五千）西伐龟兹及焉耆诸国”。[6] 由此可见，吕光西征基于以下诸因素：(1)苻坚统一北方后，以汉晋帝国的正统继承者自居，志在恢复传统旧疆。(2)西域城郭诸国的经济利益与丝路贸易紧密相关，特别是得惠最多的鄯善、车师前部二国，积极敦促前秦置西域都护。(3)大宛、龟兹等国势力不断向东扩张，威胁前秦属国及其自身的西部领疆的安全，有必要诉之武力。

---

〔1〕《晋书》卷113《苻坚》，页2911。

〔2〕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37《苻坚》上。

〔3〕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38《苻坚》下。

〔4〕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38《苻坚》下。

〔5〕汤球辑崔鸿：《十六国春秋辑补》卷36《前秦苻坚》下，页280～281。又见于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38《苻坚》下。

〔6〕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38《苻坚》下。

吕光，字世明，略阳氐人，苻坚佐命功臣吕婆楼之子，少以勇悍著称，曾生擒所向无敌的张平悍将张蚝，威名大显，苻洛反，为吕光破之于中山，穷追之于幽州。但在这些战役中主将皆为他人，此次始首膺方面之任。吕光以鄯善王休密驮为前导，大军继之，行至高昌，听到苻坚南征道不顺利的消息，吕光一度犹豫，打算驻师听候调度。副将杜进力主"节下受任金方，赴机宜速，有何不了，而要留乎？"[1]于是决意前进，加鄯善王休密驮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域诸军事，宁西将军，车师前部王弥窴使持节平西将军，西域都护，率其两国兵并出。冬十二月，进入流沙三百里（这次是指吐鲁番至焉耆之间的流沙，不同于前凉张植所渡的莫贺延碛），缺水，"俄而大雨，平地三尺"[2]，因而顺利通过流沙之险，兵临焉耆。其王泥流接受前次败他前凉的历史教训，率其傍国请降，独龟兹王帛纯婴城固守，其城坚牢难攻，吕光屯军于城南，五里为一营，深沟高垒，广设疑兵，帛纯尽徙国人入居城中，倾其财宝，重贿狯胡，求其援兵。狯胡王遣其弟呐龙侯统率骑20余万，并引温宿、尉头等国兵合70余万来救，人多势众，加之狯胡军铠甲精良，射不可入，且使弓马，善矛矟，又有一种套人革带，掷之多中，诸将多主每营结阵。吕光认为："彼众我寡，众营又相远，势分力散，非良策也。"[3]于是，"迁营相接，按阵为勾（金巢）之法，精骑为游军，弥缝其阙，战于城西，大破之，斩万余级，帛纯收其珍宝逃奔（一作遁走），王侯降者三十余国。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广轮与长安城等，城中塔庙千数，帛纯宫室壮丽，焕若神居"。[4] 建元二十年（晋太元九年，384）秋八月，吕光奏捷于苻坚，疏称："惟龟兹据三十六国之中，制彼侯王之命，入其国城，天骥龙麟，腰裹丹髦，万计盈厩，虽伯乐更生，卫赐复出，不能辨也。所获珍宝以万万计。"[5]此年苻坚南伐失利，兵败淝水，退返长安后众叛亲离，国势渐危。虽授以"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

〔1〕《晋书》卷114《苻坚》下，页3054。

〔2〕汤球辑崔鸿：《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1《后凉吕光》，页566。

〔3〕汤球辑崔鸿：《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1《后凉吕光》，页566。

〔4〕汤球辑崔鸿：《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1《后凉吕光》，页566。

〔5〕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81《后凉吕光》。

校尉,进封顺乡侯,增邑一千户[1]”,然皆虚衔,且路绝不通,使命未达。二十一年(晋太元十年,385)三月,吕光“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使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而还[2]”,回师勤王。五月慕容冲攻长安和苻坚身披甲胄,亲自登城战,飞矢满身,流血遍体,局势更加危殆。九月,吕光军至宜禾,秦凉州刺史梁熙见苻坚即将败亡,谋阻吕光东归,割据自雄。其部下高昌太守杨翰进谋,“吕光新定西国,兵强气锐,其锋不可当也……若光出流沙,其势难测。高梧谷口,水险之要,宜先守之而夺其水。彼既穷渴,自然投戈。如其以远不守,伊吾之关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虽有子房之策,难为计矣”。[3] 这一建议未受到梁熙的重视,吕光鉴于流沙乏水之苦,又有当地降人做向导,大约未循故道返师,似由龟兹穿焉耆,取北道,经巴里坤南下哈密,高梧谷、伊吾关似皆北道险隘,其中伊吾关似即今松树塘一带谷口,梁熙弃而不守,吕光遂得以长驱东进,进至高昌,杨翰以郡迎降,及至玉门,梁熙令其子梁胤等率众五万拒之于酒泉,而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等俱迎降。吕光“报檄凉州,责[梁]熙无赴难之诚,数其遏阻归师之罪”,[4]遣彭晃、杜进、姜飞等为先锋,大破梁胤于安弥,生擒之。“于是西山胡夷,皆来款附,武威太守彭济执熙请降。”[5]九月,吕光顺利夺据姑臧,自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以亲信杜进为武威太守,有效地控制了河西全境,而是岁八月苻坚已为姚苌所杀,苻丕继立,遣使册封吕光为凉州牧,领西域大都督、酒泉公。晋太元十一年(386),前凉主张天锡之子张大豫潜回凉州,聚众起兵,进攻姑臧,企图重建前凉政权,然旋为吕光击灭,直至是年九月,苻坚死讯才传至凉土。吕光“奋袂哀怒,三军缟素,大临于城南,传檄诸州,期孟冬大举”。[6] 冬十月建元太安,十二月,吕光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领

---

〔1〕《晋书》卷114《苻坚》下,页2923。

〔2〕汤球辑崔鸿:《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1《后凉吕光》,页567。

〔3〕《晋书》卷115《载记十五·苻丕》,页2942。

〔4〕汤球辑崔鸿:《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1《后凉吕光》,页568。

〔5〕汤球辑崔鸿:《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1《后凉吕光》,页568。

〔6〕汤球辑崔鸿:《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1《后凉吕光》,页569。

护匈奴中郎将、凉州牧、酒泉公，由此可见，后凉政权实为前秦政权的继续。

吕光西征，大破龟兹、狯胡的结果，西域与河西的局部统一更加巩固，物质文化交流的内容更为丰富多彩。在龟兹驻留期间得到千斛蒲桃，“士卒取实来，离宫别馆傍尽种之”。[1] 又得龟兹乐，“其乐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箫、觱篥、毛圆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鸡娄鼓、钟鼓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人，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婆迦尔舞曲、丰天殊勒监曲”[2]等。又于龟兹迎回名僧鸠摩罗什，奉为国师，西域佛教因此亦大盛于河西，进而东传中土，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时龟兹、于阗等葱岭东城郭诸国已尽纳入后凉版图，贡献无阙。如太安二年（晋太元十年，385）“龟兹国王使至，献宝货奇珍，汗血马”。[3] 麟嘉元年（晋太元十四年，389）“遣市玉玺于于阗”。[4] 为了加强西域的行政管理，除高昌继续设郡，委任太守以外，又创设西域大都护，以王子亲自出镇。史载麟嘉六年（晋太元十九年，394）七月，“群议以高昌虽在西垂，地居形胜，外接胡虏，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镇之。光以子吕覆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高昌，命大臣子弟随之”。[5] 此为西域行政建置史上一大创新，自两汉以来，碛西地区始终是西域都护（或西域校尉、西域长史）、戊己校尉两权分立，互相牵制，军政得不到统一，级别亦仅同于郡，至此二权合为一体，王子出镇，至少位同于刺史，标志着权力、级别的升格。

吕光于晋太元二十一年（396）即天王位，改元龙飞，然称天王不久，后凉政权就开始滑向下坡。龙飞二年（397）吕光杀杂种匈奴豪酋沮渠罗仇，吕光旧部段业，河西汉人领袖李暠，罗仇弟子沮渠蒙逊、沮渠男成等皆相继举兵反，公推京兆人段业为首，署号大都督、龙骧大将军、

---

[1]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81《后凉吕光》。

[2]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81《后凉吕光》。

[3]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81《后凉吕光》。

[4]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81《后凉吕光》。

[5]汤球辑崔鸿：《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1《后凉吕光》，页574。又见于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81《后凉吕光》。

凉州牧、建康公,改龙飞二年为神玺元年,先后取得了酒泉、沙州、晋昌等地,神玺这一年号用了两年(398)以后,又改年号为天玺元年,此年,段业称凉王。吕光病殁,子吕绍嗣位,旋为其兄吕纂所杀,隆安五年(401)吕纂又被其从弟吕隆所杀。同年吕隆春二月即天王位,改元神鼎,而国势日衰,九月,称臣于已霸有关中的羌人姚氏后秦。神鼎三年(403)七月,河西王秃发傉檀与沮渠蒙逊合力进攻姑臧,吕隆势孤难守,请迎于姚秦,后秦主姚兴派兵护送其家口、亲信东迁,后凉亡,这一政权先后存在18年。

4.3 西凉与后西凉

氐吕后凉政权覆灭后,汉族李氏西凉、匈奴沮渠氏北凉继之兴起,这是两个同时并存、互相对立的政权,又是递相更替的政权,而其政治影响皆及于流沙以西。

西凉李氏家族是世居河西的汉族豪姓,祖籍陇右成纪,传说是汉朝飞将军李广的后裔。西凉创业主李暠字玄盛,小字长生,据说是李广的第十四世孙。其祖父李弇曾仕前凉张轨为武卫将军、天水太守,以功封安世亭侯,可见其赫赫家世。西凉创始人李暠官拜后凉敦煌太守。后凉龙飞二年吕光众叛亲离,李暠乘机夺据晋昌起兵,晋昌乃晋末中州移民的聚居区。晋大兴三年(320)晋王保所率关中豪宗大族万余人大部分安置于此,汉族势力相当强大。晋隆安四年(400)段业兵败后,河西汉人无首,李暠被义军公推为首领、大都督、凉公,建元庚子,与沮渠蒙逊形成对峙之势。其中沮渠蒙逊在东,李暠的势力范围在西。遣军"东伐凉兴,并击玉门以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1] 可见高昌等西域地区一开始就隶属于李氏西凉政权的统治之下。庚子二年辛丑(401),夏四月,后凉吕光称王之初派去于阗采购的玉石送到敦煌,被李暠劫留下来,纳入郡府,这批美玉,正好用以

[1]汤球辑崔鸿:《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2《西凉·李暠》,页635。

为西凉王朝的创建打制玉玺。晋义熙元年乙巳(405),李暠改元建初元年,春正月,李暠自称大都督、大将军,领秦凉二州牧。李暠继承了张氏前凉以来河西汉人的以南朝为皇朝正统观念,遣使江东,求册命。派遣了舍人黄始、梁兴间道赍表南下,约与晋共复中原。其书未报,似乎其使未必能顺利到达江东。建初二年(406)李暠亲率精骑二万出征至建康东,鄯善、车师前部等后凉所属诸藩,俱改向西凉称臣、贡献方物,于是移治酒泉。张掖、武威以东汉人纷纷投诚其境。李暠分前秦所虏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一万二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事实上西凉已发展成为河西汉人势力的中心。建初三年(407)为了打通与江东晋朝的政治联系,遣法泉利用僧徒的身份,再次秘密奉表间道诣晋,此行大约也没有取得成功,使未报。李暠在位18年,始终未得到东晋朝廷的正式册命,恢复东土的壮志也未实现,而鲜卑南凉首领秃发傉檀已入据姑臧,沮渠蒙逊的势力也日益壮大,忧怆苦思,宣泄为《槐树赋》《述志赋》,充分表现出河西士大夫这种孤立无依的心情。

建初十三年(晋义熙十三年,417)二月,李暠死,子李歆继位,西凉使节始达江东,晋授之为使持节都督七郡诸军事、镇西大将军、护羌校尉、酒泉公。嘉兴四年(北凉玄始八年,419)李歆引军东伐,为北凉所败,精兵丧亡殆尽,沮渠蒙逊乘机反攻,破酒泉,李歆遇难。北凉玄始九年(420)春三月,河西李氏家族在流沙以东最后的据点敦煌也被攻陷,嗣主李恂被俘,李暠孙李宝在舅唐契、唐和兄弟的拥戴下逃亡伊吾,西凉的河西领疆全部为北凉接管。

次叙北凉。

北凉为杂种匈奴沮渠氏所建。创始人沮渠蒙逊本张掖临松卢水胡人,匈奴有左沮渠、右沮渠的官职,蒙逊先世曾任此职,故号沮渠氏。时至晋末,已是一个汉化很深的河西匈奴世家。蒙逊之父曾为苻坚中田护军,伯父罗仇任吕光西平太守,鞠粥为三河太守。后凉龙飞二年(397)吕光遣鞠粥伐吐谷浑,败绩,杀鞠粥及罗仇,于是蒙逊及其从兄晋昌太守沮渠男成相率起兵,先推举建康太守、汉人段业为盟主,不久

蒙逊假段业之手杀男成,又借为男成复仇为号召,讨杀段业,吞并诸军。是年六月,建元建安,称凉州牧、张掖公,署置百官,与西凉李暠、南凉秃发傉檀争夺河西。蒙逊为人雄杰多谋略,先称臣于后秦,结好西秦,对西凉取守势,集中力量对付南凉,击败秃发傉檀,攻占姑臧,以为都城,自称河西王。玄始三年(晋义熙十年,414)十二月,晋益州刺史遣使结好,这正是沮渠蒙逊求之不得的,立即遣使报聘,向晋称臣。此举在争夺河西广大汉族民心的支持中起了显著的作用。与此同时,又兼臣于铁弗夏,以避东顾之忧,而与西秦反目,出兵打开碛西通道。史载玄始六年(417)"夏四月,西贡吞刀、吐火秘术",[1]即为其证。七年(418)晋将刘裕北伐,灭后秦姚泓,遣使授蒙逊为凉州刺史。北凉既得到晋朝的正式册封,全靠兴晋为号召的西凉李氏迅速失去了对河西汉族的号召力与吸引力,很快趋于崩溃。八年(419)蒙逊大破刘歆,攻夺酒泉。九年(420)进克敦煌,李恂败殁,河西一统,"于是鄯善王比龙入朝,西域三十六国皆诣蒙逊称臣贡献"。[2] 蒙逊乃告捷江东,是年宋已代晋,冬十月,宋遣使拜蒙逊为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

其时北魏拓跋氏所建北魏已一统中土,因于玄始十四年(425)兼臣于魏,遣使进贡,次年(426)又得到魏主河西王的册封。义和六年(元嘉八年,431)铁弗夏为魏所逼,举国西迁,企图渡河攻夺北凉领疆,蒙逊与吐谷浑合力阻击,全歼西徙的铁弗夏部众,发使告捷于北魏,魏主令其重臣崔浩亲自为书嘉勉。沮渠蒙逊善于审时度势,多面结援,在强敌环伺的恶劣环境中足以自立。蒙逊死后,子沮渠茂虔继立,应变手段远逊其父。其时漠北柔然势力日益强盛,并渐向西域发展,危及北凉碛西领疆的安全。为权宜之计,与称臣北魏的同时,又向柔然称臣,而北魏乃柔然宿敌,视为背叛,决心消灭这一政权。魏太延五年(宋元嘉十六年,439)魏师大举西征,北凉自非敌手,九月姑臧城陷,沮渠茂虔自缚出降,诸史皆以此岁为北凉灭亡之年。

---

〔1〕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4《沮渠蒙逊》。

〔2〕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4《沮渠蒙逊》。

其实,旧史所载西凉、北凉灭亡之年皆误。这是因为,这两个政权全盛时期的领疆都包容流沙东西两大部分。当西凉都城酒泉、北凉都城姑臧失守以后,其碛西领土仍然存在,其残余势力完全可以退守到那里去,依凭流沙天险,阻抗敌师,继续奉行西凉、北凉本朝正朔。由之出现了后西凉与后北凉两个政权。对于这两个皇朝的存在年限,应以其碛西政权结束之岁为准。

玄始九年(420)西凉王朝的河西领疆全部失守后,流沙以西的高昌虽亦主动归附于北凉治下,但伊吾地区仍属西凉,西凉王朝余裔反对北凉的复国斗争活动仍有继续活动的空间。据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4记载,"玄始十年(421)十二月,晋昌太守唐契据郡以叛,[蒙逊]遣世子政德讨之"。"玄始十一年(422)……夏四月,政德攻晋昌,克之,唐契及弟和、甥李宝同奔伊吾,招集流民,归附者二千余人,遂臣于柔然。"李宝、唐契等兵败,乃西渡流沙,说明西域原属西凉王朝的传统领疆,此举并非另辟新地,而是退守到本国最后的根据地去,继续奉行西凉正朔。说明西凉未亡,它同建都河西的西凉实质上一脉相承,理应称之为后西凉。崔鸿《十六国春秋·唐繇传》记"唐繇,晋昌宜安人也,以凉土丧乱,民无所掛,推暠霸于河右,以宁一方,及凉亡,繇子和与兄契携其甥武昭王孙宝避难伊吾,招集人众二千余家,臣于蠕蠕,蠕蠕以契为伊吾王,经二十余年"。而后西凉王朝的真正首领并非唐契而是李宝,乃西凉王裔、李歆弟酒泉太守李翻之子,酒泉陷于北凉,一度成为阶下囚。崔鸿《十六国春秋》卷83,收有李宝专传,记李宝"字怀素,小字衍孙,沉雅有度量,骁勇,善抚接",北凉陷酒泉,"父翻奔于北山,蒙逊乃徙宝于姑臧。岁余,随舅唐契北奔伊吾,臣于蠕蠕,遗民归附者稍至二千,宝倾身接礼,甚得众心,皆乐为属,每希报雪"。一度被俘的李暠夫人尹太后也逃出北凉国境,西渡流沙,伊吾遂成为西凉李氏复国的基地。当时面临的形势仍然极端险恶,其主要政敌沮渠氏北凉不但继续虎踞河西,与后西凉只隔一道流沙为阻,而且在流沙以西的高昌也属北凉的势力范围,而李宝所据伊吾与蠕蠕接壤,据此判断,他所据的伊吾,主要是在今巴里坤,而不是在哈密。而蠕蠕更是一个地跨大漠南北,并

且在西域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游牧奴隶制汗国。其势力足令北凉慑服,不得不屈身向其臣服,至于其所统人众似非“二千余人”,而是“二千余家”,以每家五口计,则伊吾之后西凉政权仍拥众万余人,在碛西仍是一支可观的势力。该政权依附漠北霸主柔然,结好车师前部,继续同世仇北凉相抗20年整(420—440),较其英雄祖父李暠享国18年还要更长些。

4.4 沮渠氏北凉与后北凉

北凉经历了沮渠蒙逊的全盛时期以后,传至沮渠茂虔时期已自感处于北魏、蠕蠕两大强权的两面夹挤之下,他开始时玩弄持两端的狡猾手法,但后来逐渐失效。魏太延五年(439)魏军大举西征,北凉自非对手,九月,北凉首府姑臧城陷,沮渠茂虔自缚出降,河西地区已由北魏接管。但是正如西凉失去河西并不意味着灭亡一样,北凉在流沙以西也有自己的领疆高昌,并且其王族势力仍未全绝,不久,北凉王族征西将军、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诸军事,领酒泉太守沮渠无讳于姑臧城破之后,并未降魏,而是聚兵敦煌,与其弟沮渠唐儿继续组织抵抗。太平真君元年(440)一度收复了酒泉,生擒魏将弋阳公元吉,击败永昌王健,进逼张掖,北凉一度势力复振,迫使北魏发动了第二次西征。太平真君二年(441)征南将军奚眷督率大军长驱而西,围酒泉。北凉将沮渠安周苦守多日,酒泉城中食尽,万余口饿死,力竭城陷,迫使沮渠无讳西迁,“无讳战败,遂率万余家,弃敦煌,谋渡流沙”。[1] 先遣其弟乐都太守沮渠安周统领所部渡碛,至鄯善,魏使已先至其国,令其在比龙坚守待援,沮渠安周连旬不克,退保东城,第二年(442)沮渠无讳亲率万余家弃敦煌,“西就安周,未至,鄯善王畏之,将四千余家奔且末”。[2] 但是,自从北魏攻占河西以后,形势大变,原居高昌的敦煌人阚爽夺取了高昌,自署为高昌太守,宣布脱离北凉统治,向北魏暗送秋波。高昌

---

〔1〕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5《沮渠无讳》。

〔2〕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5《沮渠无讳》。

原来是北凉的地盘，玄始四年(415)沮渠蒙逊曾任命隗仁为高昌太守，明载于史籍，即为其坚证。沮渠无讳、沮渠安周举众西迁，本来的投奔地也就是高昌，因此举只有西进焉耆，取得了胜利，基本上在碛外初步站住了脚跟。

北凉的灭亡引起了以伊吾为复国基地的西凉余裔的欢欣鼓舞，立即遣使赴魏朝觐，款忠称臣，李宝亲率部众四千人先归，东渡碛，夺"据敦煌，缮修城府，安集故民"。[1] 别遣唐契、唐和收复高昌"拥众西趣高昌，欲夺其地"，[2]本来闭境拒沮渠无讳的阚爽迫于此种威胁，又改认旧主，向沮渠无讳求援，"无讳乃留安周住鄯善，自率众从焉耆东北趣高昌"。[3] 然而西攻高昌的西凉大军进展并不顺利，柔然对于这支势力改臣北魏的背叛行为不肯甘心，遣将阿若统大兵追讨，途中邀击，唐契战死，及沮渠无讳军至高昌，"契已死，爽遂闭门拒之。无讳怒，遣部将卫星奴诱袭之，遂屠其城，爽奔蠕蠕"。[4] 沮渠无讳夺回高昌坚城之后，以之为国都，重建北凉王朝。旧史把这一政权同建都姑臧的北凉生硬地割裂开来，其实，它们王统一脉相传，同奉沮渠氏正朔，理应视为北凉王朝的继续，宜称之为后北凉。

后北凉(或曰高昌沮渠氏皇朝)的极盛时代东至鄯善，西至焉耆，称臣于宋而与北魏、西凉为敌，册立龙比之子真达为鄯善王，闭绝丝路通道，抄截魏使，由是"西域不通者数年"。[5] 与此同时，遣使汜隽奉表诣江东，宋主册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河、凉、沙三州诸军事，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可见刘宋也是承认这一碛西政权乃是河西北凉的正统继承者。无讳死，其子乾寿继立，北魏通过车师前部王向其诱降，乾寿心动，沮渠安周遂废之自立，乾寿奔车师前部，转道亡降于北魏。安周继续遣使通宋，求册命，宋册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河、凉、沙三州诸军事，领西域戊己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

[1]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6《沮渠无讳》。
[2]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6《沮渠无讳》。
[3]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6《沮渠无讳》。
[4]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6《沮渠无讳》。
[5]《资治通鉴》卷124，宋元嘉二十二年，页3912。

名号,凭借这一名号,争取到境内广大汉族居民的支持,并继续号令焉耆、鄯善、龟兹等西域诸国。

4.5 北魏与西域

正当西凉、北凉王裔相继西徙碛外的时候,中原、江南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历史变化,其中北魏一统北方是最突出的历史现象,我国南北对立的形势越来越欹斜于北魏一方,并进一步向西域发展势力,引起后西凉的归附,后北凉的国运已渐至终点。

北魏是晋末以来实现我国北方统一的第二个朝代。其创立者为鲜卑拓跋氏,源出漠北叶尼塞河上游,古索国之地,因此,北方晋人呼之为"索虏",一说以其留长辫如索,故称。至拓跋珪时代兴起,破高车、吐突邻、柔然诸部,398年建国号为魏,都于平城,进皇帝尊号,是为道武帝。经太宗明元帝,至世祖太武帝,重用汉族名臣崔浩等襄理政事,国势强盛。利用淝水战后我国北方的混乱形势,步步进展,剪灭群雄,一统黄河南北,尽有关中、关东之地,河西北凉、河源的吐谷浑一度也向其称藩,遂以华夏的正统皇朝继承者自居,其主要劲敌乃兴起于漠北的柔然。为了削弱柔然的政治影响,开始图谋向西域发展。史载北魏太延元年(宋元嘉十二年,435)"龟兹、疏勒、乌孙、悦般、谒般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等九国入贡于魏",[1]北魏立即遣使者王恩生奉使还聘,而道遇柔然截掠,后来虽"遣恩生等还,竟不能达西域"[2]。北魏第一次出使西域失败后,继续努力,锲而不舍。其时河西北凉犹存,称臣于魏,魏主乃"诏牧犍(按即沮渠茂虔)发导护送出流沙",[3]在其密切合作下,太延三年(宋元嘉十四年,437)魏使董琬、高明厚赍金帛,顺利出使至乌孙,乌孙又发"遣导译送琬诣破落那,明诣者舌,旁国闻之,争遣

[1]《资治通鉴》卷122,宋元嘉十二年,页3857。

[2]《资治通鉴》卷122,宋元嘉十二年,页3858。

[3]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5《沮渠茂虔》。

使者随琬等入贡，凡十六国[1]”，实现了重开丝绸之路、交通西域诸国的政治目的。但太延四年（438）北魏大举四道伐柔然，士马疫死，大败而归，局势逆转。柔然可汗遣使遍告西域各国称“魏已削弱，今天下惟我为强，若更有魏使，勿复供奉，西域诸国颇有贰心”[2]。北凉主沮渠茂虔在北魏、柔然二强间持骑墙立场，不利于北魏通西域的大业，引起北魏出师河西，导致北凉都城姑臧的陷魏、沮渠无讳的西迁与后北凉政权的建立。

以李宝为首的后西凉集团，获悉北凉已溃亡，其余裔业已西迁，光复故国的大业看来实现有望，加之多年臣服蠕蠕的结果是由于文化背景、种族、生产、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相互间矛盾必定非常尖锐，也早有脱离蠕蠕统治的决心。因于此年，断然决定弃伊吾，分兵两路，规复故宇。一路由李宝亲自统领，东进敦煌。另一路由唐契、唐和统率，南下进取高昌。蠕蠕迅速做出反应，派遣大将阿若统兵追击，“部帅阿若讨之，至白力城，和先攻高昌，契先阿若战败没”，唐契战殁，唐和攻高昌失利后，“收余众，奔车师前部王伊洛时，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宁、白力二城”，[3]与位居碛口冲要的车师前部互为犄角，在高昌以东站住了脚，“遣使请降于魏”[4]。李宝一军，更是迅速摆脱了蠕蠕的追击，顺利夺取了敦煌旧居：“后魏世祖遣将讨沮渠无讳于敦煌，无讳捐城遁走，宝自伊吾率流人及虏骑南袭敦煌，据之，修缮城郭，志复先业，遣弟怀达奉表归魏，世祖嘉其忠钦拜怀达散骑常侍、敦煌太守，别遣使授宝为使持节侍中，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镇敦煌，承制玉门已西，甚著威于西土，百姓怀之，在敦煌三年，因入朝，遂留于京师，徙为镇南将军，并州刺史，转镇北将军，魏太安五年卒，谥曰宣公，有六子。”[5]《魏书》卷39《李宝传》则记：“属世祖遣将讨沮渠无讳于敦煌，无讳捐城遁走，宝自伊吾南

[1]《资治通鉴》卷123，宋元嘉十四年，页3865～3866。

[2]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5《沮渠茂虔》。

[3]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6《沮渠无讳》。

[4]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6《沮渠无讳》。

[5]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3《西凉·李宝》。

归敦煌,遂修缮城府,规复先业,遣弟怀达奉表归诚,世祖嘉其忠款,拜怀达散骑常侍,敦煌太守,别遣使授宝持节侍中,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镇敦煌,四品以下听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师,拜外都大官,转镇南将军,并州刺史。还,除内都大官,高宗初,代司马文思镇怀荒,改授镇北将军,太安五年薨,年五十三,诏赐命服一袭,赠以本官,谥曰宣,有六子。"其中长子承,"字伯业,少有策略。初,宝欲谋归款,民僚多有异议,承时年十三,劝宝速定大计,于是遂决。仍令承随表入质。世祖深相器异,礼遇甚优,赐爵姑臧侯[1]"。作为一个独立政权的后西凉则已消失于史册,此后李宝、唐和等都已作为北魏治下的官员活动于历史舞台。其中李宝主政敦煌仅三年,即被魏主召入朝,留而不遣。先出任镇南将军,后来又调任镇北将军,这一职务实际上是令他主持北方边防各镇的边防事务,以对付蠕蠕,而李宝在伊吾二十年的过程中,一直同蠕蠕打交道,深知对手的虚实强弱,因之功勋卓著,死时五十三岁,谥宣公,有的史料记作宜公,其意无解,肯定是传抄之误。

在北魏势力步步向西域延伸的时期,后北凉已在今新疆东段站稳了脚跟,以高昌为根据地,号令焉耆、龟兹诸国,并紧紧控制住鄯善,阻断北魏西进的道路。因此,北魏决定先剪灭后北凉的东部羽翼鄯善王真达,太平真君六年(宋元嘉二十二年,445)以散骑常侍成周公万度归统凉州以西兵(其中显然包括了李宝、唐和所属后西凉旧部,也许其旧部就是这支部队的主力与核心)进击鄯善,"万度归到敦煌,留辎重,以轻骑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时鄯善人众布野,度归敕士卒不得有所侵掠,边守感之,皆望旗稽伏,其王真达面缚出降,度归释其缚,留军屯守,与真达诣京都[2]",西域复通。这是万度归主持的第一次西征,其结果是夺据了碛口咽喉鄯善,逼近北凉中心据点高昌,太平真君九年(宋元嘉二十五年,448)五月,北魏立为鄯善王,镇鄯善,赋役其民,比之郡

〔1〕《魏书》卷39《李宝传》,页886。

〔2〕《北史》卷97《西域传》,页3208。

县。[1] 北魏镇抚鄯善的最高首长虽然仍保护着"王"的称号,但实为北魏委任的官吏。太平真君九年,北魏决定第二次出师西域。这次出师的战略目标在于打通与西域强国悦般联系的通道,以便东西夹击柔然。其近期战略目标则在于削弱后北凉在西域的政治影响,争取南道诸国归顺于北魏。这时,以沮渠安周为首的后北凉政权仍然拥有相当实力,横亘于高昌,难于正面攻取,于是先击焉耆、龟兹。史载焉耆之战相当激烈,"焉耆国……恃地多险,颇剽劫中国使,太武怒之,诏成周公万度归讨之,约轻赍粮,取路次。度归入焉耆东界,击其边守左回、尉犁二城,拔之,进军围员渠,鸠尸毕那以四五万人出城守险以拒,度归募壮勇,短兵直往冲,鸠尸扫那众大溃,尽虏之,单骑走入山中,度归尽屠其城,四鄙诸戎皆降服……获其珍奇异玩,殊方诡谲难识之物,橐驼马牛杂畜巨万"[2]。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李宝之舅唐和,他于李宝调回京师以后,接统西凉余众,其部被称为"甘、凉以西兵",这是主要由原西凉所统晋昌汉族武装组成的一支劲旅,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北魏派遣成周公万度归西征,唐和所率"甘、凉以西兵"即为其主力之一,是役,魏军顺利占领了鄯善,置鄯善镇。太平真君九年,唐和又率军参加了万度归的第二次西征,焉耆之役,配合万度归,一举击溃焉耆王鸠尸毕那所统四五万精兵,迫鸠尸毕那亡奔龟兹,史载,"魏主诏唐和与[车师]前部王车伊洛帅所部兵会万度归讨西域,和说降柳驴等六城,因共击波居罗城"。[3] 至十二月,万度归进而西征龟兹,留唐和镇焉耆,柳驴戍主乙直伽谋叛,和击斩之。"由是诸胡咸服,西域复平。"[4]其后,魏军退师,委唐和留守,驻焉耆,成为北魏皇朝驻西域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唐和孤军长期戍守北魏最远的西部边陲焉耆,一直到太武帝逝世,兴安元年(452)北魏文成帝继立,唐和应召入朝,皇帝给予特殊礼遇,嘉奖他保卫西陲的卓勋。

[1]《北史》卷97《西域传》,页3208。

[2]《北史》卷97《西域传・焉耆》,页3217。

[3]《资治通鉴》卷124,宋元嘉二十五年,页3934。

[4]《资治通鉴》卷125,宋元嘉二十五年,页3935。

唐和驻节焉耆多年,威信著于西域,其丰功伟绩,足与汉之班超前后媲美。

由于北魏政治影响在西域的日益增长,后北凉的政治余晖日渐暗淡,它串通柔然无异于引狼入室,虽然取得了政灭车师前部、拓境于东的暂时胜利,却从此以后,受制于人,再想摆脱这种窘境已经不容易了。此时偏安江左的刘宋皇朝已自顾不暇,自然没有实力帮助这个碛外边臣,而柔然的侵迫则有增无减,它在艰难中维持到460年,结局仍然是"遂为蠕蠕(柔然)所并"[1],时为魏和平三年,宋大明四年。

综上所述,可以证实晋末至北魏初我国历史上虽称乱世,但西域地区仍然牢不可破地隶属于我国领疆,其中同河西诸凉王朝的关系尤为密切。在这些政权的统治下,边疆续有建置,规模更盛于汉、晋,如前凉之置高昌郡,后凉并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为一,升格为西域大都护,西凉之开辟伊吾,北凉之移民高昌都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河西与碛西区域性的统一维护了我国边疆行政主权的历史连续性,进一步促进了全国的统一事业。至北魏定鼎中原,进军河西,灭鄯善,比之郡县,屯兵焉耆,尽控岭东诸国,我国历史又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原刊于《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7期,总179期)

[1]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5《沮渠安周》。

5 隋朝与西域

隋朝在历史上虽然不长，但它不仅结束了自十六国、南北朝以来的割据、分裂的局面，重新实现了我国政治上的统一，而且充满着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着手再建亚洲的政治秩序，以恢复我国在这一政治秩序中的主体地位。规复西域即为实现这一历史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5.1 击败突厥的进犯，催化东、西突厥的分裂

隋朝崛兴之初，雄踞漠北、西域的突厥曾经是亚洲大陆的霸主，周、齐二国皆曾向其称藩，岁纳贡赋。因此击败和削弱突厥乃隋朝建立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它不仅是重振国威的关键，而且是实现西域规复大业的前提。

突厥勃兴于公元6世纪中叶，与北魏皇朝中衰、周齐两国的分立大体同时，这种分裂导致相互攻伐、相互削弱，突厥遂乘机扩张自身的势力，东正柔然，西灭嚈哒，迅速建立起一个领土兼有漠北、西域的游牧奴隶制强大汗国，出现了势凌中夏的严峻形势。周、齐二国为对付各自的主要对手，争相结好突厥，不惜向其纳贡称臣。“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人西虑，惧周交之厚，各谓虏意轻重，国遂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1]。”因此，“竭生灵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彤之财，弃之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2]”，成为边民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犹复劫剥(剽)烽燧，杀害吏民，无岁而不有也[3]。”隋朝乃汉族地主杨坚

[1]《北史》卷99《突厥传》，页3291。

[2]《北史》卷99《突厥传》，页3291。

[3]《隋书》卷84《突厥传》，页1866。“劫剥”，开明书局本作“劫剽”，似胜于中华书局本。

创立的政权,以强夏攘夷为其政治号召,早在杨坚为相周室,权总百揆之578年(周宣帝大成元年)已迫周帝下令恢复汉魏衣冠,以之声望日隆,至581年(隋开皇元年)自立为隋帝以后,更不能放弃这一政治旗号,因之立即废弃了前朝对突厥的传统政策,停止岁贡,加强边备,改奉强硬方针。突厥本无国库,其财政来源大部分依赖于周、齐二国的岁贡,断绝岁贡,无异于切断突厥的财源,由之突厥与隋朝的关系迅速恶化。当时突厥沙钵略可汗又是刚刚被推立的新君,急于建立军功,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遂先唆使其属国吐谷浑率先向隋发难,兵寇弘州(甘肃临潭县西)[1],迫隋放弃了该州建置。沙钵略更误以为隋朝虚弱可乘,遂于开皇二年(582)正式调发所属诸小可汗之兵,并征北齐降酋高宝宁所部以为向导,分兵数路,大举犯隋。其实,隋朝早已做了周密准备。早在开皇元年杨坚登位之初,已采纳长孙晟进献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2]"政策,充分利用突厥大、小可汗制度存在的固有矛盾,遣长孙晟出黄无道交结突厥东面可汗处罗侯及霫、契丹等东偏属部,遣太仆卿元晖出伊吾道交加突厥西面可汗达头,并博采众议,加强塞守,修筑长城,督饬士卒,"用入贼(指突厥)之物,加赐将士,息道路之民,务于耕织[3]"。因此,沙钵略第一次入侵,就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军事进展极不理想,而突厥乃奠基于阿史那氏等蓝突厥贵族奴役各异姓突厥的游牧奴隶制国家,其属部、属国不过慑其威势,被迫屈从,国内矛盾始终非常尖锐。乘其倾众犯隋、内部空虚之际,各属部、属国皆揭竿而起,"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4]",北则"铁勒等反,欲袭其牙[5]",西则"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即叛[6]",迫使突厥西面可汗达头率先返师,沙钵略也还军自救,导致第

---

[1]《隋书》卷83《吐谷浑传》,页1842:"其主吕夸,在周数为边寇,及开皇初,以兵侵弘州。高祖以弘州地旷人梗,因而废之。"同书卷29《地理志》:"后周立弘州及开远、河滨二郡。开皇初州郡并废。"

[2]《隋书》卷51《长孙晟传》,页1331。

[3]《北史》卷99《突厥传》,页3291。

[4]《北史》卷99《突厥传》,页3292。

[5]《隋书》卷51《长孙晟传》,页1331。

[6]《隋书》卷84《突厥传》,页1866~1867。

一次犯隋以失败告终。至开皇三年(583),不甘失败的沙钵略再次纠众犯隋,西面达头拒不奉召,金山阿波虽已应召发师,而受阻于隋军,交锋不利,长孙晟乘势说之,亦半道还兵,结果陷沙钵略于孤军,又大败,"沙钵略弃所服金甲潜草中而遁[1]"。突厥二次犯隋也告失败。沙钵略先与阿波争为大汗,夙有宿怨,遂把兵败的责任归咎阿波,返师时不直归於都斤山大牙,而是先趋金山,进袭阿波,虏其母,杀之,阿波因亡奔达头。达头亦畏沙钵略将罪及己,遂与之结盟,借兵阿波,助其复仇。阿波之弟贪汗可汗旋亦遭到株连,加入了这一阵营。于是,以阿波、达头、贪汗、潘那四可汗为一方,以沙钵略、处罗侯为另一方,双方刀刃相见,至此,突厥内战已全面爆发。

突厥犯隋的失败迅速提高了隋朝的政治威望,突厥内战更为隋朝削弱自身主要对手创造了有利条件。隋文帝杨坚深刻认识到一个强大的突厥汗国的存在是隋朝最大的威胁,唯一解决途径乃是利用这场内战,进行分化、离间,催化其分裂,长孙晟献策的核心用意就在于此,因而全力推行这一政策。突厥内战形势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历史反复,长孙晟都不失时机地做出灵活、有效的政策反应,力图使形势的发展不偏欹于任何一方,以稳操内战诸方的实力平衡,其基本方针则乃始终奉行离强合弱、远交近攻的政策。

隋朝初本奉行左袒西部叛乱集团、孤立大汗沙钵略的政策,而突厥内战的初期形势也确实有利于西部叛乱集团而不利于大汗沙钵略,阿波东征迅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沙钵略则接连遭到失败,部曲散亡,兵势日蹙,到了难以自保的地步。至开皇四年(584)已不得不奉表隋朝,稽颡称臣。本来与隋有杀父之仇的突厥可敦周千金公主也奉表求为隋帝女,隋皆许之,并特发诏改册千金公主为隋大义公主,预宗籍。至开皇五年(585)阿波可汗已乘势长驱东进,攻夺了於都斤山大牙,占领了漠北全境,沙钵略处境益窘,被迫进一步投附于隋,"请将部落度

[1]《隋书》卷54《李彻传》,页1368。

漠南,寄居白道川,隋主许之,命晋王广以兵援之,给予衣食[1]”。至此,突厥大牙沙钵略已沦为隋朝的藩属。隋朝接纳沙钵略并不意味着对突厥的整体政策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与此同时,隋朝又“遣上大将军元契使于突厥阿波可汗[2]”。这时,阿波已在漠北自立为突厥大可汗,隋朝遣使则意味着对这一政权也予承认,除了这两支势力以外,隋朝还同割据西面的达头可汗正式媾和。至此,突厥内战中的两派势力已进一步演变为三个政权的并存鼎峙,其中阿波在北,沙钵略在南,达头在西。隋朝对这三个政权同时予以承认,其用心显然在于维持突厥分裂的局面,可见,这依然是离强合弱政策的继续。

但是,突厥三汗并立的形势并未维持多久。这是因为,阿波之所以东征获胜本多借重达头之力,而及其攻夺漠北,自立为大汗之后,反势凌达头,势必引起后者的不满,内战初期形成的阿波—达头联盟迅速破裂,并反目成仇,化友为敌。达头统兵东征,至 Tili 河上(土拉河,亦即独乐水),破 Khoun(浑)、Ouar(乌罗)、Ogor 诸部,并以 Eolkh(结骨)首领试其剑锋,伏尸不下三十万[3]。以上皆为阿波可汗所属九姓铁勒部落(Toquz oγuz),可知阿波已败于达头。故处罗侯上表隋帝称“阿波为天所灭,与五六千骑在山谷间[4]”,其时降隋的突厥大汗沙钵略已死,依突厥兄终弟及祖制,处罗侯已继承了可汗之位,建号莫何可汗,因表请隋朝“乘机进取,伏听诏音,当取以献[5]”,旨在借隋之力,规复漠北旧宇。隋主将此表付之廷议,长孙晟又进言“若突厥背诞,须齐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灭,阿波之恶,非负国家,因其穷困,取而为戮,恐非国家之福,不如两存之[6]”。其政策出发点仍在于分裂突厥,隋纳其策,未准莫何之请,力图继续维持三汗并立的局面。

---

〔1〕《资治通鉴》卷176,陈至德三年(隋开皇五年,585),页5482。

〔2〕《资治通鉴》卷176,陈至德三年(隋开皇五年,585),页5482。

〔3〕沙畹:《西突厥史料》,页176。

〔4〕《册府元龟》卷990《外臣部·备御三》,页11632。

〔5〕《册府元龟》卷990《外臣部·备御三》,页11632。

〔6〕《册府元龟》卷990《外臣部·备御三》,页11632。

历史的发展并不以隋朝的意志为转移，史载处罗侯"勇而有谋[1]"，自然不肯放弃敌手困厄的大好时机，尽管请援于隋而不应，仍然断然出兵，赍隋朝所赐旗鼓以壮声威，北征阿波，"敌人以为得隋兵之助，多来降附，遂擒阿波[2]"。进而统一大漠南北，还牙於都斤山，其势复振。接着又进击达头，志欲恢复昔日大可汗君临漠北、西域的政治权威，但出师不利，中流矢而卒。沙钵略之子雍虞闾继续汗位，寻号都蓝可汗，照旧继续其父、叔遗业，继续西征达头。达头实力本来足以与之为匹，但因这时波斯正发大军攻其后方，难于两面受敌，只好全力对付波斯，东线则暂时取守势。因此，都蓝西征初期曾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其前锋已推进到高昌、于阗一线。史载开皇十一年(591)"突厥都蓝可汗遣其母弟褥但特勤，献于阗玉杖[3]"。于阗位于西域，本为达头可汗属国，今已服从都蓝号令，得其特产，可见突厥内战中期，形势的发展又一度有利于突厥大汗，实力对比出现了东向欹斜，这是有违于隋朝初衷的。隋朝对突厥的基本政策是，保持内战双方处于实力均势，以催化突厥汗国分裂的定型化。都蓝可汗即位之初，一则处罗侯新败于达头，达头强而大汗弱，二则都蓝可汗是隋朝册立的，此汗初亦对隋恭执藩礼，极尽结好之能事，故曾予以政治上的支持。这是都蓝西征初战获捷的重要原因。但都蓝势力既已深入西域，形势渐不利于达头；加之，都蓝妻大义公主叛志复萌，先于开皇十一年收容亡人杨钦，且通过此人参与了彭国公刘昶与宇文氏串连的谋反事件，至开皇十三年(593)又题诗于隋主所赠陈叔宝屏风上，抒发亡国反隋的积恨，礼赐益薄，"公主复与西突厥泥利可汗连结，上恐其为变，将图之。会主与所从胡私通，因发其事，下诏废之[4]"，并以美女赂都蓝，令其手杀公主于帐。大义公主历配沙钵略、处罗侯、都蓝三可汗，皆为可敦，参赞帷幄，为其谋主，除去此人，实已卸掉都蓝一有力臂膀。隋朝又以和亲为诱饵，两许

[1]《北史》卷99《突厥传》，页3295。
[2]《北史》卷99《突厥传》，页3295。
[3]《北史》卷99《突厥传》，页3292。
[4]《北史》卷99《突厥传》，页3296。

都蓝及其麾下北面小可汗——突利可汗染干,以离间其内部,为此双方矛盾愈演愈烈,都蓝遂众叛亲离,实力大为削弱。而在此期间,达头已胜利地结束了同波斯的战事,巩固了后方,从容调动兵力,开始了全线反攻。开皇十四年(594)内战演变已对都蓝不利,开皇十七年(597)征Spazeugoun(潘那)、Roumoxola(泥利)、Touldikh(突利)三小可汗之兵,大破都蓝主力于Ikar平原[1],达头遂即以突厥"七姓大首领,世界七国主[2]"名义致书东罗马皇帝,这意味着此年达头已自立为大可汗,乘胜挺进漠北,而都蓝可汗则已兵败如山倒,统治岌岌可危。在此关键时刻,隋朝果断地抛出了和亲彩球,正式甩弃了都蓝可汗,而许婚于突利可汗,册立宗女为安义公主嫁之,"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长孙晟说其帅众南徙度斤旧镇[3]"。按度斤旧镇应即於都斤山大牙,突利可汗染干本为突厥北面小可汗,地在於都斤山北,至是南徙隋过,与隋相倚,每边防有警,"突利伺知动静,辄遣奏闻,由是边鄙每先有备[4]"。由是突厥内战又进一步演化为达头、都蓝、突利三政权的鼎足而峙的局面。

时至开皇十八至十九年间(598—599),达头、都蓝两大势力又复合流,共同向突利可汗发动进攻,这一合流意味着达头已完全控制了漠北,而原来的大汗都蓝则已被迫向其臣服,沦为其麾下小可汗。突利独力难支,隋朝遂正式武装介入了突厥内战,于是突厥内战中传统的东西对峙格局进一步演变为南北对峙的形势,而以达头、都蓝为一方,隋朝和突利为另一方,到了开皇十九年十二月,即600年元月,都蓝被部下所杀,其众完全并入达头,建号步迦可汗,其时漠北、西域全境已都置于步迦可汗的统一号令之下,唯一与之抗衡的亲隋势力就是突利可汗染干了。隋朝更是全力加强了对他的武装保护。在此前一个月,即开皇十九年十二月(599年12月),隋朝正式颁诏册立突利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派兵与之并肩抗击达头,双方经历了4年的曲折、反复,隋与启民

〔1〕沙畹:《西突厥史料》,页177。

〔2〕沙畹:《西突厥史料》,页177。

〔3〕《册府元龟》卷978《外臣部·和亲一》,页11494。

〔4〕《资治通鉴》卷178,开皇十七年,页5558。

可汗之间的联盟终于击败了一度有希望重新实现突厥统一大业的步迦可汗达头。至仁寿三年(603)达头兵败威挫,漠北九姓铁勒群起暴动,"达头众大溃[1]",本欲奔还西域老巢,而归路已断,只好"西奔吐谷浑[2]"。启民可汗乘势接管了大漠南北,突厥西部地区也大乱,木杆—阿波之裔的泥利可汗击败了达头之裔鞅素特勤,自立为西部的大可汗,迫鞅素特勤成为臣服于他的小可汗,封并闭境,阻达头取道吐谷浑西返,迫之客死异国,而与启民媾和分疆。自此,作为政治统一体的突厥汗国已不复存在,各有固定边界的东、西突厥两个独立的汗国正式形成,这就大大减轻了来自西、北两方对隋朝的威胁,进一步提高了隋朝在周邻各族中的崇高威望。自此,隋朝与突厥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主客、强弱易位,这是推行离强合弱政策的重大胜利。

5.2 击败吐谷浑,建置且末、鄯善、河源诸郡

文帝卒,炀帝继立,隋炀帝的形象是以好大喜功载于史册的,这无疑寓有贬义,然而实质上不过是雄才大略的另一种表述形式。早在他居藩为晋王时,就曾多次统兵北征达头,当其在位初期,更反映了这一进取锐气。炀帝甫登帝位,就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外交机构——四方馆。史载,"初,炀帝置四方馆于建国门外,以待四方使者……东方曰东夷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3]"。其中西域互市的地点设于张掖,裴矩初任西戎使者。裴矩,字弘,河东闻喜人,太子舍人裴讷之子,好文藻,有智数,文帝时受命出使突厥,说都蓝杀大义公主,精通西夷事务,名仅亚于长孙晟。及受任西戎使者,主互市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要,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悦,每日引矩至

〔1〕《隋书》卷51《长孙晟传》,页1335。
〔2〕《隋书》卷51《长孙晟传》,页1335。
〔3〕《隋书》卷28《百官志》下,页798。

御座，亲问西方之事。矩盛言西方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吞并，帝由是甘心，将通西域，四夷经略，咸以委之[1]。”并“复令矩至张掖，引至西蕃，至者十余国[2]”。炀帝亦称裴矩之能，擢为银紫光禄大夫，开始着手实现规复汉、唐西域旧疆的大业，其主要对手就是吐谷浑与西突厥。

先叙击败吐谷浑，建置且末、鄯善等四郡。

吐谷浑，乃羌化鲜卑所建大国，其始祖吐谷浑本为辽西慕容鲜卑一部首领，远自十六国时期率众西迁，渡洮水，进至群羌故地，开基建国，后世遂以其名为国号，至隋夸吕可汗已历十八代君，建都河源，其领疆跨有流沙东西，兼有河源、河西、西域之地，国势之强，仅亚突厥，且与之互为唇齿。史载“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3]”，在隋人心目中也是仅次于突厥的第二号强大对手，北周之世，对西部边疆常有寇掠，屡战不利，只能以“怀柔”的手段姑息。至隋朝建立以后，率先犯境者也是此国，开皇二年、三年突厥两次犯隋之役，吐谷浑皆与之相互配合，遣兵入侵，只是由于突厥犯隋失利，才停止了这种寇掠。此后隋朝国势日强，特别自开皇九年（589）灭陈之后，吐谷浑的气焰才逐渐收敛，隋文帝的施政方针又是重在与民休息，无意拓疆开土，故未给予还击。至开皇十一年（591）吐谷浑可汗夸吕卒，子世伏继位，是为吐谷浑第十九代君，遣兄子无素“奉表称藩，并献方物，请以女备后庭[4]”。文帝收其物，而拒其女，开皇十二年（592）遣刑部尚书宇文弼持节至吐谷浑招慰，向其推行怀柔政策。开皇十五年（595）世伏再遣使诣隋贡方物，并求和亲，文帝许之，开皇十六年（596）册宗女为光化公主，嫁世伏命散骑常侍柳謇之为和亲使，送光化公主至吐谷浑。世伏上书称公主为“天后”，以表恭谨，文帝不许。然至开皇十七年（597）世伏为其弟伏允所杀，伏允继汗位，是为吐谷浑第二十代君。上表续请尚光化公主，诏许之。是岁突厥内战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达头统兵东征，大破都蓝，自立为

---

[1]《隋书》卷67《裴矩传》，页1580。

[2]《隋书》卷67《裴矩传》，页1580。

[3]《隋书》卷67《裴矩传》，页1580。

[4]《隋书》卷82《吐谷浑传》，页1844。

世界七国主，伏允遂臣于达头。仁寿三年(603)达头兵败，无路可投，伏允却独收纳其入境，可见其关系的密切，达头竟客死其国。东、西突厥分立以后，伏允对于西突厥的泥利可汗及其后继者泥橛处罗可汗关系甚密，而对隋则非但早已不事藩礼，而且常加寇掠。大业元年(605)炀帝继立后，决心剪除这一反隋政权，恰于此岁，天山北麓地区出现了一个以契苾歌楞、薛延陀乙失钵为首的铁勒国，势力日盛。大业三年(607)"秋七月……裴矩说铁勒，使击吐谷浑，大破之[1]"。次岁(大业四年，608)隋朝又遣使崔君肃赴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牙庭，也令其发兵攻吐谷浑，泥橛处罗与吐谷浑关系密切，表面受诏，实未发兵，至大业五年(609)隋炀帝决心亲统六军，以巡河右为名，向吐谷浑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夏四月，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五月乙亥大猎于拔延山，进行战前军事演习，而后筑桥渡川，进入吐谷浑境，分遣内史元寿南屯金山，兵部尚书段文振北屯雪山，太仆卿杨义臣东屯琵琶峡，将军张寿西屯泥岭：

> 四面围之。浑主伏允以数十骑遁出，遣其名王诈称伏允，保车我眞山。壬辰，诏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往捕之。定和挺身挑战，为贼所杀。亚将柳武建击破之，斩首数百级。甲午，其仙头王被围穷蹙，率男女十余万口来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禄大夫梁默、右翊卫将军李琼等追浑主，皆遇贼死之。癸卯，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太半。丙午，次张掖……壬子，高昌王曲伯雅来朝，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上大悦。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2]

经过空前激烈的血战，隋军方面付出了惨重的牺牲，虽然未生获伏允，但确已击溃了其主力，吐谷浑大部分国境已被隋军接管。在此基础上，正式创立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

> 鄯善郡：大业五年(609)平吐谷浑置，置在鄯善城，即古楼兰

[1]《资治通鉴》卷180，炀帝大业三年，页5641。
[2]《隋书》卷3《炀帝本纪》上，页73。

城也,并置且末、西海、河源,总四郡,有蒲昌海、鄯善水。统县二:显武、济远。

且末郡:置在古且末城,有且末水,萨比泽。

西海郡:置在古伏俟城,即吐谷浑国都。有西王母石窟,青海盐池。统县二:宣德、威定。

河源郡:置在古赤水城,有曼头城、积石山,河所出,有七乌海。统县二:远化、赤水。[1]

史书又载,“帝复令[刘]权过曼头、赤水,置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留镇西境[2]”。至此,隋之版图已“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极于此也[3]”。以上四郡中西海、河源二郡在今青海省,鄯善、且末则皆在今新疆,吐谷浑的平定,是隋朝西部开拓的历史产物。

次叙隋朝对西突厥的分化,册立射匮可汗,招抚泥橛处罗可汗东徙隋境。

统一的突厥汗国分裂以后,东突厥汗国主管漠北,西突厥君临西域,大大地减轻了隋朝的威胁,其中东突厥启民可汗乃隋朝所立,对隋称藩、称臣,禀其指麾,隋朝的边防重点遂转移到西突厥方面来。西突厥汗国实由阿波、达头两大汗系,咄陆、弩失毕等两厢部落组成,其历史源渊可以追溯至木杆、室点密西征时期。史载:“室点密,从单于统十姓(按“十”应为“七”之误,十姓之称乃始自咥利失可汗),有兵十万众(疑为七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七)姓部落,世统其众[4]。”文中之“单于”应指阿波之父、突厥大可汗木杆。其时突厥大牙还在金山,左厢咄陆诸部皆其旧日部曲。室点密则乃木杆副帅,嚈哒既平,被封为西面小可汗,留守西域,右厢弩失毕部即其新收帐落。室点密死后,达头袭父旧封,仍为西面小可汗,建牙鹰娑川,为西域一方之

[1]《隋书》卷29《地理志》上,页816。

[2]《隋书》卷63《刘权传》,页1504。

[3]《隋书》卷29《地理志》上,页808。

[4]《旧唐书》卷194《突厥传》,页5188。

雄。而木杆之子阿波安被拜为小可汗,仍牙于金山,其父咄陆旧部悉隶其麾下。突厥内战时期的西部叛乱营垒就是由这两大派势力共同组成的。至仁寿三年(603)西突厥与东突厥分疆而治以后,最先得势者乃木杆、阿波系的泥利可汗与泥橛处罗可汗,室点密、达头系的咄六叶护、射匮可汗沦为其小可汗。当阿波系的泥橛处罗可汗为西突厥大可汗时期最为跋扈,当其武功全盛时,东破启民可汗,西破石国,铁勒诸部尽为其臣属,一度有重新统一东、西突厥之势,成为隋朝的重大隐忧。如何采取对策已成为隋朝面临的严峻议题。

根据前朝成功地分裂突厥汗国的历史经验,对于这一强大势力,军事进攻不如政治分化。而西突厥自身存在的两大汗系、两厢部落的固有矛盾正好可以利用。长孙晟死后,炀帝重用继续倡导推行离强合弱、远交近攻政策的裴矩,终于胜利地实现了自身的政治目标,完成了山汗统由阿波系到室点密系王统的历史性转移,迫使本来敌视隋朝的泥橛处罗可汗失位后托庇于隋。

泥橛处罗的穷兵黩武政策并未给他带来好的结果,其武功盛世亦只昙花一现。大业元年(605)他又谋大举东伐,厚敛属部,坑杀不肯听命的九姓酋长,激起九姓铁勒的联合暴动,公推契苾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薛延陀酋长乙失钵,即也咥为小可汗,创建铁勒汗国,连挫泥橛处罗可汗,导致其国势渐衰,原已臣服于他的小可汗咄六叶护之子射匮可汗也渐不服从他的统治。大业四年(608)隋朝乘其败,遣使崔君肃说其降隋,征召其兵合攻吐谷浑,泥橛处罗又阳奉阴违,遂纳裴矩之策"以计弱之,分裂其国[1]",秘密召见射匮可汗使节,赐白羽箭为符信,册立射匮可汗为西突厥大可汗,令其发兵东征。"射匮闻而大喜,兴兵袭处罗,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2]。"高昌王麴伯雅上书言状。泥橛处罗母向氏,本汉人,原为泥利可汗婢妾,生处罗后另适他人,时在长安,隋乃遣使,并

[1]《隋书》卷84《西突厥传》,页1878。
[2]《隋书》卷84《西突厥传》,页1878。

挟其母向氏以为人质,前往招抚,泥橛处罗穷蹙,遂入徙内地,时为大业六年(610),七年(611)入觐炀帝。史载"十二月己未,西面突厥处罗多利可汗(泥橛处罗可汗)来朝,上大悦,接以殊礼[1]"。大业八年(612)隋朝东征高丽,泥橛处罗可汗所统主力应诏从征,改封为曷萨那可汗。其老弱悉留会宁郡,及东征返师后,又分其部为三:一由曷萨那率精锐主力随侍炀帝,为其御林军,并册宗女为信义公主嫁之,以结和亲。二由特勤史大奈率其少壮部曲,安置于楼烦郡。三由曷萨那弟阙达度设统其老弱瘦羸,游牧于河西。至此,曷萨那可汗(泥橛处罗可汗)已实际上失去了自身的传统领地,沦为寄居隋地的雇佣武装。至于达头系的射匮可汗虽已代之君临西突厥,但因乃受隋册封而得国,东与隋之藩属启民可汗为首的东突厥议和分界,重在西向拓宇,未尝东犯,同隋朝维持着友好关系,隋朝的政治影响因之进一步远播西域。

5.3 臣服高昌,控制碛口,击破铁勒,建置伊吾郡

至大业三年:

帝将巡河右,复令矩至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西域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2]

前之来贡者仅10余国,至此已达27国,可见大业元年至三年间(605—607)隋朝的政治影响已日益扩大,而且重点已开始转向西域。这意味着久已中断的丝路贸易又恢复了繁荣。这就更加强化了西域诸国的向心力,其中位居碛口的汉族政权高昌麹氏皇朝率先归附于隋。

高昌国因汉之高昌壁而得名,位于吐鲁番盆地,车师前部故境,汉

[1]《隋书》卷3《炀帝本纪》,页76。
[2]《隋书》卷67《裴矩传》,页1580。

通西域，初于此置垒，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以其地安置老弱病员，其后即留为屯垦士卒，经营为汉之屯田重地，汉人士卒与当地车师女子结姻，衍生后裔，人丁日盛。及汉祚中衰，河西阻绝，原来散戍西域各地的汉军东归不得，悉聚碛口，结寨自保，遂成为碛西汉族最大的聚居区。晋之戊己校尉就设于此。八王、五胡乱兴，司马氏南渡，其地隶属于河西诸凉王朝的版图，置高昌郡。及北凉都城姑臧陷于北魏，其余众无可依托，441 年在沮渠无讳、沮渠安周的率领下，西渡流沙，退保高昌，据以为都，割据碛西半壁河山，仍奉北凉正朔，史家公认，高昌独立建国即始于此年。北魏和平元年（460）沮渠氏高昌（后北凉）为柔然所灭，立敦煌人阚伯周为王，此人或即前亡奔柔然的阚爽之裔，是为高昌阚氏皇朝。这一皇朝全凭依附柔然以自存。北魏太和五年（481）高车王阿伏至罗败柔然，乘胜破高昌，杀阚氏皇朝末代君阚首归，另立张孟明为王，是为高昌张氏皇朝。这一皇朝的存在又全凭高车的支持，及高车势衰，国人杀张孟明，立马儒，是为高昌马氏皇朝。马儒以碛外艰险，遣使降魏，谋东迁就安，而当地人民早已安土乐居，以此违忤众意，又为国人所杀，立麴嘉为王，是为高昌麴氏皇朝。这一皇朝虽然处境也并不比此前诸皇朝更好，却善于审时度势，将传统文化中的自存术发扬到了极致。这一皇朝在国内大力弘扬华夏的传统文化，以加强内部的凝聚力；对外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训为指导，先后臣服于当时称霸漠北的游牧民族政权，并同内地的中央皇朝秘密保持亲密的联系。至公元 6 世纪突厥崛兴，高昌迎战兵败，迅速转向，以内部的高度自治为代价，称臣于突厥。及突厥内战初期，阿波可汗得势，夺据於都斤山大牙，自立为突厥大汗，"阿波寝强，东距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1]"，高昌恰位于"伊吾"及"西域诸胡"之中，可知亦臣于阿波，时为开皇五年（585），正当高昌主麴乾固在位之时，及开皇十七年（587）达头可汗反攻胜利，又复臣于达头。麴乾固以隋仁寿元年（高昌历延昌四十一年，601）薨，子麴伯雅继位，是为高昌麴氏皇朝第八代

[1]《资治通鉴》卷 181，页 5482 误系此为大业六年（610）事。

君,“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纳突厥可汗女),伯雅不从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从[1]”。文中之“突厥可汗”乃指达头,可知达头为控制高昌,曾嫁女麴乾固以结和亲。麴乾固死后,此女又为麴伯雅王妃。然至隋仁寿三年(603)达头可汗的统治溃灭,西突厥独立为国,而这一汗国的初期大汗则乃阿波之裔,达头可汗失势,这种和亲关系亦复失效。麴伯雅遂于“大业四年(608)遣使贡献,帝待其使甚厚[2]”。隋朝以泥橛处罗可汗桀骜难制,奉行扶植达头之裔,分化西突厥的政策,册立射匮可汗,令其东征,至大业六年(610)泥橛处罗可汗兵败,南遁高昌北境,保时罗漫山,可知其时高昌与泥橛处罗可汗之间的宗藩关系犹未解除,故“高昌王麴伯雅上状[3]”于隋,隋因遣使派军,护送泥橛处罗可汗东徙。高昌王麴伯雅入朝亦与为此同年,史书记载为大业四年之“明年”,即大业五年(609),必误,“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女华容公主,八年(612)冬归藩[4]”。至此,高昌已改臣于隋。接着麴伯雅受召随炀帝参加了东征高丽之役,这场战役却成为隋朝国势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渡辽后,隋军大败,被迫班师。正当此时,西域形势也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出自木杆汗系的泥橛处罗降隋之后,西突厥大汗虽已易为室点密汗系的射匮可汗,但新疆兴的铁勒汗国犹十分强大,泥橛处罗故境的真正接管者并非射匮可汗,而是铁勒汗国,包括高昌国在内,都已听命铁勒而不是西突厥的正统大汗射匮,这从麴伯雅为急于遁身归国而设计的变服令并未真正实施的史实中可以得到印证。这件以全面恢复华衣冠为内容的制令全文如下:

夫经国字人,以保存为先,宁邦辑政,以全济为大。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国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为一,普天奉上,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下上,皆宜解辫削衽。[5]

---

[1]《隋书》卷83《高昌传》,页1847。
[2]《隋书》卷83《高昌传》,页1847。
[3]《隋书》卷84《西突厥传》,页1878。
[4]《隋书》卷83《高昌传》,页1847。
[5]《隋书》卷83《高昌传》,页1847。

但是，这一纯为“取悦中华”的制令未能实行的原因就在于这时的高昌已置于铁勒汗国强大势力的监督之下。史书接载：

> 然伯雅先臣于铁勒，而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虽存此令，取悦中华，然畏铁勒，而不敢改也。[1]

由此足证，泥橛处罗可汗东奔降隋之后的西突厥故境实为射匮可汗与铁勒易勿真莫何可汗契苾歌楞等两大政权东西分国的局面，其中射匮可汗虽已受封为西突厥大汗，实际上仍守西方故宇，泥橛处罗可汗故地已悉为铁勒汗国接管。关于铁勒汗国的版图，史无明载，唯《隋书·高昌国》留有如下记载：“[高昌]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贪污(汗)山，夏有积雪。此山之北，铁勒界也[2]。”“赤石山”即今火焰山。贪污山当为“贪汗山”之误，据此可知，铁勒汗国南以天山为界，与高昌麴氏王国毗邻，其西界也许已到达焉耆北界，即今玛纳斯流域，可见铁勒汗国兴起后已夺取了金山至贪汗山一带木杆汗系世袭封地。又隋使崔君肃出使西突厥行踪，结合泥利可汗已拓宇至伊犁水域判断，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牙庭大约也设在伊犁水域，至于室点密系的牙庭似乎更在此西。据此判断，射匮可汗的受册并未能实现剪灭铁勒汗国的使命，而是各安其分，东西分国。其中射匮可汗在西，铁勒汗国在东，毗邻隋境，这意味着铁勒汗国已成功接管了泥橛处罗可汗故境。

进叙伊吾的归隋与伊吾郡的创立。这两者并非一回事，前者乃隋伐吐谷浑的结果，后者则乃伐铁勒的结果。

伊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匈奴属部伊吾庐，其名东汉时期始见于我国史册。汉将窦宪伐匈奴，夺其地，始筑城，留兵屯戍[3]，后置伊吾司马，于其地开屯田，历魏、晋，皆隶我国版图。其时碛路险阻，西域“客商往来，多取伊吾路[4]”，十六国时期隶河西诸凉版图，及西凉都城酒

[1]《隋书》卷83《高昌传》，页1848。

[2]《隋书》卷83《西域·高昌传》。

[3]《元和郡县志》卷40《陇右道》。

[4]《北史》卷97《高昌传》，页3215。

泉失陷,其王裔李宝在国舅唐契、唐和拥戴下,西奔伊吾,仍奉西凉正朔达20年之久,附于柔然,册之为伊吾王[1]。及北魏崛兴,李宝率众东徙敦煌降魏,伊吾亦为北魏接管,仍遣重兵屯守,以御柔然,魏将张安保即屯兵于此。高昌王马儒降魏,表求东徙,魏许割伊吾五百里以居之,并遣张安保统兵接应[2]。其后伊吾孟威又曾派兵接应麴嘉,可见自汉迄北魏伊吾的主体居民也是汉人,与高昌一样,同是汉魏屯田士卒的遗黎。但后来以其地居碛口冲要,又有不少粟特商人聚拢于此,以其财力雄饶,其地位日益升高于汉人之上。北魏既衰,其地先后没于柔然、突厥。仁寿三年(603)东、西突厥正式分立之后,伊吾属西突厥势力范围,遣吐屯世监其国,而史书中所记主动降隋的伊吾城主即号吐屯设。《册府元龟》卷977记云:

炀帝大业……五年(609)六月,伊吾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

其时正当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在位之时,吐屯设必为此汗派往伊吾监国的使者,他的降隋反映了泥橛处罗可汗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北开罪于铁勒,西开罪于射匮可汗,东开罪于启民可汗,陷于四面楚歌的困境。是岁,炀帝亲巡河右,大举伐吐谷浑,本发其兵助战,而泥橛处罗拒不发师,吐屯设见其国亡在即,因而仓促降隋以自救,受到隋朝的隆重礼遇。史载大业五年:

六月丙辰上御观风行殿,大备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吐屯设升殿宴饮,其余蛮夷使者陪阶庭者二十余国,奏九部乐,及鱼龙戏以娱之,赐赍有差。戊午赦天下。[3]

本来,吐谷浑的覆亡乃隋与铁勒合作的结果,但是,战事结束以后,胜利果实尽为隋朝摘取,铁勒一无所得,伊吾的归隋更加阻断了铁勒南向扩张的道路,两国间的矛盾日益激化,铁勒乃长驱南进,不但攻下了

---

[1] 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2《唐契传、李翻传》。

[2] 《北史》卷97《高昌传》,页8213。

[3] 《资治通鉴》卷181,大业五年,页5645~5646。

伊吾,而且进逼高昌,迫之臣服,并“恒遣重臣在高昌国[1]”监其政事,导致此前的隋朝西域经营尽付东流,导致隋与铁勒汗国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迫使隋朝不能不给予有力的回击。为此,隋朝西召射匮可汗,令其攻铁勒于其后,东召启民可汗,令其发兵自北道入,与隋朝联兵。但这时东突厥已羽翼丰满,不再尽听隋朝指挥,竟不奉诏。但隋朝所遣西征主将薛世雄是一位胸有奇韬伟略的名将,征吐谷浑之役已初显身手,拜右翊卫将军,此役更是独当方面之任,孤军渡碛,排除万难,平伊吾而归,显示出卓越的军事天才。《隋书》卷65《薛世雄传》中记此役:

……以世雄为玉门道大将[军],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次玉门,启民可汗背约,兵不至,世雄孤军渡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及闻世雄兵已渡碛,大惧请降,诣军门上牛酒,世雄遂与汉旧伊吾城东筑城,号新伊吾,留银紫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人戍之而还。

伊吾郡的设立即为薛世雄西征的历史产物。此事《隋书》《资治通鉴》所系年代皆不确切,唐光启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则明确记云:“伊吾郡:大业六年(610)置。”

是岁泥橛处罗可汗业已降隋,唯一可以控制伊吾的势力只有铁勒,足证隋朝已同铁勒反目。

但是,隋伊吾郡存在的时间极为短促,此后,隋朝的战略重心开始转向东方,而三征高丽,得不偿失,元气大伤,至大业十一年(615)又发生了雁门之围,自此,隋朝由鼎盛陡然坠入深谷,农民起义的风暴撼天动地,炀帝南巡江都不归,受命统兵镇守伊吾的宿将王威就受召调返太原,肩膺监视太原留守李渊的秘密使命,不久被杀。历史已进入了新疆的一页。

5.4 余论二题

行文至此,本应掩卷休笔,但仍存在着两个历史疑谜有待澄清,对

[1]《隋书》卷83《高昌传》,页1848。

此,正史记载不清,须加辨析。

其一,关于铁勒汗国的消失,《旧唐书》是这样记载的:

西突厥射匮可汗强盛,延陀、契苾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1]

据此,大业七年(611),即隋置伊吾郡的次岁,契苾歌楞和乙失钵皆于此年自动取消了可汗的称号,改臣于西突厥射匮可汗。然而,参稽其他文献透露的信息,铁勒汗国的历史并结非束于大业七年。《隋书·西域·高昌》记载,高昌王麴伯雅大业八年(612)冬,动身归国,至早于大业九年(613)春夏之交才能回到高昌,因此,下令改革应是这年夏秋之事。消息传到隋朝,则最早也已是冬令。隋炀帝遣使颁赐服式,到达高昌,又非大业十年(614)春夏之交不可。因此,至早在大业十年的春夏之交,铁勒汗国仍然存在,相当强盛,其威慑力量足以使高昌王麴伯雅连服饰制度的改革都不敢进行下去!

铁勒汗国是在反抗处罗可汗的暴虐统治后建立的,射匮可汗是在突袭处罗可汗后登上西突厥大可汗宝座的,双方的矛头所向是一致的,利益是共同的,因此,射匮可汗绝不可能在突袭处罗可汗的同时,去与强盛的铁勒汗国为敌。射匮成为大可汗后,自己的根基既不牢固,牙帐又远离东部天山,事实上也无力震慑铁勒汗国。因此,终射匮可汗的短暂统治时期,铁勒汗国仍然是存在的,但与西突厥汗国保持着比较亲密的友好关系,或者是比较松散的主从关系。

射匮可汗去世后,其弟统叶护可汗继位,形势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战辄胜,因并铁勒,下波斯、罽宾,控弦数十万,徙庭石国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诸国。[2]

从这条记载的"并铁勒"三字看,铁勒汗国为西突厥所并兼,是统叶护可汗统治时期。统叶护可汗是唐高祖武德二年(619)下半年继位

---

[1]《旧唐书》卷199下《铁勒传》,页5344。

[2]《新唐书》卷225下《西突厥传》,页1848。

的，所以，铁勒开国的灭亡，至早也应是武德三年（620）的事。

关于铁勒汗国灭亡于唐高祖武德三年的史实，在吐鲁番出土的麴氏王朝后期官方文书中也可得到确证。阿斯塔那329号墓文书《高昌虎牙元治等传供食帐》之一[1]有：

（前略）

[7]□□□□婆演大官别廻，尽。次□□□□

[8]□□□□供恕逻珂寒都伦大官　□□□□

[9]□□次虎牙元治传□□

[10]□□尽。　　次□□

……………………………………………………

[11]□□不六多取妻。次康元相□□

[12]□□供北相（厢）珂寒使吐别贪旱，上一人，尽。□□

[13]□□传二斗，供卑失移浮孤使乌庚延伊利□□。

（下略）

"恕逻珂寒"所指应是东突厥汗国处罗可汗，一译"叱罗可汗"。武德二年，东突厥始毕可汗死，其弟乙力设继位，号称处罗可汗。"北厢珂寒"自然指铁勒汗国的薛延陀部小可汗。上件文书必然写于武德二年之后，可见武德二年，铁勒汗国仍然存在，契苾和薛延陀首领仍称可汗未改。可见铁勒汗国前后立国15年（大业元年至武德三年，605—620）。

其二，定襄北隋政权问题（619—630）

一般认为，隋朝兴亡仅历两代君，即文帝杨坚、炀帝杨广（也有人认为存在三代君，将唐李渊扶立的名义国君义宁帝强补在内，其实此人纯属李渊扶立的政治傀儡）。如以隋朝有效号令全国而言，确乎如此，然而定襄北隋政权亘李渊之世，乃至唐朝第二代君太宗李世民继立初世，这一政权始终与唐共存，继续在东突厥汗国的庇护和全力支持下，主持着全国的反唐复隋斗争，而北隋末帝杨政道正是隋朝正统苗裔齐

[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页342。

王暕的遗腹子,确实出自隋朝皇祚的正统延续,炀帝萧皇后则乃北隋政权的实际主政者,这一北隋政权继续存在了11年(619—630),理应属于隋朝历史的一部分。

唐朝的创立者李渊本隋朝重臣,炀帝南巡江都后所委太原留守,而以曾屯兵伊吾的名将王威为其监军,这时,北方业已大乱。李渊平叛无功,隋大业十三年(617)七月起兵太原,十一月占领长安,扶立留守长安的隋朝皇族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是为义宁帝。次岁(618),炀帝为宇文化及所弑,五月,李渊创立大唐皇朝,庙号唐高祖(617—626,年号武德),其实炀帝虽死,萧皇后仍健在,隋朝正统皇裔杨政道虽为幼婴,国脉犹存。唐武德二年(619)宇文化及北上,遇河北窦建德阻击,"与化及连战,大破之,化及复保聊城。建德纵兵四面急攻,王薄开门纳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谒隋萧皇后,语皆称臣,素服哭炀帝尽哀;收传国玺及卤簿仪仗,抚存隋之百官,然后执逆党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景,集隋官而斩之,枭首军门之外。以槛车载化及并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国,斩之"[1]。同年"隋义成公主遣使迎萧皇后及南阳公主,建德遣千馀骑送之,又传宇文化及首以献义成公主"。[2] 萧皇后携杨政道北入突厥,"因立正道为隋王,奉隋后,隋人没者隶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居定襄,众万人"。[3] 传文中"正道"无疑就是齐王暕子杨政道的笔误,"隋王"则应是"隋帝"的讹写。隋末唐初,东突厥汗国境内流亡、流落汉人数量很多,悉令云集定襄城内外,可汗又正式传令臣属于东突厥的诸沿边割据反唐诸地方政权,诸如夏州梁师都,悉听从定襄北隋小朝廷号令,隋朝势力一度复振。而东突厥汗国历代王统都出自原突厥汗国北面小可汗染干后裔,染干即为东突厥汗国的创始者启民可汗,出自隋文帝杨坚的册封,且隋与东突厥汗国结有和亲关系,隋义成公主历配启民、始毕、处罗、颉利四代可汗,皆为可敦(皇后),力主反唐复隋政策,政事一决于太皇太后萧氏(即萧皇后,

[1]《资治通鉴》卷187,唐高祖武德二年,页5842。

[2]《资治通鉴》卷187,唐高祖武德二年,页5853。

[3]《新唐书》卷215《突厥传》,页2932。

炀帝皇后，出于南梁末代君亲生女和亲于隋），此后死于唐境，唐朝特准葬于江都炀帝墓内。近日其扬州萧皇后墓中出土了一件名为延雏俑的特殊陪葬品，形如双人蛇尾俑，据《山海经》记载“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雏，人主得而飨之，伯天下”，足以证实萧皇后紫帐称制、志在复国的雄心。亘唐高祖李渊之世，隋朝的反唐复国斗争始终没有停止，直至贞观四年（630）唐将李靖统兵北伐，攻克定襄，“获隋齐王暕之子杨正道及炀帝萧后送于京师”。[1] 唐令执失思力护送萧皇后等入唐，才标志着北隋政权的正式灭亡。或言中国人尝密通书于后，中书舍人阳文瓘请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当思隋，今反侧既安，何足治耶？"[2] 又有记载请劾唐臣与萧太后私通书信者乃中书舍人杨文权[3]。所有这些劾章都被搁置，还有史料记载李世民将唐朝所查获的一切朝臣与萧皇后的来往书信，悉集中于大殿，当众销毁，下谕往事不再追究。至此，隋朝才全部隐没于史册。由此可见，隋朝实为大唐日出的历史先导。

（原刊于《新疆社会科学》，1989 年第 2 期，有所增补）

---

〔1〕《册府元龟》卷 411《将帅部 · 间谍》，页 4888 上 ~ 4888 下。

〔2〕《新唐书》卷 215《突厥传》，页 2937。

〔3〕《册府元龟》卷 72《帝王部 · 宽恕》，页 466 下："李靖破突厥，送隋萧后于京师。初有降胡言'中国人有潜通书启于萧后者'。至是中书舍人杨文权请鞫之。帝曰'往国家未定，匈奴侵扰，愚民寡识，或当思念。今天下宁一，反侧自安，既往之愆，不须问也'。"

6 北庭都护赵崇玼考

封常清天宝十四载(755) 十一月入朝以后,接任之北庭主将是谁,史无明载。前辈专家闻一多先生最先提出“代为北庭节度者”[1]就是曾为安西四军主将之一的疏勒军镇守使赵崇玼。2001 年艾尚连发表了题为《北庭节度使赵玼及其任职期限》[2]一文,继承了这一具有开拓性的重要观点,又援引清吴廷燮《唐方镇年表》[3]“疑赵崇玼当作赵玼,崇字旧传误涉下贾崇瓘而衍”,认为赵崇玼应为赵玼之误。而玼与泚可互通,做出了赵玼与节度蒲、同、虢三州的赵泚乃是一人的新考证。二文都具有破旧立新的学术启发意义。笔者亦宗尚闻先生所倡接替封常清主政北庭者乃是前北庭副帅赵崇玼,但认为其所领官衔仅为北庭都护,并未代为北庭节度使。笔者非常赞赏艾先生考证赵崇玼与赵将军同为一人,以及岑参曾佐幕于赵都护一段时间的精彩考证,却否定赵玼即赵崇玼之说,并坚决否定赵崇玼、赵玼同曾为蒲、同、虢三州节度使的赵泚乃是同一人的考证。因成斯文,以相互切磋。

6.1 疏勒军镇守使赵崇玼与赵节度、赵都护

赵崇玼之名初见于史料记载乃天宝六载(747)随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伐小勃律之役。《旧唐书》卷 104 记高仙芝“分为三军:使疏勒守捉使赵崇玼统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自北谷入;使拨换守捉使贾崇瓘

[1]《闻一多全集·唐诗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年,页 138 注释 26。

[2]《西域研究》,2001 年第 1 期。

[3]《唐方镇年表》二十四史研究丛刊,中华书局 1980 年 8 月,又开明书局二十五史补编本亦收入该书。

自赤佛堂路入；仙芝与中使边令诚自护密国入，约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吐蕃连云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为栅，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婆勒川，水涨不可渡。仙芝……登山挑击，从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杀五千人，生擒千人，馀并走散。得马千馀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此役乃伐小勃律的决战，赵崇玼一军应是此役的主力。可见赵崇玼出身于卓建军功的安西宿将。安西节度使以下总有十将军[1]，四镇军使必皆属此十将军之一，疏勒守捉使赵崇玼的日常称呼必为赵将军，岑参有《赵将军歌》一首，内记：

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

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2]。

以此判断，诗中的赵将军与赵崇玼确系一人，但岑参赋写此诗时，赵崇玼犹为疏勒镇守使，并非主政北庭之后。

除赵将军之外，岑参诗作中还有“赵节度”之名，见于《送郭司马赴伊吾郡请示李明府》[3]：

安西美少年，脱剑卸弓弦。不倚将军势，皆称司马贤。

秋山城北面，古治郡东边。江上舟中月，遥思李郭仙。

诗之题名后注云“郭子是赵节度同好”，据闻一多考证，该诗作于天宝十五载（是年七月改元至德）。此为“赵节度”之名的初现。按主政赵姓的已知节度使仅有曾任安西节度使的赵颐贞一人，其人任职时期乃是开元年间，与岑参的出塞时间毫不搭界，必非赵颐贞，而是另指他人。而“赵节度”之名亦仅此一见，别无旁证，姑先置不论。吐鲁番阿斯塔那506号墓出土的《唐天宝十四载（755）某馆申十三载七至十

〔1〕《旧唐书》卷104《高仙芝传》：“高仙芝，本高丽人也。父舍鸡，初从河西军，累劳至四镇十将、诸卫将军。”又记：“少随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击将军。年二十馀即拜将军，与父同班秩。”可知，安西有十将军。

〔2〕《全唐诗》卷201《岑参四·赵将军歌》，中华书局本，页2109。

〔3〕《全唐诗》卷200《岑参三·送郭司马赴伊吾郡请示李明府》（郭子是赵节度同好），中华书局本，页2079。

二月郡坊帖马食踖历牒》[1]多次出现"赵都护"之名,并与"封大夫"之名同时出现,其中封大夫无疑就是指时任北庭节度使兼御史大夫的封常清,可知时为封常清主政北庭时期。

(前缺)

[1]□□坊帖马从天十三载七×××

[2](略)

[3]七月一日郡坊

(下略)

[4]同日赵都护家口　乘郡坊马×××××××付健儿张庭俊

(中略)

[9]同日郡坊□□六□迎赵都护家口×××××××

[10](略)

[11]同日郡坊帖马八疋,迎赵都护家□,食青麦四斗,付健××××

(以下至35行中缺)

[35]××××疋送　封大夫旌节到,食青麦粟六石××××

(中略)

[57]八日郡坊帖马十疋,内两疋送赵都护向西,食全料

(下略)

[145]同日(接前行廿九日)赵都护乘礌石郡坊帖马六疋,食青麦三斗,付健儿陈金

同墓出土之《唐天宝十四载(755)某馆申十三载四至六月郡坊帖马食槲历状》中也有关于"赵都护"的多处记载,也是同封大夫之名同时出现的[2]。

---

〔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506号墓文书,第十六。本件背面骑缝编号起一百一十六,止一百卅六,末盖交州郡都督府朱印一方,自闰十一月一日以后,每行有朱笔点记,正面骑缝上押"覃"字。

〔2〕《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506号墓文书,第十七,页34。

[13]廿三日郡坊马十疋,送封大夫娘子银山回,食麦粟一石,付马子陈阳,赵璀。

[14]廿四日郡坊帖银山馆马十三疋迎赵都护,食麦粟八斗,付健儿上官什仵。

[15]廿五日郡坊上官下割留马三疋,帖礌石迎赵都护,食麦粟一斗五升,付天山府健儿赵嘉庆。

[17]同日(廿六日)郡坊帖马三疋迎赵都护,食麦粟一斗五升,付赵嘉庆。

[22]同日,郡坊帖银山马一十三疋,送赵都护到,便向天山,食麦粟一斗二升,付健儿上官什仵。

(下略)

以上"赵都护"也是与封大夫之名同时出现在供食马料账上,时间也是天宝十三载四至六月,赵都护所至地界,包括银山馆、礌石馆,都是属于北庭道管辖的交河郡地名,则此赵都护所任并非安西都护,只能是北庭都护。又赵都护并非只身来此,而且还带有"家口",说明赵都护由安西至北庭乃是调动工作,而非公事访问。以此判断,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赵都护与前述之赵将军、赵节度同为一人,都是赵崇玭不同时期所任官职。

前引吐鲁番出土文书同《唐天宝十四载(755)交河郡某馆具上载帖马食踖历上郡长行坊状》《唐天宝十四载(755)柳中县具属县馆私私供马料帐历上郡长行坊牒》《唐天宝十四载(755)柳中县具达匪馆私供床麦帐历上郡长行坊牒》《唐天宝十三载(754)礌石馆具七至十一月帖马食历上郡长行坊状》《唐天宝十三载(754)礌石馆具迎封大夫马食踖历上郡长行坊状》《唐天宝十三载(754)天山县具银山馆闰十一月郡坊帖马食历上郡长行坊牒》《唐天宝十四载(755)某馆申十三载三至十二月侵食当馆马料帐历状》等基本上都是同一类型文书,所记天宝十三载北庭下属交河郡诸县馆接待的官员人数众多,除了封大夫、赵都护以外,出现的带官衔人名还有黎大夫、李大夫、杨大夫、焦大夫、刘大夫、韦大夫、孙大夫、马太守、梁太守、药太守、程中丞、马都督、北庭计会使樊

光、刘总管、史将军、陈将军、梁将军、周特进、孙常侍、离常侍、米长史、姚司马、判官杨千乘、岑判官[1](应指岑参)、元判官、武判官(以上二人皆岑参同幕好友)、谈判官,荷判官、牛判官、段判官、陈判官、田判官、王判官、刘判官、米昇幹判官、孙判官、□判官、内史王进朝,以及无官衔的赵光烈、陈重晖等,却独无"赵节度"之名。这就产生了如下问题:到底"赵节度"与"赵都护"是否一人,皆指赵崇玭?果如是,怎样解释吐鲁番出土的北庭文书中赵崇玭的官衔不是节度使,而是都护呢?这就要重新返回闻一多先生所注的《送郭司马赴伊吾郡请示李明府》(郭子是赵节度同好)一诗的创作时间、地点,及其正确解读。

可以肯定这位同赵节度关系十分密切的郭司马,是一位西域土生土长的"安西美少年",全凭弓、剑所立战功,升至节度使司马的高位。史载天宝十一载(752)王正见死后,封常清继任"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2]"。天宝十三载(754)三月程千里入朝献俘,北庭主将一时空缺,封常清似曾暂时兼领安西、北庭两道。但安西、北庭相隔遥远,一人兼任似难照顾。其后因安西与阿拉伯约和,镇压播山叛乱之后,境内暂时无事,北庭境内则率西突厥强部,叛乱四起,以故封常清自天宝十三载下半年之后,就离开安西,赴任北庭,临行前似暂署赵崇玭以摄安西四镇节度留后名义,以便自身专主北庭。岑参是封常清幕下常客,前引《送郭司马赴伊吾郡请示李明府》("郭子是赵节度同好")一诗似创作于封常清刚刚接任北庭节度使的三四月份,其时封常清、岑参、赵崇玭等人仍在安西,因此,赵崇玭所任之"节度"并非北庭节度使或北庭节度留后,而是摄(或"假")安西四镇节度留后,尚未得到唐廷的正式批准。及至下半年,唐朝的正式任命已经下达,封常清所任官衔已是北庭伊西节度使,加领御史大夫,并未批准赵崇玭的安西节度留后的奏请,而是被委任为

---

〔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506号墓文书,八月三十日"郡坊帖马陆疋迎岑判官"。又十五《唐天宝十四载(755)某馆申十三载三至十二月侵食当馆马料帐历状》第153行又出现了"坊帖岑判官马柒疋,共食青麦叁斗五胜,付健儿陈金",页179。

〔2〕《旧唐书》卷104《封常清传》,页3209。

北庭都护，另行册拜梁宰正式接任安西四镇节度使。可见封常清兼领安西、北庭两道只是短暂时期，其所领官衔中"知节度事"一词，说明初仅代理性质。梁宰则乃唐明皇时期正式册拜的安西四镇节度使，《旧唐书》卷128《段秀实传》证实至德元年（天宝十五载，756）安西节度使已是梁宰[1]，其始任时间必早于此。按梁宰既为正式册拜的安西节度使，必加有御史大夫官衔，以此判断，梁宰接任安西节度使必与封常清履任北庭伊西节度使同时，应是天宝十三载下半年，即七月至十二月间[2]。随着安西节度使人事任免尘埃落定，封常清的嫡系幕佐大都转调北庭。因此，随着赵崇玭调任北庭都护，与之"同好"的郭司马调任伊吾郡，岑参、武判官、元判官等都纷纷调任北庭。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赵崇玭就是封常清任北庭节度使时期的北庭都护，是北庭道的第二号行政长官，仅次于出任北庭伊西节度使的封常清，但并未领有节度使、节度副使或节度留后的官衔。此人在安西道时期，曾被封常清奏请为摄（或"知""假"）安西节度留后，但并未为唐廷正式批准，以故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但言"赵都护"，而无"赵节度"之名。

6.2　封常清入朝后，赵崇玭继为北庭主将

如前所述，赵崇玭乃封常清爱将，天宝十三载（754）三月封常清自安西节度使调转北庭伊西节度使之后，就已推荐赵崇玭暂理安西节度使留后，但为时短暂，改任北庭都护，同岁十半年，随封常清履任北庭，成为封常清主政北庭时期的主要副手。天宝"十四载（755）入朝，十一月，谒玄宗于华清宫[3]"。按封常清入朝，并非正式调任，北庭节度使职务一度空缺，北庭都护赵崇玭已成为北庭道最高军政长官，必同时兼领北庭节度留后，加御史中丞官衔，可以确定赵崇玭应即封常清入朝后

[1]《旧唐书》卷128《段秀实传》，页3584："肃宗即位于灵武，征安西兵节度使梁宰。"《新唐书》卷153亦记："肃宗在灵武，诏嗣业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节度使梁宰欲逗留观变。"

[2]前引阿斯塔那506号墓出土文书中"黎大夫"之名，笔画潦草不真。笔者颇疑此"黎大夫"实乃"梁大夫"或正史中的梁宰实为黎宰的讹写。姑志此以存疑。

[3]《旧唐书》卷104《封常清传》，页3209。

北庭道的继任主将。

至德元载（756）肃宗即位灵武，遣使北庭、安西，征召勤王兵，时梁宰已为安西节度使，发兵五千赴难[1]，北庭发兵数字则为七千。对此，史书所记颇有混乱，如《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叙此紧踵梁宰遣李嗣业率师勤王事之后，而混记为："上又征兵于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人，励以忠义而遣之。"《新唐书》卷146《李栖筠传》亦记："迁安西封常清节度府判官。常清被召，表摄监察御史，为行军司马。肃宗驻灵武，发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难，擢殿中侍御史。"《册府元龟》卷373《将帅部·忠第四》也混记为安西："李栖筠为封常清安西行军司马，玄宗幸蜀，肃宗兴复於灵武，征兵於安西，栖筠以精卒七千人赴行在所。"按安西业已发兵五千，此七千兵必非安西所发，而乃另有所指，其发兵地必是北庭。以上记载必有错误。根据前引史料记载，李栖筠乃以封常清节度判官升为节度行军司马，必追随封常清履任北庭，而北庭节度使又名伊西节度使，以此判断，至德初年李栖筠等的官衔必非安西行军司马，应是伊西行军司马，"安西"实乃"伊西"之误。在这次征召伊西勤王兵的有关记载中，虽然没有提及赵崇玭的名字，但实际上赵崇玭正在北庭都护兼伊西节度留后任上，赵崇玭与李栖筠的关系非常清楚，赵崇玭是北庭主将，李栖筠乃其副将。以上记载有的写得并不清楚，如《资治通鉴》所记"行军司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人，励以忠义而遣之"。单从字面含义判断，似乎给人李栖筠本人并未入关勤王的错觉。其实李栖筠本人就是这支人数多达七千人的入关勤王兵统帅，参稽其他有关史料，北庭入关勤王的高级将领很多，除伊西行军司马李栖筠之外，还有北庭副都护高耀、北庭兵马使王惟良[2]，后来成为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的北庭宿将荔非元礼等。兵力超过安西勤王兵，几乎将北庭的精兵猛将全部抽空，这一切应当都是时任北庭都护兼伊西节度留后赵崇玭做出的决定。

---

〔1〕见《旧唐书》卷128《段秀实传》谓"乃出步骑五千"，《新唐书》卷153《段秀实传》记为"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共同印证安西发兵数字为五千，不是七千。

〔2〕《资治通鉴》卷200，乾元元年（758），页7053。

问题在于赵崇玭是否入关勤王？艾尚连不但给予了肯定答复，还进一步推断赵崇玭同乾元元年出任蒲、同、虢三州节度的赵泚是同一个人。[1] 主要根据是岑参赋有《送刘郎将归河东》[2]一诗，为乾元元年(758) 岑参东归长安所作。全文为：

借问虎贲将，从军凡几年。杀人宝刀缺，走马貂裘穿。

山雨醒别酒，关云迎渡船。谢君贤主将，岂忘轮台边。

艾文据此，做了如下分析：

(1)据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注释第二十六条中引岑参诗原注"参曾北庭事赵中丞，故有下句"，"谢君贤主将，岂忘轮台边"。诗中的"贤主将"和"赵中丞"应是同一人，又"轮台"为北庭属县，亦即代指北庭，以此推论，诗中的赵中丞曾主政北庭，岑参与之有同袍之谊。此诗即为怀旧述情之作。

(2)诗中的河东，即指河中府所在的蒲州。《新唐书》卷39《志二十九·地理三》："河中府河东郡，赤。本蒲州，上辅。义宁元年治桑泉，武德三年徙治河东。开元八年置中都，为府；是年罢都，复为州。乾元三年复为府。"

(3)诗中的主将即曾主河中府蒲、同、虢三州节度使的右羽林大将军赵泚。对此，《旧唐书》卷7《肃宗本纪》至德三载(二月改元乾元，758)"九月庚午朔，右羽林大将军赵泚为蒲州刺史，蒲、同、虢三州节度使"，《资治通鉴》卷220肃宗乾元元年记"九月，庚午朔，以右羽林大将军赵泚为蒲、同、虢三州节度使"。胡注"去年置河中节度使，领蒲、绛等七州。今赵泚节度蒲、同、虢三州而已。盖兵兴之际，分命节帅以扼险要，其所统之增减离合，随时制宜耳"。

(4) 清人吴廷燮《唐方方镇年表》："为蒲、同、虢三州节度使，疑赵崇玭当作赵泚，崇字旧传误涉下贾崇瓘而衍。"

---

[1]艾尚连：《北庭节度使赵玭及其任职期限》，载《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引《资治通鉴》卷200，肃宗乾元元年，页7060："九月，庚午朔，以右羽林大将军赵泚为蒲、周、虢三州节度使。"

[2]《全唐诗》卷200《岑参三·送刘郎将归河东(同用边字)》，中华书局本，页2073。

艾文据此断言,这位主政河中的蒲、同、虢三州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赵泚同诗中岑参的贤主将北庭主将赵崇玭就是同一个人,意在说明赵崇玭,本名赵玭,亦即写作赵泚,曾于遣发李栖筠东去勤王之后的至德二年又亲率北庭大军参加到平叛行列,故授为蒲、同、虢三州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理由是:

(1)赵崇玭与赵泚之名悬殊,难以比附为一人。进行这种比附,必先说"崇"为衍字,所余二字并非赵玭与赵玼,偏旁相同,犹有可说,而赵玭与赵泚,偏旁与音符皆无可比对之处。

(2)艾尚连还把马璘所率第二批安西勤王军说成是赵玭部下的北庭勤王兵。前引史料已经记载得非常清楚,安西节度使宰所遣第一批安西勤王兵由李嗣业统领,兵力为五千,北庭勤王兵乃发生于赵崇玭任北庭都护期间,总兵力为七千,由伊西行军司马李栖筠统领。据《册府元龟》卷373《将帅部 · 忠第四》,明确记载"马璘为左金吾卫将军,戍安西,至德初,闻王室多难,乃统甲士三千,自二庭赴於凤翔",可见马璘乃安西将领,所统勤王军的总兵力为三千,分明别为一支,更与赵崇玭主持的北庭毫无干系。

据此判断,前引岑参诗中的刘郎将及其贤主将,大约都曾经在北庭任职,但其贤主将绝不可能就是北庭都护赵崇玭本人[1]。

除艾尚连以外,柴剑虹也曾撰文主张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证实赵节度并非赵崇玭,而是赵光烈[2]。根据阿斯塔那506号墓出土天宝十三年至十四年马料账中确实多次出现赵光烈之名,并与赵都护、封大夫出现在同一文书之中,但细加观察、统计,赵光烈出现时总是直呼其名,与赵都护别行分列,明显不是同一人。

最后,尚须补充的是,赵崇玭身为北庭都护、北庭节度留后,守土有责,史载肃宗征兵于安西,安西节度使梁宰曾"逗留观变",意思并非心怀叛意,而是颇为迟疑,原因就在于职在守土,必须首先考虑地方边防

---

〔1〕考虑到赵泚与赵崇玭都姓赵,有可能赵崇玭遣发其子随北庭勤王军东去,以此推断,赵泚有可能是赵崇玭之子。唐朝对他的特殊重用,似寓有安抚赵崇玭安心守边之意。

〔2〕柴剑虹:《岑参边塞诗系年补订》,载《文学遗产》增刊14辑,页195。

安危。北庭一次勤王，已抽走七千，再亲自统兵东去，岂不放任北庭沦陷，何功之有？北庭主将的身份注定了他必须同北庭共存亡。且《旧唐书·地理志》北庭都护府条下明确记载："[庭州]上元元年(760)陷吐蕃。"据此判断，赵崇玭的结局就是此年战殁于北庭。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结局，绝不可能弃土勤王。但同年就被河西军将原主瓜州的关西兵马使杨预收复，此人所领官衔亦仅止"伊西庭都护"[1]，亦即北庭都护，并未拥有节度使名号，也从反面证实赵崇玭未加北庭节度使名号。及代宗李豫即位，杨预为避帝讳，更名杨志烈，升为河西节度使兼河已西副元帅，以主持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防名垂史册，然其勋业仅持续了六年(上元元年至永泰元年，760—765)。杨志烈死后原北庭节度留后周逸、甘州守将张瓌皆自立为河已西副元帅，导致郭子仪奏请遣使巡按河已西三道，正式册立张志烈族弟杨休明袭兄河已西副元帅、河西节度使名号，原甘州守将张瓌必为杨休明所杀。导致甘州陷蕃，河西名为节度使，已仅余瓜、沙二州，此年奉使西去就职的还有接主北庭的"李大都护"，对此，笔者完全同意艾尚连先生确定为李秀璋[2]的精采考证。郭子仪之侄郭昕本与此人同行，但李秀璋主政北庭后，似也全力贯彻郭子仪的既定政策，原北庭节度留后周逸必定死于其手，由之引起庭州粟特首领曹令忠自邀旌节，李秀璋未必善终。

对此，笔者对艾先生的考证也有区别，别详于著作《北庭春秋》[3]的有关章节，余不赘论。

(原刊于《新疆社会科学》，2008 年第 5 期，页 120 ~ 124)

[1]《全唐文》卷 422《杨炎二·四镇节度副使右金吾大将军杨公(和)神道碑》，页 4307 ~ 4308。

[2]艾尚连、陈香菊：《常建诗李大都护之李大都护考辨》，载《吐鲁番学研究》，2012 年第 2 期。

[3]薛宗正：《北庭春秋——古代遗址与历史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6 月。第十一章《大唐北庭日落》第二节《从三道联防到结盟回鹘》。

卷二　历史地理考证

1 金蒲、疏勒、且固、务涂谷考

务涂谷乃车师后国牙庭，金蒲、疏勒乃汉朝西域屯田重地，三者皆在天山北麓，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然其具体地望何在，虽有徐松[1]、李光廷[2]、丁谦[3]、藤田丰八[4]、松田寿男[5]、嶋崎昌[6]、岑仲勉[7]、孟凡人[8]等人做过考证，却人言各殊，难为定论。其中孟凡人的观点尤不敢苟同。现据实地考察，结合有关文献记述，草为斯文，以求这一问题得到澄清。

1.1 汉与匈奴的车师争夺

车师乃西域古族之一，它分化为车师前、后部二，乃是汉与匈奴激烈争夺的历史产物。

车师的最初译名为姑师，本居于罗布泊沿岸，与楼兰为邻，见于《史记·大宛列传》：

> 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当孔道，攻掠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赵破奴将属国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

---

〔1〕《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朱玉麒整理，中华书局2005年7月第1版。

〔2〕《汉西域图考》，清光绪年木刻本。

〔3〕《汉书西域传考证》，《后汉书西域传考证》，清光绪年木刻本。

〔4〕《西域研究》，杨錬译本，商务印书馆。

〔5〕《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学の研究》，陈俊谋汉译本作《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碑铭》，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

〔6〕《隋唐时代に东トルクスタンの研究》之一《姑师と车师前、後王国》，之二《匈奴统治西域と两汉经略车师》。

〔7〕《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上、下二册。

〔8〕《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姑师、车师显然是同音异译。“姑”,攻乎切,见纽(k)、虞韵(ü)、十古入麻韵(a);“师”,霜夷切,穿纽(t'ç),支韵(i)上古入鱼韵(o),复原其上古音值皆为 ka、ga。而后世车师突厥化为哥舒,突厥儒尼文即为 kaça,其部本为匈奴藩属,在汉、匈斗争中站在匈奴一边,故汉开西域,首须击之。“盐泽”指罗布泊,“破奴”指汉将赵破奴,参稽《资治通鉴》卷 21,赵破奴伐楼兰、姑师之役发生于汉武帝元封二年冬十二月至元封三年正月间,即公元前 108 年。上遣将军赵破奴击车师,破奴与轻骑七百先至,虏楼兰王,遂破车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春正月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佐破奴击楼兰王,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

这是汉朝对匈奴西域作战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导致姑师离开罗布泊,举部北徙,《汉书》卷 96《西域传》中明确记载:

> 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诸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

据日本人嶋崎昌研究,姑师北徙并分化为车师前、后二国,就始于此时[1]。其徙居吐鲁番盆地者称前部,建都交河,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定居生活,其徙居天山北麓者,称车师后国,建牙於涂谷,改事逐水草的游牧生活,并与东且称、西且弥、蒲类、卑陆等原先生活在天山北麓的游牧诸部互为党援,而为之首。合称山北六国。

车师的分化有利于汉而不利于匈奴,汉朝的势力得以自南而北次第推进。先控制车师前部,继又同匈奴展开了激烈的车师后部争夺。当然,其间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反复。西汉时期已基本上完成了控制车师前部的战略目标,汉将重合侯马通率骑四万击匈奴,开陵侯因发六国兵伐车师,为之策应,两路大军都取得了胜利,初定车师前部。然武帝逝世,昭帝继位以后,西域局势发生了反复,车师复降于匈奴。匈奴遣四千骑田车师,重新控制了丝路北、中二道咽喉。汉宣帝本始三年(前

---

〔1〕《隋唐时代に东トルクスタンの研究》之一《姑师と车师前、後王国》,之二《匈奴统治西域と两汉经略车师》。

71）汉朝再度发起反攻，遣五将伐匈奴，西域校尉常惠又与乌孙昆弥联兵，自西策应，常惠所统西路军胜利地攻入匈奴右鹿蠡王牙庭，战大捷，再定车师，然汉军返师后，车师又叛。直至地节二年（前68）汉将郑吉联兵西域校尉司马熹，猛攻车师前部于交河城，破之，其王退避其北石城。至秋，汉军又攻石城，车师前王穷蹙降汉。至此，汉朝已基本上控制了车师前国，达到了"独护南道[1]"的战略目标。

关于车师后国，直至西汉末期才初步归属于汉。此国位于天山北麓，与匈奴毗邻，汉朝夺取时的斗争更为艰苦，神爵三年（前59）汉将郑吉利用匈奴日逐王叛单于的有利时机，进军天山北麓，占领了车师后部。时过不久，元帝初元五年（前44）北匈奴郅支单于发动反攻，破车师，进而远征乌孙，附汉之车师后王战殁，汉军被迫撤出天山北麓，另立车师太子军宿为王，徙国渠犁以避其锋，车师余众复降于匈奴。直至元帝建昭三年（前36），汉将陈汤矫诏发诸国兵，远征康居，大破郅支单于，汉朝兵威复振，戊己校尉乘势反攻，夺回了车师前、后部，实现了并护南、北二道，全面确立了汉朝的西域统治。

前、后汉嬗递之际，王莽秉政，天下大乱，一度西域尽沦，车师前、后部复没于匈奴。及东汉肇兴，建武二十一年（45）车师后王与鄯善、焉耆共遣子入侍，要求重开西域，设西域都护，光武帝以中原事务未靖、无遑外略，俱遣归之，于是诸国复事匈奴。

东汉重开西域的伟业始于汉明帝时期，此后有所谓"三绝三通"，关键都在于对车师的争夺。其中同本文有关的主要是第一次争夺。这场争夺始于明帝永平十六年（73），是岁春二月，汉朝遣将三道伐匈奴，其中窦固、耿忠统率的西路大军出酒泉塞，"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取伊吾庐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庐城[2]"。至是，汉朝又在西域东端重建据点，次岁（永平十七年，74）冬十一月，汉朝又遣奉车都尉窦固率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列张出昆仑

[1]《汉书》卷96《西域传》，页3873。

[2]《资治通鉴》卷45，永平十六年，页1459。

塞,合兵万四千骑,"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进击车师[1]"。西汉时期车师前部强而后部弱,这时正相颠倒,车师后部人丁日旺,国势日强,前部反而退居从属地位,因之耿秉力主先击车师后部,并力根本[2],"遂统兵直趋天山北麓,大破之,"斩首数千级,后王安得震怖,走出门迎秉,脱帽抱马足降,秉将以诣固,其前王亦归命,遂定车师而还[3]。汉朝对车师后王安得厚加招抚,嫁汉女以结和亲,"于是[窦]固复奏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以陈睦为都护,司马耿恭为戊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谒者关宠为巳校尉,屯前部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恭,况之孙也(耿况以上谷归光武,子孙多著功名)"。[4] 于是,车师重归于汉。

关于车师人的种族归属,史无明载,须加推测。根据现有资料判断,汉、晋时期的西域人种大致可分为剪发民族与被发民族两类。《晋书》卷97《西夷西戎传》焉耆条,"其俗丈夫剪发",龟兹条"男女皆剪发齐项"。据白鸟库吉研究山北六国多被发,而车师后王独剪发,可见车师与焉耆、龟兹、楼兰等国民俗相同,应乃人种相近的指征。焉耆、龟兹、楼兰等国皆操东伊朗语,属高加索种,车师应归于此类。汉晋之高加索部落细分又可分为塞(Saka)与月氏二亚种,塞人徙自岭右,月氏则徙自河西。月氏人部落名称上常冠以 ka、ga 首音节,其意为"大",如龟兹(kaça)、姑臧(kazang)、居延(kaja)、姑默(kama),姑师、车师(katça)之名亦与之近似。以此推断,似乎应是月氏的一支。至于后世的哥舒部显然是车师人的胤裔,却已改操突厥语,那是西域突厥化的结果。不可据以后世的演变逆推其先世的族属。因为汉世的月氏人应操伊朗语而非突厥语。研究西域上古史必须有此文化地层学的概念。

---

[1]《资治通鉴》卷45,永平十七年,页1466。

[2]《资治通鉴》卷45,永平十七年,页1466

[3]《后汉书》卷19《耿弇传·附耿秉传》,页717。

[4]《资治通鉴》卷45,永平十七年,页1466。

1.2 金蒲城应即今泉子街贼疙疸梁古城

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车师归汉以后,重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遣耿恭统兵屯田天山北麓车师后国境,旨在把它经营为西域的粮仓,进屯匈奴的前沿阵地,自然为匈奴所不容。汉永平十七年(74)匈奴遣左鹿蠡王联合焉耆、龟兹等南道属国向汉朝发动了猛烈的反攻,于是爆发了金蒲之战,事见《后汉书》卷49《耿恭传》:

> 永平十七年(75)三月,北单于遣左鹿蠡王二万骑击车师,[耿]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骑多,皆为所殁。匈奴遂破杀后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战,以毒药傅矢,传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因发强弩射之,虏中箭者,视疮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据此,耿恭所守之城名金蒲,而同书《西域传》所记戊己校尉屯兵之城却名金满,二者显然同指一地。

> 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城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桃,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城焉。

同地异名,一作金蒲,一作金满,怎能不引起后世研究者的困惑,而唐朝庭州下属有金满县,今吉木萨尔(济木萨)仍存此音的千古遗响。这一名称显然是金满一脉相承的历史继续,故《新疆建置志》中指出,"汉金满之名,既沿至唐,则唐亦呼金满可知,唯吐鲁番回鹘相继据有,文字不同,辗转讹謬,遂译为济木萨,此三字急读之,与金满县同"。据此,清代学者大都认为金满之名是对的,金蒲则是错的,岑仲勉却独以为金蒲之名无误,指出早在西汉末期已存在着一个金附国,后为车师所灭,金蒲城名就是承袭金附国名而来,事见《汉书·车师后城长国传》:

> 地节二年(前68)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屯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车师旁小金附国随汉军盗车师,车师王复请破击破金附。

清人钱大昕早已指出,古无轻唇音,上古时期凡轻唇音皆读为重唇,金附之"附"属轻唇非纽(f),汉代读音作滂纽(p),则金附、金蒲的读音完全相同,必为同名异译无疑,此国既可配合汉军,寇掠车师,必与之毗邻,如在天山北麓,应位于柳谷通道的北端,与车师后部牙庭务涂谷相近,正与金蒲城的地望相合。而至东汉初年,金附国名消失,金蒲城名出现,说明耿恭屯田的金蒲城应为古金附国故地,并以该国都城作为戊己校尉的驻地。可见金蒲乃是汉代该城的正名,至于金满则似金蒲的音变。古汉语中p、b与m之间常有互讹的现象,如《史记》中所记魏将武蒲、《汉书》中则作武满,至唐朝这种互讹的现象更为突出,如突厥语baγa应当音译为巴贺,却译为莫贺,磨延啜之本音乃Bayan cur,本应音译为巴颜啜,却译为磨延啜。故汉代的金蒲至唐已讹为金满,于阗文亦作connond,由之创建了金满县,故岑仲勉指出:"今比以《汉书》金附,知耿恭所守之城实应作'蒲',不应作'满',大抵唐初所见《后汉书》已有误写为满者,当日考古立县,未加细勘,遂设金满(或因当时同音之地名而误会,参文件吮余条,Cammaidi条),此金满一名所自起也[1]。"

必须指出的是,汉金蒲与唐金满虽有名称上的嬗变关系,却并非一地。清人不审,已往往把它们混淆不分。孟凡人曾亲临天山北麓考察,却仍继续因袭清人的谬误,误把汉金蒲位置定于唐金满县所在的吉木萨尔县后堡子古城。该城位于吉木萨尔县城东北,同作为唐蒲类县所在地的今奇台县城同一纬度,城为三重,高墙深堑,占地面积极广,虽城垣大多残缺,犹可见其当年雄浑气象,可容驻兵数万人,唐金满县与庭州及北庭大都护府同治于此,故有如此巨大的规模。汉代耿恭所统士卒数量有限,与此城之规模不相适应。此乃非汉城之证一。加之后堡

---

[1]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2月,页488。

子古城名扬中外,近世至此考察者已有多人,而所获标本无一属汉代遗物,说明其存在上限犹未及汉。此乃非汉城之证二。东汉初年,西域初开,匈奴尚强,而作为北庭故城的后堡子遗址乃"孤城天北畔[1]",距匈奴近,距汉军远,耿恭一介孤军,断不会选择此地为戊己校尉的治所。此其非汉城之证三。可见将汉金蒲定为后堡子古城是不正确的。

那么,汉金蒲的具体地望究竟何在呢?对此,曾经亲履新疆进行考察的清人徐松有一段话值在我们注意。在《汉书西域传补证》一书中他曾明确指出:"今济木萨城北五里有破城,为唐都护府遗址,而城南十五里入山,是今城的唐城之南,汉城又在今城之南也。"易言之,唐金满在今吉木萨尔县城北,而汉金蒲则在今吉木萨尔县城南。东汉初开西域,都护陈睦驻交河,校尉关宠驻柳中,耿恭在山北屯田,必与山南汉军各驻地有路可通,且相距不远,方可倚为势援,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依此判断,汉金蒲城只能位于天山北麓傍山谷地之中。按《西域图经》残卷,所记有他地道:"右道出交河县界, 至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百五



图 2－1－1　吉木萨尔县小西沟古城(贼疙瘩梁)

〔1〕《全唐诗》卷200《岑参三·北庭作》,中华书局本,页2094。

十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宋人王延德使北庭亦取道于此,汉之车师前、后二部联系交通亦必此路。此他地道或曰柳谷通道,即今吉木萨尔县泉子街通往吐鲁番的山间大道,直至新中国成立前这条道路仍然商贾络绎、畅通无阻。就在这条大道的西侧距泉子街乡西北约5公里,长山渠东岸,天山北坡台地上发现古城一座,土名贼疙瘩梁,吉木萨尔县文管所已将其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名之为小西沟古城。

城呈不太规则的方形,长220米,宽160米,城为夯制而成,残高不足1米。1959年至1960年间曾出土五铢钱、铁刀、灯等遗物,当地社员陶文贵还曾收集到汉瓦四方,形制与奇台石城子所见相同,今藏吉木萨尔文管所,但已仅余三方。

1987年笔者到该城考察时还拾到残灰陶片若干,因过于残破,已难复原,但可以据此推断,它是一座汉城遗址。后经碳14测定,此城之下,又有文化层存在,应是古金附国的居住遗址。详考另见别文,不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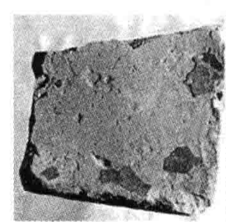




图2-1-2　吉木萨尔小西沟古城出土汉代方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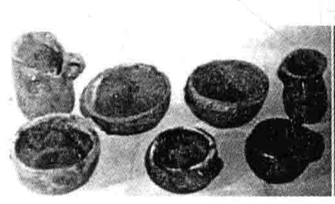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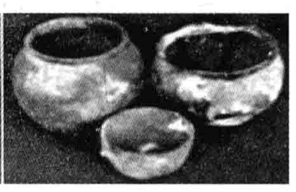



图2-1-3　吉木萨尔小西沟古城出土黑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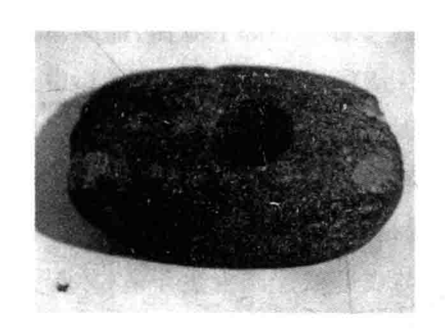


图 2-1-4　吉木萨尔小西沟古城出土金附国权杖石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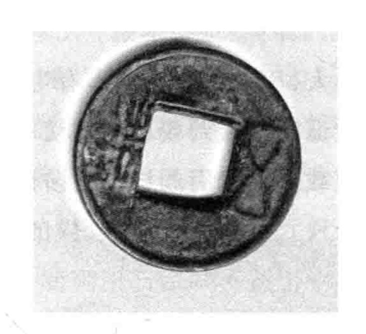


图 2-1-5　吉木萨尔小西沟古城出土五铢钱

该城东靠桦树林，西临长沟，北近山，南临开阔的平地，具有古代军事城堡的天然形胜。由此东南行，即入天山谷道，越二道桥、头道桥，翻越大阪，登大雪山、小雪山，可至吐鲁番，因此，有理由断定它就是汉金蒲城故址。耿恭以此为其校尉治所，既便于沿天山北坡谷地屯田，又便于同驻师山南的汉西域都护陈睦所统之汉军主力相联系。以理揆之，舍此无他。唐人所谓之"石会汉戍"亦当指此。

1.3　且固城即今大龙沟古城

《后汉书》卷 88《西域传》记云："永兴元年(153)，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围汉屯田且固城，杀伤吏士。后部候炭遮领余人畔阿罗多，诣汉吏降。阿罗多迫急，将其母妻子，从百余骑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后部王。后阿罗多复从匈奴中还，与卑君争国，颇收其国人。戊校尉阎详虑其招引北虏，将乱西域，乃开信告示，许复为王，阿罗多乃诣详降。于是收夺所赐卑君印绶，更立阿罗多为王，仍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食其税。"自此，车师后部又分化为二。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传文中"戊校尉阎详"仍是决定天山北麓全局的汉军最高长官，说明戊校尉建置仍存，其治所显然仍是金蒲城。戊部候严皓，候者，斥候也，应是低于戊校尉阎详的天山北麓屯田长官。据《续汉

书·百官一》将军条:“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又悬泉汉简[1]中充分证实曲候乃校尉的属吏,故有“赐校尉钱,人五万……候,人三万”的记载。戊校尉阎详的官阶应为秩二千石的戊校尉,戊部候严皓的官阶为秩六百石的曲军候,候的下属机构就是直接管理屯兵的屯长了。传文中记载车师后部王阿罗多就是因为与戊部候严皓发生矛盾,才起兵反汉,“攻围汉屯田且固城”,则且固城就是戊部候严皓驻节的斥候城。复据《后汉书·西域传》,“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则车师后部候城或后部候城也是戊部候的驻地,且固城亦即车师后部候城或后部候城,这三个名称实为一城。应当指出的是,戊部候与后部候在官阶上虽然都属校尉的属吏曲候,但性质迥然有异。“戊部候”由汉人出任,“后部候”则由车师亲汉派首领炭遮充任,车师是游牧族群,其王犹建牙山谷,这位领有汉朝后部候官名的车师贵族首领炭遮并不住在后部候城,只有汉人出任的戊部候才实际驻节于后部候城,亦即且固城中。可见永建三年至永兴元年(128—153),汉朝在山北屯田又有了新发展,并在金蒲城之外,又新建了斥候之堡且固城或后部候城。这个新建的斥候城(且固城)同金蒲城一样,都是隔山与高昌壁相望,相距都是500里,说明金蒲城与且固城(后部侯城)都位于今吉木萨尔县的山前地带,而且相距甚近,必定同在泉子街乡。前文业已述及,在被笔者考证为金蒲城所在的小西沟古城之南仅8公里,确实存在着一座较小的戍堡——东大龙沟古城,地理坐标:东经89°06′36″,北纬43°44′49″,海拔高度1660米。东、西两面临河,地形狭长而平坦,城略呈长方形仅存西墙、北墙西段和南墙西段,东墙无存,基迹依稀可辨。西墙方向北偏东35度,长约60米,北墙约85米,南墙约95米。城墙夯筑,夯层7~11厘米,夯土中夹有小砾石与碎骨,残高1.7~3米,底部宽4~5米,顶宽1.5~1.8米。南北墙有豁口,似为城门。南豁口两侧有里凸的土坯

---

[1]参阅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载《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建筑残迹，似为后建之门墩或瓮城。傍山临涧，具有军事要塞性质，残垣犹清晰可辨，明显是金蒲城的斥候之堡。地表陶片多为夹砂红、灰陶，文化层不厚，时代晚于小西沟古城。据此判断，东大龙沟古城似即东汉时期的戊部候所驻之且固城，亦即后部候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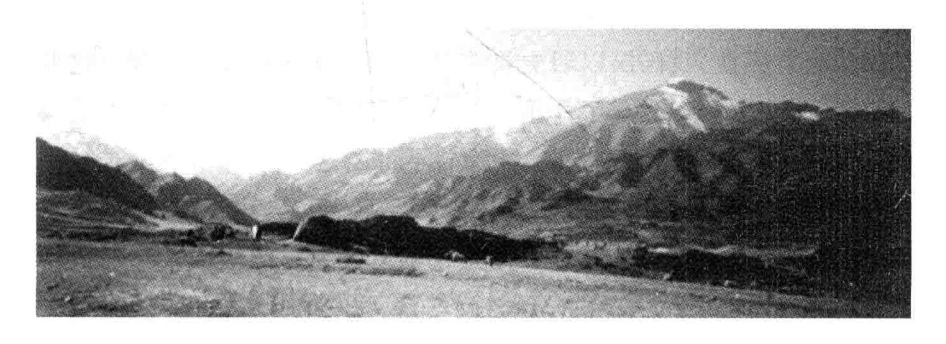


图2－1－6　吉木萨尔县大龙沟古城（汉且固城）

1.4　务涂谷即今吉木萨尔县五塘沟

关于车师后国牙庭务涂谷的记载，首见于《汉书》卷96《西域传》下："车师后国，治务涂谷，去长安八千九百五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胜兵千八百九十人……西南至都护治所（乌垒）千二百三十七里。"又见于《后汉书》卷118："后王居务涂谷，去长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阳九千六百二十里，领户四千余，口万五千余，胜兵三千余人，前后部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是为车师六国，北与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后部，西通乌孙。"务涂谷既为车师后部牙庭所在地，必定位于天山北麓，然其具体地望，却仍有所不明。以至唐宋时代的著作中往往把它同唐之金满县（可汗浮图），或蒲类县混淆在一起。例如杜佑《通典》卷191《边防典七》车师务涂谷下注云："即金满城，今北庭府蒲类县是也。"五代刘昫《旧唐书·地理志》三唐金满县条下注云："后汉车师后王庭。"《元和郡县志》卷40，金蒲城条下云："车师后王庭也。"《太平寰宇记》卷180，车师国条下注云："后王理务涂谷，即金满城。"其实，这一切说法都是靠不住的。《后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后王居务涂谷，

去长史所居五百里”,而自“高昌壁返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按东汉西域长史治所之柳中城(今鲁克沁)在高昌壁东50里,可见务涂谷与金满城并非一地。汉车师后部的牙庭务涂谷的位置就在汉金满城之东,汉疏勒城之西。耿恭刚撤守到疏勒城时,军粮的供应主要凭借车师后部王安得夫人全力支持,因而又坚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说明务涂谷距疏勒城很近。因此,我国汉以后史籍多将它同金满城拉扯在一起。这些出自唐、宋史官的记载起了严重的历史误导作用。根据车师后部坚持庐帐游牧的传统生活方式判断,务涂谷不可能是一座城堡,而只能是一处水草丰茂的山谷。因此,《后汉书·西域传》仅记其谷名,而不留其城名。那么,务涂谷的具体方位究竟在哪里呢?自清代以来早已出现了种种推测,但大都与史书所记方位不符,松筠在《新疆识略》中曾列举了一种说法“今巴里坤西二百五十里有务涂水塘,或以为车师后王国王所治”,这段路程大体相当于由巴里坤至木垒的中间距离,其地过于偏西,同以今吉木萨尔县境为中心的车师后王部基本国境不符。丁谦在《汉书·西域传考证》中认为,“阜康所属三台塘,其西四十里有乌尔图河(蒙古语乌尔图,长也),西图作库列图川,乌尔图库为务涂,浮屠之转名,此水从博格达山北面流出,近山处为谷,知汉时务涂谷,唐时浮屠城均当在此河滨”。三台,今归属吉木萨尔县,其西140里的乌尔图河已近阜康,而远吉木萨尔,距泉子街大路更远,方位不合,又以乌尔库图对音务涂、浮屠,亦属勉强,因为其中又多出个“库”音,无从安置,则此说纯属臆想。藤田丰八以为务涂即Bogda的转音,即博格达[1]。岑仲勉以为乃佛陀转音,来自梵音Buddh[2],即后世可汗浮图命名的由来。这些解释都缺乏语音学的根据。

吉木萨尔资深地方史研究者王秉诚认为,千佛洞北距吉木萨尔县城仅5公里,那里谷深不过2公里,宽不足60公尺,山高仅为50公尺,周围台地方园不足2公里,林木既少,也无古代文物发现,那里绝不可

[1]《西域研究》,杨錬译本,商务印书馆,页50。
[2]《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

能是务涂谷所在地[1]。阚耀平、阎顺在《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的初步调查》[2]一文中认为小西沟古城即车师后部牙庭务涂谷。亦非的论。孟凡人在《车师后部史研究》[3]中主张"后部王治不应在深谷中，故靠近他地道北端，又与之相通的千佛洞一带，很可能就是务涂谷的所在地"。以山谷为牙庭，冬窝子，这一切都是游牧民族的通例，何况《汉书·西域传》明白记述，包括车师后国在内的山北诸国牙庭皆名为谷，说明它们皆在近山谷地。孟说似乎也不能成立。

班固的《汉书·西域传》中最先按照生产、生活方式，将西域诸国分为逐水草游牧的"行国"和定居农耕的"城郭诸国"两大类。范晔《后汉书·西域传》继承了这一分类。两汉书《西域传》中所记天山北麓诸国名，无一例外都是清一色的游牧行国，其牙庭所在都不是城堡，而是山谷。诸如蒲类王住疏榆谷，郁立师王住内咄谷，乌贪訾离王住于娄谷，卑陆后部王住番渠类谷，包括车师后部的牙庭务涂谷，绝不是一个城堡名，而是一个山谷名。按古汉语有纽、有韵，纽、韵相切，即可复原古代音值。"务"，亡遇切，中古属微纽(ɱ)、遇韵(n)，"涂"，同都切，透纽(t')、药韵(ak)，则务涂之中古汉音应为 mntak，而中古微纽与奉纽可以互转，亦可写作 vitak，与《波斯—俄罗斯词典》中之 vater 及 owtri oytap 之音非常相近，其意为弓，则务涂谷者，弓形山谷也。作为车师后部牙庭的务涂谷，仅仅是冬窝子所在的一座山谷，并无城堡，今泉子街南山的确存在一个名为吾唐沟的地名。早在 1987 年笔者就曾赴吉木萨尔吾唐沟考察，并初步推断这一今地名就是务涂谷的千古遗音[4]，2005 年 5 月，又专程驱车细致地考察了此沟，吾唐沟已更名为五塘沟，但到底是哪五个水塘，谁也说不清楚，说明此名并非汉语，亦非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或蒙古语。1987 年昌吉州文物普查中写为乱杂岗(乱葬

---

[1]王秉诚:《再探"务涂谷"与"金满城"地理位置——兼与孟凡人先生商榷》。

[2]《新疆文物》,1992 年第 4 期。

[3]载《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4 月第 1 版,页 27。

[4]薛宗正:《金蒲、疏勒、务涂谷考》,载《新疆文物》,1988 年第 2 期。

冈之讹)。金石并用时代遗址[1]就位于五塘沟口,那里不仅出土了大量陶器,还出土了许多大型磨谷器,在古代必定是水草繁茂、宜于人居的所在。足以证实务涂谷就在今五塘沟流域所在山谷。



图 2-1-7　吉木萨尔县五塘沟(务涂谷)



图 2-1-8　吉木萨尔县乱葬冈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普查工作队:《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载《新疆文物》,1989 年第 3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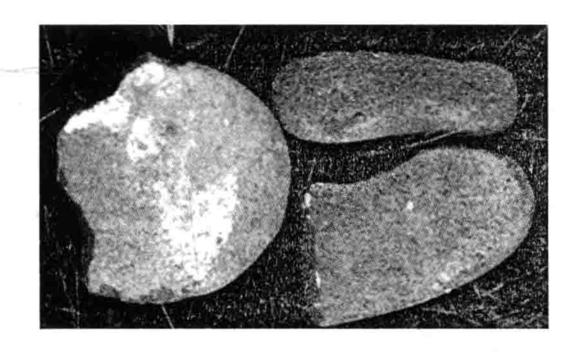


图 2-1-9　吉木萨尔县乱葬冈石器



图 2-1-10　吉木萨尔县小西沟出土金附国红陶罐

1.5　疏勒城即今奇台县石城子古城

疏勒城保卫战乃金蒲保卫战的继续。史载耿恭于金蒲城初挫匈奴之后,不南撤交河,与都护陈睦会师,而是东退疏勒,凭险固守,原因是陈睦战殁,南下之路已被切断。事见《后汉书》卷2《明帝纪》:

> 六月乙未……焉耆,龟兹攻西域都护陈睦,悉没其众。

龟兹、焉耆此次军事行动显然是为了配合匈奴左鹿蠡王围攻金蒲之役,及金蒲围解,降汉之车师后王安得已战殁,匈奴另立新主,耿恭遂偕同安得汉夫人所统忠于汉朝的车师后王残部东退至疏勒,匈奴又统兵来犯,耿恭英勇奋战,击退了匈奴第二次攻势:

> [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七月,匈奴复来攻恭,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胡骑奔走。匈奴遂于城下拥

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乏渴,笮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闻昔贰师将军拔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解去。

汉有两疏勒,一为班超驻节的疏勒国,地在天山南麓。一为耿恭驻节的疏勒城,地在天山北麓,且必在金蒲城之东,因为陈睦已师覆于交河;耿恭东退的唯一指望只能同驻守柳中的关宠部会师,则此疏勒城必与柳中隔山相望,相距不远。前引史料亦足证实,该城乃依山建城,故下有涧水,而城中挖井十五丈难得水,说明其位置在天山北坡,同金蒲务涂谷大体在同一纬度上,且相互之间有沿山道路可通。

耿恭虽于疏勒初战告捷,迫匈奴退师,但并未能与山南汉军会师,这是因为柳中关宠所部也已被围,于是战局逆转,不久匈奴又大举来犯,疏勒保卫战进行得更为艰苦。

时焉耆、龟兹攻殁都护陈睦,北虏亦围关宠于柳中,会显宗(按指明帝)崩,救兵不至,车师复叛,与匈奴共攻恭厉士卒,击走之,后王夫人先世汉人,常以虏青告恭,又给以粮饷,数月食尽,乃煮铠弩,食其筋。恭与士卒推诚共死生,故皆无二心,而稍稍死亡……

这场保卫战从永平十八年(75)五月,一直持续到建初元年正月(76),即章帝即位改元以后,始派来援军,夺回柳中、交河,破车师前部王,耿恭旧将范羌统别部取道山北,迎回耿恭,生还者仅十余人,生入关者又仅数人。这场疏勒保卫战乃是光耀千古的辉煌战役,谱写了一曲气撼山河的中华民族英雄主义壮歌。

1972年奇台县文化馆曾经独力组织了一次全县性的文物普查,当时笔者在奇台县师范学校工作,参加了这次普查,汉代遗址石城子的发现应是这次普查的重要收获,当年笔者就以奇台县文化馆的名义写成了这一考古调查报告,但直至1979年才正式得以发表[1]。报告中称

〔1〕《新疆奇台境内的汉唐遗址调查》,载《考古学集刊》第5辑。

“遗址位于天山北坡丘陵地带的麻沟梁上，属奇台半截沟公社麻沟梁大队一队，在县城之南约55公里。城建一山上，居高临下，东西两面临涧，南为天山余脉的层峦叠嶂，仅北面有一条山路可以通行，城南北约长138米，东西约长194米，城墙仅存痕迹，其中北段算是最好的，但残高已不足半米……地形为东北高，西南低，高低之差可及半米，城西南部有一圆形凹地”。其中发现了大量粗绳纹板瓦、筒瓦、素面实心砖，以及各式云纹瓦当，皆为典型的东汉遗物。据此，笔者考证这一石城子遗址应为耿恭驻守的汉疏勒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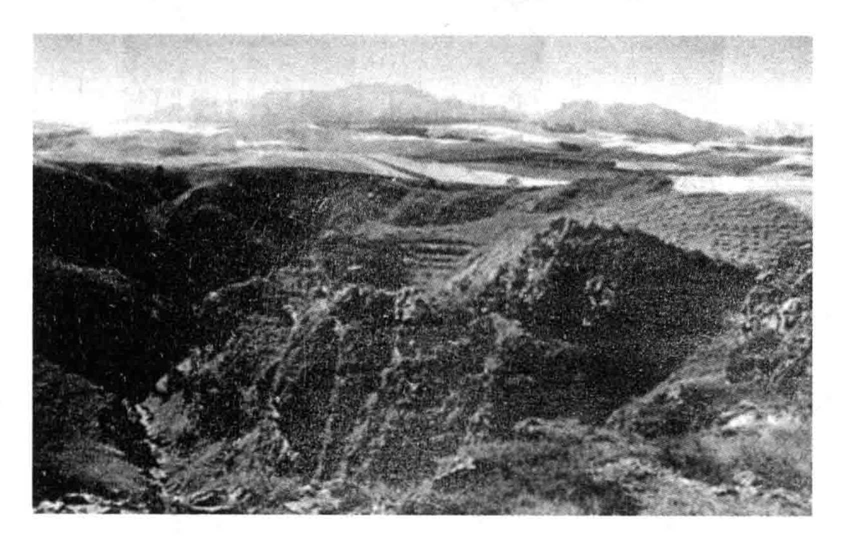


图2-1-11　悬崖之上的奇台石城子古城(汉疏勒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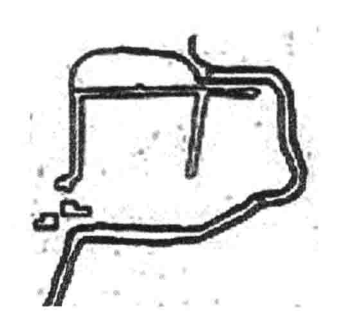


图2-1-12　奇台石城子古城实测图



图 2-1-13　奇台石城子出土云纹瓦当、汉代大方砖、筒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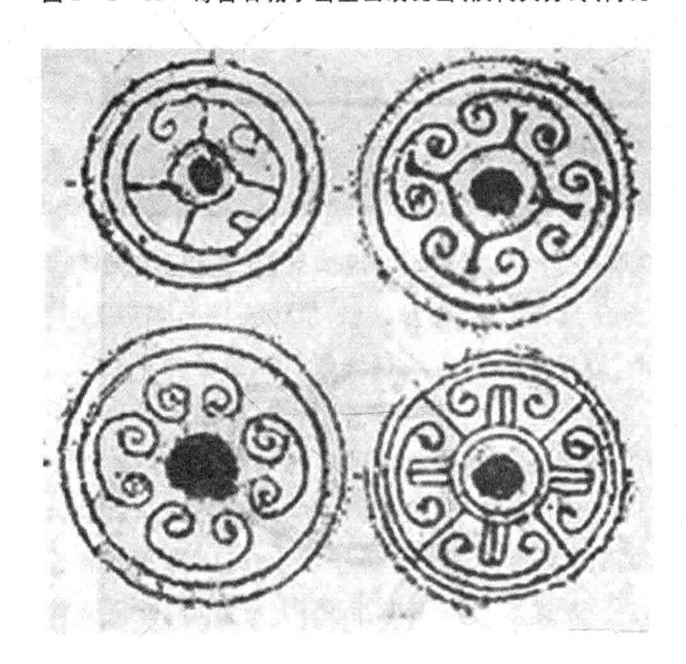


图 2-1-14　奇台石城子出土云纹瓦当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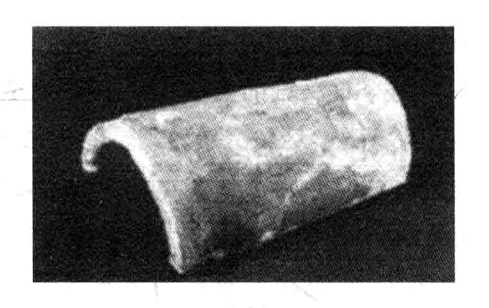


图 2-1-15　奇台石城子出土汉瓦

这一结论现在似乎已得到学术界大部分同行所认可，但仍有个别同志，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些文章……其主要的，也是唯一的论据便是遗址中发现了汉砖、汉瓦[1]"。非也。对此，笔者本在旧作《耿恭驻守的疏勒城究竟在哪里》一文中早已列举了四项理由。不妨引证如下：

（1）耿恭抗击匈奴先在金蒲（金满），后来才移驻疏勒，可见二城相距不远。据清人徐松考证，汉金满在今吉木萨尔县南山，石城子在今奇台南山，县境毗邻，且同在天山北坡丘陵地带同一直线上。

（2）耿恭移驻疏勒，可能为了便于同汉朝援军取得联系。当时，关宠驻柳中，即今鄯善鲁克沁一带，与石城子所在地隔山相望。

（3）金蒲（金满）城所在的车师后王地与西域长史屯军的车师前王部有山道相通，此路即新、旧唐书所载之柳谷通道，即今吉木萨尔泉子街南通吐鲁番的山间大道。弃此他徙，说明此路早被切断，耿恭移师，说明疏勒城与柳中城之间亦必有山路相通。据当地居民反映，由此南入夹皮山，隔山越黑涝灞，有峡谷崖道，叫色尔太小路，恰可直通鄯善。

（4）疏勒城"凿井十五丈不得水"，而山下"有涧水可固"，说明其城地形高峻，依山临涧亦与今日石城子地貌特征相仿。[2]

除此以外，今又增补两项理由。

（5）"疏勒"之名必属月氏语言，属东伊兰语支，《汉语—波斯语词

[1] 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载《车师后部史研究》，页 30～31。

[2] 《图书评介》，1979 年第 3 期。

典》页 1531 有 solb 一词,意为"硬石、坚硬的、力量",其对音与疏勒相近,其第一意"硬石",与今日汉城的土名"石城子"完全相符。

(6)关于戊己校尉所属屯区,史无明载。近年来天山南北东段戊己校尉所属诸屯城相继发现了一种似为屯官标志的铜马,非常引人注目。按秦汉时期大将统兵,设有虎符制度,其下各级官佐,各有官符,依例,戊己校尉所率屯田将佐,也应各有其等级不同的官符或勋符,以为信物。奇台石城子汉代屯城中发现了一匹铜马,大眼炯炯,一颈浓鬃,细腰劲臀,尾巴甩动,骏姿英武,长约 4 厘米、高约 3.5 厘米,显然是一种佩饰。鞍部有一小孔,可系带佩用,很可能就是屯田军官区分级别的标志。后来这种官符陆续发现,1981 年木垒英格堡也征集到一匹铜马,马的基本造型前马相同,区别仅乃马上另有一骑者,也应是东汉时代的产物。1985 年奇台东湾乡又出土了石城子同样形制的铜马,高 3.5 厘米、长 5.2 厘米,也是鞍部开孔,铜的成色更黄。吐鲁番也发现了类似形制的铜马,高 3.7 厘米、长 5 厘米。以上三马形制悉同。其后又得知吉木萨尔也曾发现两匹铜马,一为张天铭先生的私人收藏,马上有猴,另一铜马形制与奇台石城子铜马基本相同,其出土地点明确就在泉子街乡的小西沟古城。马上有猴,似乎寓意为马上封侯。由此判断,这些似乎都是汉军基层屯田长官佩戴的官符。



图 2-1-16　奇台石城子出土铜马勋符



图 2-1-17　奇台东湾乡出土铜马勋符



图 2-1-18　吐鲁番出土铜马勋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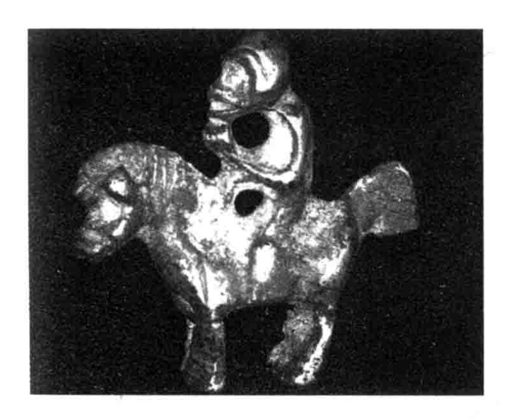


图 2-1-19　吉木萨尔出土马上封侯铜马勋符



图 2-1-20　木垒出土马上封侯铜马勋符

又据《后汉书》卷 19 载："会关宠已殁，蒙等闻之，便欲引兵还。先是，恭遣军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随王蒙军俱出塞。羌固请迎恭，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遇大雪丈余，军仅能至。城中夜闻兵马声，以为虏来，大惊。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城中皆称万岁。开门，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随俱归。"说明苦守疏勒孤城的耿恭最后是被其部将范羌营救返汉的。范羌先已到达鄯善柳中，关宠业已战殁，范羌请缨救耿恭，必持有虎符。而今木垒恰好出土了汉代虎符，说明范羌乃由柳中绕行木垒，成功地迎

接耿恭一军将士返汉。此路必取由柳中经今木垒而达奇台的花谷道。[1]

由此足证,奇台县石城子遗址就是汉疏勒城的地望所在。

综上所述,基本上澄清了务涂谷、金蒲、且固、疏勒四地的具体位置,并且进一步勘明了汉代天山北麓诸城与唐代天山北麓诸城颁布上的重大差别,唐城大多在今乌鲁木齐—木垒公路之北,而汉城则大部分布于公路之南。

(原载《新疆文物》,1988 年第 2 期《金蒲、疏勒、务涂谷考》,有增改)

---

〔1〕《西州图经》花谷道。"右道出蒲昌县界,西合柳中,向庭州,丰水草,通人马。"吐鲁番文书中有挎谷烽的记载,说明花谷道又作有挎谷道,挎谷烽似因两谷相交得名,具体路线为鄯善之东的台子北行,沿克尔其河,经达匪,北经罗护守捉而至山北。按由罗护守捉北上,经独山守捉出山,乃进入今木垒境,参阅《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自罗护守捉西北上乏驴领,百二十里至赤谷;又出谷口,经长泉、龙泉,百八十里有独山守捉;又经蒲类,百六十里至北庭都护府"。独山守捉即木垒油库古城,蒲类县即今奇台唐朝墩古城,赤谷即连接罗护与独山的山道,据此,此路所经非柳谷,而是赤谷。则赤谷在《西州图经》中也被混称为柳谷。

2 柳中—田地城考

柳中是西域历史名城之一，东汉时期戊己校尉分化为主管天山北麓的戊校尉与主管天山北麓的己校尉两种官职，柳中城为己校尉关宠的治所，金满城为戊校尉耿恭的治所。三通西域时期为西域长史班勇的驻地，前凉设高昌郡，改名为田地县，高昌国时期田地城、交河城与高昌城并为其国三大名城，设田地公。入唐为西州柳中县，其后音变为鲁陈，陈诚西使，犹留诗其地[1]，说明直至明初，仍为吐鲁番名镇。2005年4月受鄯善县委邀请，笔者与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田卫疆、新疆考古研究所资深考古工作者张平一起考察了柳中城故址。虽然古城早圮，且大部分都已挖平，但仅凭残存的一段城垣亦足窥见当年雄浑气象。遗憾的是，这座历史名城迄今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单位都不是，因撰斯文，期在唤起人们的重视，保护这一国宝。

2.1 己校尉与西域长史治所的汉柳中城

柳中城即今鄯善鲁克沁，早在清代史籍中就多有记载，但正式勘察过该遗址的当属我国西域考古学之父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盆地考古记》中记述其考察经过："入鄯善界，下午三时，至鲁克沁住次。次日往见回王……鲁克沁东有一回城，为安集延时代所筑。但有一旧城，城墙一段，其建筑形式和方法，与哈拉和卓旧城同。疑即高昌时代之田地城，唐柳中城之遗址也。"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篇）》中将柳中与交河、高昌一起列入车师前部所建诸城之一[2]，依其说，则柳中与交河皆属

〔1〕薛宗正：《陈诚西使及其纪行诗文》，载《西域史论丛》第2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

〔2〕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篇）》第二节《车师前国》之二《车师前国的种族与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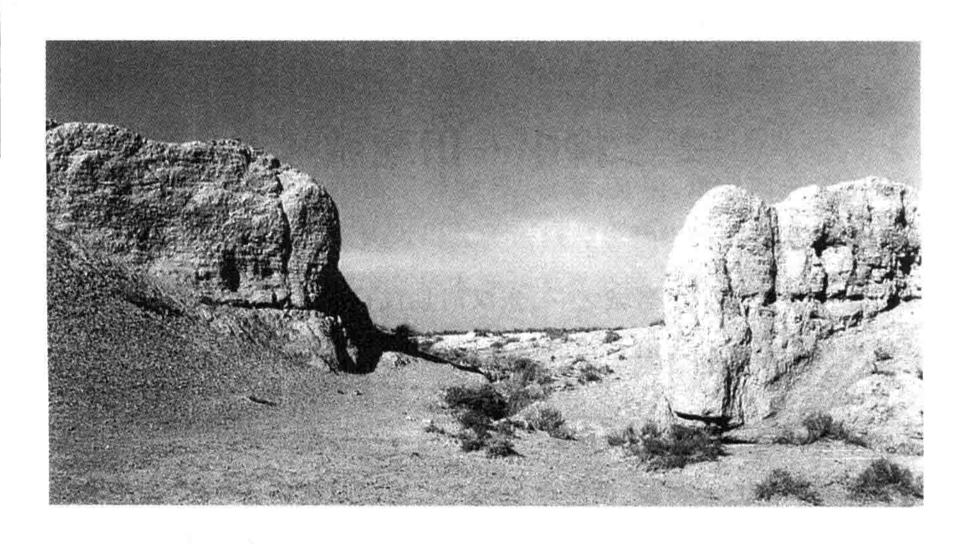


图 2－2－1 鄯善县鲁克沁柳中故址

车师前部所建。但经实地勘察,二者建筑形制完全不同。交河城乃因势挖地取土所建城堡,其形制确为中原未见,纯属地方文化的独特创造,但现存柳中残城的建筑形制全为夯筑所成,明显为中原风格,即黄文弼所云"其建筑形式和方法,与哈拉和卓旧城同"。说明绝非车师前部所建,而是汉军屯垦将士的建筑成果。其起源绝非汉武帝元封三年十二月姑师北徙,改译为车师之后,而是发生于汉宣帝郑吉领西域都护,在山南山北地区全面推行屯垦制度之后,属西汉驻军在车师前部故境的屯城之一。至东汉时期,地位更加重要,先后成为汉己校尉屯城总部与西域长史的治所。至于其命名为柳中,大约类似于高昌壁因河西高昌里而得名。按西域柳中城之名,西汉尚未见诸史籍,而《汉书》卷42《樊哙传》已录有以下文字:"樊哙,沛人也,以屠狗为事。后与高祖俱隐于芒砀山泽间……还定三秦……攻赵贲,下□(邳?)、槐里、柳中、咸阳……从攻项籍,屠煮枣。"可见,柳中本关中地名,与槐里、咸阳近。汉军在今鄯善地区的屯城以柳中为名,说明建城汉军士卒,多原籍柳中,因以为名。

汉开西域,贯穿了同匈奴之间激烈的碛口丝路咽喉的争夺,西汉的"五争车师"、东汉的"三绝三通",都贯穿了汉与匈奴争夺车师前部控

制权的激烈斗争。在西汉所谓“五争车师”的战斗中,前两次战役都发生在汉武帝时期,主持进军碛口的汉军统帅都是以降汉的匈奴介和王、汉封开陵侯的成娩为统帅,第一次攻车师败绩,第二次复率汉军及附汉的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兵共围车师,“虽胜,降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1],原因都在于长途行军,粮运难以供应,大部分将士并非死于战争,而是死于饥饿。汉武帝虽然早已认识到军粮供应的重要性,但所遣屯田轮台的打弥太子赖丹却被杀身亡,屯田积谷的计划并未成功。至汉宣帝时期发动的第四次、第五次战役汉军统帅则乃汉将郑吉,此人于渠犁屯田,大积粮谷,以之交结西域诸王,取得了对车师的决定性胜利,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又取得了匈奴日逐王的臣服。神爵三年(前59)汉置西域都护府,郑吉出任西域都护,遂将屯田制度进一步推广。出现了屯田校尉的官职,主要是在车师牙庭交河城附近屯田,元帝初元元年(前48)正式创置了戊己校尉,下辖“丞、司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2] 先亦在交河城一带屯田,后来扩展到原为汉军后勤大本营的高昌壁一带,汉军屯田区遂与车师前部划疆而治。当时进驻车师前部的汉军似以原籍敦煌高昌里的士兵为主,因此,在今吐鲁番所建汉城被称为高昌壁。随着汉军屯田面积的东扩,今鄯善县境也兴建了汉军屯城,成为高昌壁之东新的汉军城堡。由于此处驻军多来自关中的柳中,至东汉初年柳中城名开始浮现于史册,并在东汉重开西域的“三绝三通”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东汉西域的“三绝三通”仍与争夺车师前、后部有关,具体指明帝永平中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的再置与罢废,班超再建汉朝政治权威,与班勇以西域长史身份进驻柳中,号令西域等三大重要事件。

恢复重建后的西域都护仍治于距车师前部都城交河不远的高昌壁,已校尉关宠驻地就位于今鄯善鲁克沁的柳中城,亦即作为高昌壁斥候之所的高昌垒。此地平原肥沃,东距敦煌较近,北隔天山与今奇台县

[1]《资治通鉴》卷22,武帝征和四年,页739。

[2]《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页139。

接壤,山北就是位于奇台县麻沟梁的石城子古城遗址。而西域都护陈睦则驻节于其西的高昌壁,即今吐鲁番高昌故城,其北即吉木萨尔县的泉子街,那里有一座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古代遗址,下层是古代聚落遗存,碳14测定数据为2340±80年B、P,推测为金附国故址,时间相当于战国至西汉初年,上层为古城遗址,年代为2039±104年B、P,相当于汉朝,据笔者考证即戊校尉治所的金蒲城[1]。至永平十八年(75)二月,窦固、耿秉所统大军刚刚凯旋,三月北匈奴已联合焉耆等西域属国发动了全面反攻。焉耆、龟兹等亲匈奴的诸国联军加上车师前部全力进攻驻守高昌壁的汉西域都护陈睦,与此同时,北匈奴也在北道发动了进攻。北单于遣左鹿蠡王二万骑击车师。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骑多,皆为所殁。匈奴遂破杀后王安得,耿恭先在金蒲城迎战,以毒箭击退北匈奴的来犯。但金蒲城解围之后,耿恭发现,作为西域汉军主力的西域都护陈睦一军却未能抗住焉耆、车师前部等诸国联军的攻势,高昌壁失守、陈睦战殁,南道退路已断,不得不东退疏勒城。据笔者考证此城应即奇台县的石城子古城[2],城中发现了大量具有汉代特色的云纹瓦当、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足以证实是一座汉城[3]。现已得到不少研究者的赞同[4]。经实地调查,该城与山南的柳中城恰有山路相通,其具体路线是由此南入夹皮山,隔山越黑涝坝,有峡谷崖道,可直通鄯善,名为"色尔太小路"。

当时驻守柳中的己校尉关宠仍然在那里坚守,足与耿恭一军南北呼应。史载关宠于陈睦战殁后,曾上疏汉庭告急,"初,关宠上书求救,时肃宗新即位,乃诏公卿会议。司空第五伦以为不宜救。司徒鲍昱议

---

〔1〕薛宗正:《金蒲、疏勒、务涂谷考》,载《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2〕薛宗正:《耿恭驻守的疏勒城在哪里?——兼与才家瑞同志商榷》,载《图书评介》,1979年。

〔3〕奇台县文化馆(薛宗正执笔):《新疆奇台境内的汉、唐遗址调查》,载《考古学集刊》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4〕如魏大林:《疏勒城考辨》,载《西部学坛》,1987年第3期。王炳华:《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载《新疆文物》,1988年第1期。戴良佐:《奇台麻沟梁石城子遗址踏勘记——兼论耿恭驻守的疏勒城方位》,载《新疆文物》,1992年第1期。王秉诚:《再探"务涂谷"与"金满城"地理位置——兼与孟凡人先生商榷》等。

曰：'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又二部兵人裁各数十，匈奴围之，历旬不下，是其寡弱尽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将精骑二千，多其幡帜，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极之兵，必不敢当，四十日间，足还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建初元年正月，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城，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驼、驴、马、牛、羊三万七千头，北虏惊走，车师复降，会关宠已歿"。可见关宠守柳中的时间也很长，只是较山北的耿恭稍逊时日。耿恭却因此而得救。而举凡耿恭经历的杀马、煮铠甲为食等艰苦卓绝的生活必都同样发生过。遗憾的是关宠战殁时间稍早，遂令"节过苏武"的美誉让耿恭独擅了。章帝自此"罢戊己校尉官"[1]，并"不复遣都护。二年，复罢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2]

二绝二通的主要人物是班超。初以孤军在疏勒创立据点，拜西域长史，永元二年(90)巧妙地化解了同大月氏的冲突，招致"车师前后王并遣子入侍"。[3] 永元三年(91)，擢西域都护，徙治龟兹。此年"复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相去五百里"。车师前、后部再度置于汉朝治下。柳中城必在这一时期重归汉朝统治，可惜缺更详尽的记载。

西域三通的主要人物是曹宗与班勇。永元十四年(102)班超返乡之后，任尚接任西域都护，不久，西域就开始发生动乱。车师又非复汉有，此即西域三绝。最早倡议重开西域的汉朝官员乃敦煌太守曹宗，其最早的实践者则乃敦煌长史索班。史载安帝元初六年(119)："初，西域诸国既绝于汉，北匈奴复以兵威役属之，与共为边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长史索班将千馀人屯伊吾以招抚之。于是车师前王及

[1]《后汉书》卷3《章帝纪》，页133。
[2]《后汉书》卷88《西域传》，页2910。
[3]《后汉书》卷4《和帝志》，页170。

鄯善王复来降。"[1]这是安帝元初六年岁末的事,而数月后的永宁元年(120)初,已遇到麻烦:"北单于与车师后部遂共攻没班等,进击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于曹宗,宗因此请出兵五千人击匈奴,报索班之耻,因复取西域。邓太后召勇诣朝堂会议。"[2]西域局势一度非常严峻,班超次子班勇全力支持曹宗的进取政策,在廷议中力排众议,力陈西域不可失。邓太后采纳了班勇的建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3]但仍没有决心重开西域。"北匈奴连与车师入寇河西"[4],新任敦煌太守张珰上书力陈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汉朝才下了决心,正式册拜"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5] 延光三年(124)"正月,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特加三绶。而龟兹王白英犹自疑未下,勇开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缚诣勇降。勇因发其兵步骑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庭,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余人,于是前部始复开通。还,屯田柳中"。[6] 延光四年(125),班勇率兵出征车师后部,初战大捷。"秋,七月,西域长史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击后部王军就,大破之,获首虏八千馀人,生得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将至索班没处斩之,传首京师。"[7]至延光四年(125),"永建元年,更立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勇又使别校诛斩东且弥王,亦更立其种人为王,于是车师六国悉平。其冬,勇发诸国兵击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众二万余人皆降。捕得单于从兄,勇使加特奴手斩之,以结车师,匈奴之隙。北单于自将万余骑入后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马曹俟驰救之。单于引去,俊追斩其贵人骨都侯,于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后车师无复虏迹,城郭

---

[1]《资治通鉴》卷50,安帝元初六年,页1602。

[2]《后汉书》卷47《班梁列传》。又据《资治通鉴》卷50,系此事发生于安帝永宁元年春三月。

[3]《资治通鉴》卷50,安帝永宁元年(120),页1606。

[4]《资治通鉴》卷50,安帝延光二年(123),页1625。

[5]《资治通鉴》卷50,孝安皇帝延光二年(123),页1626。

[6]《后汉书》卷47《班勇传》,页1589。

[7]《资治通鉴》卷51,安帝延光四年(125),页1626。

皆安。惟焉耆王元孟未降”。[1] 班勇主政西域时期册拜的车师后王加特奴，贡献尤大。此人本车师后部亲汉贵族。永建元年(126)与其弟八滑从班勇击匈奴呼衍王，大捷，为班勇奏立为王。阳嘉三年(134)率兵千五百人，佐戊己校尉、后部司马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今巴里坤县境)，“大破之，获其季母”[2]，以及牛羊10余万头，车1000余辆。顺帝阳嘉四年(135)呼衍王大举反攻，“侵车师后部。帝令敦煌太守发兵救之，不利”。[3] 入秋，车师后国破，加特奴战殁。汉朝重新控制了车师前、后部及车师六国。

综上可知，柳中城始建于西汉宣帝时期，初仅作为高昌壁的斥候之所存在，至东汉初年地位日益重要，明帝时期已成为主管山南吐鲁番盆地的己校尉治所，至班勇主政西域，又进一步演变为西域长史治所。

2.2 高昌郡、高昌国前期的田地县

魏、晋上承汉制，虽然国势已远不如两汉强盛，但仍领有今天山南麓东段地区。魏文帝黄初二年(221)，“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4] 参稽《晋书》卷14《地理志》“魏时复分以为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如汉故事[5]，至晋不改。统郡八，县四十六，户三万七百。”继续保持着凉州刺史兼领戊己校尉的历史传统。首任戊己校尉张恭“黄初二年，下诏褒扬，赐恭爵关内侯，拜西域戊己校尉”，死后又由张恭之子继任[6]。又《三国志》卷30《魏书》，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此之高昌应为高昌壁。说明尽

[1]《后汉书》卷47《班勇传》，页1590。

[2]《后汉书》卷6《顺帝纪》，页264。

[3]《资治通鉴》卷52，顺帝阳嘉四年(135)，页167。

[4]《三国志·魏书》卷2《文帝纪》，页79。

[5]戊己校尉由凉州刺史遥领的制度似始于汉末，《三国志·魏书》卷6《董卓传》引《英雄记》：“卓有才武，旅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军司马，从中郎将张奂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悉以分与吏士。迁广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可为坚证。

[6]《三国志》卷18《魏书·张恭传》，页551。

管名义上戊己校尉乃由凉州刺史遥领,其法定治所仍在高昌壁。可见包括柳中城在内的高昌故城以东地区都属魏军的屯田地界。说明曹魏之世,虽然继续领有包括柳中城在内的西域东段地区,且继续设立戊己校尉等屯田官员,但戊己校尉改由凉州刺史遥领。

晋承魏制,留名史册之戊己校尉有马循,曾于咸宁元年至二年间(275—276)多次征伐已臣属于鲜卑的车师后王[1]。以此判断,晋代戊己校尉马循的驻地,绝不可能驻于凉州,只能驻于名为鲜卑实为车师后部王阿罗多相距不远的高昌壁。说明至晋凉州刺史已不再兼领戊己校尉,这一主持西域屯田事务的最高长官已直接屯驻于高昌壁或柳中城一带。至西晋末年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全面进行建置改革,进一步印证了以上推测:"永宁中,张轨为凉州刺史,镇武威,上表请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统武兴、大城、乌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监等县。又分西平界置晋兴郡,统晋兴、枹罕、永固、临津、临鄣、广昌、大夏、遂兴、罕唐、左南等县。是时中原沦没,元帝徙居江左,轨乃控据河西,称晋正朔,是为前凉。及张寔,分金城之令居、枝阳二县,又立永登县,合三县立广武郡。张茂分武兴、金城、西平、安故为定州。张骏分武威、武兴、西平、张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晋兴、广武合十一郡为凉州,兴晋、金城、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成、汉中为河州,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张骏假凉州都督,摄三州。"[2]据此可知,戊己校尉已由凉州刺史兼领,变为凉州下属的一级军政单位,又恢复了罢置已久的西域都护,以分其势,相互牵掣。参稽李柏文书的发现,不论该文书的真正发现地是LA或LK,西域都护的驻地都是在楼兰,而戊己校尉的名义治所虽在高昌,其主要屯田地区似在其东的柳中,从后来柳中更名田地城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因为这一地区更为接近敦煌,而戊己校尉所属屯将士主要都是

〔1〕《晋书》卷3《武帝纪》,页65～66:"咸宁元年……六月……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二年……秋七月,鲜卑阿罗多等寇边,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之,斩首四千余级,获生九千余人,于是来降。"

〔2〕《晋书》卷14《地理志》,页434。

由敦煌人组成,例如《晋书》卷60记敦煌人索靖就曾"出为西域戊己校尉长史"。后来叛变凉州张氏家族的戊己校尉赵贞以及曾盘踞高昌抗拒北凉沮渠氏的阚爽,也都是敦煌人。

高昌郡始设于东晋时期,且与前凉主张骏平定赵贞之乱有关。而《晋书·张骏传》所记混乱、失序,《资治通鉴》所记又有重大疏漏,必须参稽其他史料。对此,顾野王《舆地志》留有明确的时间记载。顾野王,字希冯,吴郡人……遍观经史,精记嘿识,天文地理、蓍龟占候、虫篆奇字,无所不通。南梁太学博士,是我国历史最大规模类书之一的《玉篇》的最早撰稿人[1]。30卷本的《舆地志》更是其名著,而其书久佚。有幸其中关于高昌设郡的文字片断尚存,内记:

晋咸和二年(327)置高昌郡,立田地县[2]。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6《陇右道第七》西州高昌县条与此全同。高昌郡的设立乃是西域郡县化的历史开端,田地县就是汉柳中城的更名。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段有关高昌郡建置的重要记载中并未提及高昌县,而是同时提及田地县的设置,说明初置之高昌郡的郡治并未设在高昌壁,而是与田地县同治。足证直至东晋初年,汉屯城柳中仍是前凉西域屯田的中心,以故正式更名田地县。前秦继续沿袭着这一历史传统,史载前秦所册高昌太守为杨翰,很可能高昌治所仍在田地县。上隶凉州刺史梁熙,及前秦苻坚兵败淝水,众叛亲离,晋太元十年(385)三月,吕光自龟兹回师勤王,前秦凉州刺史梁熙见苻坚即将败亡,谋阻吕光东归,割据自雄。高昌太守杨翰进谋:"若光出流沙,其势难敌,高梧(一作高桐)谷口临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夺其水,彼既穷渴,自然投戈,如以其远不守,伊吾之关,亦可拒也。若度此二阨,虽有子房之策,无所施矣。"前秦高昌太守所说的高梧(一作高桐)谷口疑即今焉耆铁门关要隘。伊吾之关应指今巴里坤松树塘。可见前秦高昌郡的领

[1]《南史》卷42《齐高帝诸子》上,页1074:"太学博士顾野王奉令撰《玉篇》。"

[2]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叙高昌郡据《初学记》卷8《陇右道第六》车师国田地县条注引,又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6《陇右道第七》西州高昌县条,未记原文所出,而文字全同,显然同出一源。

地西至今焉耆铁门关,东至哈密北山,比前凉所属之高昌郡更有所扩大,则汉柳中城所在的田地县界也已东扩至今哈密境内。由于梁熙并未采纳杨翰的建议,吕光大军顺利通过上述二险隘,杨翰举高昌郡归降吕光,很可能继续留任高昌郡守。晋太元十年(385)八月,苻坚为羌人姚苌所杀,吕光自立为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牧、酒泉公,创立后凉王朝。麟嘉五年(晋太元十八年,393)七月,"群议以高昌虽在西陲,地居形胜,外接胡虏,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镇之。光以子吕覆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高昌,命大臣子弟随之"[1]。此为王子出镇高昌,领西域大都护,其级别又高于普通郡太守,这是高昌建置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权力、级别的升格。关于后凉王子出镇之高昌,未必是高昌壁,更未必是高昌垒,很可能直到这时,高昌郡仍与田地县同治。

后凉亡,汉人李氏家族创立的西凉王朝代兴,开始领属高昌郡。共传三君,先曾沿用过的段业神玺、天玺两种年号,后又自建四种年号:李嵩年号为庚子(400—405)、建初(405—417),李歆年号为嘉兴(417—420),李恂年号为永建(420—421)。以上庚子、建初、嘉兴三种年号都已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唯李恂永建年号尚未发现。自晋太元二十一年(后凉龙飞二年,段业神玺元年)算起,至永建二年(396—421)有效统辖高昌郡长达25年[2]。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中有《建□某年兵曹下高昌、横截、田地三县符为发骑守海事》[3],此墓所出有纪年的文书上起西凉建初四年(408),下至缘禾五年(436),据此判断,文书中"建□"年号的缺字应为初,正是李嵩的纪年。属西凉领属高昌郡高昌、横截、田地三县的物证:

(前缺)

[1]□□一人自桑所×××自乘□□

---

[1]屠乔孙、项琳辑崔鸿:《十六国春秋》卷81《吕光》。

[2]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谓"西凉统治河西大约二十二年,统治高昌大约二十至二十一年",今不取。

[3]《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文物出版社,页131~133。

[2]隤社福、帛午、任任□三人乘所配马，田□

[3]三骑，通身合七骑、次往海守十日，以休领

[4]兵曹□赵茗史蕫兴……

[5]罗人□□右，请下县？……

[6]东部督[邮]，横截主者……

[7]海守十日，□高昌三骑，田……

[8]七骑，起□□十五日兙遣[尽]……

[9]乃下符□□休诣田地县……

[10]案奉行

[11] [校]□□[簿] 訣

[12]建□□[年]九月十二日白

[13](主簿)……悦

[14]×××(功曹吏)□

[15]典军主簿 莹

[16]五官 洿

[17]典军 遗

(后缺)

这一重要文书的出土证实西凉时期高昌郡建置已有重大发展。咸和二年赵贞初署高昌郡太守时，仅建有高昌一郡、田地一县，并无高昌县的建置，说明当时仍是郡、县分治，高昌县始置，最早只能追溯至咸康元年(335)张骏平定赵贞，高昌正式建郡之后。即使如此，高昌郡下也不过领有高昌、田地二县，属于今鄯善县境者仅田地一县。这件文书明确记述，除田地县外，又增加了一个横截县名。

西凉亡于汉化杂虏沮渠氏北凉，北凉王朝初建都凉州，至北魏攻占河西，沮渠无讳率北凉余众西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页85，哈拉和卓96号墓出土《(北凉)高昌郡功曹下田地县符为以孙孜补孝廉事》：

[1]……田地县主者，今以孙疋补孝廉，符到

[2]…………………………………………奉行

[3]……………………………功曹书佐　　　王开觊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页13,哈拉和卓90号墓《阚氏高昌高宁、威神、田地诸县驼马文书》,此墓出土文书无纪年,但有柔然永康十七年(482)文书,据此可知,本墓出土文书属阚氏高昌时期。

[1]……那迦乘往□北

[2]……高宁驰一头……

[3]……马二疋,威神驰一头

(中缺)

[4]……田地县驰两头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页9~11,阿斯塔那517号墓麴氏高昌文书补遗《高昌某年田地、高宁等地酢酒名簿》:

[1]…………田地田寺惠藏五斛□升　高寺绍御……

[2]一斛牛寺□文五斛韩满提一斛四斗　王令祐二……

[3]五斗,竺道□一斛七斗兼任善善一斛 ?阿?

(后缺)

2.3　麴氏高昌时期的田地郡、平远府、田地公

在我国南北朝史书中并没有高昌国地方行政组织的清晰记载,却共同记录了该国由若干"城"或"镇"组成,其中北朝史书皆记为"城",如《周书》卷50《异域》记高昌"国内总有城一十六"。《北史》卷97记高昌"其国,周时,城有一十六。后至隋时,城有十八"。南朝史书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高昌诸城名,但却不称"城",而是别称为"镇",如《梁书》卷54:"高昌国……置四十六镇,交河、田地、高宁、临川、横截、柳婆、洿林、新兴、由宁、始昌、笃进、白力等,皆其镇名。"《南史》卷79:"高昌国……置四十六镇,交河、田地、高宁、临川、横截、柳婆、洿林、新兴、由宁、始昌、笃进、白刀(力)等镇。"主要采撷南朝史料撰成的《册府元龟》卷961《外臣部·土风三》也记"高昌国……置四十六镇:交河、

田地、高宁、临川、横截、柳婆、洿林、新兴、繇宁、始昌、笃进、白刀等，皆其镇名"。入唐后，史书中始出现了"州""郡""县"等字样，但仍沿用"城"这个旧名，给人的印象似乎是高昌存在着郡、县、城镇三级管理制度。《新唐书·高昌传》"[侯]君集分兵掠定，凡三州、五县、二十二城"。《通典·边防七》车师高昌附条则不称州，而称郡："侯君集平高昌国，下其郡三、县五、城三十二。"《唐会要》卷95高昌条亦记"[侯]君集分兵掠地，下其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旧唐书·高昌传》略同，《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西州条："[侯]君集进兵破之，下其二十二城。"前辈学者黄文弼的《高昌疆域郡城考》[1]就是利用这批资料写出的总结性著作。由于吐鲁番文书、墓志的大量出土，这些记载虽不能成为研究的主要依据，但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吐鲁番学的起步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成国际显学，基本上可以复原麴氏王朝时期地方行政建置的基本面貌。在高昌行政建置的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我国学者主要有郑炳林[2]、侯灿[3]、钱伯泉[4]、孟宪实[5]、王素[6]等人，日本学者嶋崎昌[7]、荒川正晴[8]等人也积极参加了这一研究。本节综辑诸家研究成果，认为高昌国的地方行政制度继承了魏、晋及十六国时期河西诸凉王朝的政治传统，奠基于

---

[1]原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3卷第1号，1932年3月。今收入《鄯善县的历史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

[2]郑炳林：《高昌王国行政地理区划初探》，载《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

[3]侯灿：《麴氏高昌王国郡县城考述》，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

[4]钱伯泉：《高昌国郡县城镇的建置及其地望考实》，载《新疆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5]孟宪实：《关于麴氏高昌皇朝地方制度的几个问题》，载《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

[6]王素：《麴氏王国末期三府五郡二十二县考》，载《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

[7]嶋崎昌：《麴氏高昌国官制考》，载《隋唐时代の东トウルキスタン研究—高昌国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大学出版会重印本，1983年。

[8]荒川正晴：《麴氏高昌国における郡县制の性格をめって—としてトウルフアン出土资料による》，载《史学杂志》第95编第3号，1986年。

郡县制的础石之上[1]。郡、县属级别不同的两级结构,虽然出现了一些郡县合治的现象,说明郡县合治,但绝不能以此断定郡不管县。经仔细勘比出土墓砖、文书,得出的结论是,麴氏王朝时期高昌共设五郡、二十三县[2]。

在高昌国中,"郡"是最高级的地方行政单位。至迟麴氏高昌时期田地县已升格为田地郡。对此,吐鲁番出土砖质墓表中保存着大量证据,例如《高昌章和十八年(548)汜灵岳墓表》中记载汜灵岳的仕宦经历中就有"田地郡虎牙将军、内幹将"一职,说明田地县已升格为田地郡[3]。又如《高昌延昌五年(565)郭和儿及妻咆(鲍)氏、张氏墓表》[4]记郭和儿曾任田地(郡)户曹参军,因为参军是郡府官职,官品在第七等级。再如《高昌延和三年(604)巩孝感墓表》记巩孝感生前曾任"故田曹司马"[5]。据此可知,至迟麴氏高昌时期田地县升级为田地郡,同交河郡、横截郡、南平郡并列为高昌四郡应是事实,如果加上高昌令尹主管的高昌王都特区也算作一个郡的话,至迟麴氏高昌时实质上已是五郡建置。且此高昌五郡之间级别未必完全平等。这同高昌的朝廷组织与地方军府组织的存在有关。

关于高昌的朝廷组织,史书中留有明确记载。《周书》卷50《异

---

[1]郡县制虽为高昌地方行政制度的础石,但并不意味着除郡、县二级行政单位之外,别无建置。前引《南史》《梁书·高昌传》及《册府元龟》卷961《外臣部·土风三》皆记高昌国还置有"四十六镇",据此,高昌国境内,除郡下有县之外,县下还应有更小一些的城,统名为镇。阿斯塔那154号墓,出土的重光年间《高昌作人善喜等名籍》文书中有"诸城"一名,大谷文书中《唐开元四年(716)柳中县高宁乡授田名籍》中也记有:"壹段伍亩永业部田,城东六十里于堪城。"这个于堪城僻在柳中城东60里外,似乎是个乡村,应当也属县之下的镇城。可见这四十六镇未必是正规的镇戍,很可能指仅有简陋城墙或根本没有兴建城郭的村落或聚落。

[2]王素曾援引勒柯克在高昌古城发现的回鹘摩尼教文献断简,上有"高昌国二十二城的幸运与守护之灵"文字。11世纪加兹尼朝的加尔迪吉(Gardizi)编辑的波斯语史料 *Zaynal - Akhbr* 九姓乌古斯(西回鹘)条中也有:"高昌之地,比龟兹小,有二十二个村(城)"等语句,认为高昌二十二县久成定制,也同我国史书所记高昌入唐前有城二十二的记载完全相合。笔者也曾相信过这一说法,但实际对比资料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二十三县,只能承认事实。

[3]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上册,巴蜀书社2003年第1版,页39。

[4]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上册,巴蜀书社2003年第1版,页93。

[5]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上册,巴蜀书社2003年第1版,页254,注释1云:"田曹司马。笔者在《官制研究》中认为属郡府地方官吏,官品在第六等级。从此墓砖出土地点分析,有可能是田地郡的司马。"

域》记高昌:"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国;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为交河公,一为田地公;次有左右卫;次有八长史,曰吏部、祠部、库部、仓部、主客、礼部、民部、兵部等长史也;次有建武、威远、陵江、殿中、伏波等将军;次有八司马,长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书郎、主簿、从事,阶位相次,分掌诸事;次有省事,专掌导引。其大事决之于王,小事则世子及二公随状断决。平章录记,事讫即除。籍书之外,无久掌文桉。官人虽有列位,并无曹府,唯每旦集于牙门评议众事。诸城各有户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马、侍郎相监检校,名为城令。"《北史》卷97:"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国;次有公二人,皆王子也,一为交河公,一为田地公;次有左右卫;次有八长史,曰吏部、祠部、库部、仓部、主客、礼部、户部、兵部等长史也;次有五将军,曰建武、威远、陵江、殿中、伏波等将军也;次有八司马,长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郎、主簿、从事,阶位相次,分掌诸事;次有省事,专掌导引。其大事决之于王,小事则世子及二公随状断决。评章录记,事讫即除,籍书之外,无久掌文桉。官人虽有列位,并无曹府,唯有每早集于牙门,评议众事。诸城各有户曹、水曹、田曹。城遣司马、侍郎相监检校,名为令。"《隋书》卷83《高昌传》记:"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卫,次八长史,次五将军,次八司马,次侍郎、校郎、主簿、从事、省事。大事决之于王,小事长子及公评断。"据此,高昌五郡又可分为三等:第一等是高昌,是以国都而兼郡,不仅为国王宫邸所在,而且是位同中朝相国的令尹亲领之郡,吐鲁番出土文书证实,令尹皆由世子充任,位在诸郡之上。故有郡之实,而无郡之名。第二等是田地郡与交河郡。其郡守皆领"公"的爵号,一为交河公,一为田地公,皆由王子出任。可见田地郡与交河郡的郡守,又各兼公爵,出自王脉,地位显赫,超出郡僚。其中麴孝亮为田地公带左卫将军,麴宝茂以田地公入继大统,麴欢为田地公带平远将军,尤说明田地公在麴氏王朝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三等为横截、南平二郡,属于一般郡,由普通大臣充任。可见麴氏王朝的地方行政建置处处贯穿了巩固和加强麴氏家族统治的政治目的。

郡兼军府的军政合一制度乃是巩固、加强麴氏家族统治的重要手

段。对此,我国南朝史书早就有所透露。《梁书》卷54云:“高昌国……官有四镇将军及杂号将军、长史、司马、门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谘议、校尉、主簿。”《南史》卷79也记:“官有四镇将军,及置杂号将军、长史、司马、门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咨议、谏议、校尉、主簿。”当代学者中郑炳林最先指出高昌除存在郡县制之外,还存在三个军府,即抚军、平远、镇西府。其中抚军府实乃高昌都城的王家御林军府[1]。镇西府则乃设于交河郡的军府,交河公除兼任交河郡守之外,还兼任镇西将军名号[2]。平远府则乃与以上二军府平级而设于高昌东部重镇柳中的军府建置。《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收有《延昌二十七年(587)六月、七月、八月兵部条例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其中多次出现“平远将军领兵部事麴欢”字样,又《章和七年(537)丁巳岁十一月壬戌朔,十五日□亥,平远府禄事参军张归宗夫人索氏墓表》[3]也明确记载了平远军府的存在,说明田地城就是平远府所在地。田地公除兼任田地郡守之外,还是平远府的主将,故领平远将军名号。郑炳林、王素强调军府的地位高于郡守,并非如此,军府与郡之间的关系,实乃郡为本体,府乃兼置,以上军府与郡守实际上是一个单位,三幅匾牌。高昌令尹与高昌郡衙、抚军府衙合署办公,交河公又兼任交河郡守和镇西府将军,田地公则兼任田地郡守与平远府将军,同样合署办公。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高于横截、南平等两个只管民政、没有军权的普通郡。由此可见,由田地郡守兼任的平远府将军地位非常特殊,足与兼任抚军府将军的高昌世子出任的高昌令尹、兼任镇西将军的交河郡守形成鼎足而三的形势。

田地公,与交河公并称两公,与世子出任的高昌令尹,都必须由王族嫡系子嗣充任,并称高昌三公或高昌一尹二公,都具有高昌国事的最

---

[1]嶋崎昌:《隋唐时代の东トウルキスタン研究—高昌国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大学出版会重印本,1983年,页289、292、293。其中指出高昌世子除领有高昌令尹之外,还有权调动都城近卫军,兼领抚军将军名号。

[2]屡见于和平二年(552)八月一日至延寿十三年(636)十二月十日墓表,上书“镇西府”或“镇西府交河郡”“交河郡镇西府”,足以说明交河郡中设有镇西军府。

[3]罗振玉:《辽居杂着·乙篇》,载《高昌砖录》。

高议政权，其中田地公的地位尤为显赫。

麴氏高昌第六代君麴宝茂就是以田地公身份入继高昌国王之位。清宣统三年(1911)出土的《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1]明确记载当突厥汗国第三位国君木杆可汗在位时期，始兵临高昌北鄙，当时正值麴氏高昌第五代君年号和平的麴某在位时期，此王恪守臣属于柔然的历史传统，贸然派遣时任折冲将军、新兴县令的麴斌统兵迎战，而“兵锋暂交，应机退散”，高昌统兵主将麴斌明智地改战为和，请降退兵。“□(居)安虑危，见机而作，乃欲与之交好，永固邦疆。以专对之才，非人莫口，□□君厥庭，远和□□(突厥)。□□□之以机辨，陈之以祸福。厥主钦其英规，口众畏其雄略，遂同盟结姻，□□而归。自是边□□□，□□元虞，干戈载戢，弓矢斯韬，皆君之力也。以功进爵。”以上是刻在阳面的铭文。在其阴面第一行刻有“□□□年乙亥岁十二月廿三日”。碑末刻有“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瓜州诸军事，侍中、瓜州刺史、西平郡开国公，希堇、□(时)多浮跌、无亥、希利发、高昌王麴宝茂；□(卫)将军波多□(旱)鍮屯发，高昌令尹麴乾固”。以此判断，高昌与突厥的初次接触应发生于高昌麴某和平四年(554)，仍属麴朝佚名国君麴某在位时期[2]，且碑刻阴面铭文中所记率先领有突厥所封希利发爵位之麴宝茂就是和平王在位时期的田地公，其人应即全力支持麴斌同突厥议和行动的高昌王族，在应急制变的高昌最高王族会议中，力主抛弃传统的亲柔然政策，改向突厥称臣，由此引起高昌国王的人事变动，和平王麴某自此下台，和平年号戛然而止，麴宝茂以田地公身份登上了高昌王的宝座，改元建昌，受希利发[3]称号，为突厥汗国的附庸。北周武成二年(560)卒，建元6年，享国7年。

---

〔1〕原出吐鲁番三堡。有《新疆图志》旧本及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新本两种，碑阳、碑阴皆有刻铭，麴斌，又作麴斌芝。黄文弼认为斌为本名，斌芝为其字。建昌元年(555)麴斌初施产建寺，未完工而身死；其弟麴喧续刻亦未成。至麴乾固延昌十五年(875)，其嗣子麴亮始竣工竖碑，前后历20年。

〔2〕麴某(550—554，年号和平)，高昌国麴氏王朝第五代君，大统十六年(550)改元和平(1—4，551—554)。西魏恭帝元年(554)退位，田地公麴宝茂继为高昌王，建元4年，享国5年。

〔3〕希利发：突厥语作 irta，正史突厥传中多作俟利发，二名实为同音异译。

高昌二公在高昌王族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在麴伯雅两次朝隋期间还得到充分的表现。麴伯雅第一次入隋朝觐始于隋大业五年(高昌延和八年)六月十七日壬子(609 年 7 月 23 日)。至迟大业六年(延和九年)三月二日癸亥(610 年 4 月 1 日)前已返回高昌,仅半年有余。麴伯雅第二次入隋的时间与泥橛处罗可汗内徙同时。对此,有明确史料记载:"[樊子盖为]武威太守。……[大业]六年(610),……朝于江都宫。……还,除民部尚书。时处罗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复以子盖检校武威太守,应接二蕃。"[1]而据《隋书·炀帝纪》上:武威太守樊子盖任命为民部尚书乃大业七年五月四日戊子以后事,可见麴伯雅陪同泥橛处罗可汗再次入隋实乃始于隋大业七年(高昌延和十年)五月四日戊子(611 年 9 月 19 日)之后。十二月八日己未(612 年 1 月 16 日),这时隋伐高丽的战争已经开始。麴伯雅入朝后,并未遣其立即返国,而是偕其从征高丽,直至大业九年(延和十二年,613)初才遣令返国,羁留隋境时跨两年。在此期间,高昌国王麴伯雅、高昌世子兼高昌令尹麴文泰都羁留于隋,不久,高昌国内改用义和年号,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已发生了所谓"义和政变[2]"。此说如能成立,理当有一位义和王存在,但事实上并无其人[3],说明麴伯雅入隋期间,国内政事,悉由交河、田地二公联合执政,类似于周之周、召二公共同执政的"共和"时期,足以说明田地、交河二公在麴氏王朝政治体制中的特殊地位。

---

[1]《隋书》卷 63《樊子盖传》,页 1491。

[2]此说为吴震首倡,见所撰《麴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载《文物》,1981 年第 1 期。学术界中从其说者颇众,如王素《麴氏高昌"义和政变"补说》,载《敦煌吐鲁番研究》卷 1,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 1998 年。孟宪实《关于麴氏高昌晚期纪年的几个问题》,《学术集林》卷 10,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 年。孟宪实、姚崇新《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麴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2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张铭心《"义和政变"与"重光复辟"问题再考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5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关尾史郎《"义和政变"前史——高昌国王麴伯雅の改革を中心として》,载《东洋史研究》第 52 卷第 2 号,1993 年,页 153 ~ 174,及其另作《"义和政变"新释——隋、唐交替期の高昌国、游牧势力、中国皇朝》等。

[3]参阅薛宗正:《麴伯雅生平析疑》,载《敦煌学辑刊》。

2.4 高昌田地城与佛教

由汉柳中城改置的高昌田地城、田地县、田地郡不仅在高昌政治建置上具有重要意义，还在汉传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佛教发祥于印度，初由西域东传内地，至迟于魏晋十六国时期已成为以大乘为主的汉传佛教，至河西诸凉王朝时期渐趋成熟，又经凉州西传。高昌郡、高昌国就是西域汉传佛教的主要基地，其中兴建于丁谷山中的丁谷寺就是这一时期高昌最主要的汉传佛教基地，其地就位于田地县、田地郡境内。对此，《西州图经》[1]中留有以下记载：

山窟二院

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姆院一所

右在柳中县界，至北山什五里丁谷中，西去州什里。寺其（基）依山而构，揆辙疏阶，雁塔飞空，虹梁饮漠，岩蛮（峦）纷乱，丛薄阡眠，既切烟云，亦亏星月。上则危峯迢避，下则轻溜潺湲。寔仙居之胜地，谅灵（栖）霞之秘域。见有名额，僧徒居焉。

以上虽是唐人追记，所反映的内容却绝非局限于唐代史事，其上限可以一直追溯至前凉时期，所记丁谷山、丁谷窟、丁谷寺皆指今鄯善县境内的吐峪沟。是一座幽深的大峡谷，其地毗邻古车师文化发祥地的洋海墓地与苏贝希墓地，鄯善绿洲古代文明最早就升起于这一地区，因其山谷形似丁字，故名。佛教初传，这里又成为地区性的佛教圣地。张轨主政凉州的西晋末年，佛教始在汉人地区广泛传播开来，张骏建郡之后，佛教更在高昌郡范围内大规模发展。对此《魏书》卷114《释老志》留有明确记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田地县位置更近于敦煌，应是高昌郡中佛教最盛的地区。

---

〔1〕见王仲荦：《西州图经残卷考释》，收入王仲荦著、郑宜秀整理：《敦煌石室地志残志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鄯善县今存大量佛教遗址，充分说明这一问题。已知吐鲁番市现存千佛洞大都始凿于沮渠氏北凉时期，而鄯善的吐峪沟千佛洞、苏贝希千佛洞的开凿则是始于前凉时期，是吐鲁番地区开凿最早和新疆境内最东的一处石窟寺群。

吐峪沟石窟寺位于鄯善县西南 40 公里的吐峪沟东西两面山崖上，西距高昌古城仅 10 公里，东南距柳中古城 15 公里，两岸石壁峭立，沟水穿谷，洞窟就镶嵌在两岸的半山腰中，叠嶂相错，鳞次栉比。唐代时称为丁谷窟，东南距柳中古城 15 公里，今名"吐峪沟"，维吾尔语具有"走不通的山沟"之意。约自前高昌郡时期一直延续到高昌回鹘时期，麴氏高昌以前一直是高昌的国寺，基本上代表了高昌早期的风格，1961 年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分布于沟谷东西的山腰中，90% 的洞窟先经自然坍塌，后又遭西方探险家劫掠，几乎都已被破坏。阎文儒师曾至此考察，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区：东南区 4 窟，西北区 21 窟，西岸还有石窟和以土坯砌成的 16 个。此外在这两区之南、东西向的大山中，有许多已风化过的残石窟，已看不到有什么画的痕迹了。已编号洞窟 46 个，今仅存 10 个洞窟（1、2、12、20、22、38、40、41、42、44），尚有寥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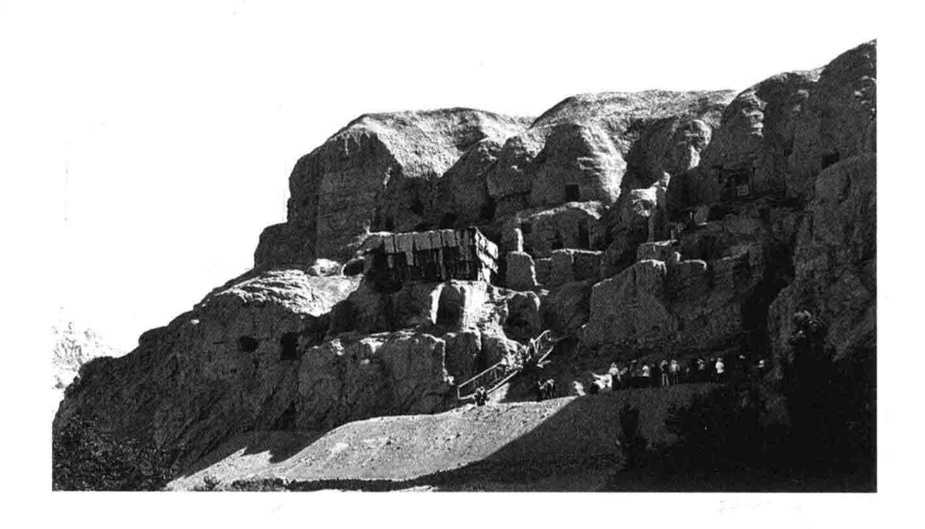


图 2－2－2　鄯善吐峪沟千佛洞

无几的幸存壁画,并有汉文榜题。在窟形上,分为方形窟、中心柱窟、纵券顶长方形窟等三种类型。在内容上都是清一色的佛教壁画,近年来晁华山提出存在摩尼教窟的新说,贾应逸已撰书反驳,笔者很赞同。东岸东南区的4个窟,只有4号窟较为完整,窟作正方形穹庐顶,中心设高坛基,四有弧度,与中原晋墓的建筑形式相接近。窟正中画莲花,四周画条幅,条幅中画佛立像,庐顶外四角画千佛,左、右、后三壁分为上、中、下三层:中层画佛本生故事,上层画千佛。汉文题记的字与罗布淖尔地区发现的晋简,莫高窟发现的晋、十六国卷子中的字体相同。西北区的21个窟中,其中2、3、4三个窟,是相连的一个窟。各窟内都有简单的壁画,在题材上虽然没有多少不同,但佛像下座为胡床,是其他各窟群所见不到的。边饰用粗大的忍冬纹,千佛像完全是通肩式的袈裟,轮廓线多作线条,内部用大笔烘染,风格较为简单朴实。比东南区4号窟的开凿还要早,说明2、3、4号窟开凿最早。河西岸半山中的16个窟时间较迟,似为高昌国时代产物。吐峪沟石窟寺的画法大异于西域流行的龟兹风,而是用墨线勾轮廓的汉人画法,开创了吐鲁番地区石窟寺壁画的独特传统。以窟形分为正方或长方两种形制。有的左、右壁及后壁设在耳室;有的窟中央凿出中心柱,有左右甬道,分前、后室,窟顶有券顶、套斗顶、穹隆顶等;中心柱形较伯孜克里克为多。佛装有通肩、双领下垂和偏衫。除第25窟位于后沟山腰上以外,其余洞窟以沟为界,分列东西。1~24窟为沟西区,26~46窟为沟东区,依断崖形势,洞窟高低错落,分二层存在。其中沟西区3号窟的开凿时间更早于高昌郡时期,至今仍保存较好,主室后壁和左右壁各凿有耳室,壁画现存两层,外层方格中绘有坐禅僧,坐在胡床上,是新疆众多石窟寺中所仅见的一幅,这种坐禅画也属"渐进成佛"乘教义,与大乘宣扬的"顿悟成佛"教义不同。纹饰风格较简单古朴,坐侧有佛塔、宝珠、水瓶等法物及琵琶、排箫等乐器,侧壁耳室中留有汉文题记"僧知空"。这确定无疑地反映了汉传佛教的原始形态,可以确定为前高昌郡壁画。4号窟则乃高昌郡时期的典型代表,为中心柱式窟,正方形穹庐顶,中心设高坛基,四壁有弧度,与中原晋时墓式相近。中心柱正面塑立佛像,正中

绘莲花,四周条幅中绘有立佛和坐佛,其外有四排小坐佛,穹庐顶四角画千佛,四壁画有佛本生故事图及千佛像,佛本生故事图中有"尸毗大王"等汉文题记,且佛本生故事很多取自汉译佛经,如尸毗王割肉贸鸽、慈力王施血、焚志焚身、孱提波利忍辱断臂等,都属小乘佛教特征。后室窟门右侧天王像旁绘有三身头戴进贤冠、身着大领袍的供养人。窟顶绘有飞天多身,皆已摆脱了原始羽人形象,顶束髻,袒上身,左手托盘,右手散花,袍袖代替了羽翼,下身衣罗裙,袒双足,身高而足低,起飞状,不如敦煌飞天优美,已初具汉式飞天的雏形。窟中曾发现元康六年(296)的《诸佛要集经》写本以及前秦甘露二年(360)沙门静志写的《维摩经义记》等佛典。第44窟开凿于北凉时代,在洞窟形制、壁画布局、绘画内容、晕染技法等方面都与敦煌莫高窟中的北凉洞窟极为类似,不但广泛使用了左图右史的传统形式,而且出现了汉地佛教特有的弥勒佛信仰。第44窟供奉的主佛很可能是弥勒佛,这同西域佛教信仰的主流——小乘教宗大相径庭,开凿于高昌王国时代的石窟已少于北凉时期,吐峪沟壁画中人物轮廓用较粗的线条,线内用笔略加烘染,这样的人物形象不仅造型分明、立体感强烈,且给人以质感,显得丰满,是中印绘画艺术结合的产物。在吐峪沟南口西岸霍加玛扎村,有一片陶棺墓地,已发现十余座。墓室均在沟两壁的断崖上,有的因沟崖倒塌,墓室暴露,人骨也暴露于崖边,葬具为陶棺。1981年,吐鲁番文管所在此清理了两座陶棺墓,很可能是千佛洞僧人死后的葬具,属南北朝至唐西州时期。

吐峪沟千佛洞之外,还有苏贝希石窟,位于鄯善县西南40公里吐峪沟西陡壁上,岸上就是苏贝希居住遗址,由北向南共有石窟5洞,窟底因淘金而挖得凹凸不平,说明原先存在过镶嵌金箔的壁画,但现在已破坏殆尽。种种迹象表明,这座石窟寺的开凿时间也应很早。

鄯善除存在大型石窟寺之外,还发现了大量地面佛教建筑遗址。包括位于鄯善县连木沁乡汉都阿克都村东南约1.3公里的汉都夏大墩塔、位于浪坎乡拜什塔木村西南约8公里荒漠中的克其克阿萨佛寺遗址、位于连木沁乡西稍偏南高沙梁上的土尔尕列孜土尔塔、位于连木沁

乡汉墩乡巴哥庄西北约5.5公里二唐沟东岸的二唐沟塔，以上古代佛寺都属于土坯建筑，时间应当晚于纯然夯筑的汉式建筑，似乎与田地城的佛教并无直接关联。这一现象说明田地县的佛教至唐代出现了一段考古文化的断档。如何解释这一时期佛教的传承，尚待新遗址的发现。此外，柳中郡故境还残存一佛塔。20世纪50年代末尚存，因该塔位于村民密集处，危塔将塌，村干部不得已予以拆毁，笔者仅在一外国人所摄照片中得睹该塔壮伟原貌，及往调查，村中老人仍留有在此塔前玩耍的记忆。因无确切物证，难以确定其兴建时间，姑存疑。

引人注目的还有重要佛教遗物塔木禾勒克塔西佛像刻石。“塔木禾勒克塔西”为维吾尔语，意为有印记的石头，即刻石。位于鄯善县连木沁到鲁克沁的色尔克普厄格孜沟中的无人区，地理坐标：东经89°52′，北纬42°50′，1930年4月为黄文弼最先发现。为一块长4.5米、高1.5米、宽5.5米的红色砂岩石，与山上石质相同，有可能自山上自然滚落沟中，现已加栏简单围护。佛像刻石基本呈长方体，顶部剥蚀严重，一端高，一端低。两面刻有佛教内容和其他图案，余皆不见刻画。宽面一侧上部有上下分布的两排圆孔，上排有9个，孔径5~7厘米，深10~14厘米不等，间距21~23厘米不等，其中有6个保存较好。下排有5个在一条线上，但小而浅，说明刻石原立于有木椽支撑的佛寺中，圆孔下有许多小龛，多能看出龛形轮廓。1号龛呈方形，残留浮雕痕迹，周围有植物纹，隐约可见魏体字两排，左侧有竖写五字“迎天神□欲”，天字又似大字，因上有许多晚期刻画，难于确切辨识，右有四字“□国六年”。2号龛在1号龛之左，长方形，高53厘米，宽45厘米，龛楣为拱形，龛内雕一结跏趺佛坐一须弥山座上。3号龛在2号龛左，亦为长方形，高60厘米，宽47厘米。下方刻有浮雕佛像，高45厘米，肩宽23厘米，头高15厘米，宽12厘米。除龛楣边缘有放射性划纹外，龛形造像，皆同于2号龛，佛之项光和身光较清晰。4号龛又在3号龛左，且在5号龛之上，至此龛分上下二层。龛高45厘米，宽40厘米。龛内是一结跏趺坐佛，佛座有裂纹。5号龛在4号龛下，亦为长方形，高50厘米，龛楣似垂帐形，龛底残。龛内雕一交脚弥勒坐佛，项光和身光

均用阴线刻表现。6号龛在4号龛左,7号龛之上。长方形,高60厘米,宽55厘米。内雕交脚弥勒坐佛,龛楣残。6号、5号和4号龛之间的角上又有一小龛,内雕结跏趺坐佛。7号龛在6号龛下,5号龛左侧。长方形,高40厘米,宽55厘米。龛楣两端各浮雕一圆形图案,龛内上部雕五弟子举哀图,下部雕佛涅槃像,佛右靠脚处亦雕一举哀弟子。

7号龛与6号龛之左原来也有刻像,现已剥蚀不清。2号和3号龛下刻有一些图案,皆模糊难辨。在刻石狭面圆孔上则另凿有羊形岩画,与佛刻无关。狭面右侧是一人工磨平的宽面石,上有两个大方框,其中左框高86厘米,宽80厘米,内刻上下4层佛像,每层各4尊,合计16尊。右框与左框大小相近,但顶部接近石顶故剥蚀,也是上下4层小佛像,每层各4尊,合计亦16尊,并且在两方框下刻一“卍”符号。

根据以上判断,笔者以为该刻石应当原立于山上,4个魏碑体字,说明其时代很早,应是高昌郡时代的产物。“天神□欲”中的“欲”字依假借法与“谷”字通,可释读为“天神丁谷”,亦即丁谷天,属古老的车师人拜祭袄教天神的遗物,后来粟特人的阿摩坞天神崇拜成为袄教天神的正宗,丁谷天下降成为一种地方神,而佛教的兴起又利用这块巨大的石料雕成了浮雕佛像,开始筑寺礼佛,成为柳中县的一大名寺,至佛教败落,寺院倒塌,无人护理,遂从山上滚落山沟,保存至今。

2.5 入唐田地复名柳中

田地恢复汉代旧名柳中已是入唐之后的事。

唐朝崛兴根本改变了自两汉以来,西域地区一直臣属草原游牧诸族的政治格局。唐朝第二代君太宗李世民登基的第五年——贞观四年(630)就已灭亡了庇护亡隋势力的东突厥汗国,其政治影响开始向西域扩散,同年伊吾七城主石万年降唐,始创西伊州,后定名伊州,成为大唐西域郡县化的历史开端。此年,西突厥一代名君统叶护可汗为木杆汗系的莫贺咄所杀,西突厥陷入内战,一度转衰。善于调整政策的麴文泰曾于当年偕妻华容公主入唐朝觐。唐朝也厚礼相待,本姓宇文氏的

华容公主赐姓李,改封为常乐公主,被承认为唐朝皇族成员。贞观六年(632),太宗在藩时期曾与结成盟兄弟关系的西突厥首领阿史那泥孰夺取了西突厥汗位,受唐封为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推行亲唐政策。在这种政治大环境下,麴文泰也表现得对唐非常忠诚,"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以奏闻[1]"。但是,麴文泰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仍是麴氏王朝历代相承的二元化国策,主要依其臣属的西突厥国君的对唐政策为转移。自贞观八年(634)咥利失可汗夺取汗位之后,高昌的朝贡记录突然断绝。这一内外相悖的二元化国策终于导致麴氏王朝和高昌国的灭亡。

贞观十二年(638)西突厥爆发了全面内战,作为西突厥属国君的高昌王麴文泰被迫卷入这场内战,站在右厢部落推立的乙毗咄陆可汗一方。贞观十三年(639)乙毗咄陆可汗重新实现了西突厥全境的政治统一,派出吐屯阿史那矩出为高昌冠军将军,控制了高昌的兵权与财权,又派遣原为咥利失可汗心腹、今已归降的咄陆叶护阿史那步真屯兵可汗浮图城,名为防御唐朝,实为加强对高昌的监控,迫使麴文泰与之联兵,东犯伊州,西犯焉耆,表现出鲜明的反唐政治姿态,唐与西突厥的关系急剧恶化。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初九丁丑(640 年 1 月 7 日)唐朝正式传檄问罪,发动了以侯君集为主帅的交河道行军。在整个行军过程中,有两大战役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是先遣兵团姜行本主持的可汗浮图之战,结果是西突厥守城叶护阿史那步真举城降唐,断绝了指望西突厥援军的希望,导致麴文泰"闻王师临碛口,惶骇计无所出,发病而死,其子智盛嗣立[2]"。接着唐朝就发动了平定高昌的决定性战役——田地城之战,《资治通鉴》卷 195,贞观十四年条记载:

> 军至柳谷,诇者言文泰刻日将葬,国人咸集于彼,诸将请袭之,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无礼,故使吾讨之,今袭人于墟墓之

[1]《旧唐书·高昌传》中这段文字原置于武德七年献拂菻狗之下,贞观四年朝觐之前,移用于此亦可,因为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曾与唐朝结盟共反东突厥,受西突厥影响,故早期的麴文泰也曾兼臣于唐,至贞观八年才发生了实质性的政策改变。

[2]《旧唐书》卷 198《西戎传·高昌》,页 5294。

间,非问罪之师也。”于是鼓行而进,至田城,谕之,不下,诘朝攻之,及午而克,虏男女七千馀口。以中郎将辛獠儿为前锋,夜,趋其都城,高昌逆战而败,大军继至,抵其城下。

高昌的主体居民与中原汉人同文同种,早就盼归内地,唐军还未渡过流沙时,国中就流传着一首民谣:“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炤冰雪,回首自消灭[1]。”麴文泰曾下令搜捕民谣的最初传唱者,始终不能找到,可见民心的向背。在唐军冲车、云梯等先进攻城器械的猛攻下,六月初七,麴智盛开门出降。自此结束了麴氏高昌内外相悖的二元化治国传统,重新回到了强大祖国的怀抱,实现了政治、文化的归一。

贞观十四年(640)底,侯君集解高昌王麴智盛献于麟德殿。唐太宗决心将高昌经营为重建西域政治主权的前进基地,仿伊州旧例,改置高昌为西州,改高昌原有五郡为西州五县,并置安西都护府。其中田地郡被改置为柳中县,恢复了汉代旧名。直至唐朝退出西域、北庭——高昌回鹘创立之后仍然沿袭这一旧名,而回鹘语读音稍有音变,以故明人陈诚西行,已记其地为鲁陈,至清仍然沿袭这一旧名,实际上鲁陈就是柳中的音变,鲁陈故城至今虽然仅余断垣残壁,但古韵犹存。就是这一历史沧桑的实物见证,至今已成为鄯善县境内一道最亮丽的历史文化风景线。

(原载《鄯善历史文化论集》,200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从汉柳中城到高昌郡田地城》,有增改)

[1]《册府元龟》卷1000《外臣部·亡灭》,页11739~11740。

3 盐泽、蒲昌海、唐蒲昌县考

蒲昌乃西州五县之一，并置蒲昌府，统辖本县府兵，乃西州东部重镇。而西州乃唐灭高昌国的历史产物，其前身必与高昌郡、高昌国时期的行政建置存在着渊源关系。对此，唐代史书仅存片断有用信息，却广泛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结合对鄯善县古代遗址的实地调查，足以得出唐蒲昌县乃由高昌横截郡改置的判断。然其治所却有所转移，不再是横截郡治所在的横截城，而是定治于横截郡所属重镇白芳城，即麴氏高昌末年命名的东镇城，其具体地望在今鄯善鲁陈故城一带。这就是笔者对唐蒲昌历史渊源思考、研究的基本结论。因成斯文，以请教于方家。

3.1 有关唐蒲昌县记载的正误辨析

史书中关于蒲昌县的记载正误兼杂，且绝大多数误多于正，仅有少项正多于误。首须进行正误辨析。依其性质，约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由高昌改置的西州，下辖几县？对此，绝大多数史料皆正确记为五县，这是有关记载中唯一正多于误的选项。

（1）《旧唐书》卷40《地理志》：

西州……旧领县五。高昌……柳中……交河……蒲昌……天山。

（2）《新唐书》卷40《地理志》：

西州：……户万九千一十六，口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六。县五：……前庭，下。本高昌，宝应元年更名。柳中，下。交河，中下。……蒲昌，中……天山，下。

（3）《元和郡县志》卷40《陇右道》：

[贞观十四年]八月君集进兵破之,下其二十二城,获户八千,列其地为西州,并置安西都护以统之。显庆三年置都督府,天宝元年复为西州,贞元七年没于西蕃,州境八到,东西八百九十五里,南北四百八十六里,东南至上都五千三十里,东南至东都五千里。贡赋,管县五,前庭、柳中、交河、天山、蒲昌。

(4)《通典》卷174《州郡四》,古雍州下,今置郡府十八　县五十一:

交河(郡)[西(州)]五县(高昌　交河　柳中　蒲昌　天山)

(5)《唐会要》卷95《高昌》:

以其地为西昌州,又改为西州。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山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高昌城为高昌县,并为都护府,留军以镇之。

唯有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6《陇右道第七·西州废》,西州交河郡条所记自我矛盾:

唐贞观十四年讨平,以其地置西州,兼升为都护府,仍立五县……元领县四:高昌、柳中、交河、蒲昌。

据此,既说西州下领五县,却在具体名单中又记为四县,显然后者是错的,错在漏记了天山县。

(二)唐西州五县究由高昌几郡改置而成,有关记载几乎完全错误。

《旧唐书》卷198《高昌传》:

君集分兵掠地,下其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口三万七千七百,马四千三百匹。其界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

《新唐书》卷221《高昌传》:

君集分兵略定,凡三州、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口三万,马四千。

《通典》卷191《边防七·西戎三》:

[贞观]十四年八月,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高昌国,下其郡三、县五、城三十二,户八千四十六,口万七千七百三十,马四

千三百尺。

以上记载皆云唐西州五县是由高昌三郡演化而成,果如是,则唐西州五县乃由高昌三郡演变而成,唐西州之县与高昌之郡之间并无对应关系。吐鲁番出土文书证实这一记载是错误的,留待后论。

(三)蒲昌县的得名究竟是由于濒临蒲昌海还是蒲类海,而蒲昌海之"海"字究竟是真正的湖泊还是另有解释?对此,有关记载几乎也都完全错误。

《旧唐书》卷40《地理志》:

蒲昌:……县东南有蒲类海,胡人呼为婆悉海。

按西域地名有蒲昌海与蒲类海,蒲昌海在今天山南麓,濒临今鄯善县境,蒲类海则在天山北麓,即今巴里湖。蒲昌应在今鄯善县境,与蒲类海所在的巴里坤湖一南一北,相隔遥远。属于明显的地理错误。

《新唐书》卷40《地理志》:

蒲昌,中。本隶庭州,后来属。

同书又记:

北庭大都护府,本庭州,贞观十四年平高昌,以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部落置,并置蒲昌县,寻废,显庆三年复置,长安二年为北庭都护府。

该书错误更为严重,竟将西州管辖下的蒲昌县与庭州管辖下的蒲类县混为一谈,所记蒲昌本隶庭州的错误就出自上述认识。蒲类县在庭州东80里,故址即今奇台县城东北的唐朝墩古城,蒲昌城则在今鄯善县故境,所犯地理错误更甚于前书。

《元和郡县志》卷40《陇右道》:

蒲昌县,贞观十四年置本名金蒲城,车师后王庭也,天山军在州城内,开元二年置,本汉车师后王庭,乌孙之东境也。贞观十四年置庭州。

该书的错误也是南北不分。按金蒲城乃汉代城名,主管天山北麓东段屯田的东汉己校尉耿恭的治所,曾在此以毒箭击退匈奴的围攻。唐代无此城名,但有金满县与蒲类两县,皆在天山北麓,其中金满县与

北庭、庭州同治,地在今吉木萨尔北庭故城,该传中提到的汉车师后王庭也在天山北麓,而蒲昌县在今鄯善县,地在今天山南麓。可见所记同样不得要领。

《太平寰宇记》卷156,《陇右道第七》,西州(废)条:

> 蒲昌县:东北一百八十里,二乡……取县东蒲昌海以为名,蒲昌海者,胡人呼为婆悉海。

据此,蒲昌县的命名源自县东之蒲昌海,蒲昌县在今鄯善县境。笔者曾有幸踏勘了鄯善境内的一切遗址,始终没有发现任何足以称"海"的大湖,参稽吐鲁番有关"守海"文书及大海道的命名,足以说明历史上的蒲昌海并非真正的湖泊,更与楼兰濒临的盐泽、泑泽、牢兰海或今罗布泊毫不相干,实际上所指乃鄯善濒临的大沙海。可见这一记载同样沿袭了历史的错误。对此,笔者已另撰专文考辨。

(四)关于蒲昌县的高昌国旧称及其地望所在,又有始昌城、东镇城二说。

始昌城说,见于两种史料:

其一,《旧唐书》卷40《地理志》:

> 蒲昌:贞观十四年,于始昌故城置。

其二,《太平寰宇记》卷156,《陇右道第七》,西州(废)条:

> 蒲昌县东北一百八十里二乡唐贞观十四年置于汉始昌故城。

以上记载绝对不可信。《唐会要》卷95《高昌》明确记载:"以……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山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高昌城为高昌县……留军以镇之。"可见始昌城非蒲昌县的前身,而是天山县的前身,而天山县即今托克逊县,地在今蒲昌县所在的鄯善西,且中间相隔吐鲁番市,足证其说大谬。

以上史料中唯一正确的记载乃前引《唐会要》中关于蒲昌县乃高昌东镇城改置的记载。《唐会要》一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会要体史学专著。今版本虽然署名为北宋王溥(922—982)撰,成书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实为续苏冕《会要》与崔铉等撰《续会要》而作,其中苏冕就是唐人,可见该书实乃唐人苏冕首创,至宋人王溥始正式完成的一部史

学巨著,可信程度最高。据此,则唐蒲昌县的前身就是高昌国的东镇城。这是正统史书中保存的少数可用信息之一。

综上所述,关于唐西州蒲昌县的历史渊源、具体地望等重大问题,仅仅依靠传统的文献记载,不会得出任何结果,必须深入钻研吐鲁番出土文书,参稽在鄯善县的实地调查,从中寻找答案。

3.2 唐蒲昌县乃高昌横截郡改置,但治所并非横截城

吐鲁番文书的大量出土开辟了吐鲁番学的新纪元,不仅纠正了我国传统史书中存在的若干错误,而且填补了自高昌郡、高昌国直到唐西州创立期间的许多历史空白。通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现已查清,唐置西州之前,高昌国就存在着同内地一样的郡县制度,而不是州县制度,至迟麴氏皇朝时期,高昌国已存在着王城一、郡四、府三、县二十三、镇四十六。

可见我国正统史书中所记高昌仅有三郡的记载是错误的。具体而言,高昌王城统摄中央,下属柳中、横截、交河、南平四郡,其中柳中、横截二郡皆在今鄯善县境,交河郡及高昌王城皆在今吐鲁番市,南平郡在今托克逊县,而唐西州所置之县凡五,恰与以上高昌一王城、四郡[1]一一相应。其中确切可考者有四,即以高昌王城为西州治所,兼为高昌县治(后改为前庭县),高昌之交河郡入唐置为交河县,南平郡置为天山县,田地郡置为柳中县,则所余仅为横截郡,而横截郡、横截县、横截城皆地在今鄯善县境,唐蒲昌县境也在此县。据此判断,唐蒲昌县境就是高昌横截郡的历史继承,易言之,唐蒲昌县就是高昌横截郡的改置。对此,虽然史书中毫无记载,却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得到有力的印证。

晋咸和二年(327),前凉主管屯田的戊己校尉赵贞在高昌屯区武装割据,宣布本屯区一切屯田军户悉解放为民户,自署为高昌郡太守,

[1]高昌王城除国王外,还以世子兼领高昌令尹,统领高昌王城一带军政事宜。因此有学者认为高昌令尹的职权大体兼有高昌郡、抚军府的双重功能,也可视为高昌实设五郡、三府。

梁太学博士顾野王佚书《舆地志》留有以下记载,至今为学术界广泛援用:

晋咸和二年置高昌郡,立田地县。[1]

此为西域设郡之始,高昌郡被公认为西域地区所创置的第一个郡级单位。引人注目的是,赵贞初署高昌太守时,其郡治似不在高昌垒,而在田地县。至咸康元年(335)五至六月间,前凉平定赵贞,追认了高昌军户解放为民户的既成事实,正式将高昌郡列置为沙州三郡,完成了高昌郡县化的全过程,反映了从高昌世袭军户到在籍民户的深刻社会变革:

是年……骏尽有陇西之地,分武威、武兴、西平、张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晋兴、广州,合十一郡为凉州,以世子重华为五官中郎将、凉州刺史。分金城、兴晋、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城、汉中八郡为河州,以宁戎校尉张瓘为刺史。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为沙州。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骏自称大都督、将军、假凉王,督摄三州事。……初戊己校尉赵真,不附於骏,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

很可能至此,高昌郡治始由地在今鄯善境内的田地县(今鄯善鲁克沁柳中故城),西移至今吐鲁番的高昌垒。

前凉张骏是代领西域东段高昌地区政治主权的第一个河西地方政权,史称河西诸凉王朝,前凉亡于氐人吕氏所建后凉,后凉又亡于河西各族人民大暴动,此后陆续兴起了汉人李氏创立的西凉王朝,汉化杂虏沮渠氏所建北凉王朝,都相继统治西域,高昌郡的建置继续传承不辍。

---

〔1〕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叙高昌郡据《初学记》卷8《陇右道六》《车师国田地县》注引,又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6《陇右道七》西州高昌县条未记原文所出,而文字全同,显然同出一源。

初建之高昌郡似仅领有田地一县或田地、高昌二县，至迟到了西凉时期[1]，今鄯善地区的县级单位已不止田地一县，而是变为田地、横截二县分治今鄯善县境的局面。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中有《建□某年兵曹下高昌、横截、田地三县符为发骑守海事》[2]，此墓所出有纪年的文书上起西凉建初四年(408)，下止缘禾五年(436)，据此判断，文书中“建□”年号的缺字应为初，正是李嵩的纪年。属西凉领属高昌郡田地、高宁、横截三县的物证，摘录其第6~12行如下：

(前缺)

[6]东部督邮，横截主者……

[7]海守十日，□高昌三骑，田……

[8]七骑，起□□十五日兙遣尽……

[9]乃下符□□休诣田地县……

[10]案奉行

[11] 校□□簿 [言央]

[12]建□□年九月十二日白

(下略)

此为横截城之名在汉文献中的首次出现。这一重要文书的出土证实西凉时期高昌郡建置已有重大发展，后来又升级为横截郡，成为高昌国五郡之一，统领今鄯善县境。其命名似与索励横截注滨河的历史有关，见于《水经注》卷2《河水二》：

敦煌索励，字彦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励厉声曰“王尊建节，

〔1〕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谓“西凉统治河西大约二十二年，统治高昌大约二十至二十一年”。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欠妥。按西凉共传三君，先曾沿用过的段业神玺、天玺两种年号，后又自建四种年号：李嵩年号为庚子(400—405)、建初(405—417)，李歆年号为嘉兴(417—420)，李恂年号为永建(420—421)。以上庚子、建初、嘉兴三种年号都已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唯李恂永建年号尚未发现。自晋太元二十一年(后凉龙飞二年，段业神玺元年)算起，至永建二年(396—421)有效统辖高昌郡长达25年。

〔2〕《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文物出版社，页131~133。

河堤不溢,王霸精诚,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劢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讙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其水东注泽,在楼兰国北扜泥城,其俗谓之东故城,去阳关千六百里,西北去乌垒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国千八百六十。

两相比较,《水经》作“横断”,出土文书名“横截”,字异意同。索劢主持这次横断注滨河的行动主要是在楼兰屯区进行的,前凉时期楼兰属西域长史屯区,高昌为戊己校尉屯区,高昌郡创设不久,楼兰屯区罢废,并入高昌郡。屯兵悉解放为民户,安置在今鄯善境内,兴建新城而居,以故纪念昔日壮举,命名横截,后来发展为郡,仍然保留原来的名称。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山北横截”之名,所云“山北”,不可理解为天山以北,也不可理解为今鄯善县北临天山地区,所指之山,应是界隔楼兰与车师、穿越今鄯善南戈壁的横断山,亦即今《鄯善县志》特意标出的恰特喀勒塔格山以北地区。

西凉亡于沮渠氏北凉,北凉玄始九年(420)春三月,河西李氏家族在流沙以东最后的据点敦煌也被攻陷,西凉的河西领疆全部为北凉接管。北凉为“河西杂虏”,即匈奴沮渠氏所建。创始人沮渠蒙逊本张掖临松卢水胡人,匈奴有左沮渠、右沮渠的官职,蒙逊先世曾任此职,故号沮渠氏[1]。又因与汉人杂居,汉化很深,时至晋末,已是一个汉化很深的河西杂虏世家。北凉王朝鼎盛时期的领疆也远达流沙以西,史载沮渠蒙逊曾任命隗仁为高昌太守,接管了西凉的碛外领疆。关于其郡守任期止于何时、后任者为谁,都不清楚,此后再次见于史书记载的已是学术界最具争议,“自署为高昌郡守”的阚爽了。

阿斯塔那22号墓文书出土有《横截县被符责取鹿角文书》[2],内容为:

---

〔1〕由此出现了沮渠氏匈奴说,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又有月氏说,见周一良:《北朝的族群问题与族群政策》,载《魏晋南北朝史沦集》,中华书局1963年。

〔2〕《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页198。

（前缺）

[1]输绵袍一领……

[2]横截县言，被符刘崇、令狐受

[3]各有鹿角一头，符到○主者将

[4]诣，当科给贾（价），谨案，奉符召

[5]责取崇、受，各列右……

（后缺）

阿斯塔那22号墓所出文书都无纪年，墓葬形制具有十六国时期特征，推断为北凉时期，以上文书证实，北凉治下的高昌郡横截仍然继承西凉旧制，保持县级建制，犹未升格为郡。

进入麴氏高昌国时期，横截又进一步演变为郡级建置，横截郡成为同田地郡、交河郡、南平郡同级的郡级单位。麴氏高昌文献《张雄夫人麴氏墓志铭》中明确记载"祖愿、父明，横截太守"。太守乃郡级长官的特称，足证横截城的行政建置级别已由县级升格为郡级单位。

日本橘瑞超从吐鲁番所得大谷文书2604号有"城东六十里横截城阿魏渠"的字样，可知横截城在高昌城东60里处。钱伯泉正确地判断高昌城正东60里，为高峻的火焰山，不可能建城，文书中的"城东"，或当为"城东南"，或当为"城东北"，却将其方位误判为火焰山北，得出了在今吐峪沟北口偏东苏巴什的结论。又有学者指出其地即在今鄯善县汗都坎（Khando），不知何据。笔者认为横截之名是因汉末索劢横断北河，垦殖楼兰屯区而得名，其地望应在大沙海口，今大阿萨古城似即古横截城故址，负责"守海"，保卫大海道。此城乃鄯善县文物普查中发现，与之同时发现的还有另一处佛寺遗址，初被分别命名为大、小阿萨遗址。2005年笔者与田卫疆博士同受鄯善县委书记赵文泉之邀，乘当地石油公司特派的地质勘探车，驶入沙漠，到达这一人迹罕至的古城、佛寺废墟。发现所谓大、小阿萨遗址虽然彼此毗邻，却是性质迥异的两处遗址。其中大阿萨实为一座古城，又名阿萨协亥尔或琼阿萨古城，位于鄯善县南戈壁深处，在达浪坎乡拜什塔木村西南。地理坐标：东经89°36′58″，北纬42°35′56″。古城地处较平坦地，四周为风蚀沙地，部分

地表有轻度的盐碱化,生长有芦草等植物。古城为土坯建筑,西、北两墙角平直,东、西两墙呈弧形,周长约304米,墙厚约5米,残高约3米。东北方向有古河道,说明当年曾人丁繁茂,遗址内有许多红、灰夹砂陶片及石磨,方砖,残锈铁片,毛布,铜币,铜盘等。古城是驻兵或把守两用城,由其形制及遗物判断,下限似止于唐,上限约为南北朝时期。横截郡的设立,对于守卫大沙海、保证大海道畅通具有重要意义,出土文书中多次出现征发横截人户,严密守海,即为其证。因此,笔者认为此地应即高昌横截郡的所在地。小阿萨遗址则是由若干佛寺、佛塔组成的佛教遗址,位于大阿萨古城之南。地理坐标:东经89°38′42″,北纬42°36′23″。塔、寺皆保存完好,其中还有不少残存壁画,从画面上看,显然是回鹘人形象,但在地面遗物中却又有汉僧使用的麻鞋与壁画中的乌皮靴,形成了貌似不协调,实则反映了高昌回鹘时期汉僧、回鹘僧人共处一寺的特征。

除此二郡外,今鄯善县境还有以下六县:横截、白芳、临川〔1〕、高宁、威神〔2〕、酒泉〔3〕,分隶于田地、横截二郡,其中隶属于横截郡者应为以下三县。即:

横截县,应与横截郡同治,地在今大阿萨古城遗址。

高宁县,据日本人橘瑞超从吐鲁番获得的大谷文书2064号和2865号,皆有"(高昌)城东二十里高宁城"的字样。高宁城应在今新疆吐鲁番东高昌古城以东10公里的火焰山南吐峪沟,古车师国发祥地。

白芳城,留待后论。

由此可证,唐蒲昌县的行政管辖范围就是继承了麴氏高昌横截郡

〔1〕临川县:从县名的含义看,其城必处在大河旁。临川音近"连木沁",今从钱伯泉考证,遗址在今鄯善县二塘沟河旁的连木沁一带。

〔2〕威神县:连木沁东北20公里左右,有地名"汉墩",遗留废弃古城一处,西南小山上又有烽燧遗址,钱伯泉认为即威神县城所在地。

〔3〕酒泉县:阿斯塔那第42号墓出土的几件文书中,有"[高昌]城东二十里酒泉辛渠""[高昌]城东二十里酒泉巢渠""[高昌]城南二十里酒泉巢渠"的字样,说明酒泉县应在高昌古城东南二十余里,正是今洋海遗址所在地,研究者认为这是一个安置随沮渠氏北凉移民的侨置县。

的全部领疆。然而,蒲昌县乃由高昌横截郡改置,并不意味着蒲昌县治就是横截郡治所在的大阿萨古城,入唐之后这座昔日郡治所在的大阿萨古城逐渐淡出历史的首页,退居次要地位,位居西州入唐孔道的重镇白力城则代之而兴,成为唐蒲昌县、蒲昌府的军政中心。



图 2-3-1 鄯善大阿萨城(蒲昌县故址)

3.3 唐蒲昌县治所在即高昌横截郡治下的白芀城

白力城,又作"白棘城",吐鲁番文书则多作"白芀",去高昌 160 里。隶横截郡治下,与横截、高宁二城并现于史册,麴氏皇朝前期,隶横截郡治下。与横截之名同时浮现。见于同为哈拉和卓 91 号墓出土的《兵曹条往守白芀人名文书二》[1]:

[1]兵曹椽张预、史杜华白:谨条次往白芀守人

[2]名在右,事诺班示,催遣奉行。

---

[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文物出版社,页144。

[3]　　　　　　　　　　校曹主簿　　彭

(后缺)

此城正式出现于史书,已是沮渠氏高昌末年,有关史料记载,搜集如下:

《魏书》卷43《唐和传》:

唐和,字稚起,晋昌冥安人也……经二十年,和与契遣使来降,为蠕蠕所逼,遂拥部落至于高昌。蠕蠕遣部帅阿若率骑讨和。至白力城,和率骑五百先攻高昌,契与阿若战殁。和收馀众,奔前部王国。时沮渠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斩安周兄子树,又克高宁、白力二城,斩其戍主。遣使表状,世祖嘉其诚款,屡赐和。

《北史》卷27《唐和传》:

唐和,字幼起……经二十年,和与契遣使降魏,为蠕蠕所逼,遂拥部至高昌。蠕蠕遣部帅阿若讨和,至白力城。和先攻高宁。契与阿若战没,和收余众,奔前部国。时沮渠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斩安周兄子树,又克高宁、白力二城。遣使表状。太武嘉之,屡赐之玺书。

《魏书》卷101《高昌传》:

五年,高车王可至罗杀首归兄弟,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以巩顾礼、曲嘉为左右长史。二十一年,遣司马王体玄奉表朝贡,请师迎接,求举国内徙。高祖纳之,遣明威将军韩安保率骑千余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榛水,儒遣礼、嘉率步骑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礼等还高昌,安保亦还伊吾。安保遣使韩兴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复遣顾礼将其世子义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而立麴嘉为王。

《北史》卷97《高昌传》:

[马儒]二十一年,遣司马王体玄奉表朝贡,请师逆接,求举国内徙。孝文纳之,遣明威将军韩安保率骑千余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榛水,儒遣嘉、礼率步骑一千五百迎安保。去

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礼等还高昌,安保亦还伊吾。安保遣使韩兴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复遣顾礼将其世子义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而立麴嘉为王。

明屠乔孙、项琳所辑崔鸿佚书,四库全书本《十六国春秋》卷96《北凉录三·沮渠无讳》:

初茂虔之亡也,凉州人阚爽据高昌,自称太守,宝舅唐契为柔然所逼,拥众西趣高昌,欲夺其地,柔然遣其将阿若追击之,契败死,契弟和收余众,奔车师前部王伊洛。时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宁、白力二城,遣使请降于魏。

明屠乔孙、项琳所辑崔鸿佚书,四库全书本《十六国春秋》卷93《西凉录三·唐繇》:

唐繇,晋昌宜安人也……经二十余年,和与契遣使降魏,遂为蠕蠕所逼,拥部众至高昌,蠕蠕复遣部帅阿若讨之,至白力城,和先攻高昌,契与阿若战,败没,和收余众奔前部王国,时沮渠安周屯横截城,和攻夺之,斩安周兄子树后,又从伊洛,击高宁、白力二城,克之,遣使奉表归魏。

《册府元龟》卷958《外臣部·国邑二》:

高昌国南接河东连敦煌西次龟兹北邻敕勒置四十六镇交河、田地、高宁、临川、横截、柳婆、洿林、新兴、繇宁、始昌、笃进、白力等皆其镇名。其地东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国内总有城一十六(一云有八城)……本皆中国人也。

《册府元龟》卷961《外臣部·土风三》:

高昌国盖车师之故地也。南接河东连敦煌西次龟兹北邻敕勒置四十六镇交河、田地、高宁、临川、横截、柳婆、洿林、新兴、繇宁、始昌、笃进、白力等皆其镇名,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

钱伯泉最早注意到这一城名,并考证此即比胥鞬的音变[1],这一贡献理应给予高度评价,但他又因唐蒲昌县的前身即高昌之白棘城、白力城、白芳城,就将白棘、白力、白芳都说成是蒲昌的对音,这在古音学上是找不到根据的。因此,王素强调其间根本不存在对音关系。在这方面,王素是对的。钱伯泉还将白力之名同岑参诗中的"白草"联系起来,也同样没有任何根据。其实,这个城名就是突厥语 balik 的译音,亦即城堡,如别失巴里,即五城之地,伊里巴里,即伊犁之地,很简单,就是"城"的意思,说明城内外操突厥语的居民为数不少。然而高昌郡境内原有族群如车师、鄯善都不说突厥语,这些操突厥语的居民究竟从哪里来的呢?史载沮渠氏北凉麾下有一支劲旅平凉杂胡就说突厥语,《册府元龟》卷956《外臣部》,种族条记:"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帝灭且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若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西凉与北凉为世仇,战争连年,平凉杂胡中必有被俘或归降者,以此判断,白芳城的兴建者或与自北凉归降的平凉胡有关。

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灭亡了麴氏皇朝之后,由于高昌国早已建立了完善的郡县制度,很快在这一制度的基础上,废国立州,废郡为县,废县为乡,建立起同内地一样的州、县、乡(坊)三级管理制度。据《唐会要》卷73,贞观十四年六月初七麴智盛降唐,至九月二十二日,已正式创建了安西都护府,西州的创置时间必定也是这一天。可见贞观十四年九月乃是高昌正式改置为西州的重要月份。吐鲁番出土文书《西州高昌县李石柱等牒上当户手实》所署时间就是此年九月,可见高昌降唐之后,唐朝的州、县改置工作进展得空前神速。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前又出现了《西州高昌县弘宝寺僧及奴婢名籍》,十二月二十七日又出现了《西州高昌县弘宝寺主法绍辞稿为请自种剩给常田事》的唐朝官府判牒,说明政权的交替,并未影响高昌人民的日常生活,很快实现了与唐朝政治制度的全面接轨。这时侯君集及交河道行军的主要将帅

[1]钱伯泉:《北胥鞬考》,收入赵文泉、田卫疆《鄯善历史文化论集》,页68~74。

都已奏凯还朝，仅留谢叔方统兵留守，以首任西州刺史名义主政。此人本齐王府骁将，玄武门事件时曾全力为齐王冲杀，太宗夺得政权之后，予以留用，以故参加了交河道行军。但此人武人出身，未必有如此高超的治州之才，因此，在任时间不长，就调转伊州刺史兼伊州都督，其后又参加了与薛延陀的战斗，说明此人所长在军事，并不在政务，如此神速地完成改国立州、改郡为县的工作，必有高人及高昌当地士人首领参预。以笔者判断，这位政务高人应当就是很快受命到来的第二任西州刺史乔师望，这位当地士人领袖应当就是出身高昌王族的麴智湛。据《文馆词林》所收此人所赍诏书有三，一即《贞观年中平高昌曲赦高昌部内诏》[1]，此外还有两诏，一名为《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2]，另一名为《贞观年中慰抚高昌文武诏》[3]，其中明确宣布除为麴文泰反唐政策助纣为虐的少数人之外，其余高昌文武官员一律留用。出身高昌王族的麴智湛以此继续得以在西州衙署为唐供职。《册府元龟》卷1000《外臣部》，亡灭条记载："君集等遣使告捷，太宗大悦，宴百僚，班赐各有差，曲赦高昌部内，从军兵士以上，父子犯死罪以下，期亲犯流以下，大功犯徙以下，小功缌麻犯杖罪，悉宥之，时太宗欲以高昌为州县，特进魏徵谏曰……"麴智盛开门降唐乃贞观十四年六月初七，侯君集遣使报捷必为六月份事，太宗颁诏曲赦高昌罪犯尚在以高昌改置为州事付诸廷议之前，应是八月份事，至九月西州已正式建立，至迟九月底十月初，乔师望已以安西都护名义赴任，而初置之西州刺史都兼任安西都护，反言之，所有安西都护也都兼任西州刺史。以此推断，谢叔方出任西州刺史不过一个月，也许不足一个月。正是在乔师望的主持、麴智湛的积极参与下，顺利完成了西州的县、乡改置工作。具体而言，麴氏高昌时期，不仅创立了一尹（指高昌王城设令尹，相当于郡）、四郡，还创立了抚

[1]《文馆词林》卷669，适园丛书本。见薛宗正：《突厥稀见史料辑成——正史外突厥文献集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182～183。

[2]《文馆词林》卷664，适园丛书本。见薛宗正：《突厥稀见史料辑成——正史外突厥文献集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183。

[3]《文馆词林》卷664，适园丛书本。见薛宗正：《突厥稀见史料辑成——正史外突厥文献集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182。

军、平远、镇西等三个军府建置,其中与横截、田地二郡同设于今鄯善境内的军府名为平远府。《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收有《延昌二十七年(587)六月、七月、八月兵部条例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其中多次出现“平远将军领兵部事麴欢”字样,又《章和七年(537)丁巳岁十一月壬戌朔,十五日□亥,平远府禄事参军张归宗夫人索氏墓表》[1]也明确记载了平远军府的存在,说明田地城就是平远府所在地。田地公除兼任田地郡守之外,还是平远府的主将,故领平远将军名号。郑炳林、王素强调军府的地位高于郡守,并非如此,军府与郡之间的关系,实乃郡为本体,府乃兼置,以上军府与郡守实际上是一个单位,三幅匾牌。高昌令尹与高昌郡衙、抚军府衙合署办公,交河公又兼任交河郡守和镇西府将军,田地公则兼任田地郡守与平远府将军,同样合署办公。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高于横截、南平等两个只管民政、没有军权的普通郡。入唐后,改横截郡为蒲昌县,改田地郡为柳中县,废平远府,置蒲昌府。其中改田地郡为柳中县较为单纯,因为原来的田地郡治所田地城就是原来汉军驻屯的柳中城,只需改郡为县即可,中间变化不大。而由横截郡到蒲昌县的改置则记载混乱,有待清理,且涉及治所地望的改变,须重点考证。

白芳城在高昌国时期曾隶属于横截郡,位于东、西交通要冲,随着麴文泰由亲唐到反唐的历史转变,此城在防止来自东部唐朝攻击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遂改白芳城为东镇城,这一城名反读即为镇东城,反唐的政治色彩非常明显。入唐后,横截郡改置为蒲昌县,县治却发生了重大地望转移。出于设县地必当为西州入唐要道,白芳城特殊的战略地位引起其政治地位的急骤上升,《通典·边防七》车师条明确记载“以东镇城为蒲昌县”。《唐会要》卷95高昌条也记:“田地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高昌城为高昌县,并为都护府,留军以镇之。”黄文弼进一步指出,在一切古代文献记载中《元和郡县志》所记蒲昌“县在州东北一百八十里”最为可信,他曾在访问中得知,“二堡东北有二

[1]罗振玉:《辽居杂著·乙篇·高昌砖录》。

古址，一曰汉墩，在辟展西北四十里现有土城遗迹，西南有小山，山上有二墩，相传汉时所筑。今以二堡望汉墩正在东北，其方向颇相合，但由高昌故址数至汉墩，计一百一十里，距离远近微嫌不足。一曰柯柯雅，在山谷间，即在汉墩之北约八十里地，为通木垒河古城子间道，亦说有土墩及小土城。但又据一维民说为安集占人所筑，以防古城子敌人者。按由汉墩到柯柯雅均有居民甚多，水草亦优，为至古城子必经之地。唐时高昌东北与铁勒为邻，取名东镇城，盖亦镇守东界之义，则在此处置建城台殊为可能[1]”。陈诚《西域行程记》云：从必残至鲁陈城约有九十里，从鲁陈城至火州城有五十余里，则必残至火州为一百四十余里。可见东镇城即今新疆鄯善县城，维吾尔族今仍称之为“辟展”。笔者也赞同这一见解。

3.4 唐蒲昌县、蒲昌府与蒲昌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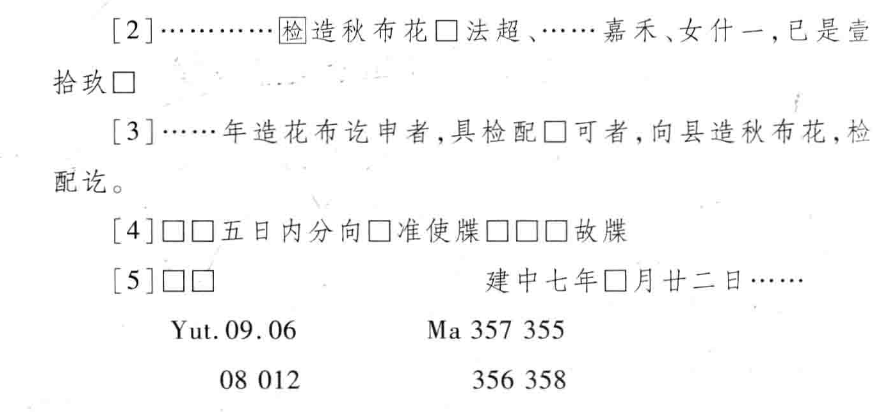
蒲昌县重要的战略地位是由作为西州东境的特殊交通位置决定的。这在《西州图经》中有明确记载，这部残卷乃法人伯希和自敦煌携走的重要文献，编号 P2009 号，残存 56 行。刊本很多，根据王仲荦遗著、郑宜秀整理，《〈西州图经〉残卷考释》[2]所记，西州总 11 道，其中发自蒲昌县的就有赤亭道、新开道、花谷道（又名挎谷道）、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道等 6 道，超过了西州 11 条交通干线之半。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决定了蒲昌不仅是西州下属五县之一，而且是统辖府兵的诸府之一。易言之，唐朝西州不仅存在着蒲昌县的建置，而且还存在着蒲昌府的建置。对此，我国正史中并无记载，仅能在有关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进行钩沉、索引。

蒲昌县是一个纯行政建置，有关出土文书所记大都是处理民事纠

〔1〕黄文弼：《高昌疆域郡城考》，收入赵文泉、田卫疆主编《鄯善历史文化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 年，页 104～114。

〔2〕王仲荦遗著、郑宜秀整理，收入《敦煌石室地志残志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第 1 版，页 208～214。

纷的记录。诸如《蒲昌县牒为卫士范君住母亡准式丧服事》乃是唐朝继续推行以孝治国、重视丧服的典型例证,《蒲昌县界长行小作具收支饲草数请处分状马寺尼法(慈)买牛契》涉及长行坊与佛教尼庵之间的民事交涉,《蒲昌县牒为勘某人身死事》则为一宗死人案件的卷宗。又如阿斯塔那517号墓文书(高昌国时期)内夹文书题为《唐开耀二年(682)西州蒲昌县上西州都督府户曹牒为某驿修造驿墙用单功事》,内容是受西州都督府征发,蒲昌县须遣送服役人员前往某驿成修补驿墙的记录,属于半军事性质的文书。今举斯坦因所获《唐建中七年(786)西州蒲昌牒为检造秋布花事》[1]为例,原件已裂为四片,现引文乃经陈国灿先生拼接,其中第1~3行间有"蒲昌县印"字样:



[1]蒲昌县　　　　　　牒……僧法超

[2]…………检造秋布花□法超、……嘉禾、女什一,已是壹拾玖□

[3]……年造花布讫申者,具检配□可者,向县造秋布花,检配讫。

[4]□□五日内分向□准使牒□□□故牒

[5]□□　　　　　　建中七年□月廿二日……

Yut.09.06　　Ma 357 355

08 012　　356 358

这是一件以征收秋花为主要内容的典型民事文书。秋花布,所指即秋天征收的草棉布,为西州特产,又称绁布,可以充调,又可以代庸,与内地征收的绢帛具有同样功能。该寺征收对象乃一座佛寺,很可能是一座尼庵,同样要承担民户一样的调赋。

蒲昌府则主管府兵的军府建置。早在高昌国麴氏皇朝时期,今鄯善地区就存在着平远府的建置,入唐后罢废平远府,却又出现了蒲昌府。表面上看来,似乎唐蒲昌府就是高昌国平远府的简单改置,其实,

[1]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页431~432。

并非如此。其一,高昌国平远府置于田地郡,由田地公兼领,而唐之蒲昌府则并非置于柳中县,而是置于蒲昌县,治所不同。其二,高昌平远府军事长官虽然也领有将军名号,但高昌国时期的将军名号不过虚有其名,虽然名义上拥有统兵权,但高昌国时期战争不多,对外主要唯强是依,对内也没有建立起真正实施军事动员的有效制度,而入唐之后,则为了强化碛西的政治军事统治,强力推行内地行之有效的府兵制度,蒲昌府是真正意义的军府,与虚有其名的高昌国平远府具有实质性的区别。可见蒲昌府不仅统管蒲昌县府兵,柳中县的全部府兵也都归蒲昌府统领。这是因为,在以蒲昌为起点的六条交通孔道之中,其中三道就是直通北庭,成为联系西、庭二州的生命线。正是在这一深刻的历史背景下,蒲昌府统一管辖蒲昌、柳中二县军事的性质已完全确定。可见唐之蒲昌府无论在组织上还是性质上都同高昌国的平远府有别。

唐初实行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度,特点是兵农合一,"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武骑、排手、步射……诸府总曰折冲府。"折冲府的组织依州之大小有异。有兵1200人以上为上府,有兵1000人为中府,有兵800人为下府,每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并以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为副,下有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兵以团、旅、队、火的编制组织起来,凡10人为火,50人为队,100人为旅,200人至300人为团。《新唐书·兵志》中的团为300人组成,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一团辖二旅,则每团为200人,火有火长,队有队正,旅有旅帅,团有校尉。每团管二旅帅,辖四队正。这种团外出征战,也称为营,如阿斯塔那西州营文书。每火备六驮马,以及必要的武器、炊具装备。如无马,任备驴、骡。其中队是基层作战单位,按步战方阵编队,下辖队副、执旗、十火。府兵都须自备食粮。如果征行在外,由所在官府给发仓米,称为身粮,上番还归,也给身粮。唐初的军事力量,就是以府兵为主。西州都督府创立之后,也迅速将内地的府兵制度在全州普遍建立起来。

西州都督府属中都督府,据近年吐鲁番出土文书,下辖岸头府(本

称交河府,后改名)、天山府、前庭府(本称高昌府)、蒲昌府等四折冲府,各领本县府兵。依唐制,这些折冲府特称"军府",这是同现代词汇中的"军府"有别的。又有押官,有统领500人的押官与统领50人的押官之别,实皆将军、校尉临时派遣的战地指挥官,不属于正规军事建置。各折冲军府中都设军典及随军医生,军典为军镇中配备的抄写人,属军中的文职小吏。有军典的军镇有资格申请纸墨等办公费用。随军医生则被称为医学博士,其中既有公职医生,也有民间医生,以西州营为名的府兵中的医生则是民间聘用的。战士建树军功,成为勋官,颁发黄纸告身,上记授勋者姓名、籍贯、勋转、所授官位等,死后多抄录副本殉葬。武周时期,府兵制日益解体,还出现了称为团结兵的民兵组织。此后时置时废。又作团结军、团练、土团、土军、土镇兵、乡兵等,乃由各道节度使、都团结使、都防御使、州镇遏使、在当地征发的地方军队,继承了府兵制的某些传统,平日务农,闲时军训,乃正规府兵的一种补充形式。一般不出本乡,除暂时不派遣色役、差科外,并无其他任何待遇。广泛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类似今天的民兵。唐蒲昌府的设立在于统辖蒲昌、柳中二县的府兵,加强贯通西域与内地交通孔道的西州东境战略地位。这一战略地位的动摇有可能全面倾覆唐朝在西域的政治主权。西州五县,共设四府,一般都是一县一府,唯独西域境却是一府二县,这足以证实蒲昌府所辖府兵总数超过其他西州诸县。已知出土吐鲁番文书总量中蒲昌府的军事文书占第一位。今举阿斯塔那117号墓文书之11,《唐残辞为买马柳中报蒲昌府马疋事》[1]:

[1]……□兵石长……

[2]……买[马]柳中……日……

[3]……报蒲昌府……前件马……

[4]……其镇人……本□谨……

[5]……陈[请土]卜……作辞草……

69TAM117:57/4

---

〔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册,非图录版,页251。

遗憾的是，已知出土蒲昌府文书，绝大多数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在《大谷文书集成》、宁乐美术馆，以及日比野丈夫的论著中保存的蒲昌府文书数量、字数都远远超过国内发现的同类文书。今再举日比野丈夫所公布的7号文书[1]为例：

帖蒲昌府

年定番案。并身死、没落，遭忧

上件案。勾会，帖至。仰府获……

……立待勘会，八月七日，史安进帖

录事参军

府

由于边疆信息匮乏，笔者所直接涉猎的蒲昌府文书数量有限。仅据这些资料可以判定，蒲昌府文书大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西州都督府牒下蒲昌府的文书。诸如《西州都督府牒蒲昌府为诸处要路陪须严备防贼入界事》《西州都督府牒蒲昌府为取实状报贼情事》等，数量最多。第二类是单纯的蒲昌府牒，诸如《蒲昌府案卷尾判》《蒲昌府牒为孙玄通等人勋宫支配事》，数量也很多。第三类是西州牒下蒲昌府，已知文书仅有两件，即《西州牒下蒲昌府为李秀才解退病马依追到府事》《蒲昌府受州牒为当月游奕官乘马及各烽戍替番下所由事》，余尚未见。第四类是蒲昌县牒上蒲昌府。已知文书也不多，如《蒲昌府受蒲昌县一日牒为卫士面义逖母郭氏身亡准式丧服事》《蒲昌县牒上蒲昌府为勘府兵梁成德身死事》等。从文书内容看，主要是军事内容，包括配烽、安置、检防、督察、防敌、探敌、陷敌、病废、伤疾、战亡，以及承账、随番、不役、停番等名簿，都与战事有关。还有申报勋官或勋官待遇是否落实等问题，也是战争的后续产物。此外也涉及少量民事问题，都带有明显的唐代色彩，诸如年老配仗身、遭母忧、长寿老人配给侍丁等都属唐朝法定制度。所谓侍丁，一般是中丁男，都须自带食粮，义务为

---

〔1〕日比野丈夫：《新获の唐代蒲昌府文书について》，载昭和四十八年九月，《东方学报》（京都）第45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页367。

官府做侍从,而本乡有长寿老人,则可在本乡做侍丁,这是唐朝推行孝道、优待老人政策的一部分,至于难以解决的欠练问题,也请求蒲昌府协助解决。

还有迹象表明,唐蒲昌府不但统一管辖柳中、蒲昌二县府兵,而且还在境内七道交通要冲和水草丰茂、兵家必争之地,设立了许多镇戍、烽堠、馆驿。镇有镇将,是军、守捉之下的军事建置,级别高于馆和烽[1]。镇戍驻军都须自营屯田,在自赡军食的前提下,还要下设粮仓,储存一些粮食,并须建立馆驿等镇戍级附属设施。发自蒲昌县的新开道所经神泉、罗护等镇似乎都有这类镇仓,例如斯坦因所获吐鲁番出土文书《天宝八载(749)罗通牒尾判》[2]中有“□护镇仓检覆”字样,“护”字前所缺之字无疑就是“罗”字,证实了罗护镇仓的存在。吐鲁番阿斯塔那506号墓出土的《唐天宝十四载(755)申神泉等馆支供(封)大夫帖马食[䜑]历请处分牒》[3]乃是一份北庭、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过往供应的消费账目,其中明确记载在神泉馆供应了6石6斗4升粮食,过罗护馆供应了7石□斗8升粮食,赤亭馆26石9斗5升粮食,达匪馆16石6斗4升粮食[4]。以上粮食暂时由当地镇戍屯仓支付,按实际消费账目,交付蒲昌府发文有关各县,实报实销,通过长行坊,保证车运到位。

除蒲昌县、蒲昌府两类文书之外,还有一类涉及长行坊中的“蒲昌群”,是非常特殊的一类文书,仅见于斯坦因所获吐鲁番出土文书,兹举《唐张从牒为计开元十年(722)蒲昌群长行马事》[5]:

---

[1]关于蒲昌府所属镇戍、馆驿、烽堠制度,陈国灿根据日比野丈夫所获蒲昌府文书和经陈国灿校释、拼合、重加编号的宁乐美术馆藏蒲昌府文书,明确记载的烽名已有十余个,俱载其论文《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初载武汉大学编《魏晋南北朝隋唐资料》第17集,2000年4月。收入《吐鲁番学新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这是迄今唯一有关这一制度的重要论文。

[2]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页313,七区二号墓文书。

[3]《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文物出版社,非图录版,页238~240。

[4]原文为“1陆硕陆斗肆胜(神)泉馆,2柒硕口斗捌胜罗护馆,3贰拾陆硕玖斗伍胜赤亭馆,4壹拾陆硕陆斗肆胜达匪馆”。

[5]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页210~211。

[1]蒲昌群长行马壹伯肆拾陆疋

[2]右检案内去闰五月廿五日得槽头梁远状

[3]通上件马见在蒲昌府,后至六月三日

[4]得蒲昌县中叁疋死,六月十七日更得蒲昌

[5]县中两疋死。除死外,计在群有马壹伯

[6]肆拾壹疋见在,未经点阅,所由检校

[7]人鞠威见在州,请处分。

[8]牒件检如前谨牒

[9]　　　　　　　　月　　日典张从牒

[10]　　　　　　　　　　　　鞠威

(后缺)

Ast. Ⅲ.3.06 Ma 309.

可见蒲昌还是唐西州饲养驮马的重要基地,出现了"蒲昌群"名称,大约是蒲昌府下属长行坊中的一个重要组织,饲养驮马多达上百匹。

综上所述,唐蒲昌县、蒲昌府、蒲昌郡的建置进一步完善了唐朝在今西州东部地区的军政统治。

[原载《河北传媒研究》,2009年第3、第4期(总第6、第7期)《唐蒲昌城渊源建制考》,有增改]

4　安西大都护府治所考
——兼论豆勒豆尔奥库尔古建筑群

安西大都护府始置于天皇李治显庆三年(658),定型于武周长寿年间,延亘至安史之乱以后(显庆三年至元和三年,658—808),存在时间如此漫长,治所并非一地。初建时期的治所乃龟兹王城,即今皮朗古城;其后治所又在西州(高昌古城)、庭州、碎叶(吉尔吉斯阿克贝希姆古城)、西州之间迁徙。以上都明确见于文献记载。关键乃武周长寿二年(692)定型后的安西大都护府治所究竟在哪里?对此,史书独有疏漏。本文根据伯希和在 Douldour âqour 考察时所拍遗址照片,所出249件汉文文书,以及日本大谷探险队所得昔日未注明出土地,今已确证出自库车ドルドルオコル遗址的汉文文书。[1] 结合有关汉文记载,初步推定,该遗址位于唐龟兹国境内汉军、汉民、汉僧最为集中的聚居区,符合唐朝汉蕃分治的建置特征,应当就是长寿二年直至元和三年间(692—808)唐安西大都护府定型后的治所。草为斯文,以就教于海内外同好。

4.1　豆勒豆尔奥库尔古建筑群即今渭干河东西的玉曲吐尔、夏和吐尔[2]

被伯希和称为豆勒豆尔奥库尔[3](Douldour âqour)的遗址,位于

〔1〕主要收录于小田義久:《大谷文书集成》(法藏社,卷一、三),具体考证见其所撰《大谷探检隊將來庫車の出土文書について》,《東方史苑》(第40~41期),1993年,页3~23。

〔2〕夏和吐尔,又为夏克吐尔、夏和库尔、夏合吐尔,以下叙述中根据不同人、不同时期的描述均有出现。

〔3〕检索国内这一遗址通行译名似皆为"都尔都勒阿库尔"(Douldour Aqour),校以伯希和法文原作,其地名实为 Douldour âqour,而法文 a 与 â 读音迥异,今一律改译为豆勒豆尔奥库尔。

今库车、新和两县交界处,渭干河中流、河的两岸各有一座遗址。汉译本《伯希和西域考察记》中所收参加这次考察的医生兼地理学家路易·瓦扬《中国西部地理考察报告》和伯希和的《库车地区考古笔记》都记载了这次考察,[1]但都叙述简单,从中很难了解这次考察的全貌。事实上伯希和早已意识到这次发现意义的重大,出于谨慎,在其有生之年始终没有公布这次发现及其研究成果,只是在身后才由其弟子韩百诗(Louis Hambis)、玛德琳·哈拉德(Madeleine Hallade)等人整理,当年所写有关这次考察的笔记和初步研究断想,始以 *Douldour âqour et Soubashi*(《豆勒豆尔奥库尔与苏巴什》)之名,刊入《伯希和遗作》第15卷。其实,伯希和考察这一遗址的时间乃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当时伯希和所拍遗址照片(DSCO1545),残存城墙、佛寺、佛塔、菩萨像,以及所绘大河穿城图(BSCO1715)都清晰无误地证实这是以渭干河为界,由两座遗址组成的一个庞大古代建筑群。伯希和还在1907年4月17日至6月4日间在渭干河西岸遗址进行了正规的考古发掘,所获大批考古资料,都已由其弟子整理至《遗著》中,至于所获249片汉文文书,则早在生前就已交由法兰西国家图书馆东方抄本部收藏。其弟子们似乎并不甚了解。直到2000年才由图书馆方特聘日本池田温先生和张广达先生共同整理公布,题名为 *LES ANUSCRITS DE KOUTCHA* 出版。同现代考古调查资料相对勘,这座被称为豆勒豆尔奥库尔的庞大古建筑群,无疑就是今日跨越新和、库车两县的河西夏和吐尔(xiah tur)与河东玉曲吐尔等两座古代遗址的总称,而其中心则为今日已划入库木吐拉水电站范围的古城废墟。这片古代建筑群今日仅存若干残垣断壁,亦即民国17年(1928)黄文弼所说的色乃当旧城,[2]却早也看

[1][法]伯希和等著、耿昇译:《伯希和西域考察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37~100、222~247。

[2]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千佛洞(指库木吐拉千佛洞——引者)之南,库木吐拉村庄附近旧城工作。旧城名色乃当,遗址尚存。周约420米,四方形,附近已开垦为熟地。余等在城东北隅,拾唐代陶片数块,间有带波纹灰陶片,当在唐前。在城北里许,且有一陶片上划汉字,字迹甚模糊。有土堡一,本地人称为炮台。盖为当时守戍官兵了望之所。"其后又接叙河西亦有一遗址,性质乃佛寺,据此可知,黄文弼先生认为玉曲吐尔(色乃当)乃城堡,河西夏克吐尔遗址是佛寺。

不出当年周约420米的方形城堡规模了。其北即今库木吐拉千佛洞遗址,今天那里已仅存石窟寺,一切地面佛寺都早已荡然无存,而在伯希和所拍照片中,还清晰地留下了一张土木结构的汉风佛寺地面建筑的影像。伯希和在《豆勒豆尔奥库尔与苏巴什》一书中还详细比较了河西古城外一座汉风佛塔与今日犹存的西安大雁塔的建筑形制对比图,证实这座千年古城具有浓厚的汉式建筑特征。引人注目的是,这座被伯希和称为豆勒豆尔奥库尔的庞大古建筑群,实以河西夏和吐尔遗址为中心,而 xiah 一词,亦即波斯王称中"沙"的直接译音,其名早见于波斯古经《阿维斯塔》。可见其名明显具有"王墩""王庭"的高贵含义。[1] 而此城在黄文弼到达该地所获名称则是"色乃当",维吾尔语作 salay tam,意为"公主垣",也同王庭有关。则河西遗址为王庭、河东遗址为公主垣,皆与王家有关,分明是同一古代建筑群的两个不同分区。[2] 详细分析这些照片和所获文物,有助于恢复这一遗址的原始面貌,进而确定遗址的性质。



图2-4-1　豆勒豆尔奥库尔古建筑群1

---

〔1〕维吾尔语中的 xiah 源自波斯语的王称"沙",可见夏合(xiah)具有王的含义。仅从这一遗址命名判断,就绝非普通城堡,而是唐代高级军政建置的所在地。王炳华《新疆库车玉其土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载《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82-105)中释此词为"天堑",其解无考,且不符合维吾尔语、波斯语含义。

〔2〕"豆勒豆尔奥库尔"一名的由来,词意更为不明,待考。鉴于当地古龟兹人所操语言并非突厥语,而是别属于地中海印欧语系的B型吐火罗语,以上语言解释尚未定论,须留待后人继续考证。



图 2-4-2 豆勒豆尔奥库尔古建筑群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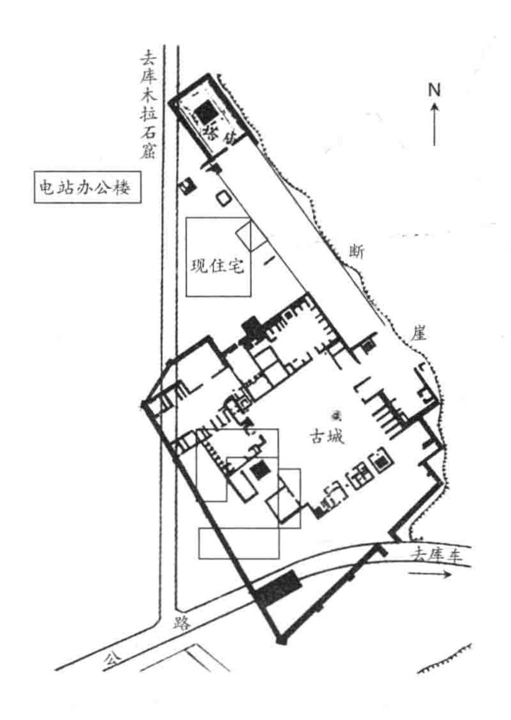


图 2-4-3 新和夏和吐尔平面图



图 2－4－5　夏和吐尔遗址



图 2－4－6　玉曲吐尔遗址

4.2　豆勒豆尔奥库尔古建筑群既非单纯的佛寺，也非柘厥关或白寺城

伯希和是第三位来到今名玉曲吐尔[1]（又作乌什吐尔）和夏和吐尔遗址考察的外国学者，在他之前，日本人渡边哲信所率大谷探险队已于 1903 年 5 月中到达这里，并于 15—19 日间进行了为时 5 天的调查发掘，获得许多具有唐代特征的文物，诸如带有“天宝”“大历”年号字样的文书残件。据其归国后发表的简单报告，将渭干河东玉曲吐尔遗址，初步推定为唐安西大都护府治下的柘厥关。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 20 世纪 80 年代考古学家王炳华也撰文赞同玉曲吐尔是柘厥关的说法，但王说与渡边说之间仍有所不同。大约渡边哲信发掘的遗址局限于玉曲吐尔，因此他推定的柘厥关局限于河东玉曲吐尔遗址，王炳华说的“玉曲吐尔”则并非局限于河东遗址，而是兼跨库车、新和二县的玉曲吐尔、夏和吐尔二遗址的总称。[2] 这一说法，直至目前，仍在我国学

---

[1] 玉曲吐尔，也称玉其土尔、玉其吐尔，以下叙述中根据不同人、不同时期的描述均有出现。

[2] 王炳华《新疆库车玉其土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中也将玉其吐尔与夏合吐尔视为同一遗址：“我这里提到的‘玉其土尔’遗址，实际包含玉其土尔、夏克土尔两个遗址点。它们分居渭干河东西岸，隔河相对。虽有二称，实为一体。还要说明一点，因为库车、新和两县，今天以渭干河为界，这就出现了一个更偶然的现象：玉其土尔遗址居渭干河东，现属库车；夏克土尔居渭干河西，归于新和。一组有机联系的古代遗址，于是被分割在两个行政县内。拙文以‘库车玉其土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为题，一是因为库车绿洲的地域，传统上可以包括新和、沙雅在内。”王炳华是笔者的校友，在新疆考古工作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与笔者私交甚笃。笔者最早得知都尔阿库尔遗址曾出土了 200 余件汉文文书就是他从法国讲学归来后告知的。今日获睹这批文书的真面目，抱着交友必诤言的原则，公开提出自己的观点。

术界占有主导地位。第二位来此的学者是德国人格伦威尔(A. Grünwedel),1906 年 1 月到达这里,此人长在宗教学,并不精于汉学,重在搜集佛教文物。他将这片庞大的建筑群单纯地定为佛寺。由于西方最大的东方学权威伯希和生前对此并未明确表态,乃是导致柘厥关说与佛寺说分别在东、西方大为盛行的基本原因。对以上两种说法,笔者都持否定立场。

首须指出,豆勒豆尔奥库尔古建筑群性质与苏巴什迥异,绝非单纯的佛寺。作为龟兹国境中的一座庞大的古建筑群,不可能没有佛寺、佛塔,但龟兹境内最大的汉传佛寺绝不可能置于此城,而应置于库木吐拉石窟寺群中,因为总管西域的僧都统的驻锡地就在那里。而城、寺一体乃是唐代西域建筑的重要特征。有城必有寺,有寺必依城。尤为武周革命至唐朝复辟后的主要特征。根据近现代考古发现,列举出大量证据。[1] Douldour âqour 遗址虽然发现了佛塔及地面佛寺的某些遗迹,但仅能说明这片庞大的古建筑群具有城、寺合一的特征,却不论其中的河东遗址,还是遗址都不足以成为一座独立于城堡之外的佛寺,易言之,不论整个 Douldour âqour 古建筑群或者河西夏合吐尔遗址都不可能成为一座游离于城堡之外的单纯佛寺。

还须指出,柘厥关说更是难以成立。尽管此说的倡导者渡边哲信与王炳华二先生之间仍有小异,但所据史料都是《新唐书·地理志》中如下一段文字:“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其后,可西通碎叶、怛逻斯。”易言之,此路地当向达先生所说的“热海道”,亦即碎叶路。

---

〔1〕诸如唐交河城:有塔林。唐西州:有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即宁戎寺。唐庭州:城内有龙兴寺、大宁寺。蒲类县(奇台唐朝墩古城):今奇台县城东北之唐朝墩古城残存之中心墩绝非衙署所居,应即县城中心所建佛寺。轮台县:在今昌吉古城,其中心墩应在卫生学校院内,20 世纪其处有高墩,据笔者判断,应是佛塔所在,今已荡然无存。奇台县东地疙疸:有隔河而立的两座土墩,东大墩与西大墩,20 世纪 50 年代保存良好,二墩皆高丈许,根据出土文物判断,其中明显东大墩是城,西大墩是寺,是城、寺统一的典型。可参阅奇台县文化馆(薛宗正执笔):《新疆奇台县境内的汉、唐遗址调查》,载《考古学集刊》(5 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细加推敲,此说存在着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

(1)“关”在唐代官制体系中是一种低级建置,与“烽”“戍”的级别差不多,烽的长官称烽帅,戍的长官称戍主,关的长官则称关令。《唐六典》卷30三府督护州县官吏条明确记载:“关令掌禁末游,伺奸慝。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有上、中、下令之别:“上关,令一人,从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皇朝置录事一人,府二人,史四人,典事六人,津吏八人。中关,令一人,正九品下;丞一人,从九品下。录事一人,府一人,史二人,典事四人,津吏六人。下关,令一人,从九品下。府一人,史二人,典事二人,津吏四人。”又记“无津则不置(津吏)”,可见即使是上关令,官品也不过是从八品,远不及县令的正从七品。其属吏也仅关丞、录事、关府、关史、关典事、津吏等24人,可见设关之处,仅为一小堡,而玉曲吐尔、夏合吐尔二城既为一城,如果再加上以南的库木吐拉遗址,乃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建筑群,其中玉曲吐尔,王炳华比定为黄文弼1928年考察的色乃当古城,即维语salay tam的译音,意为公主墙。黄文弼记载墙垣呈方形,周约420米。河西的夏合吐尔遗址,汉文记载周长约380米。而伯希和发掘的Douldour âqour遗址,实乃今属新和县的夏合吐尔,114米×134米,形若古堡,再加上南部的库木吐拉遗址,也类似城堡形制,具有相当规模。其北的库木吐拉千佛洞,今日虽然仅存石窟寺,但当初却是地面寺院与石窟寺俱全,其外且有围墙防护,也具有城堡形制,如此庞大的建筑群仅仅是一座柘厥关,于理不合。

(2)更为不合理的是,如此级别低下的柘厥关令,却不仅驻屯在如此庞大的建筑群中,而且经常接受与其级别不合的上级文书、指令。据记载,巴黎图书馆东方手稿部所藏经伯希和探险队在所称Douldour âqour遗址(实为新和夏和吐尔遗址)中发掘所得的唐代汉文文书就有200多件,其中不乏机密军事文书或高级判牍。这些绝不会送达柘厥

关,而应送达更为高级,甚至应当是最高级的唐朝军政建置。[1]

(3)白马河,王炳华先生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断定就是渭干河,则玉曲吐尔在白马河东,夏合吐尔在白马河西。渡边哲信将玉曲吐尔定为柘厥关,夏合吐尔定为阿奢理贰寺,尚可自圆其说。既将白马河定为渭干河,则其力主玉曲吐尔、夏合吐尔为一个遗址的理由就难以成立,因为夏合吐尔的位置就在河西,明显与史书所载不合。

继柘厥关说之后,武汉大学刘安志博士又据几件敦煌出土文书都提及"白寺城"名,进一步征引伯希和在 Douldour âqour(此处所指主要是河西新和县境的夏合吐尔遗址)所获汉文文书中有"河西寺"与"白寺"并提,由此推论,河西寺就是新和的夏和吐尔遗址,白寺城就是玉曲吐尔遗址。应当指出的是,刘安志博士在正文中一再强调,"在渭干河东面有一区遗址名叫玉其吐尔,与夏克吐尔遗址隔河相望。关于两区遗址的性质,王炳华先生曾有过精湛的考释,认为它们即是唐代龟兹的柘厥关,从而纠正了法国学者伯希和氏对该遗址性质的错误认识。笔者完全同意王先生的这一卓识,只是想进一步指出,玉其吐尔和夏克吐尔这两区遗址,不仅是唐代柘厥关的所在地,而且也是龟兹都督府下属机构,城的所在地。"意即他不敢正面否定王炳华说,其白寺城说不过是柘厥关说的一种补充。但细品其文意,其立意明显与力主玉曲吐尔、夏克吐尔实为同一遗址的王炳华先生大不相同。因为他仅仅承认河东的玉曲吐尔是白寺城,而河西的夏克吐尔仍然以佛寺为主,故为河西寺所在地。看来,刘安志博士的深意实在于并不否定格伦威尔的河西夏克吐尔乃以佛寺建筑为主的论断,并承认渡边哲信以玉曲吐尔古城为柘厥关的观点,可见其说仅为格伦威尔说与渡边哲信说的一种补充,并非力主河东、西二遗址同为一城的王炳华说的补充,仅为其否定语言的巧妙、曲折的表达形式。按《新唐书》云:"初,兵之戍边者,大曰

[1]即使像潼关、剑门关这样重要的关隘,关令所司职能仍然有限。这里除关令外,大都驻有军级建置,其中安史之乱初起时,潼关还先后是天下兵马副元帅高仙芝、哥舒翰的驻地。在唐代历史上还不曾存在过一个小小的关令单独驻在像豆勒豆尔奥库尔那么庞大的建筑群,并存在着接受高级官府文书的职权。

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1]依此,城设城使,或城主,级别低于守捉使而高于镇使,每座城、镇的周围都烽、戍密布,说明城、镇的级别都高于关令、烽帅、戍主。即使退而承认,刘安志博士的考证是正确的,易言之,白寺城使与柘厥关令同治一城,那么,二者的隶属关系也是柘厥关令隶属于白寺城使,而不是反过来,白寺城使隶属于柘厥关令。

那么,白寺城说是否可以成立呢?笔者的回答也是否定的。理由是城使的官品虽然较关令为高,至多也不过是六品,亦非200余件汉文文书出土地的官员品级。

至于刘安志博士据敦煌文书所言白寺城并非子虚乌有。2010年夏,笔者在考察Douldour âqour遗址结束之后,又继续自南,考察库木吐拉村的遗址,途经三道桥,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土墙,现已成为当地驻军的打靶场,据当地居民反映,现存土墙虽是解放军增筑,但土墙本身早就存在。当地人称之为Ak xiahar,意为白城,说明古代遗址遗音尚存。此次同行者尚有霍旭初、泰来提二先生,都有同样的感受。可见豆勒豆尔奥库尔古建筑群既非柘厥关,又非白寺城,而应是建置级别不可与前述关、城同日而语的大唐西域最高级别官府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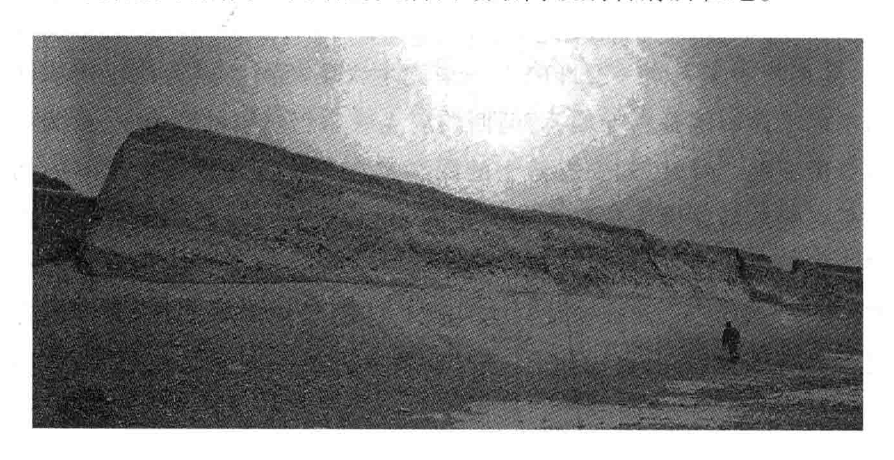


图2-4-6 三道桥长城墙(今打靶场)

[1]《新唐书》卷50《兵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1328~1329。

4.3 龟兹王城仅为存在四年的安西大都护府初期治所

豆勒豆尔奥库尔即柘厥关说最为脆弱的软肋在于,此说实以安西大都护府的治所就在皮朗古城,这一前提若不成立,其一切推理都不攻自破。前已详细论证,安西大都护府以皮朗古城为治所前后不足4年,则此说再无存在的任何前提。

安西大都护府乃唐朝中央政府(朝廷)在西域的派出机构,是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建置。显庆三年(658)延亘8年的西突厥阿史那贺鲁、龟兹羯猎颠叛乱荡平,不仅西突厥两厢部落,龟兹、焉耆、于阗、疏勒等西域四大城邦皆于此年正式纳入唐朝版图,列置为西突厥兴昔亡、继往绝等两厢可汗封地,昆陵、濛池二羁縻都护府,龟兹、焉耆、毗沙、疏勒等由四大城邦改置的"四镇都督府",而且葱岭以西、河中粟特诸城邦、乌浒水域吐火罗等十六国也都主动将自身国土合并于唐朝,相继列置为河中、乌浒水域诸羁縻都督府。"彼时,唐朝国威远震。北境突厥亦归聚于唐,[西]直大食国以下均为唐廷辖土。"[1]唐朝版图"极于西海",[2]出现了大唐天皇武功盛世。在这一新的政治形势下,唐朝的边政、边防体制必须做出相应的重大调整,以全面强化对于这一新拓疆土的军政管理。

安西移治龟兹实乃平定阿史那贺鲁和龟兹羯猎颠叛乱的历史产物。《唐会要》卷73明确记载:"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又以贺鲁平……至[显庆]三年五月二日(658年6月7日),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以麴智湛为之,以统高昌故地。"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的主帅乃苏定方主持的伊丽道行军及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主持的流沙道"安抚"行动的胜利成果,而平定龟兹叛乱则是左屯卫大将军杨胄别领一军,击杀龟兹叛首羯猎颠的结果。史

[1]王尧、陈战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页141。

[2]《旧唐书》卷83《苏定方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2780。

载显庆三年"正月,戊申(658年3月4日)杨胄及龟兹羯猎颠战于泥师城,败之"。[1] 同月,"立龟兹王兹王嗣子白素稽为龟兹王,授右骁卫大将军,仍遣使就加册命"。[2] 这标志着决战胜利与龟兹归唐,同年,苏定方等归朝献俘,杨胄一军则未见召回的记载,说明继续驻军留守。安西大都护府的前身是始建于贞观十四年(640)的安西都护府,初治于交河城,贞观十六年(642)定治于西州,即今高昌古城。前引史料在"安西都护府移治于龟兹国"之后,漏记"晋级为安西大都护府"。安西大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唐六典》卷30中明确记载:"大都护府:大都护一人,从二品;上都护府:都护一人,正三品。"可见安西大都护府为从二品,其长官称大都护,而安西都护府则为正三品,其长官仅称都护,加不加这个"大"字,建置级别、长官品阶迥然不同,不容混淆。[3] 而龟兹国境很大,安西大都护府"移治龟兹"究竟何

---

[1]《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页58。同书卷221《西域·龟兹传》(页6233)又记此年"诏左屯卫大将军杨胄发兵禽羯猎颠,穷诛部党,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更立子素稽为王,授右骁卫大将军,为都督。是岁,徙安西都护府于其国"。

[2]《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页11340。

[3]陈国灿先生在吐鲁番、库车出土汉文书的整理、注释、解读等方面都做出了举世瞩目的学术贡献。遗憾的是,凡是有关安西建置的一切研究,都仅使用"安西都护府"字样,很少使用"安西大都护府"这一明显见于史书记载的建置名称。例如,《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所刊陈先生与刘安志合写的文章就题名为《唐代安西都护府对龟兹的治理》,其实,应当题作《唐代安西大都护府对龟兹的治理》才对,因为以西州为治所的安西都护府根本管辖不了龟兹。余不赘举。贞观至显庆初年以交河城或西州为治所的安西都护府与迁治龟兹之后出现的安西大都护府建置明显不同。史书中明确记载领有安西大都护府官衔的主边将领就有多位,如天皇、天后、武周神皇时期的裴行俭大都护、王果(或王世果)大都护、阎温古大都护,开元年间的安西大都护及安西副大都护郭虔瓘,遥领安西大都护的亲王李琮、宰相李林甫、赵颐贞副大都护等,充分说明安西都护府与安西大都护府是两种级别有异的不同军政建置,不宜混淆不分。

指呢？遍查文献，绝大多数史书所记皆为泛指“龟兹”，[1]其中留下安西治所明确记载的史料只有以下三种，皆定为龟兹王城，即皮朗古城。

（1）《旧唐书》卷38《地理志》：“安西节度使，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国城内。”此处所记之“龟兹国城内”，明确所指就是龟兹王城，亦即皮朗古城。

（2）《通典》卷191《边防七 · 西戎三》：“今安西都府所理，则龟兹城也。今王则震之后也。今并有汉时姑墨、温宿、尉头三国之地。”

（3）《新唐书》卷40《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初治西州。显庆二年平贺鲁，析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分种落列置州县，西尽波斯国，皆隶安西，又徙治高昌故地。三年徙治龟兹都督府，而故府复为西州。”此处亦言“徙治龟兹都督府”，自显庆三年正月唐朝册封白素稽之后，原龟兹国已被改置为龟兹都督府，则龟兹府城亦即原龟兹王都，当年五月三日新建立的安西大都护府移治于此，实际上是汉、蕃最高级军政机构合治一城。

至于唐朝册拜的首任安西大都护是谁，虽然史无明载，却明确透露，杨胄乃攻占龟兹的唐军主将，平乱后，其所统汉军皆驻地留守，且其所领左屯卫大将军的官阶恰是从二品，与安西大都护的品阶相符，则唐

---

[1]诸如《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显庆］三年春正月……甲寅，西域平，以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复于龟兹国置安西都护府，以高昌故地为西州。”此处“安西”之后，缺一“大”字。《旧唐书》卷40《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置西州都护府，治在西州。显庆二年十一月，苏定方平贺鲁，分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分其种落，列置州县。于是，西尽波斯国，皆隶安西都护府。仍移安西都护府理所于高昌故地。三年五月，移安西府于龟兹国。旧安西府复为西州。”《唐会要》卷73安西都护府条：“［显庆］三年五月二日，移安西都护府於龟兹国，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以麴智湛为之，以统高昌故地。”《资治通鉴》卷200：“［显庆］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府，镇高昌故地。贞观十四年平高昌，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今徙于龟兹。”《通典》卷172《州郡》：“镇西节度使：（理安西，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疋，衣赐六十二万疋段。）抚宁西域，统龟兹国、焉耆国（在理所东八百里）、于阗国（在理所西南二千里）、疏勒国（在理所西二千余里）。”《册府元龟》卷956《外臣部 · 总序》：“则天长寿元年，始大破吐蕃，收四镇之地，乃于龟兹复置安西都护府以镇之。”《慧超行记》：“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从此已东。并是大唐境界。”皆未明确交代安西大都护府治所究竟治于何城。

册之首任安西大都护非杨胄莫属。[1]

皮朗古城位于库车县新城西1公里，库车河东岸，地扼库车绿洲最形胜处，乌恰河流经城中。一作龟兹古城。学术界普遍公认就是《汉书·西域传》所记龟兹王所治之延城，《唐书·西域传》之伊逻卢城。原先规模宏伟，被当地俗名南海墩、萨克当墩、皮朗土墩、哈拉墩等不同形制的古代土墩遍布城中，出土汉唐时期文物以及金石并用时代的石器，文化遗存延续时代久远。现因遗址密迩城镇，几乎已破坏殆尽，仅存断壁残垣，迂回曲折稍可窥想古城风貌。千余年来龟兹历经沧桑，唐代的伊逻卢未必是汉代延城的原来形制，郦道元《水经注》中曾记延城在北魏时一度荒废，透露出这座龟兹古都必在原来旧址基础上经过多次改建。规模之大，为新疆古城之冠。因此，前辈权威学者黄文弼的《略述龟兹都城问题》文末有如下一段话："安西都护府亦移至库车。而龟兹都城即皮朗旧城遂又为西域政治经济中心地。"[2]

应当指出的是，显庆三年与安西大都护府治于龟兹王城的记载出现同时，唐朝还创置了安西四镇守军，即龟兹镇守军、于阗镇守军、疏勒镇守军、焉耆镇守军，简称安西四镇，皆属汉军建置，乃安西大都护府卫星建置，旨在拱卫四翼，保卫大都护府的安全。又将龟兹、焉耆、于阗、疏勒等四个降唐的西域城邦改置为四镇都督府，龟兹国改置为龟兹都督府，焉耆国改置为焉耆都督府，于阗国改置为毗沙都督府，疏勒国改置为疏勒都督府，皆属羁縻建置，名义上虽已废除了各国原有的国名，实际上仍以原先的各国王世袭唐朝都督，沿行各自祖制，唐朝对其内政概不干涉，实质上是对内仍称国王，仅对唐廷称都督，而总隶于安西大都护府。依此，安西大都护府与龟兹王或龟兹都督同治一城，同上述基

〔1〕杨胄，正史无传。而《旧唐书》卷77《杨弘礼传》："弘礼，隋尚书令素弟之子也……太宗有事辽东，以弘礼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见弘礼所统之众，人皆尽力，杀获居多，甚壮之，谓许敬宗等曰：'越公儿郎，故有家风矣。'"此人参加了贞观二十二年昆丘道行军占领龟兹之役，为副大总管，总统汉军，永徽四年卒。此年龟兹羯猎颠又叛，显庆三年出现了杨胄统兵伐龟兹的记载。其名"胄"，就对杨氏家族充满自豪，隐喻"越公儿郎，故有家风"之意，以此推断，杨胄或即出自杨弘礼之门。

〔2〕黄文弼：《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页209。

本国策并不完全相符,但龟兹初定,百事草创,尚无足够时间另建新城,除了以龟兹王城为临时治所,别无其他选择。可见安西大都护府与龟兹王城同治,不过是西域归唐之初的临时权宜之策。

但是,安西大都护府刚刚创立,由于噶尔家族重新执政蕃廷,由唐太宗与松赞干布共同结成的和亲纽带就已全面断裂。永徽元年(650)松赞干布死后幼主乞梨拔布(芒松芒赞)继立为赞普,不事事,志在向河源、西域等有羌人活动地域扩张的噶尔·东赞域宋出任大相,唐蕃边境冲突已逐渐升级。显庆四年(659),吐蕃亚相达延·莽布支率兵犯河源,为苏定方所败,莽布支战殁。[1] 这次失败引起吐蕃朝中亲唐派势力的抬头,为此,噶尔·东赞域宋一度引咎离开了吐蕃大相之位,但在六年后,即龙朔元年(661)重新复位。[2] 他上台后,先于龙朔元年至二年间(661 年底至 662 年初)攻陷地当四镇入吐火罗道咽喉的护密,吐蕃势力开始进入西域,弓月、疏勒、龟兹相继叛唐附蕃,"苏海政为䬃海道总管("总管"前似缺一"大"字)……高宗龙朔二年十二月(663 年

〔1〕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明白记述:"及至羊年(659),赞普驻于鹿苑。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阿豺),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亦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是为一年。"对此,内地学者大都以汉文史料中不录此事为理由,有意回避或根本否认。藏族学者根敦琼培《白史》则释此文意为:"汉兵八万,不能胜藏兵一千之义",把此役说成是蕃胜唐败,也于理难通。考达延·莽布支乃地位仅次于噶尔·东赞域宋的吐蕃亚相,此役战殁,可知是吐蕃战败。苏定方乃 656—657 年平定西突厥的主将,658 年归朝献俘,此后何往,史无明载。然唐初旧制,边将不离戍区,将帅不离部伍,苏定方所部自 657 年冬自西域班师,至 659 年返至凉州,不可能继续东归,河源有警,唯一可以调动应急的唐军,应即此部,苏定方自长安受封以后,亦应自归本军,因此可以肯定,吐蕃文书反映出来此役击败蕃军的唐方主帅苏方必即苏定方。且此役必发生于该年十月之前,因为《旧唐书》卷 83《苏定方传》有明确记载,是岁"十月,思结俟斤都曼帅疏勒、朱俱波,谒般陀三国反,击破于阗"。而平定此役的唐军主将又是苏定方。《资治通鉴》卷 200 记载显庆四年十一月苏定方统兵驰援"思结保马头川。定方选精兵万人、骑三千匹驰往袭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诘旦,至城下,都曼大惊。战于城外,都曼大败,退保其城。及暮,诸军继至,遂围之,都曼惧而出降"。足证破达延·莽布支与救于阗、破都曼乃紧相衔接的两役,前者发生于十月前,后者发生于十月至十一月间,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同一战役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故此役结束后苏定方进一步加官晋爵,"以功加食邢州、钜鹿、真邑五百户"。其事仍俱见于同书《苏定方本传》,可见吐蕃发动的第一次反唐攻势以失败告终。

〔2〕据藏文史料《赞普传》:"域宋年耄,由倭美岱类赞继任,不久,彼以心怀逆二见杀。其后东赞重新出任,六年,老死。"可知噶尔·东赞域宋 659 年犹为吐蕃大相,其后一度罢相,死前六年又复任首辅。按此人卒于 667 年,逆推六年,则噶尔·东赞域宋复位乃 661 年事,此前一段时间曾由倭美岱类赞执掌相位,可见东赞域宋确因显庆四年乌海之败而于次岁引咎辞职。

1 月),受诏讨龟兹及疏勒……敕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及濛池都护阿史那步直发众以从海政……海政军至疏勒之南,弓月又引吐蕃之众来拒官军,海政以师老,不敢战,遂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1]龟兹既已发生叛乱,苏海政主持的𠇗海道又师出无功,安西大都护府必定失陷无疑,自此杨胄之名消失于史册,说明首任安西大都护府战殁,移治龟兹的安西大都护府全体人员殉难。移治龟兹的安西大都护府始置于显庆三年,至龙朔二年十二月前业已失陷,则以龟兹皮朗古城为治所的安西大都护府存在时间不过 4 年(显庆三年至龙朔二年,658—662)。进而深究,在苏海政主持的这次𠇗海道行军中,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与濛池都护阿史那步真皆受主帅苏海政节制,而昆陵都护、濛池都护皆为正三品的都护品阶,非从二品阶的安西大都护府不足以节制此西突厥二将,由此足证苏海政除领有𠇗海道行军大总管之外,必定兼领“检校”安西大都护官衔,即名义上或临时性的安西大都护。又苏海政原任伊州都督,兼伊州刺史,则又说明龙朔二年(662) 𠇗海道行军期间,伊州曾为安西大都护府的名义治所。苏海政虽为贞观末年就参与伐龟兹、平贺鲁诸场恶战的猛将,却非独领一军的帅才。他所主持的𠇗海道行军非但未能平定龟兹、疏勒叛乱,而且途中冤杀了唐册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2]导致西突厥左厢部落首领阿史那都支叛唐,一度攻陷庭州。[3] 自始西域局势开始逆转。

4.4 安西建置级别与治所的变迁

自唐朝初置龟兹之安西大都护府陷落之后,自龙朔二年至长寿二年(662—693)的整整 30 年间,安西建置级别基本上已还原为正三品

---

[1]《册府元龟》卷 449《将帅部 · 专杀》,页 5324。

[2]《唐会要》卷 94《西突厥》,中华书局 1985 年版,页 1695:“龙朔二年,十月,敕兴昔亡、继往绝二可汗发兵与苏海政讨龟兹,继往绝与兴昔亡有怨,密请海政矫敕收斩之,其部落亡走,海政讨平之,继往绝寻死,十姓无主,附于吐蕃。”

[3]《资治通鉴》卷 201,龙朔二年(662),页 6333:“是岁,西突厥寇庭州,刺史来济将兵拒之,谓其众曰:‘吾久当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当以身报国!’遂不释甲胄,赴敌而死。”

的安西都护府,仅在垂拱二年至永昌元年间(686—689)为策划为武周革命献礼的安息道行军升格为从二品的安西大都护府。其治所也已不在龟兹,而是东徙西州旧治,其间又曾以碎叶为其临时治所。直至武周名将王孝杰主持的武威道行军取得辉煌胜利之后,才于长寿二年再次定治龟兹,再建安西大都护府与安西四镇。在此30年间,安西的建置级别升降与治所的变迁表述如下:

表2-4-1　安西的建置级别升降与治所变迁

建置级别	主将官阶	治所	时间	历任安西主将姓名
安西大都护府	从二品	伊州	龙朔二年十二月	苏海政(龙朔二年十二月)
安西都护府	正三品	西州	龙朔三年至仪凤四年(663—679)	高贤[龙朔元年(?)至麟德二年,661(?)—665] 裴行俭(麟德二年至乾封二年,665—667) 陶大有(乾封二年至总章二年,667—669) 董宝亮(总章二年至咸亨二年,669—671) 崔智辩(咸亨二年至上元二年,671—679)
		庭州	上元二年至仪凤四年(675—679)	杜怀宝(上元二年至仪凤四年,675—679)
		碎叶	调露元年至永淳元年(679—682)	王方翼(调露元年至开耀元年,679—681) 杜怀宝(开耀元年至永淳元年,681—682)
		西州	永淳二年至垂拱元年(683—685)	李祖隆(永淳二年至垂拱元年,683—685)
安西大都护	从二品	西州	垂拱二年至永昌元年(686—689)	王果(垂拱二年至垂拱三年,686—687) 阎温古(垂拱三年至永昌元年,687—689)

续表 2-4-1

建置级别	主将官阶	治所	时间	历任安西主将姓名
安西都护	正三品	西州	永昌元年至长寿元年(689—692)	咎斌(永昌元年至天授元年,689—690) 王孝杰(天授二年至长寿元年,691—692)
安西大都护	从二品	龟兹	长寿二年至广德元年(693—763)	从略

先叙安西建置级别第一次降级为都护府时期(龙朔三年至垂拱元年),其间安西主将所领官衔皆为安西都护,无一人领安西大都护者,其治所亦自龟兹他徙,具体又分为西州、庭州、碎叶三地。

(一)安西治所东徙西州时期(龙朔三年至仪凤四年,663—679),共历五位安西都护:

(1)高贤[龙朔元年(?)至麟德二年,661(?)—665],其前任应为麴智湛,据《册府元龟》卷991《外臣部 · 备御四》,页11641记"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护府,以尚舍奉御、天山县公麴智湛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府州刺史,往镇抚焉"。同书同页又记:"[显庆]三年……又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府,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天山县公,麴智湛为西州都护,以统高昌之故地。"麴智湛主政安西于永徽、显庆年间,进入龙朔年间已不再出现此人姓名,以此判断,高贤任安西都护时间约始于龙朔元年,其在任时间似止于龙朔四年改元为麟德元年之际。[1]

(2)裴行俭(麟德二年至乾封二年,665—667),其所领官衔《新唐书》卷108《裴行俭传》,页4086:"裴行俭……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

[1]《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龙朔三年(603),页6339:"[龙朔三年十二月]壬寅(664年1月24日),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将兵击弓月以救于阗。"此次救援行动结局如何,史书并无下文,龙朔四年(664)改元麟德元年,此年高贤之名已消匿于史册。说明高贤主持的伐弓月,救于阗之战不利。吐鲁番出土墓志中记载曾参加此次行军的□柱柱就在此役中阵亡,又高昌人汜相达也是死于"西讨"之役。据此可知,此次行军由龙朔三年末一直延续至麟德元年初,高贤亦必战殁于麟德元年。

护,西域诸国,多慕义归附。”别有史料另记其官衔为“安西大都护”。[1] 裴行俭所领官衔究竟是“都护”还是“大都护”,事涉龙朔二年至垂拱二年间(662—686)安西建置级别是否全面降级的重大问题,现经仔细清理有关史料,确信裴行俭曾领安西大都护官衔不可信。理由有四:裴行俭以贬员身份,由西州都督府长史升至金山都护府副都护,已至极致,其官衔不过从三品,乾封二年(667)内调后,所授官职也不过是“征拜司文少卿。总章中,迁司列少常伯。咸亨初,官名复旧,改为吏部侍郎”,[2]也不过是从三品至正三品官员,都不够从二品的安西大都护资格。说明裴行俭麟德年间曾任安西大都护的履历事殊可疑。此其一。《新唐书·裴行俭传》,明确记载其人官衔为安西都护,乃安西大都护说的有力反证。此其二。高贤任安西都护时期,裴行俭任西州都督府长史、金山副都护,高贤战殁后,裴行俭始代主安西,所领官衔只能是安西都护,不可能随即升为安西大都护。此其三。伯希和所获吐鲁番出土 P2754 号文书第 25~26 行留有“奉判:裴都护左右私向西州事。都护左右,事议积难,比更披寻,是非不易。安西再经闻奏”字样,下接 32~33 行“诘其方便来由,确称都护面许”[3]等文字,尤为裴行俭所领官衔乃安西都护的坚证。吐鲁番文书是唐代西域第一手原始文献,其价值远远高于以后世追溯前代的正统史书与碑刻墓志。文书中的“裴都护”显然指裴行俭,则裴行俭所领之官衔绝非安西大都护,而是同其前任麴智湛同样的“安西都护”。此其四。

(3)陶大有(乾封二年至总章二年,667—669):“[陶]大有……父讳瓒。梁著作随西(缺一字)司功员外郎,朝(缺一字)州清池县令介州

---

[1]如《旧唐书》卷 84《裴行俭传》,页 2801~2802:“裴行俭,绛州闻喜人。……麟德二年,累拜安西大都护,西域诸国多慕义归降,征拜司文少卿。”《册府元龟》卷 397,《将帅部·怀抚》,页 4723:“裴行俭以麟德二年为安西大都护,西域诸国多慕义归降。”而《全唐文》卷 228,页 2304-2308 所收张说(八)《赠太尉裴公神道碑》:“又拜安西大都护,西域从政,七八年闲,穷荒举落,重译向化。”则是以上二书共同的史料来源,连文字、句式都几乎完全相同。笔者在本书旧版中曾误信以上记载,导致安西建置沿革制度发生混乱,必须予以重新审视。

[2]《旧唐书》卷 84《裴行俭传》,页 2801~2802。

[3]《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2 辑《唐安西判集》,页 610~614。《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8 册,页 103~104。

司马上柱国丹阳县开国公……[大有]上柱国燕容县开国公,通事舍人,西州刺史,安西都护。"[1]

(4)董宝亮(总章二年至咸亨二年,669—671):"宝亮,安西都护,陇州刺史,天水公。"[2]

(5)崔智辩(咸亨二年至上元二年,671—679):"崔智辩从五俟斤路,乘我间隙,疮痍我众,驱掠牛羊,盖以万计。"[3]

(二)安西治所北徙庭州时期:仅历杜怀宝一位安西都护(上元二年至仪凤四年,675—679):"仪凤岁……以安西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4]这一记载说明庭州一度成为安西都护府治所。安西都护改驻庭州,显然同这一时期西突厥两厢可汗反唐倾向日益明显,天山北麓形势紧张有关。

(三)安西治所远徙碎叶时期(调露元年至永淳元年,679—682),共历二都护:

(1)王方翼(调露元年至开耀元年,679—681):"[裴]行俭奏肃州刺史王方翼以为己副,仍令检校安西都护。"[5]而王方翼任安西都护最主要的政绩就是扩建碎叶城,并驻节于此:"唐王方翼为安西都护,高宗朝安抚大食使裴行俭之讨遮匐也,诏以方翼为副,行俭军还,方翼始

[1]《全唐文》卷912《灵廓》(永昌时沙门),《唐宣州刺史陶府君德政碑》,页9506,原文为:"(碑前缺两行半计一百十六字)……父讳瓒。梁著作随西(缺一字)司功(缺三字),朝(缺一字)州清池县令介州司马上柱国丹阳县开国公。……通(缺四字)州刺史安西都护,上柱国,燕容县开国公。"复据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册,页441引《江苏金石志》卷4《宣州刺史陶府君德政碑》拓本,相互校勘,"通"后所缺四字为"事舍人西",则陶大有所领官衔应为"上柱国燕容县开国公,通事舍人西州刺史安西都护"。郁贤皓泛系为"约唐高宗前期",而置于裴行俭在任(麟德二年至乾封元年,665—666)之前,其说不取。陶大有主政安西应为乾封二年至总章二年间。

[2]《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6,页800,《陇西董氏》。参稽《金石录校正》页67所收李俨撰《戎州刺史董宝亮碑》,咸亨四年(673)立,可知其人任陇州刺史后,又任戎州刺史,咸亨四年死,其主政安西只能在668—671年间。

[3]《通典》卷190《边防六·西戎二·吐蕃》,中华书局本,页5175。

[4]《全唐文》卷228《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方翼)神道碑》,页2303~2304。按杜怀宝曾于仪凤二年至四年间(677—679)随裴行俭出师,任波斯军使,此前已任安西都护,则杜怀宝第一次主安西应是咸亨二年至仪凤四年年间(671—679)。

[5]《资治通鉴》卷201,调露元年,页6391。

筑碎叶镇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西域胡夷竞来观之，因献方物。”[1]

(2)杜怀宝(开耀元年至永淳元年，681—682)：此乃杜怀宝第二次主政安西。“诏公(王方翼)为庭州刺史，以波斯使领金山都护，前使杜怀宝更统安西，镇守碎叶。”[2]以上二都护皆驻节碎叶，说明碎叶曾为安西都护府临时治所。

(四)安西都护返治西州时期，仅历一都护。

李祖隆(永淳二年至垂拱元年，683—685)：“属蕃携贰，安西不宁，都护李君与公(裴沙钵罗)再谋奏拔四镇。”[3]复据《沙州志》鱼泉驿条记：“右唐咸亨四年[沙州]刺史李祖隆奏，奉敕置”，按安西都护往沙州、伊州、肃州刺史调任，此李祖隆任沙州的时间在前引史料中李君任安西都护之前，或即一人。

(五)安西第二次晋级为大都护府时期(垂拱二年至永昌元年，686—689)，共历二大都护：

(1)王果(垂拱二年至垂拱三年，686—687)：“[王]果，垂拱初官至广州都督、安西大都护。”[4]

(2)阎温古(垂拱三年至永昌元年，687—689)：“[垂拱三年十二月]壬辰(688年1月10日)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副之。”[5]“[永昌元年七月]丙子(689年8月16日)……斩副

[1]《册府元龟》卷410《将帅部·壁垒》，页4874。

[2]张说：《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收入《全唐文》卷228，页2303～2304。

[3]《千唐志斋藏志》上《大周故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郎将裴府君(沙)墓志并序》，页674，又收入《唐代墓志汇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大周故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郎将裴府君(沙)墓志并序》，页1304。原文“公讳沙，字钵罗，疏勒人也”，按此名具有浓厚的突厥语色彩，而突厥语中无名、字之分，此人姓裴，当出自疏勒王族，沙钵罗则为突厥语爵号。

[4]《旧唐书》卷56《王雄诞附传》，页2272。又《资治通鉴》，则天后垂拱元年，页6435：“九月，丁卯，广州都督王果讨反獠，平之。”按王果以垂拱元年(685)任广州都督，则主安西时间当为二年(686)。是岁阿史那斛瑟罗统兵收复四镇，再定十姓，王世果必发师与之配合。《新唐书》卷92《王雄诞传·附王世果传》，页3803：“世果，垂拱初，[官]至广州都督，安西大都护。”则王果又作王世果。

[5]《新唐书》卷4《则天纪》，页86。

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1]

（六）安西第二次还原为都护府（永昌元年至长寿元年，689—692），还治西州时期共历二都护：

（1）昝斌（永昌元年至天授元年，689—690）：“大周启祚，定鼎开祥，以公雄略，除右豹韬卫翊郎将，别检校安西都护、检校巂州都督、别敕皇城留守……长寿二年八月一日终于私第，春秋五十有六。”[2]按“大周启祚”乃永昌元年至天授元年事，可知昝斌出任检校安西都护就在这一时限，然其官衔仅乃“右豹韬卫翊府郎将”，品阶不算高，不够大都护品阶，可知此时安西确又降级为都护府。

（2）王孝杰（天授二年至长寿元年，691—692），阿斯塔那230号墓所出《武周天授二年知水人康进感等牒尾及西州仓曹下天山县追送唐建造妻儿邻保牒》[3]，其中前三段内容如下：

[1]牒件状如前。谨牒。

[2]天授二年壹月十一日知水人康进感等牒。

[3]付司。杰示。

在上引文书中签署的“杰”字，必为西州主政长官之名，同墓所出《武周天授二年史孙行感残牒》亦有“杰”的签署。这件文书时间亦在天授二年一月。据李方[4]推断，应即王孝杰，说明他天授二年（691）已升任安西都护，直至长寿元年（692）仍在此官任上。

4.5 定型后的安西大都护府应设治于龟兹国境汉人聚居区的中心

安西大都护府正式还治龟兹及其治所的定型化乃长寿年间王孝杰武威道行军的历史产物。

---

[1]《资治通鉴》卷204，永昌元年（689），页6459。

[2]《唐代墓志汇编》上，《大周绛州稷山县右豹韬卫翊府右郎将昝君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页849～850。

[3]《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文物出版社1994年，页90。

[4]李方：《唐西州长官编年考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页11。

武曌在位时期曾经策划了多次西域反攻,其中最大规模者有两次,一次是永昌元年(689)以宰相兼武周朝第一名将韦待价为主将、安西大都护阎温古为副将,三十六总管多路并出的安息道行军,结果惨败寅识迦河。天授元年(690)武曌正式废唐兴周,自立为大周神皇,又开始策划名为"武威道行军"的大规模军事反攻。这次行军实有两次,最初任命的统帅并非王孝杰而是岑长倩。本计划在天授二年(691)出师,[1]而至当年十月,就已被密告处死,[2]这次反攻实未成行。而至次年(长寿元年,692)又出现了一次武威道行军,但主将王孝杰所领官号并非"武威道行军大总管",而是"武威道行军总管",这两个官号明显不同,说明官阶较统领内地大军的岑长倩低了一级,也许王孝杰原来的身份不过是岑长倩统领下的诸路总管中的一员。此人本是仪凤年间应募中选的"猛士",随刘审礼从征吐蕃被俘,洞悉吐蕃虚实,后被释归。天授二年呰斌已改调检校嶲州都督,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西州都督已由王孝杰接任。岑长倩被杀后,代之承担起武威道行军主将的重任,副将有二,一是最早建议攻取四镇的西州都督唐休璟,[3]另一是西突厥首领阿史那伽利支,即阿史那忠节。[4] 这时,噶尔家族专国吐蕃已历东赞域宋、赞聂多布、钦陵赞婆等三代,所辅幼主器弩悉弄(墀都松,仪凤元年至长安四年在位,679—704)业已成人,在其母没庐·墀玛类的支持下,为亲政扫清道路。吐蕃国中君臣矛盾日益激烈,大相噶尔·钦陵赞婆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5] 利用这一大好形势,"[王]孝杰久在

---

[1]《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五》,页11581:"天授二年五月命文昌右相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讨击吐蕃。"

[2]岑文倩乃唐天宝年间著名边塞诗人岑参伯父,曾佐武曌实现了武周革命,官至夏官尚书,是武周法典《垂拱新格》的制定者之一。至武周朝创立之后,似已出现某些异议。因此,主持武威道行军同年,就遭密告,"冬十月……杀文昌左相岑长倩"。见《旧唐书》卷6《则天本纪》,页122。

[3]《册府元龟》卷405《将帅部·识略四》,页4818:"唐休璟……迁西州都督,上表请复取四镇。则天遣王孝杰破吐蕃,拔四镇,以休璟之谋也。"参阅薛宗正:《两唐书·唐休璟传补阙》,载《史学集刊》,2009年第1期。

[4]参阅薛宗正:《阿史那伽利支官符考释》,载《吐鲁番学研究》,2000年第2期。

[5]参阅薛宗正:《噶尔家族专国与吐蕃的北部领土扩张——兼论唐、蕃间的西域、河源争夺》,载《西藏研究》,1988年第4期;收入薛宗正:《吐蕃王国史的兴衰》,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页48~55。

吐蕃，知其虚实。会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敕以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将兵击吐蕃。（长寿元年，692）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1] 这是武周皇朝存在期间在西域创建的最辉煌武功了。

对此，史书中有几种不同记载，一是长寿元年（692）十月，二是长寿二年（693）十一月。前者见于《新唐书》卷4《则天本纪》：“十月丙戌，武威道行军总管王孝杰败吐蕃，克四镇。”后者见于《唐会要》卷73《安西都护府》：“长寿二年十一月一日，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克复四镇，依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可见长寿元年乃破吐蕃、收四镇之年，而长寿二年则乃重置四镇之年。尚须指出的是，长寿元年武周收复的安西四镇乃焉耆、龟兹、于阗、疏勒，而长寿二年再置的安西四镇名单却是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两相勘较，长寿二年再置四镇时已无焉耆，加碎叶。其中碎叶并非唐军收复，而是碎叶川西地方实力派首领突骑施·乌质勒夺自东突厥，又转还于周。可见这次不世之功的缔造者不仅有汉将王孝杰、唐休璟，西域蓝突厥贵族阿史那忠节，还有西域异姓突厥实力派人物，突骑施首领乌质勒。自此，安西还治龟兹，复为大都护府，自此垂为定制，西州复为西州都督府，归隶于安西大都护府。[2] 自此，安西大都护府的治所开始定型化。吸收显庆年间安西与龟兹王城同治的惨痛历史教训，安西还治龟兹之后，绝不可能再以龟兹王城为府城，必须根据汉、蕃分治的有效国策，在龟兹国境之内另觅新址，重加扩建，成为定型化的安西大都护府和安西节度使、安西道的永久性治所。

那么这个安西大都护府定治新址究竟在哪里呢？曾在库车生活多年的资深文物考古工作者梁志祥最先提出了安西大都护府不应当与龟兹王城同治，而应是设于入唐后汉军驻地及汉族移民聚居区的中心地

---

[1]《资治通鉴》卷205，长寿元年（692），页6488。

[2]参阅薛宗正：《北庭历史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页173～174。

段，具体而言，应在库木吐拉千佛洞以南地区。[1] 千佛洞附近有玉其吐尔、夏克吐尔和库木吐尔，说明这一地区曾是龟兹境内汉军、汉民、汉僧最集中的地区，最宜于安西大都护府治所在此建立。

唐代的龟兹国乃由汉、晋时期的龟兹、温宿、尉头诸国合并而成，领疆西至今阿克苏、温宿诸市、县，而以今库车、新和、沙雅、拜城诸县为其腹心地区。文物普查资料表明，今库车、拜城境内遗址龟兹风都非常明显，说明这里是龟兹人的心脏地区，居民也绝大多数是本地人，应属龟兹都督府的基本势力范围。而库车西境、新和、沙雅一带，属于本地文化色彩的遗址诸如占地1740亩、新和县最大的建筑群——玉奇喀特协海尔古城[2]等皆属汉晋时期的建筑，入唐后，这里却不再是龟兹的中心地带。而这一地区早已有汉军出入，诸如距前述之玉奇喀特协海尔古城不远就是曾出土李崇铜印、“汉归义羌长”铜印的于什格提古城，[3]其北库木吐拉本来也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小乘佛教中心之一，但

---

〔1〕梁志祥《库车县古遗址简介》：“古龟兹地区唯有库木拉千佛洞的唐风较盛，这与其地位有关系，这里可能就是唐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库木吐拉有条件作为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因为渭干河从这里流过，下游为新和和沙雅两县，这一带都是原来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利用河水灌溉较为方便。在这里发现的古城堡比较多，在千佛洞附近有玉其吐尔、夏克吐尔和库木吐尔，如果没有大量唐代军队驻此，是不会有这样多城堡的，所以说，只有安西都护府在此，中原文化对此有强大的影响，才可能产生繁荣的唐文化。据史书记载，唐在龟兹古城驻兵三万多人。这些驻兵及其家属中的佛教徒，可能开凿了石窟。现在看来，一部分石窟是汉族人开凿的，并且是汉族人主持的，因为汉佛教文化洞窟中的发愿文都是汉文，只要是汉风窟，发愿文都是汉文，并且有大量汉僧题记、题名，据统计，现有二十多处可以看清。从汉文题记中可知的寺院名称有金砂寺、大宝寺等。”载《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2〕玉奇喀特协海尔，意即“三重城”，位于新和县城西南17.2公里，距尤鲁都斯巴格乡3.5公里，介于吐尔艾日克和玉其喀物特两村之间，长方形，东西长约1450米，南北宽约800米。有宫城、内城、外城三层，互相环套，内城面积（含宫城）约184亩，长宽各350米。内城之中又建宫城，面积12亩，长宽各为100米、80米。内城东距外城200米，西距外城约800米。内城及外城北部已垦为农田，古城损坏较大。城的建筑中有夯层，说明有汉军协助修建，似始筑于汉代，入晋后，经本地人扩建。此城规模足与库车的皮朗古城相当，却无任何唐代文物发现，据笔者推测，有可能是白纯时代的龟兹王城，入唐后已废弃。

〔3〕位于新和县西南23公里，距大尤都斯乡3公里的荒地上。黄文弼所著《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一书，曾称此为“沙裕勒都司巴克”，或“乌什哈特”古城。形制为大小相套的三重城墙，部分墙基仍然残存。外城墙略呈东西长方形，中城与内城约为方形，偏居于外城东部。内城面积约为2500平方米，墙厚14米；中城墙每边约199米，厚15米左右。1953年初，在此城曾发现过散见的汉代铜钱和“孔雀鸟形”铜印押、“孔雀啄蟾蜍”印押、封牛形印押等。

入唐后,这里的龟兹寺院却逐渐减少,而汉人数量日益增多。考古调查的资料还表明,渭干河西岸至少存在两处重要汉军遗址:一是新和的通古斯巴斯古城,新疆考古研究所张平研究员曾予考定;另一是其东的小央达克古城或羊达克古城,都已发现唐代文物。前者有可能是龟兹军驻所,后者至少也是一座重要屯城。当然渭干河东岸也有汉军驻地遗址,诸如黄文弼考察过的黑太沁古城,亦即张平研究员所说的"唐王城",也是一座汉军屯城。其地理位置却在皮朗古城之南,与渭干河西岸的前述二城基本上处在平行一线。这足以证实北至库木吐拉千佛洞,南至今沙雅,西至今新和县则是汉军、汉民、汉僧相对集中的地区。梁志祥将安西大都护府的新址定在库木吐拉千佛洞以南,所指正是这一地区。有资格在龟兹本地居民的包围之中,独成一域。唐朝选择龟兹境内汉军、汉民、汉僧最大的集中地作为治所新址,完全符合唐朝汉、蕃分治的基本国策。参稽清代接管新疆之后,也是到处兴建满城、汉城,不与回城及一般维吾尔村落相混,这种出于治安和稳定的政治考虑大约古今相通。兼跨渭干河东、西两岸,今库车、新和两县交界之处的玉曲吐尔与夏克吐尔两遗址,亦即西方学术界所称的 Douldour âqour 古建筑群正在其中心地区,最有资格成为安西大都护府治所在地。对此,大谷探险队在库车ドルドルオコル出土的汉文文书中可以找到大量证据。

伯希和所获 Douldour âqour 编号 2 的户籍文书:[1]

[1]……刘宪(?)之、张(?)晖、党拔海

……………………缝……………………

[2]……[王]南山、封思敏、杨崇光、韩二郎

[3]张羊羔、高[女?]、张令(或"念")诠、樊思礼

[4]张金仙(或"山")、董峤儿、马嘉祥、车若见

[5]…………

以上刘宪(?)之、张(?)晖、党拔海、[王]南山、封思敏、杨崇光、韩

---

[1]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 de France,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p. 48.

二郎、张羊羔、高[女?]、张令(或“念”)诠、樊思礼、张金仙(或“山”)、董峤儿、马嘉祥、车若见都是汉人,可见居住在今河西夏合吐尔遗址的居民似以汉人为主。日本大谷文书则证实河东玉曲吐尔也与河西遗址情况相类似,例如1506号文书《人名记录》:[1]

(前欠)

[1]张子愿、张日……

[2]张廷俊、石惨琰

(后欠)

又如1524号文书《人名记录断片》:[2]

[1]安伏清

[2]毛如俊

[3]意……

(后欠)

以上张子愿、张廷俊、毛如俊等也是汉人;安伏清、石惨琰,虽有粟特人姓氏特征,大约也是同西州的户籍资料透露的信息一样,是久已汉化的粟特人。这说明Douldour âqour(ドルドルオコル)城内居民以汉人或汉化粟特人为主。即使城外一座名为西萨波僧厄黎的村子里,也居住着有车有马的汉人崔进达,足以证实Douldour âqour是龟兹境内汉人聚居的中心。其北即库木吐拉千佛洞中发现汉文题词“金砂寺”所在,乃是汉僧大聚集处与僧都统驻锡地。[3] 引人注目的是,大谷探险队还在ドルドルオコル河东遗址(今名玉曲吐尔)出土了1535号文书《唐代佛教徒供养文》,[4]明确记载金砂寺(库木吐拉千佛洞中汉传佛教僧都统驻锡地)供养人姓名就有冯密、石秀、王锡玉、张季(原作李)、田遊歆、吕嵩、独孤三、贺住等,皆为汉人,与本文做出的判断完全相符。作为龟兹境内汉人大聚集地,ドルドルオコル城内还存在着以

[1]小田義久:《大谷文书集成》卷1,法藏馆1989年版,页72。

[2]小田義久:《大谷文书集成》卷2,页45~46。

[3]据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图版《杂品》,学苑出版社1999版,库木吐拉还出土了多枚唐代铜质及木质印章。印章是权力的象征,未必全为僧人之用。

[4]小田義久:《大谷文书集成》卷1,页78。

"社邑[1]"为名的汉人民间组织。吐鲁番出土文书显示,这种组织曾在高昌国城中存在,西州沿袭了这一历史传统,如今又全盘移到安西大都护府治所来,这里如非安西治所,或者仅为柘厥关、白寺城一类的低级建置,断不会出现这类组织。此外,1521号文书原题名《性质不明残片》,纸表有"福"字,纸背有"開"字,也是大批汉人存在于此城的特征。[2]

龟兹乃当地塞人的世居地,本无汉人。虽然历史上两汉都曾统治过龟兹,曾派遣重兵驻屯,及汉祚衰微之后,汉军大都东撤,除返回内地者外,绝大多数聚于碛口高昌,形成了西州汉人聚居区。唐朝汉军再次进入龟兹国境始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唐第三任安西都护郭孝恪就战死于龟兹王城(今皮朗古城),其后,龟兹虽已降唐,羁縻而已,并未派出汉军进驻。

至永徽二年(651)就发生了羯猎颠叛乱。降叛周期不过三年(649—651),8年之后的显庆三年(658)杨胄率军平定了这场叛乱,再度占领龟兹,安西大都护府移治皮朗古城,并置安西四镇守军拱卫四方。自此,龟兹境内始出现汉军进驻。这些驻军必皆出自杨胄旧部,至多其中有一批西州都督府府兵。但这个与龟兹王同治一城的新建安西大都护府仅存在4年(显庆三年至龙朔元年,658—661),至上元二年(675)萧嗣业西征之后,龟兹国始再度降汉,第二次变为唐龟兹都督府。降叛周期长达13年(662—675)。随着龟兹王城的失陷、杨胄的战殁,驻于龟兹王城及其附近的汉军必全部被歼,龟兹境内仅有一支汉军(很可能就是安西四镇中的"龟兹军",亦必出自杨胄旧部)犹以拨换城为据点,为唐苦守。至咸亨元年(670)这支汉军也被迫撤离或者全部被歼。龟兹境内已无汉军踪影。直至如意元年(692)王孝杰再次占领龟兹,光复四镇。可见大批汉军真正进驻龟兹,有效地控制全境,实非始于李唐显庆三年,而是始于武周长寿二年(693),而光复四镇的武

[1]小田義久:《大谷文书集成》卷1,页76~77。

[2]小田義久:《大谷文书集成》卷1,页75。

威道行军主帅王孝杰，本武周所委安西都护，所率武威道行军的主力就是西州都督府兵，易言之，基本上都由西州世居汉人组成。这种情况基本上维持至安史之乱以后。这就是为什么龟兹出土诸屯文书同西州文书具有极大相似性的原因所在。

同理，入唐之前，龟兹国境基本上没有汉民，大批汉民进入龟兹，参加诸屯农垦、职田佃人，实际上都源自武周长寿二年安西大都护府定治龟兹，四镇再置之后，以汉民的基本构成而言，也应当大都是自西州狭乡徙居龟兹宽乡的结果。

以上推理可由驻节西州的原安西都护府接管的高昌国旧档及安西都护府（注意：非安西大都护府）文书莫名其妙地在库车 Douldour âqour 遗址的出现得到合理的解释。

例证 1：Douldour âqour 所出两件 441 年的《功曹条任或改动行水官文书》。[1] 这些文书本属高昌国时代，重又在龟兹国境出土实在莫明其妙。功曹是主管人事的重要衙署，设有功曹的单位至少为州级以上，则又说明该遗址绝非简单的佛寺，而是重要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推其根由，应是唐朝初置西州、安西都护府时期接管高昌国的旧档，安西大都护府是安西都护府的升级，然而显庆年间安西大都护府初治于皮朗古城时，这些旧档皆未随迁，仍留西州故地，至安西大都护府定型后，始随迁新址。以此判断，这些高昌国时期的归档出现在 Douldour âqour 遗址，必是安西大都护府定治于此所接受的安西都护府全部档案的一部分，则安西大都护府官署必在 Douldour âqour 无疑。

例证 2：Douldour âqour 遗址中还发现了天授二年至如意元年《西州高昌县诸堰头等申青苗亩数佃人牒》残片 37 件。这些文书明显是西州文书，却在龟兹的 Douldour âqour 遗址中出现，天授二年正是王孝杰在西州出任安西都护任上。如意元年亦即王孝杰出任武威道行军总

---

〔1〕张广达：《典籍、文书与西北史地——张广达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张广达师系统地研究了这些文书，而将这些官府文书解释为当地存在“龟兹都督府辖下的世俗行政机构所在的官舍”，笔者则认为龟兹都督府乃羁縻建置，重在管理当地龟兹人，而不是管理汉人，汉人的管理应当别有系统，别属于安西大都护府以及安西道的长官安西节度使的衙署的职能范围。

管,再置安西四镇,安西升级为大都护府,定治龟兹新址之年。则以上文书再次出土于 Douldour âqour ,必是安西大都护府定治新址之年,是原在西州的安西都护府西徙龟兹安西大都护府的历史产物。由此又可印证,安西大都护府定治豆勒豆尔奥库尔遗址就是王孝杰亲自选址扩建的成果。

至于龟兹汉僧的来源较为复杂,他们大都来自中原,乃至来自东、西两京,或是北都太原,很少与西州相干。但这些信奉大乘佛教的汉僧大批西来,也是始于长寿二年安西大都护府定治龟兹新治之后。易言之,始于武周革命之后,而不是之前。正式以朝廷名义全面推行佛教,实肇始自武周革命,《佛祖历代通载》卷 12 明确记载:“天后废为庐陵王。幽于房州。天后临朝称制……明年(载初元年)七月沙门十辈诣阙上《大云经》。盛称则天当即宸极。则天大悦。赐十沙门紫方袍银龟袋。颁经于天下郡国。各建大云寺。九月则天革唐命改国号周。自称圣神皇帝。”重用洛阳白马寺僧薛怀义、魏国东寺僧法明、佛授记寺僧行感等利用佛教经典《大云》《宝雨》诸经中女主临朝的预言,为女皇登基、废唐兴周的改朝换代大造舆论。自此出现了一批以白马寺、魏国东寺、佛授记寺等三寺为核心的政治僧人,并随着全国各州普建大云寺而强力推行至西域,在此期间,不仅伊、西、庭三州,而且远至碎叶,都已兴建了大云寺,这批政治僧人随即进入西域。[1] 天册万岁元年(695)薛怀义被杀之后,武曌又改宗华严,自此,华严宗崛起。唐朝复辟后,中宗动用朝廷政治权力,全面推行以华严宗为主体的大乘佛教,下令全国各州,大云寺皆更名龙兴寺,前来西域弘扬汉传佛教的僧人越来越多,其中显然不乏政治僧人,他们既是汉传大乘佛教的弘扬者,又是协助朝廷稳定西域的政治助手。库木吐拉千佛洞的汉文题字表明,总管西域的最高僧官“僧都统”就是由朝廷钦命,派来常驻库木吐拉。龟兹汉传佛教自此大盛。这一政治自武曌、龙兴帝李显、明皇李隆基一脉传承。

---

〔1〕详见薛宗正:《〈大云经疏〉的编撰与废弃——兼论唐、周易代时期的佛学思潮》,增勤主编:《首届长安佛教国际佛教研讨会论文集》第 3 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页 266 ~ 287。

区别仅在于武周朝所崇奉的经典是《大云经》,而自唐朝复辟之后,汉传大乘佛教所崇奉的基本经典已变为《华严经》,至明皇盛世,由于李隆基亲加奖掖,《金刚经》又开始在西域流行。以下保存在《册府元龟》的有关记录反映了这一盛况:

中宗神龙元年二月,制天下诸州各置寺、观一所,咸以大唐中兴为名。

[开元]二十三年九月,亲注《金刚经》及《修义诀》,中书令张九龄等上言:"臣等伏御作前件经及义诀,佛法宗旨,撮在此经,人间传习,多所未悟。陛下曲垂圣意,敷演微言,幽阐妙键,豁然洞达。虽臣等愚昧,本自难晓,伏览睿旨,亦既发明。是知日月既出,天下普照,诚在此也。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道,已广度其僧,又不违其愿,三教并列,万姓知归。伏望降出御文,内外传授。"……许之。

[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丁酉,制曰:"道释二门,皆为圣教,义归弘济,理在尊崇。其天下观、寺大小,各度一十七人,简检择灼然有经业戒行,为乡间所推,仍先取年高者。"

[开元]二十七年二月,制天下观、寺,每于斋日,宜转读经典,惩恶劝善,以阐文教。[1]

正是在唐朝以政治权威,先后强力推行以《大云经》《华严经》《金刚经》为主奉经典的汉传大乘佛教,以龟兹为中心、以汉人信徒为主要群众基础的汉传大乘佛教在龟兹的统治地位得到空前巩固。至明皇临朝,大弘佛法,汉僧西来,并出任总管西域佛法的僧都统驻锡库木吐拉,进入了它的鼎盛期。

凡此种种,更资证实,唐代龟兹汉人聚居区的形成实乃始于武周革命之后,更确切地说乃武周长寿二年安西大都护府定治龟兹新址之后,这一新址应即豆勒豆尔奥库尔古建筑群。因为其地望正在这一龟兹汉人聚居区的中心。

[1]《册府元龟》卷51《帝王部·崇释氏一》,页574~575。

此外,将豆勒豆尔奥库尔古建筑群定为安西大都护府城,还可以从下图所示中得到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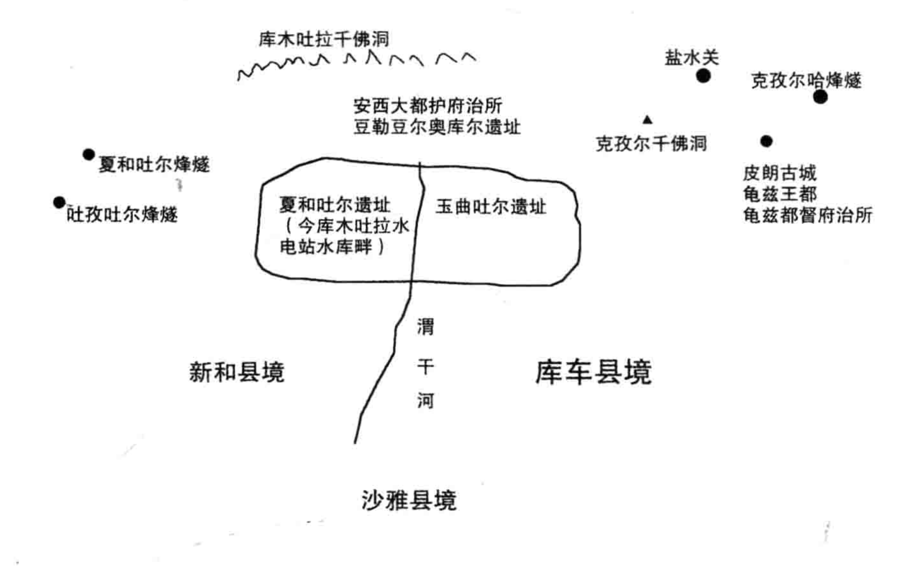


图 2-4-7　安西大都护府及其周围卫星戍堡

参稽目前已经发现的唐代文物遗址,认为渭干河西岸遗址群是唐王朝安西都护府主力部队驻守、屯田、防御的军事体系,是一处大型军事基地遗址群。遗址群大体由丝绸之路烽燧线遗址(9 处烽燧遗址)、军事基地烽燧线遗址(8 处烽燧遗址,沙雅境内 2 处)、军事基地遗址(22 处古城、戍堡等,沙雅境内 3 处)构成。军事基地遗址由较大的 5 处古城和周边的小城及戍堡等遗址群构成,大体可分 4 部分,东北部:以托普古城为主的城堡遗址群,北部:以尤尔滚协海尔古城为主的城堡遗址群,南部:以通古斯巴西古城为主的城堡遗址群,东南部:以托浦敦古城为主的城堡遗址群。[1]

综上所述,跨有渭干河东、西两岸,兼跨今库车、新和二县的豆勒豆尔奥库尔遗址位于龟兹国境汉军、汉民、汉僧聚居区的中心地带,唐朝安西大都护府治所不置于龟兹王都或龟兹都督府以东,而是在其以西,

〔1〕参阅邢春林:《渭干河西遗址》,2008 年龟兹学术讨论会参会论文。

是良费苦心的。唐朝对龟兹仅为羁縻统治,吸收历次龟兹叛乱的教训,不可能重蹈郭孝恪、杨胄覆辙。汉人与龟兹人族属不同,语言不同,信奉的佛教教派也不同,差别就是矛盾,不可能对这一位居西域中心的属国毫无防范。则定型化的安西大都护府与安西节度使所在地不可能仍在皮朗古城,与龟兹都督府城中大量龟兹居民混处一起。参稽清代西域管理奉行的政策,清军所到之处,都兴建满城、汉城,与当地回城分城而治,满、汉、回(指维吾尔族)各从其俗,各居其城,互不杂处。深悬西域腹地的安西大都护府为自身安危,也必如此。

伯希和所说的豆勒豆尔奥库尔遗址,包括今新和县之夏和库尔和库车县的玉曲库尔,地在皮朗古城,即龟兹王城之西,拨换城之东,便于监控龟兹王与疏勒王、于阗王之间的交往,四方有毗沙军、疏勒军、拨换军的拱卫。这一带是龟兹国境中汉人最多的地区,北有库木吐拉千佛洞、阿艾千佛洞等汉传佛教繁盛地区,且有若干汉军屯驻的城堡掩护,其中龟兹军的驻地应当就在其西南的通古斯巴斯,其西还有一系列烽燧、戍堡与之相连,足以巩固安西的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伯希和称为 Douldour âqour 古建筑群应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汉人聚居区的中心,没有任何遗址能取代它的地位。以此为安西大都护府治所,理所当然。

4.6 出土文书证实豆勒豆尔奥库尔遗址即唐之明府城

豆勒豆尔奥库尔(Douldour âqour、ドルドルオコル)东、西二城出土的龟兹汉文文书,包括池田温、张广达二先生 2000 年公布的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抄本部所藏 Douldour âqour 249 件汉文文书和ドルドルオコル出土的日本大谷文书,两相补充,足以确证 Douldour âqour 遗址(库车ドルドルオコル遗址)绝非普通遗址,而是唐朝在龟兹地区最高军政机构——安西大都护府或安西四镇节度使的驻地。

证据 1:安西大都护府直属地区的民户,多为汉人,伯希和在豆勒豆尔奥库尔(明府城)中所获 249 件文书中,提到许多汉人民户的名

字,如2号文书中的刘宪(?)之、张(?)晖、党拔海、王南山、封志敏、杨崇光、韩二郎、张羊羔、张令(或"念")诠、樊思礼、张金仙(或"山")、董峤儿、马嘉祥、车若见,11号文书有开府张志励,12号文书第一行有□□兴、刘天奴,第二行有"南萨波村税丁张小诠,西萨波村孙光朝",13号文书有何仙来,38号文书有陈希俊,39号文书有白□□、胡进卿、张超俊、目元曜,43号文书有四娘,47号文书有行客梁俊,51号文书有张志,52号文书有判官苟怀智,55号文书有火长李仁发,57号文书有游弈官张彦祥,58号文书有行客营、队头贺严光下五十人,贾庭璋、吴陵进、赵□□,62号文书有高乾,63号文书有杨光樊,64号文书有张知全、郭游礼、卫山刚、杜望夏、杨游止、孙宪芝,76号文书有左奔儿,79号文书记上柱国李嘉祥,84号文书有赵承福,86号文书有行客刘怀义、张山石及受雇人朱俊,87号文书有雷可宾、任昭都、任延喜、弋仙宾、张仵神、奚希俊、□好仪、承希芝、王奉期,90号文书有葛清,94号文书有钱景璋、保人梁大名,96号文书有□三郎,107号文书有裴仙、李俊、曹舍利、温临帖、吴朝、安失发、张俊、张随军、米恒、李俊、张自励。皆详见于张广达、池田温共同整理的伯希和在豆勒豆尔奥库尔遗址发现,今藏于巴黎法兰西国家图书馆的汉文文书,题名为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说明这些汉人(其中包括屯田军户、助屯民户、税丁、行客、作人、军人等不同身份)都直辖于安西大都护府所在的今新和县境内,自成一域。从命名习惯上判断,必定是随同安西大都护府定治龟兹,从安西旧治迁入龟兹境内的西州世居汉人。此外,据《唐大诏令集》卷82载开元十二年(724)四月《减抵罪人决杖法诏》云:"自今以后抵罪人,合决敕杖者,并宜宽,决杖六十,一房家口,移隶碛西。"这些移隶碛西的刑徒及其家口必然由当地官府直接管理。

安西大都护府直辖地区的汉人民户,除绝大多数为农民之外,还有不少作人,即手工业者,《水经注》卷2北河条引《释氏西域记》云:

> 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

故郭义恭《广志》云:"龟兹能铸冶。"在1999年发现的阿艾石窟周

围，分布有阿艾古城及可可沙依等四处冶铁、炼铜遗址，石窟内书有榜题，多为汉人名，有裴、赵、彭、梁、李、白、申、傅、寇等姓氏，有的名前还冠有"行官"字样，显为唐代汉人所开石窟。这些汉姓人氏很有可能就是当地冶炼遗址上的工匠，"行官"则为唐安西都护府的行官。[1]

唐代的龟兹既是安西大都护府驻节地，龟兹镇守军的屯戍地，又是龟兹都督府的世袭领地，唐朝治理这一地区的基本原则是实行汉、蕃分治，各行其制。以地域分，大体可以确定今库车、拜城、沙雅以及今温宿县、阿克苏市等地，基本上属于龟兹世居族群的集中地，库车县西境至今新和县境，则是汉民、汉军，以及编入民户的当地世居农民。此外，还有许多散居于龟兹都督府直属领疆的汉军、汉民、汉僧，他们似乎也直隶于安西大都护府治理。

证据 2：大量高级官员云集于此，诸如"都护""节度副使行军司马秘书监""银青光禄大夫""镇使""兵马使"等。Douldour âqour 文书 135 虽为残片，仅存一行，内容却是"谨［都护九郎？］阁下"，[2]明明是一封致都护的信件。注意，这位都护并非"大都护"或"副大都护"，所领官衔必是安西都护。据笔者判断，必是杨志烈任河已西副元帅，实行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防，朱某或尔朱某主政安西时期的历史遗存。又如，Douldour âqour 文书 134 第 4 行出现了"摄副使行军司马秘书少监薛□□"，[3]按行军司马之官仅能在大都护府或都护府衙署存在，官职很高，则这位身兼摄副使行军司马秘书少监的薛某人，所领主官衔必为安西节度副使。亦即末任安西节度使郭昕的副长官，其官阶竟与于阗王相埒。Douldour âqour 文书 109 页 1 有"五日申时都□……"，[4]所空之字应为"都护"，页 2 第一行为"银青光禄大夫"，[5]按银青光禄大夫官仅亚于金紫光禄大夫，安西节度府衙之内多由都护或大都护、副

---

〔1〕参见霍旭初：《敦煌佛教艺术的西传——从新发现的阿艾石窟谈起》，载《敦煌研究》，2002 年第 1 期。

〔2〕Fonds Pelliotdela Bibliothèquenationalde France, *Lesmanuscritschinoisde Koutcha*, p. 112.

〔3〕Fonds Pelliotdela Bibliothèquenationalde France, *Lesmanuscritschinoisde Koutcha*, p. 111.

〔4〕Fonds Pelliotdela Bibliothèquenationalde France, *Lesmanuscritschinoisde Koutcha*, p. 96.

〔5〕Fonds Pelliotdela Bibliothèquenationalde France, *Lesmanuscritschinoisde Koutcha*, p. 97.

大都护、节度使或节度副使兼任,领此衔者,始可主持与外蕃的外交事务。第三行池田温先生、张广达师原释文为“锁(或镇)、戍”,据笔者判断,所疑者似应是主字,即“镇、戍”。此文书三行残文缀合后,可以得出此时之安西都护曾兼领银青光禄大夫,主持外交,并领辖安西境内的镇、戍,笔者疑这些文书的时代也是三道联防时期。“镇使”官阶也很高。唐朝的“镇”有二:一是镇守军的简称,诸如安西四镇中的龟兹镇守军,简称龟兹军,主军长官全称为镇守军使,简称为镇使;二是低于守捉使的镇,长官称镇将,不称镇使,则此镇使必指安西四镇守军的长官。见于 Douldour âqour 文书 8:[1]

[1]…………□得举

[2]……镇使滥隈处置

[3]负一物已上仰牒到一月内百方[2]

[4]尽难徵镇使、副使

又如 Douldour âqour 文书 30:[3]

[1]……诸镇散下

[2]……十管内军镇

[3]……立功效斩获

[4]……万人以上并

[5]……检开元十(?)

安西大都护府或安西四镇节度使下辖仅有四镇守军(简称安西四镇),如此高级的官府文书也必须送达豆勒豆尔奥库尔,后一文书中更明确斩获万人以上的战功也须上报于此,足以说明这一建筑群规格非凡。

“兵马使”官名应指阶在安西十将之上,仅亚于安西四镇节度使的安西四镇兵马使。见于 Douldour âqour 文书 18:[4]

---

[1] Fonds Pelliotdela Bibliothèquenationalde France, *Lesmanuscritschinoisde Koutcha*, p. 52.

[2] “方”为池田温先生与张广达师的解读,笔者查阅了图谱中的原文笔迹,疑“方”为“万”。

[3] Fonds Pelliotdela Bibliothèquenationalde France, *Lesmanuscritschinoisde Koutcha*, p. 62.

[4] Fonds Pelliotdela Bibliothèquenationalde France, *Lesmanuscritschinoisde Koutcha*, p. 56.

[1]下张希研一人,[史?]兵马[使?]程

[2]依责得五将 状

[3]……件如前,请处分

[4]牒

[5]月 日判官郎将 王庭(或应?)諲牒

此处出现了"五将"字样,安西有十将,即十位领有"将军"官衔的官员,此"五将"必为安西十将之半,皆隶于兵马使,可惜这位"兵马使"字迹欠清晰,导致文书的解读者池田温先生、张广达师两位大家皆拿不定主意。大谷文书中的8074号文书《安西(龟兹)差科簿》[1]却恰好为其补充:

(前欠)

[1]张遊艺、窦常清

[2]六人锄苜蓿

[3]吴兵马使两园家人拓羯、来富、拔勿烂、苏达、素石、奴鹞子

[4]三人花林园役

[5]白支陁羡宁□□磨大斯、妞曲充裕、作人俱满提

[6]廿人单贫老弱不济

[7]王子芝……田叔良、贵奴、任□□

[8]□□……

[9]□玉琳、□義、阿師奴、□□名失離□

[10]元金刚、□□俊、安拂延、李廷俊□

[11]百七十口人……

(后欠)

该文书被日本人定为《安西(龟兹)差科簿》肯定有误。唐代官员俸禄不由政府支拨,而是各食职田,安西将领每位士兵,包括步兵都有私马二匹,以此判断,该文书实为《安西(龟兹)职田文书》。职田属于

[1]小田義久:《大谷文书集成》卷3,法藏馆2004年版,页228。

吴兵马使所有,下有张遊艺、窦常清等六人锄苜蓿,供养其马匹,拓羯、来富、拔勿烂等则是吴兵马使的"两园家人",即具有奴隶身份的人,其中包括曾经拥有"粟特勇士"称号的"拓羯",唐朝并未根绝奴隶、人口买卖,虽然汉人官吏不能像突厥人一样可以在战争中自由掠获人口作为战利品,但却可以在市场上购买突厥人掠得的人口为其家奴。在吴兵马使职田中服役者还有龟兹本地人白支陁羡宁,以及作人(手工匠人)俱满提。吴兵马使的显赫地位由此可知。兵马使乃安西大都护府中官品最高的官员之一,全称实为安西兵马使,位仅次于安西大都护,而在"安西十将"之上。高仙芝就曾在蒙灵詧任安西大都护(安西节度使)时期任安西(都知)兵马使,其后先后接任此职者又有李嗣业、段秀实等人,皆安西名将。Douldour âqour 城中出现吴姓安西兵马使的职田文书,足以说明此城规格非凡。

豆勒豆尔奥库尔遗址曾为唐代重要军事中心,还可在 Douldour âqour 文书 1 的第二纸中得到证实,这件文书中提到守捉级中层军事建置:[1]

[1]□□营賸{剩}请粮事[二屯?]□……

[2][得?]守[捉]状为供诸军□

[3]中间共有三百八十……

[4]案一□□从开九二[月]……

[5]伊利等屯准□欠[课]……

[6]……营□……

日本大谷 1520 号文书中更明确记载了城中还有军事衙署,有权发放铠甲:[2]

(前欠)

[1]∪□甲一百……

[2]三十(合体字)六领铠子甲三百廿日……

---

[1]Fonds Pelliotdela Bibliothèquenationalde France, *Lesmanuscritschinoisde Koutcha*, p. 48.

[2]小田義久:《大谷文书集成》卷 1,页 75。

(后欠)

纸背:

(前欠)

[1]\∪一百三十(合体字)九口……

[2]六十三口……("三"旁有朱点)

(后欠)

这件残文书正面虽只两行,却提到发放了136副铠甲,发放机关必是级别很高的军事建置,纸背虽然也只两行,所记受领铠甲的人数却达139口与63口,可见城中军事建置的级别不会低于"军",甚至更高,必定是唐朝治理西域的最高军事建置的治所。

证据3:各种性质的高级官府文书,包括安西直接向朝廷报捷的文书齐集于此,更资证实此城规格高于西域群城。证据更多,诸如朝廷高官文书出土于此城。又如 Douldour âqour 文书10缺残殊甚,仅有两行文字,[1]却出现了边疆地区罕见的朝廷高官、宰相级的官衔:

[1]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士(?国)公……

[2]尚书右丞相开国(或"阙")……

又如 Douldour âqour 文书114,[2]出现了凉州与朔方军这两个与安西平级军府和豆勒豆尔奥库尔直接文书来往的证据,内容是这两大节度府皆向安西输送钢材,却不送别处,直送此城。

[1]钢壹阡斤行纲凉州明威镇兵曹凤祥　典龙

[2]得凉州牒称朔方军兴(晨)

[3]……钢□……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豆勒豆尔奥库尔城中衙署还有直接奏报朝廷战争大捷的权力。Douldour âqour 文书28、29内容就是这一性质。如 Douldour âqour 文书28:[3]

[1]搴旗斩将(或"得")

---

[1]Fonds Pelliotdela Bibliothèquenationalde France, *Lesmanuscritschinoisde Koutcha*, p.53.

[2]Fonds Pelliotdela Bibliothèquenationalde France, *Lesmanuscritschinoisde Koutcha*, p.99.

[3]Fonds Pelliotdela Bibliothèquenationalde France, *Lesmanuscritschinoisde Koutcha*, p.61.

[2]不解[金]……

Douldour âqour 文书 29:[1]

[1]仍留锐兵助守荒

[2]……凯旋拓境数千经途

[3]胡俗所未宾莫不

[4]……西海长清

问题是文书中反映的这次深入中亚腹地,拓境凯旋,导致“西海长清”的重大战役究竟何指呢? 可能发生的时间只有以下两年:一是开元三年(715)阿史那献、张孝嵩主持的定远道行军,此役安西、北庭两道并出,会师拔汗那西、米国附近的铁门关。然始胜终败。[2] 二是天宝九载(750)高仙芝、王正见再次两道并出,安西兵攻破石国,北庭兵攻陷碎叶,回师献捷。结果招致次岁怛逻斯之战,[3]对手都是大食。这种直奏朝廷的文书只能发自安西大都护府城。

证据4:豆勒豆尔奥库尔(Douldour âqour、ドルドルオコル)城中还是唐朝治理西域的最高行政建置的所在地。城中有坊,明显是州以上建置,重大祭祀活动,都在城中进行,城外散布诸屯,水渠纵横,有陶拓使、陶拓所、堰头等主水官员,以保证府城及诸屯的粮食供应。豆勒豆尔奥库尔城内至少存在着和众、怀柔、安仁等三个坊级建置。后者见于Douldour âqour 文书 93:[4]

[1]怀柔坊樣(?)丁安拂勒资钱壹阡伍佰文今分付

[2]安仁坊防禦人张嘉兴裴大娘领

---

[1]Fonds Pelliotdela Bibliothèquenationalde France, *Lesmanuscritschinoisde Koutcha*, p. 61.

[2]参阅薛宗正:《碛西节度使的置废——兼论开元年间唐朝对突骑施、大食政策的推移》,载《历史研究》,1993 年第 6 期。收入薛宗正:《中亚内陆与大唐帝国》,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页 400 ~ 433。最新研究成果见薛宗正:《北庭历史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7、第 8 卷碛西节度使治下的北庭,页 255 ~ 399。

[3]薛宗正:《怛逻斯之战的历史溯源——唐与大食百年关系述略(651—751)》,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 年第 4 期。最新研究成果见薛宗正:《北庭历史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5 月第 1 版,《唐与大食决战怛逻斯》,页 309 ~ 321。

[4]Fonds Pelliotdela Bibliothèquenationalde France, *Lesmanuscritschinoisde Koutcha*, p. 88.

前者见于大谷1512号文书《和众坊等文断片》:[1]

(前欠)

[1]∪和众坊东東来四日坊上名

(后欠)

此一文书残片虽然只有短短一行,却保存着"和众坊"这一重要坊级行政建置。唐朝大城之中多实行坊墙制度,即大城中有小城,每一坊实即一小城,各有坊墙,不同的人居地各在不同的坊,"和众坊"顾名思义是一个单独的汉人聚居区。如果是当地族群,多使用"慕义坊""归化坊"等坊名。有坊的城,绝不会低于州级以上,而安西大都护府治下无汉人聚居的州,只有龟兹都督府下辖的羁縻州,在那里又不会存在"坊"的建置,则该文书的出土地,必为安西大都护府城无疑。安西大都护府虽与北庭大都护府属于平级单位,然自安西、北庭东西分治以来,推行的管理制度迥然不同。北庭大都护府辖境汉人聚居区众多,因此基本上可以完全贯彻执行同内地类似的州、县、乡(坊)三级管理制度,下辖伊、西、庭三州,州下有县,县下城、镇中有坊,农村有乡。安西大都护府下属汉人民户远不如北庭三州众多,仅在安西大都护府直属的今新和县境存在着一大批汉人农民、作人、税丁,因此,无州、县级单位,仅在明府城,即安西大都护府管辖下,存在着坊、村、屯等基层单位,坊乃城区单位,"在邑居者为坊"。见 Douldour âqour 文书134:

[1]支度　　帖追官

[2]和众坊正曹德德

[3]右仰追过二月廿四日帖

[4]摄副使行军司马秘书少监薛□□

以上文书中曹德德所领职务就是坊正。坊有"怀柔坊"[2]"安仁坊"[3]"和众坊"[4]等,吐鲁番出土文书《唐某人与十郎书牍》中有云:

[1]小田義久:《大谷文书集成》卷1,页74。

[2]D. A93号,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页88。

[3]D. A93号,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页88。

[4]D. A134号,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页133。又见小田義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一),页74。

"当城置城主四,城局两人,坊正、里正、横催等在城有卅余人,十羊九牧……"[1]文书中"城局"列于城主之下,坊正、里正之上,可见唐代城局已演变为一吏职名。据D. A90号文书,城局似负责"修浚"事务。坊内又有"防御人""虞候"等职名,村有"东王子村"[2]"西王子村"[3]"南萨波村"[4]"西萨波村"[5]"僧厄黎村"[6]"伊禄梅村"[7]"双渠村"[8]等。村名俱见于库车汉文文书,其中绝大多数发现于明府城。这是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存在的重大差别之一。

证据5:在这一遗址中还出现了官府主持的祭祀文书,即大谷编号为1523号《性质不明文书》:[9]

[1]∪若曰一……

[2]∪□祭文□……

[3]例斋祭□……

[4]日

(后欠)

观其内容,实应命名为《官府祭祀文书》。"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在古代,祭祀往往与战争相伴,主持祭祀乃朝廷大事,在西域,有权主持祭祀者只能是安西节度使或安西大都护,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代表朝廷与上天直接对话。Douldour âqour城中出土了出师前的祭祀文书,足以说明这里是唐朝在西域最高行政建置衙署所在。由此可见,Doul-

[1]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9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页140。

[2]见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史料》(16),东京:国华社1915年。小田義久:《大谷文书の研究》,图版第2页。小田義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三),京都:法藏馆2003年,页223,图版一九。

[3]D. A95号,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页89。又见大谷文书8062号。

[4]D. A12号,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页54。

[5]D. A12号,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页54。又见小田義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一),页74。

[6]小田義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一),页74。

[7]D. A121号,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页103。

[8]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史料类)(10),小田義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三),页219,图版四五。

[9]小田義久:《大谷文书集成》卷1,页75。

dour âqour 古建筑遗存既是唐朝在西域最高军事机构所在,又是唐朝在西域最高行政建置所在,只有安西大都护府或安西节度使才符合这一唐朝治理西域的军政合一机构的条件。

证据6:安西大都护府管辖下的民户,包括汉人民户与汉化粟特人民户,都编入户籍,造册计账,其制一如内地。如伯希和所获 Douldour âqour 编号2的户籍文书:[1]

[1]……刘宪(?)之、张(?)晖、党拔海

……………………缝……………………

[2]……[王]南山、封思敏、杨崇光、韩二郎

[3]张羊羔、高[女?]、张令(或"念")诠、樊思礼

[4]张金仙(或"山")、董峤儿、马嘉祥、车若见

[5]…………

以上刘宪(?)之、张(?)晖、党拔海、王南山、封思敏、杨崇光、韩二郎、张羊羔、高[女?]、张令(或"念")诠、樊思礼、张金仙(或"山")、董峤儿、马嘉祥、车若见都是汉人,可见居住在今河西夏合吐尔遗址的居民似以汉人为主。日本大谷文书则证实河东玉曲吐尔也与河西遗址情况相类似,例如1506号文书《人名记录》:[2]

(前欠)

[1]张子愿、张日……

[2]张廷俊、石惨琰

(后欠)

又如1524号文书《人名记录断片》:[3]

[1]安伏清

[2]毛如俊

[3]意……

(后欠)

---

[1]Fonds Pelliotdela Bibliothèquenationalde France, *Lesmanuscritschinoisde Koutcha*, p. 48.

[2]小田義久:《大谷文书集成》卷1,法藏馆1989年版,页72。

[3]小田義久:《大谷文书集成》卷1,页45~46。

以上张子愿、张廷俊、毛如俊等也是汉人;安伏清、石惨琰,虽有粟特人姓氏特征,大约也是同西州的户籍资料透露的信息一样,是久已汉化的粟特人。这说明 Douldour âqour(ドルドルオコル)城内居民以汉人或汉化粟特人为主。即使城外一座名为西萨波僧厄黎的村子里,也居住着有车有马的汉人崔进达,足以证实 Douldour âqour 是龟兹境内汉人聚居的中心。其北金砂寺,即库木吐喇千佛洞中发现汉文题词"金砂寺"所在,乃是汉僧大聚集处与僧都统驻锡地。[1] 引人注目的是,大谷探险队还在ドルドルオコル河东遗址(今名玉曲吐尔)出土了1535号文书《唐代佛教徒供养文》,[2]明确记载金砂寺(库木吐喇千佛洞中汉传佛教僧都统驻锡地)供养人姓名就有冯密、石秀、王锡玉、张季(原作李)、田遊歆、吕嵩、独孤三、贺住等,皆为汉人,与本文做出的判断完全相符。作为龟兹境内汉人大聚集地,ドルドルオコル城内还存在着以"社邑[3]"为名的汉人民间组织。吐鲁番出土文书显示,这种组织曾在高昌国城中存在,西州沿袭了这一历史传统,如今又全盘移到安西大都护府治所来,这里如非安西治所,或者仅为柘厥关、白寺城一类的低级建制,断不会出现这类组织。此外,1521号文书原题名《性质不明残片》,纸表有"福"字,纸背有"開"字,也是大批汉人存在于此城的特征。[4]

证据7:旅顺博物馆藏编号为20·1609的《唐建中五年(784)孔目司帖及抄》为1903年4月日本大谷探险队与当地民工在克孜尔谷北断崖上洞窟所得,文书2~5行且有朱印三方,印文有字3行:"安西大都护府之印"。[5] 无疑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治下。对此,张广达师以及孙继民、冻国栋、陈国灿、刘安志诸先生都已有了深入研究,本文主要引

---

[1]据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图版《杂品》,学苑出版社1999版,库木吐喇还出土了多枚唐代铜质及木质印章。印章是权力的象征,未必全为僧人之用。

[2]小田義久:《大谷文书集成》卷1,页78。

[3]小田義久:《大谷文书集成》卷1,页76~77。

[4]小田義久:《大谷文书集成》卷1,页75。

[5]彩印图版见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西域研究会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物研究文集》古文书彩版。录文又见于《新疆文物》连载之《旅顺博物馆藏大谷文书》。

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其下有行官多人,兼领行田、信使、传令、送行、押马、参预军兵部署之责。[1] 大谷1508与1538号两件文书是可以上下缀合的唐安西官府事目历,[2]其第3行有"某某状为请宴设蒲桃酒价直事"一目。"宴设"一词,又见于敦煌吐鲁番文书,唐朝前期的沙州称"宴设厨",[3]归义军时期则称"宴设司",其职责主要是招待来往客人饮食,[4]而且均在军、州一级才有设置。[5] 龟兹出现了"宴设"字样,说明这是安西大都护府才具有的高级接待机构。更足以证实,明府城亦即定型后的安西大都护府治所。

证据8:龟兹境内的城堡肯定很多,已知考古遗迹中就不下数十座,仅在新和、库车两县发现的较大唐城废墟也不下六七座。依理这些城堡都应称为城,但在法兰西国家图书馆公布的 Douldour âqour 或日本在ドルドルオコル出土的大谷文书中,"城"仅出现一处,即明府城。见 Douldour âqour 文书4:[6]

[1]……□伽[梨]……

[2]人白苏鸡,年卌一

---

〔1〕孙继民:《唐西州张无价及其相关文书》,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9、10合期,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1988年,页87;冻国栋:《旅顺博物馆藏〈唐建中五年(784)孔目司帖〉管见》,页135。

〔2〕刘安志:《库车出土唐安西官府事目历考释》,页87。以下所引《事目历》,俱出自该文,不另注。

〔3〕2626、2862号文书背面《唐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牒》第81行记有"宴设厨"三字,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页475。

〔4〕刘俊文、牛来颖:《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宴设司》,载砺波护主编:《中国中世纪的文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0年,页643~660。

〔5〕《册府元龟》卷42《帝王部·仁慈》载开元十一年(723)十一月诏云:"自今以后,非祠祭所须,更不得进献牛马驴肉;其王公已下,及天下诸州、诸军宴设及监牧,皆不得辄有杀害。"(第1册,第479页)由此可知,宴设仅限于诸州、诸军一级才有设置。敦煌莫高窟北区47窟新出的《军宴设公廨捉钱帐》中便记有"军宴设本一百廿四千二百六十",此"军宴设"当为沙州豆卢军之宴设机构。参见陈国灿:《莫高窟北区47窟新出唐贷钱折粮帐的性质》,收入陈氏著《敦煌学史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230~243。

〔6〕*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页49,释文。刘安志、陈国灿:《唐代安西都护府对龟兹的治理》,据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页49。该书实皆图版,解读为"[保]人明府城处半白瑟笃米黎年五十"。补正了池田温、张广达"人"前缺字为"保",又补充了"笃"后缺字为"米",颇有创意。

[3]人明府城处半瑟笃□梨年五十

[4]人

刘安志、陈国灿《唐代安西都护府对龟兹的治理》一文引宋人洪迈说:“唐人呼县令为明府,丞为赞府,尉为少府。”[1]然敦煌所出《唐天宝年间地志残卷》明确记载:“安西……无县,管蕃府四。”[2]库车出土汉文文书中,亦未见有县令、丞、尉等职名的出现。这说明安西大都护府直辖地并无州、县级建制,那么,此之明府究竟何意呢?笔者认为,洪迈所言明府指县令之说,实乃因明府初指县官,后来进一步演变为专指县令,而县官,古意本指朝廷,如晁错《论贵粟疏》云“今募天下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此之县官,即指朝廷,安西大都护府乃朝廷在西域的政治代表,因此,明府城,应指安西大都护府所的在豆勒豆尔奥库尔遗址。Douldour âqour 文书 92 为《付米帐》:

[1]廿六日付厨米一硕,同日付细米玖斗

[2]同日付侍卿厨米一硕,同日付马员米一硕

[3]席明府米五升[3]

又 Douldour âqour 文书 108《付马料帐》第 4 行末尾“十八日张明府马食五升”。[4] 张明府,又见于日本在ドルドルオコル出土的 8083 号大谷文书《书信稿》,信上写有“……张明府至,得书奉诲忧情……”,[5]足证明府城,即朝廷城,亦即定型后的安西大都护府治所 Douldour âqour 遗址(ドルドルオコル),亦即今库车、新和交界处之夏克吐尔—玉曲吐尔古建筑群。而《唐六典》明载,大都护府,可设大都护一人、都护数人,以此判断以上文书反映的席明府、张明府绝非县级

[1]洪迈:《容斋随笔》卷 1,赞公少公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页 4。

[2]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1 辑,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年,页 57。

[3]*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页 87,释文。刘安志、陈国灿文引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页 87,图录,释为“[付]席明府米五斗”,同池田温、张广达所释之伯希和原件不符。姑存疑。

[4]*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页 96,释文。又见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图录,页 96。

[5]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史料类)(22)。小田義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三),页 230,图版 44。

单位的小官，而是都护级单位的大官。进又证实，定型后安西大都护府所在的 Douldour âqour（ドルドルオコル）遗址，俗称明府城。1971 年在轮台西北拉依苏东的喀拉克尔琴沟古墓中曾发现一块竖刻楷书木匾，后被民工烧毁。当事者回忆，木匾中间大字为“安西大渡户（安西大都护府）”，左侧为“西至乌垒管（关）七里”，右侧为“东至守捉十五里”。虽然这块木匾今已无存，但当事者的回忆应当是真实可靠的，绝非出自杜撰，从地理方位上判断，也恰与以上研究结论基本相符。

安西大都护府周边关隘林立，有柘厥关、盐水关等。盐水关就在盐水沟一带，位于库车县盐水沟南侧山梁上，约 1 公里范围内关垒 4 座，其中只有一座保存较好，面积约 77 平方米，现高约 7 米，顶部面积 27.5 平方米，中心部分为夯筑，四周及顶部为片石垒砌。伯希和 1907 年就在盐水沟一古堡掘得许多古龟兹文木简，经列维（Sylvain Lĕvi）教授释读，不少木简上书有“盐关”，其中最完整的一件简文为：“Gwarttas 书于……在盐关。汝自适用此符，现自……来，偕行者共十人，马共五匹，牛一头，放行勿诘；汝亦不得有所留存。Ksum 二十年七月十四日，Yo（署名）。”[1] 拓阙关，渡边哲信以为即今河东玉曲吐尔遗址，王炳华则认为应为玉曲吐尔与夏克吐尔两遗址的总和，亦即 Douldour âqour（ドルドルオコル）遗址或明府城所在地。陈世良最先指出其地有两误，一是道里不合，二是白马渡无法位置，认为柘厥关在今克孜尔千佛洞崖顶。[2]

4.7 文献学的有关证据

（1）正史的有关记载。

《旧唐书》卷 104《封常清传》：“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也。外祖犯罪流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门，颇读书，每坐常清于城门楼上，教其读书，多

[1]转引自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 1957 年，页 12。

[2]陈世良：《唐柘厥关考》，原载《西域研究》，2008 年第 3 期，收入同氏：《丝绸之路史地研究》，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008 年，页 178～193。

所历览。外祖死,常清孤贫,年三十余,属夫蒙灵督为四镇节度使,将军高仙芝为都知兵马使,颇有材能,每出军,奏傔从三十余人,衣服鲜明。常清慨然发愤,投牒请预一傔。常清细瘦目颣,脚短而跛,仙芝见其貌寝,不纳。明日又投牒……仙芝犹未纳。常清自尔候仙芝出入,晨夕不离其门,凡数十日,仙芝不得已,补为傔。”这段记载说明“安西胡城”即安西大都护府在龟兹的治所的所有城门都由汉军守卫。可知必与龟兹都督府治所的原龟兹王城不在一地,因为真正的龟兹“胡城”,不可能交由汉兵把守四大城门。再者,从传文所言,安西治所中居住的也大都是朝廷授命的汉官,包括汉化高丽人高仙芝父子,毫无胡、汉衙署合治一城的迹象。说明定治后的安西大都护府不在皮朗古城,而其定治后的新城则是一座纯由汉军或高度汉化的族群组成的。

(2)佛传中的有关记载。

据《大正藏》所收 No. 2089《游方记抄》之《五天竺行纪》,新罗僧人慧超返唐时路过安西的情况:“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此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韭等也。汉僧行大乘法。又,安西南去于阗国二千里,亦足汉军马领押,足寺足僧,行大乘法,不食肉也。从此已东,并是大唐境界,诸人共知,不言可悉。开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至安西。于时节度大使赵君且于安西。有两所汉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讲说。先是,京中七宝台寺僧,大云寺□维那,名义超,善解律藏,旧是京中庄严寺僧也。大云寺上座名明恽,大有行业,亦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乐崇□德。龙兴寺主名法海,虽是汉儿生安西,学识人风,不殊华夏。”传文中的“节度大使赵君”应指开元中任职安西四镇节度使的赵颐贞。文中反映,安西汉僧很多,汉传佛教很盛,其中尤其强调安西治所乃“汉国兵马大都集处”,亦即纯然汉城,绝非以龟兹人为主的皮朗古城。

(3)唐诗中的证据。

据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缚戎人》[1]中所记安西陷落于一次吐蕃夜袭。由于事关重大，基本上全文引录如下：

边头大将差健卒，入抄禽生快于鹘。但逢赪面即捉来，半是边人半戎羯。

大将论功重多级，捷书飞奏何超忽。圣朝不杀谐至仁，远送炎方示微罚。

万里虚劳肉食费，连头尽被毡裘暍。华裀重席卧腥臊，病犬愁鸪声咽嗢。

中有一人能汉语，自言家本长城窟。少年随父戍安西，河渭瓜沙眼看没。

天宝未乱犹数载，狼星四角光蓬勃。中原祸作边防危，果有豺狼四来伐。

蕃马膘成正翘健，蕃兵肉饱争唐突。烟尘乱起无亭燧，主帅惊跳弃旄钺。

半夜城摧鹅雁鸣，妻啼子叫曾不歇。阴森神庙未敢依，脆薄河冰安可越。

荆棘深处共潜身，前困蒺藜后臲卼。平明蕃骑四面走，古墓深林尽株榾。

少壮为俘头被髡，老翁留居足多刖。乌鸢满野尸狼藉，楼榭成灰墙突兀。

暗水溅溅入旧池，平沙漫漫铺明月。戎王遣将来安慰，口不敢言心咄咄。

供进腋腋御叱般，岂料穹庐拣肥腯。五六十年消息绝，中间盟会又猖獗。

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近年如此思汉者，半为老病半埋骨。

常教孙子学乡音，犹话平时好城阙。

---

〔1〕《全唐诗》卷419_13，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缚戎人》。

诗中明确记载安西陷落乃出自吐蕃发动的一次初冬夜袭。这位没蕃的安西戍卒后来只身奔唐,反为唐朝边将作为蕃俘押送流放,此乃唐宪宗元和年间元稹亲自采访到的一件真实历史悲剧,以此进谏,断非凭空捏造,因赋为诗。从诗中描写安西城的地形来看,所记"阴森古庙"应即库木吐拉千佛洞,诗中为脆薄冻冰覆盖的河面应即渭干河,与 Douldour âqour 遗址的方位、地形完全相合。[1]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已完全成立,这就是 Douldour âqour 就是定型后的安西大都护府府城,存在时间自长寿二年直至元和三年(693—808),总共存在 116 年。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霍旭初、泰来提·乌布尔二先生的协助,更不能忘怀者乃千里惠赠我以关键外文史料的余太山先生,前者启发了我的思路,后者惠赠我所最短缺的外文资料。特此致谢。

(《史学集刊》2011 年第 3 期《安西大都护府治所考》,该杂志不能刊载照片、地图,故照片、地图为今所增补)

[1]参稽薛宗正:《郭昕主政安西史事钩沉》,载《西域研究》,2009 年第 4 期。

5　唐碎叶建置诠索

碎叶，一译素叶，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碛西名城，至唐建为西北边防重镇，先后隶属于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此城的建置沿革、弃复兴废，反映了公元7世纪至9世纪碛西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动和唐朝西北边防体制的复杂演化。对此，学术界迄今仍然研究不够充分。有必要理蔓清枝，攀巅穷览，做进一步的全面考察。

5.1　碛西归唐前的碎叶

远在唐朝崛兴以前，碎叶城久已雄踞于碎叶川上，《文苑英华》卷945记载李白先世"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姓易名"。[1] 可见其城隋世已存。贞观二年(628)唐僧玄奘西行求法，途经目睹，留下了翔实的记述：

> 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麋麦，葡萄，林树稀疏，气序风寒，人衣毡氎，素叶已西数十孤城，城皆立长，虽不相禀命，然皆役属突厥。[2]

又据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由高昌王使者护送，于此城郊外谒见了西突厥统叶护可汗：

> 可汗方事畋游，戎马甚盛，可汗身著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编发，围绕左右，自余军众皆裘氎毳毛，槊纛端弓，驼马之骑，极目不知其表。

据此可知，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此处已是西突厥汗国治下的重要城镇。而且：

[1]《文苑英华》卷945《志十一・职官七》，范传正：《赠左拾遗翰林供奉李白墓志》。

[2]《大唐西域记》卷2《跋禄伽国》。

(1)碎叶的商业相当繁荣,农业也发展很快,说明城中的土著乃文化很高的定居民族,此与城外耀武扬威,以畜牧、射猎为业的突厥人显为两种。考碎叶在清池一带,清池即热海,今伊塞克湖,而史载热海以西、以南,皆为粟特人的故地,他们恰以知农、精商闻名于世,直至入唐后乾陵碑上尚留有粟特人出任碎叶州刺史之名。由此可见,碎叶的始建者就是粟特人。

(2)两唐书《突厥传》皆记统叶护可汗寻牙于千泉,而前引玄奘行纪所述该可汗实常驻跸于碎叶。千泉并非城名,而是指碎叶城西 400 里范围的一片丰美草原,"地赢三百里,南雪山,三垂平陆,多泉池,因名之[1]"。结合突厥人分冬、夏两季分期放牧的生活习俗,似乎可汗夏日至千泉草原营帐,冬日则入碎叶城居。可见碎叶不但已归西突厥统治,至统叶护可汗之世事实上也已成为汗国的牙庭。

突厥兴起于公元 6 世纪,562 年击败嚈哒,开始君临碛西。慑于其强大威力,粟特诸城邦皆向其称臣款服,碎叶城自然也不例外。仁寿三年(603)东、西突厥正式分为两国,粟特故地皆归属西突厥汗国治下。俗染习熏,城市在这一汗国的政治生活中渐渐起着重要的作用。碎叶地当汗国中枢,诸部盟会,咸聚于此城稍北的羯丹山。咥利失可汗划分两厢、十姓部落,亦以碎叶川作为左厢(东厢)咄陆诸部与右厢(西厢)弩失毕诸部的分界,足证碎叶城在西突厥汗国中的显著地位。

自隋迄唐初,西突厥历代可汗皆与中原王朝结好,如隋之泥撅处罗可汗、射匮可汗、统叶护可汗,唐初之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咥利失可汗等皆受朝廷册封。唐与西突厥反目始于乙毗咄陆可汗奉行反唐政策,其后任乙毗射匮可汗、乙毗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都继承了这一政策,引起唐朝的有力反击。贞观十四年(640)唐朝反击乙毗咄陆可汗,进军高昌,始置西州,创建安西都护府,并于贞观十六年(642)推翻了乙毗咄陆可汗的统治,册立乙毗射匮可汗继为西突厥大汗。但这位乙毗射匮可汗本质上仍然是个反唐可汗,继位后奉行的政策与前可汗无

[1]《新唐书》卷 221《龟兹传》,页 6233。

异。这导致唐朝招徕其麾下叶护阿史那贺鲁降唐，并爆发了贞观末年的龟兹决战，逐之于碎叶川西，而以阿史那贺鲁取而代之。而太宗薨，高宗初立，阿史那贺鲁又自建号乙毗沙钵罗可汗，发动反唐叛乱，迫使唐朝连续发动了三次平叛行动，至显庆二至三年（657—658）才平定了这场大规模的叛乱，并进而消灭了乙毗射匮可汗的继承者真珠叶护可汗，实现了十姓归唐的伟业，安西晋级为大都护府，移治龟兹，真正稳定了西域形势。在此之前，唐安西都护府所能有效控制的范围西不过焉耆，此外的广大碛西地区尽属西突厥领疆。当此之时，安西四镇尚属乌有，遑及位居中亚腹地的碎叶！

5.2 碎叶的归唐及其备列安西四镇

安西四镇究竟创始于何时，初设之四镇名单究竟有无碎叶，这是学术界迄今未有公论的难题，首先必须予以解决。有一种传谬甚广的说法，似乎安西四镇乃创设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唐伐龟兹战役结束之后，而初设之四镇名单中有碎叶而无焉耆。其说的主要根据乃《旧唐书·龟兹传》中如下一段记载：

> 先是，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

这是一条孤证。其余史书如《新唐书》《太平寰宇记》《通典》《元和郡县志》《唐会要》都无这一记载。仅此孤证，难为凭据。此其一。贞观二十二年龟兹之役，唐军虽然获胜，龟兹王白·诃黎布失毕及其相那利皆被俘，但实际上此后该国始终动乱不已，唐朝先是创立了龟兹都督府，任命亲唐派首领叶护玷出任龟兹都督，并未控制住局势，不得已恢复龟兹国号，重遣其王白·诃黎布失毕返国主政，而其相那利与其后阿史那氏相结，唐令不行，其时已是高宗之世。高宗两召其王及相入京，囚其相而返其王，龟兹大将羯猎颠又起兵叛，并与阿史那贺鲁之乱合流，其王不得返，直到显庆三年羯猎颠之乱才与贺鲁之乱一起平定。在如此混乱的局势下，四镇为设，从何说起？至于郭孝恪徙治龟兹之

说，更属荒唐。其人贞观二十二年已战殁于龟兹，未尝亲见龟兹的第一次平定，直至显庆三年之前，安西都护府的治所都在西州，未尝徙治，郭孝恪安能兼统四镇？可见其说无据。依《唐会要》卷73，安西移治龟兹实乃平定阿史那贺鲁与羯猎颠之乱的历史产物，其时间不是贞观二十二年而是显庆三年五月二日(658年6月7日)：

> 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又以贺鲁平……至[显庆]三年五月二日(癸未，658年6月7日)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以麴智湛为之，以统高昌故地。

只是显庆三年之后，西域形势才真正完全平静下来，归于唐朝治下。四镇之设只能发生于此年。碎叶的归唐与置镇是两回事，显庆三年随着阿史那贺鲁的平定，碎叶确已归唐所有，但汉军并未进驻其地，而安西四镇乃汉军单位，碎叶既无汉军，足证初设之四镇有焉耆而无碎叶。这一结论还可以从安西四镇第一次罢废时的记载得到印证，《唐会要》卷73明确记载，"咸亨元年四月，罢四镇，是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可知直到此时，碎叶虽已名义上归属于唐，但并未名备四镇。以故岑仲勉先生早就指出初设之四镇有焉耆而无碎叶，"碎叶列四镇是高宗时事，此处当作焉耆，唐是时势力未达碎叶也"。[1] 碎叶原属西突厥，归唐后唐朝于西突厥故境推行羁縻可汗、羁縻州府制度，依西突厥两厢分治的历史传统，分别册拜降唐西突厥首领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一世兼首任昆陵都护，册拜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一世兼濛池都护，分领西突厥两厢部落。"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号为羁縻[2]。"而并隶于安西大都护府，其中阿史那步真主宰右厢弩失毕部，其牙庭就设在碎叶。唐朝对于二羁縻可汗兼羁縻都护完全信任，故未派出任何汉军进驻，也未派出汉人官员进行监控。在这时，碎叶虽已归唐，却不可能在其地设置镇守军级建置，易言之，这时碎叶设镇是根

---

〔1〕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其考证》，页29。

〔2〕《新唐书》卷43《地理志》，页1120～1121。

本不可能的。且阿史那步真受封为继往绝可汗乃显庆二年事,受封为濛池都护则乃显庆三年事,虽然理论上,碎叶已成为阿史那步真的牙庭兼濛池都护府治所,然其时西突厥阿史那贺鲁虽已平定,真珠叶护可汗却志在规复旧国,并已挺进至双河一带,阿史那步真并未能及时赴任。以故阿史那弥射前来赴援,至显庆四年己未史书中才出现了如下记载:"春……三月,壬午,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与真珠叶护战于双河,斩真珠叶护。"[1]直至此岁,在阿史那弥射的协助下,阿史那步真才能赴任碎叶,而唐朝所册之西突厥两厢可汗不和,阿史那弥射死于龙朔二年(662),阿史那步真死于乾封二年(667)。由于吐蕃卷入了西域争夺,其后西突厥两厢部落一度叛唐附蕃,十姓故地出现了以阿史那都支、李遮匐为首的二附蕃政权,唐朝对这一地区已完全失控,其中碎叶归李遮匐统治,唐军一度退守西、庭、伊三州,西域局势极端混乱,更是谈不上在碎叶设镇。唐朝再次在西突厥拥有主权乃裴行俭再定十姓的历史产物。可见碎叶镇的创置者乃裴行俭,首任镇守使乃安西都护王方翼。

裴行俭是一位才兼文武的唐朝将领,历任西州长史、金山都护府副都护、安西大都护,在西州主政多年,很有人望。后调返朝中,仪凤三年(678)受任为册立波斯王暨安抚大食使,以此名义,率领副将王方翼、杜怀宝,统辖主要由汉军组成的"波斯军",护送在长安为质子的波斯王子泥涅师返国主政,继任波斯王,取道西突厥境内。由于这是一支和平使团,西突厥二附蕃首领未加防范,调露元年(679)裴行俭一行至西州后又秘密扩军,进行演练,而后突然出击,俘阿史那都支,擒李遮匐,迅速平定了西突厥两厢十姓,"立碑于碎叶以纪其功[2]"。这是唐朝军队进驻碎叶的历史开端。也只是此时,碎叶才具备了列置为安西四镇的条件。史载,裴行俭再定十姓以后,重建安西都护府与安西四镇,先后以王方翼、杜怀宝出任都护。由于碎叶地居冲要,安西都护似皆以此为驻节之所。王方翼任都护时,重加整修城郭,变其形制,设关收税,以

[1]《资治通鉴》卷200,显庆四年。

[2]《旧唐书》卷84《裴行俭传》。

财养军。《王方翼碑》中记述:“大城碎叶,城郭回互,夷夏纵观,莫究其端倪,三十六国,承风朝谒。”[1]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玛克西南8~10公里的阿克·贝希姆废城应即碎叶城遗址。



图2-5-1 唐碎叶城(阿克贝希姆遗址)

该城建于北临碎叶川的丘岗地带,至今仍是高达二十多米的土墩包,清晰地看到这是一片建筑的残垣断壁,大概有四五百平方米大小。从这堆残墙中,我们还能依稀地辨出中间有个一二百平方米的大厅。从残存的断墙和土丘中我们判断,这片土包里至少有二十多间房子,对外有三处大的出口,靠近东北角还有一个极小的出口,隐隐可见其南墙仍迂回曲折,转角处都有城楼,城门却隐入城墙缩入部分的东侧,其城垣形制与史书所记屈曲隐伏之状相符。《册府元龟》卷967更明确记载“调露元年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碎叶之所以取代焉耆列备四镇,是由于唐朝西北边防形势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高宗初年,西突厥已平,唐朝经营的重点在于天山南麓城郭诸国,故以龟兹居中,以焉耆、于阗、疏勒三镇环拱安西。至此,唐朝的势力已进入天山北麓,除经营庭州以外,还须在其西段地区设一重镇,故碎叶正中其选。至于除此中亚的碎叶以外,是否还有一个焉耆的碎叶呢?事实证明这种说法纯属宋人欧阳修的误记。业经诸家考证清楚[2],这里就不拟置辩了。

---

[1]张说:《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载《文苑英华》卷913。

[2]周伟洲:《略论碎叶城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唐安西四镇的历史事实》,吴震:《唐碎叶镇城析疑》,俱载《新疆历史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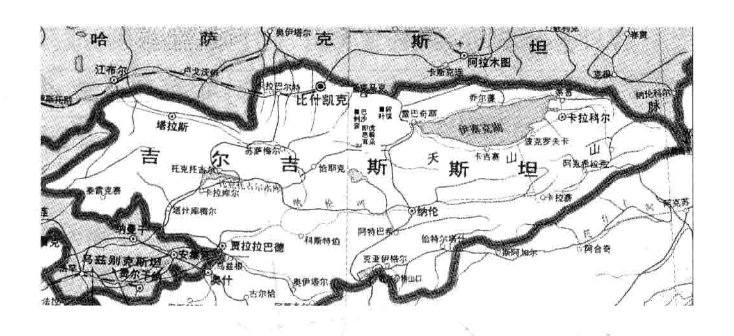


图 2－5－2　吉尔吉斯地图中的碎叶(阿克贝希姆遗址)

5.3　安西治下的碎叶镇

《新唐书》卷40《地理志》记载:“安西大都护府,初置西州,显庆二年平贺鲁,析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分种落,列置州县,西尽波斯国,皆隶安西。”碎叶既名备四镇,显然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此镇建置以后,在屏卫唐朝的西北边防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间多次废而复置,历尽沧桑。周伟洲教授认为共经历了三置三弃[1],笔者则以为更为复杂,碎叶城先后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而又复归安西大都护府,其历史演变脉络如下:

(1)第一次建置、失陷与罢置(调露元年至垂拱元年,679—685):碎叶镇乃裴行俭再定西域的历史产物,初置于调露元年,其副将王方翼不但是辅佐裴行俭初创碎叶镇的元勋,还是再定碎叶的功臣。裴行俭返师后,初留其任安西都护,驻节碎叶,重修此城,使之成为兼具军城、商城双重性质的城堡。当时,安西的建置级别已不是大都护府,而是都护府,王方翼与金山都护杜怀宝对调,“杜怀宝自金山都护更镇安西,遂失蕃戎之和”。[2] 永淳元年(682)漠南单于大都护府治下二十四州东突厥部落联合暴动,在其影响下,西域也发生了以阿史那车薄为首的

[1]周伟洲:《略论碎叶城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唐安西四镇的历史事实》,载《新疆历史论文集》。

[2]《新唐书》卷111《王方翼传》。

西突厥叛乱。碎叶一度失守，杜怀宝移守弓月城，又被围，战殁，情势危急，王方翼以金山都护驰救，“战伊丽河，败他，斩首数千级，俄而三姓咽面兵十万踵至，方翼次热海，进战，矢著臂，引佩刀断去，左右莫知，虏谋执方翼以内应。方翼悉召全军中，厚赐，以次出壁外，缚之，会大风，杂金鼓，而号呼无闻者，杀七千人（疑“千”为“十”之讹），遣骑分袭咽面等，皆惊溃。乌鹘引兵遁去，禽贼首突骑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1]同年收复碎叶，此为碎叶镇创置后的第一次沦陷与收复。而至垂拱元年武则天罢废了金山都护府。同年西突厥首领他匐又率领西突厥部落发动了反唐叛乱，武则天遂恢复了羁縻可汗与羁縻都护府制度，册拜阿史那称射子阿史那元庆袭父爵出任兴昔亡可汗二世，兼昆陵都护，令其招抚十姓，而讨他匐败绩，被俘逃回，四镇尽沦。对此，《旧唐书》卷97所载郭元振奏疏中有所透露：“往四镇以他匐十姓不安，请册元庆为可汗，竟不能招胁十姓，却令元庆没贼，四镇尽沦。”考元庆受封乃垂拱元年十一月事，至本年末，至迟次年初，碎叶城已失。但四镇的失陷与四镇罢置并非一回事，四镇失陷后的汉军仍然散至各处退守，至垂拱二年武周册拜阿史那步真之子阿史那斛瑟罗为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加金牙道行军大总管，反攻碎叶，并发安西“都护李君”，即汉将李祖隆，另行主持疏勒道、安西道、昆丘道三道行军，共同完成了“拔碎叶、疏勒、于阗、安西四镇，皆如所请[2]”的伟业，见于《汜达德告身》《裴沙钵罗墓志》等文献。这次拔四镇，实乃一次大规模的营救性与换防性军事行动。自此，在重新光复四镇地区的同时，却正式罢废了安西四镇的汉军建置。其中碎叶虽然继续是濛池都护府治所和西突厥继往绝可汗牙帐，但防务已全盘移交给阿史那斛瑟罗，汉军在碎叶的一切军事及屯田建置已全部撤销，不再设镇。在此期间，可考之唐安西都护兼碎叶镇守使应有三人，其中可考者仅二人。

---

〔1〕《新唐书》卷111《王方翼传》。

〔2〕《全唐文》卷165《达奚思敬碑》。

表 2-5-1　唐安西都护兼碎叶镇守使

碎叶镇守使	唐历	公元
王方翼	调露元年至开耀元年	679—681
杜怀宝	开耀元年至永淳元年	681—682
佚名待考	永淳二年至垂拱元年	683—686

(2)碎叶的光复与失陷(垂拱二年九月至天授元年,686 年 9 月—690 年 1 月)。碎叶建置史中的疑难之处在于其失陷与罢镇既非一回事,亦非发生于同年。其失陷实乃垂拱元年阿史那元庆西征他匐兵败的结果,而罢镇则与阿史那斛瑟罗金牙道行军胜利平定他匐之乱,光复碎叶同年。则碎叶镇罢置之岁,正是阿史那斛瑟罗光复碎叶与还治碎叶之时。此人因这次辉煌战绩而被武周倚为西陲干将,并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图谋策划以"安息道行军"命名的更大规模的全面西域反攻。由韦待价、阎温古主持其事,而偏要选择废唐兴周,更易国号、年号的永昌元年(689)发师,为新王朝加庆增辉。结果失去战机,兵败寅识迦河,阎温古被斩于秦州,韦待价免死流放,安西副都护唐休璟收余众退保西州,说明龟兹等诸镇又失。此后东突厥也乘虚西侵十姓,斛瑟罗独力难支。《资治通鉴》卷 204,天授元年条记曰:"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胡三省曰:谓为骨咄禄等),散亡略尽,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人居内地,拜右屯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可见天授元年碎叶陷于东突厥阿史那骨咄禄。

(3)碎叶再次收复与置镇(天授二年至长寿元年,691—692)。碎叶失陷不久,就为突骑施首领乌质勒夺回。乌质勒本斛瑟罗帐下莫贺达干,斛瑟罗奔唐后,率部抗击东突厥。其人"能抚众,有威信,诸胡顺附,部落寖盛,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叶西北,稍攻得碎叶,即徙其牙居之,谓碎叶为大牙,弓月城、伊丽水为小牙"。[1] 这条史料反映:①天授元年碎叶已为东突厥攻占期间,乌质勒仍"屯碎叶西北",可

[1]《新唐书》卷 215《突骑施传》。

见仍在为唐守境,同东突厥做斗争。②都督乃唐朝官号,说明乌质勒仍恪守唐制,效忠朝廷。③乌质勒取碎叶不曰攻陷而曰“攻得”,可见非得自唐,而得自东突厥。此役的具体年代可参考《太平寰宇记》卷196“[阿史德]元珍等率兵讨突骑施,临阵战死,骨咄禄天授中亦卒”,阿史德元珍乃后东突厥汗国重臣,其身亡明载为讨突骑施战殁,骨咄禄之卒亦当与此有关。可见乌质勒曾大破东突厥,光复碎叶。而天授年号仅用于690、691年两年,690年东突厥尚盛,攻夺碎叶,逐斛瑟罗奔唐皆为此年事;则乌质勒击杀阿史德元珍、攻夺碎叶似皆为天授二年事。至长寿元年,吐蕃国中发生政争,武则天乘虚发动了名为武威道行军的西域反攻,破格擢拔一度没蕃的将领王孝杰为主将,配合斛瑟罗旧属阿史那忠节所部西突厥兵,“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复安西都护于龟兹,发兵戍之……一举而取四鎮,还先帝旧封”。[1]《旧唐书》卷198《西戎传》更明确记载此役结束之后“乃于龟兹置安西[大]都护府,发兵以镇守之”。[2] 王孝杰所收复的“四镇”实为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并无碎叶,其时碎叶尚在乌质勒手中。而《唐会要》卷73《安西都护府》记:“长寿二年十一月一日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克复四镇,依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这一时间与前引《新唐书·吐蕃传》所记明显不同。又《唐会要》同卷,引苏氏曰:“至长寿二年十一月,复四镇敕,是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两四镇不同,未知何故。”依笔者判断,此年碎叶重新取代焉耆,备列安西四镇,是乌质勒主动交回的。因此,《资治通鉴》记王孝杰光复四镇的时间乃十月,而《唐会要》所载复置四镇的时间则乃十二月。对此月份不同的唯一解释是,直到十二月乌质勒交还碎叶后,才复置四镇。至万岁通天二年,即神功元年(697)唐蕃议和,吐蕃退出了西域争夺,安西四镇遂初步定型化。

(4)碎叶的弃守、收复再置镇与再失陷(圣历二年至久视元年至景龙二年,699—700—708)。然至圣历二年,默啜册拜其子匐俱为泥涅可

---

〔1〕《新唐书》卷216《吐蕃传》,页6079。

〔2〕《旧唐书》卷198《西戎龟兹》,页5525。

汗"主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余人,号为拓西可汗[1]",统兵西征。而唐碎叶镇守使韩思忠调离之后,其后任失载于史,这一异常现象只能说明这位镇守使很可能已失守碎叶。因此,《册府元龟》卷967中出现了如下记载:"圣历中,突厥咀鹿州都督乌质勒移衙于碎叶。"这已是乌质勒第二次移牙碎叶了。考圣历年号仅用于698、699年两年,而圣历元年唐碎叶镇守使仍驻守该城,及圣历二年韩思忠已出现在抗击默啜入侵的石岭险塞上,其后任则未彰于史。说明泥涅师已从韩思忠的后任手中夺取了碎叶,而又被乌质勒夺回。故《资治通鉴》记载是年"八月癸巳,突骑施乌质勒遣其子遮弩人见八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遣遮弩入朝必为报光复碎叶之捷,解琬"安抚"则乃酬乌质勒败东突厥之功。可证碎叶光复乃七月事。又《册府元龟》卷967记:"圣历中,突厥(应为突骑施)首领嗢鹿都督乌质勒移衙碎叶,则天授以瑶池都督。"故授乌质勒为瑶池都督以酬之。然乌质勒这次夺回碎叶后并未交还唐朝,此城之再度置镇乃久视元年事。史载是年唐朝采纳阿史那忠节的建议,令"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罗为平西道大总管,还镇碎叶",唐安西大都护、左金吾将军田扬名,殿中侍御史封思业给予全力支持。其时西突厥阿史那薄露不服其统治,兵犯碎叶,"夜于城傍剽掠而去[2]",有赖田扬名、封思业(此人似兼碎叶镇守使)的驰击,才击溃了这支反唐势力。此阿史那薄露与吐蕃册立的附蕃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拔布同音,其在位时间也相符,疑为一人,应即人蕃谒见赞普的暾叶护可汗。可知斛瑟罗二次返封后,有汉军协防,说明碎叶重又置镇。但是,斛瑟罗左袒阿史那忠节,排挤乌质勒,终于爆发为公开的武装冲突。长安三年(703)七月"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与西突厥诸部相攻,安西道绝……斛瑟罗部众离散,因入朝,不敢复还"。[3] 而斛瑟罗归朝后,唐朝又于长安四年(704)继续册立斛瑟罗之子阿史那怀道继为十姓可汗,即继往绝可汗,乌质勒当然不服,由之唐与突骑施的关

[1]《资治通鉴》卷206,圣历二年,页6543~6544。
[2]《资治通鉴》卷207,久视元年,页6550。
[3]《资治通鉴》卷207,长安三年,页6562~6563。

系骤然紧张起来。神龙二年十二月(707年元月)唐朝同时派遣北庭大都护郭元振、北庭都护解琬两大西域主将亲赴其牙帐,与之谈判,说明这一矛盾尚未冰释;而谈判地点不在城中而在风雪帐前,则不但说明双方关系的紧张化,而且说明其时碎叶仍在唐朝统治之下。

唐与突骑施之间的矛盾源于唐朝坚持册立西突厥阿史那氏的传统政策,终于演变为激烈的武装冲突。乌质勒谈判未终,染病暴卒,唐朝遣阿史那怀道持节册立乌质勒伽子娑葛袭父爵嗢鹿州都督。怀德郡王企图了结此事,但娑葛根本不承认阿史那怀道的权威,并表请除去支持斛瑟罗、怀道父子的阿史那忠节。当时兵部尚书宗楚客执政,不准所请。娑葛遂于景龙二年(708)发兵击忠节,唐碎叶镇守使周以悌出兵干涉,始胜终败。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阿史那怀道被召还朝,周以悌兵败后,被迫移驻播山镇。说明是年碎叶复失。

5.4　碎叶转隶北庭及其返归安西

唐朝治理碛西的最高军政领导机构本来只有一个安西大都护府,这个机构统辖范围过宽,难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北庭都护府遂晋级为北庭大都护府,与安西大都护府分疆而治,广大天山北麓地区都划归其领有。北庭都护府创立于长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703年1月7日),其晋级为北庭大都护府的时间则为景龙三年(709)。是岁,唐朝与突骑施娑葛全面化解了关系,唐朝正式承认了突骑施汗国,册拜娑葛为突骑施十四姓钦化可汗,赐其名为突骑施守忠,从而博得了这一新兴异姓突厥政权的效忠,娑葛遂将碎叶返还唐朝,其地理位置理当转归北庭管辖。可见碎叶的行政隶属关系前后是有所变化的。而在其碎叶改隶北庭后的七年间(景龙三年到开元四年,709—716)又经历了两置两废的复杂演变。

第五次置镇与弃守(景龙三年七月至景云二年,709—711)。北庭大都护府的成立及唐朝册立突骑施娑葛,都是中宗废周兴唐后,策划北伐后东突厥汗国默啜可汗的政策产物。计划三道发师,其中西路军统

帅就是新创置的北庭大都护,《全唐文》卷253所收景龙四年颁发的秘密文件《命吕休璟北伐制》中计划于次年(711)调集汉、蕃大军,包括北庭、瀚海、碎叶汉兵五万骑,兼征突骑施、坚昆(黠戛斯)兵马,合攻默啜,"长驱沙漠,直指金微"。[1] 而身膺西路军统帅的吕休璟所领官衔就是检校北庭大都护"右领军卫将军,兼……碎叶镇守使、安抚十姓……金山道行军大总管[2]",足证随着北庭大都护府的建立,碎叶镇守使业已复置,不仅划归北庭,而且由北庭主将兼任。然而这一北伐计划并未真正实施,就在此诏刚刚颁发的景龙四年六月中宗暴薨,睿宗新立,默啜立即遣使议和,以麻痹唐朝,北伐流产,遂制机于先。于景龙四年末景云元年初(710—711)统兵西征,突厥儒尼文《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清晰地记载了这次报复性军事行动,突骑施可汗娑葛及黠戛斯可汗等唐朝忠实盟友悉为所杀。自此唐朝西疆大乱,碎叶镇守使吕休璟调徙安西,而碎叶城旋为西突厥叛酋都担所据,说明该城此年复陷。

第六次置镇(开元二年至开元四年,714—716)。由于娑葛的战殁,突骑施汗国的一度解体,十姓故境无主,碎叶一直被西突厥叛酋都担所据。直至开元二年阿史那献拜北庭大都护、碛西节度使,统兵西征,平都担,据《资治通鉴》卷211:"三月己亥,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克碎叶等镇,击斩都担,降其部落三万余帐。"《册府元龟》卷358亦记:"阿史那献为北庭大都护,开元二年枭突厥都担之首,献之阙下,并擒其拏胡禄屋等部落五万余帐内附。"都担叛乱的主体是胡禄屋、鼠尼施、葛逻禄等部,自碎叶光复之日,这些部落又纷纷诣北庭降唐。自此之后,史书中又出现了碎叶镇守使刘遐庆之名,说明碎叶重又置镇。由于碎叶转隶北庭,安西四镇中碎叶的位置又为焉耆所取代。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开元四年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府制度的建立,是岁册拜靖德太子李琮遥领安西大都护。自此,安西主将已降为安西副大都护,北

---

[1]《全唐文》卷253《命吕休璟等北伐制》,页2562~2563。

[2]《全唐文》卷253《命吕休璟等北伐制》,页2562~2563。

庭主将自然也不能逾越礼制，官高于亲王，自此岁起，北庭大都护府又还原为北庭都护府，于是碎叶复划归安西，取代了焉耆，备列安西四镇。

碎叶复备安西四镇及其罢置（开元四年至开元七年，716—719）。开元四年唐朝之所以创立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制度，起因于开元三年阿史那献以反攻大食为目标的定远道行军失败。至开元四年随着默啜可汗的被杀，大批东突厥部落远迁西域，投附车鼻施首领苏禄帐下，苏禄势力顿强，开始重建突骑施汗国，史称黑姓突骑施汗国，或突骑施黑姓汗朝，不服唐朝所册拜的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献的号令。在对待这一新兴异姓突厥政权的问题上，唐朝边将一度分裂为两派，阿史那献、汤嘉惠、刘遐庆等北庭系将领力主进剿，而以安西副大都护郭虔瓘为首的安西派将领则力主招抚。此时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后一派意见占了上风，阿史那献益不能制。开元五年苏禄联兵吐蕃、大食，进犯唐之领疆大石城与拨换城，阿史那献遣归降的葛逻禄部前往讨击，并表请朝中派兵应援，而郭虔瓘奏："突骑施国的围石城，则缘史献致寇。"[1]于是唐朝拒派援兵，葛逻禄孤军出战，全军败没。阿史那献无法应付形势，返回长安，他的退出碛西政治舞台标志着唐朝传统奉行的西突厥羁縻可汗制度之最终结束，此后改而承认异姓突厥所创立的突骑施汗国为唐朝治下的民族自治政权，取得了苏禄的效忠。开元七年唐朝遣使解忠赴突骑施，册拜苏禄为忠顺（毗伽）可汗，并应其请，让出碎叶为之牙庭。史载：

> 开元七年［焉耆王］龙懒突死，焉吐拂延立，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请以焉耆备四镇。[2]

此"十姓可汗"显然指的是苏禄。自此之后，安西四镇又成了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因为碎叶镇已罢置，它已变成突骑施汗国的牙庭。

开元七年唐朝之所以让出碎叶为突骑施汗的牙庭，是为了通过突

---

〔1〕《册府元龟》卷157《帝王部·诫励二》，页1902。

〔2〕《新唐书》卷221《焉耆传》，页4135。

骑施遏制大食的河外扩张，而以岁赠绢帛，并以马绢市易为其补充。这一政策曾经取得了有益的政效。大食武力进犯连连受挫，改而推行离间，唐朝边将渐受其影响，与突骑施的摩擦不断升级，终于爆发为双方悲剧性冲突。唐朝竟联兵大食，东、西夹击自身扶立起来的地方政权，突骑施国势渐衰。开元二十六年(738)苏禄死后，国中三汗并立，又分为黄、黑二姓，黑姓可汗正支，其长子尔微特勤立于怛逻斯，另一黑姓可汗吐火仙立于碎叶，此外尚别有黄姓可汗娑葛之裔为权臣莫贺达干拥立，相互攻伐。唐碛西节度使盖嘉运竟应莫贺达干之请，统兵卷入了本来纯属突骑施内政的黄、黑二姓可汗之争，助黄姓，伐黑姓，开元二十七年(739)"攻碎叶城，吐火仙出战，败走，擒之于贺逻岭[1]"，进又攻克怛逻斯，杀尔微特勤，这是唐朝第七次收复碎叶，但已不再置镇了。其后，黑姓突骑施移拨可汗立，叛唐投倚大食，天宝九载(旧史中误为七载，"七"乃"九"之讹)，其年，唐朝发动了对大食的全面反攻，先以大食属邦石国及黑姓突骑施为打击对象，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伐石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攻突骑施，黑姓突骑施可汗、石国王皆被俘，这是唐朝第八次攻占碎叶，由于双方激烈争夺，碎叶城毁于兵燹。对此，《新唐书》卷221记："热海西有碎叶城，天宝七载(按，应为九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伐安西，毁之。"杜环《经行记》记其亲身目睹："天宝七载(九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薄伐，城壁摧毁，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之处建大云寺犹存。"[2]可见碎叶直到其历史终结之日，仍归北庭防区，其废墟至元犹存，称索虏城。元初耶律楚材西游，过此城废墟，"索虏城在大河南，城已圮，唐碎叶镇故墟也"。[3]

由此可见，安西四镇的命运同整个唐朝国力的盛衰休戚相关，四镇的置废反映了这一变化。详见表2-5-2：

---

[1]《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七年，页5275~5276。
[2]《通典》卷193《边防典·西戎·石国》，引杜环《经行记》，页5275。
[3]耶律楚材：《西游录》，见《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180。

表 2-5-2 安西镇的置废

四镇建置	四镇名称	时间	备注
第一次置镇	龟兹、焉耆、于阗、疏勒	贞观二十二年至咸亨元年,648—670	
第二次置镇	龟兹、碎叶、于阗、疏勒	调露元年至开元七年,679—719	景龙三年(709)以前归安西,以后归北庭
第三次置镇	龟兹、焉耆、于阗、疏勒	开元七年至元和三年,719—808	

5.5 碎叶镇的交通地位与行政级别

碎叶虎踞碛西腹地,当丝路北道正路,襟山带河,锁湖控原,位居冲要,具有特殊优越的战略地位。唐朝明智地选择此城置为西北边防重镇是寓有宏谟深算的。

根据各种史料综合判断,碎叶至少是四条大道的交会之所:一是安西路,南经拨换,西达安西大都护府治所的龟兹;二是疏勒路,南经拨换,转往唐之西部雄镇疏勒;三是北庭路,东通庭州,远达长安;四是怛逻斯路,西经怛逻斯,远交大秦、大食。其中庭州路与怛逻斯路连接起来即为贯通天山北麓的丝路北道,有必要把这些交通路线考证清楚。

(1)安西路:碎叶曾备安西四镇,因此这条路线记载里程特详。《新唐书》卷221《石国传》载:"由勃达岭北行赢千里得碎叶川,东曰热海,地寒不冻,西在碎叶城。"据此可知碎叶在热海(伊塞克湖)之西。又同书同卷龟兹记:"自龟兹赢六百里,逾小沙碛有跋禄迦,人国也,一曰亟墨,即汉姑墨国也。横六百里,纵三百里,度石碛至凌山,葱岭北原也,水东流,春夏山谷积雪,西北五百日地至素叶水城。"素叶水城当即碎叶的异译。其中尤以《新唐书》卷43《地理志》所记里程最具体:

> 安西西出拓阙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

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乃西北渡拨换河、中河，距思浑河北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阗境之胡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又西北二十里至粟楼烽，又四十里度拔达岭，又五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度乏驴岭，五十里度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一十里至贺猎城，又三十里至叶支城，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又西四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

此路称为安西—碎叶路，自安西东行，经焉耆，沿银山道，又可直达西州，亦可称为西州—安西—碎叶道。

明人茅以升《武备记》所附西域图中标出碎叶城的相对位置，然误置于碎叶水北，案之今日实测的中亚地图，其行程乃自龟兹（库车）出发，渡白马河（沙雅河），经拜城、阿克苏间的小沙碛，经拨换（阿克苏稍北），北渡拨换中河（托什罕河），经大石城（齐木库尔干），西北越拔达岭（天山余脉），过真珠河（乌契库勒河），翻乏驴岭（帖尔斯凯阿拉套山），沿热海南岸绕行，经碎叶川口（楚河河口）、裴罗将军城而达碎叶，以上都已属于中亚内陆地区，主要沿热海，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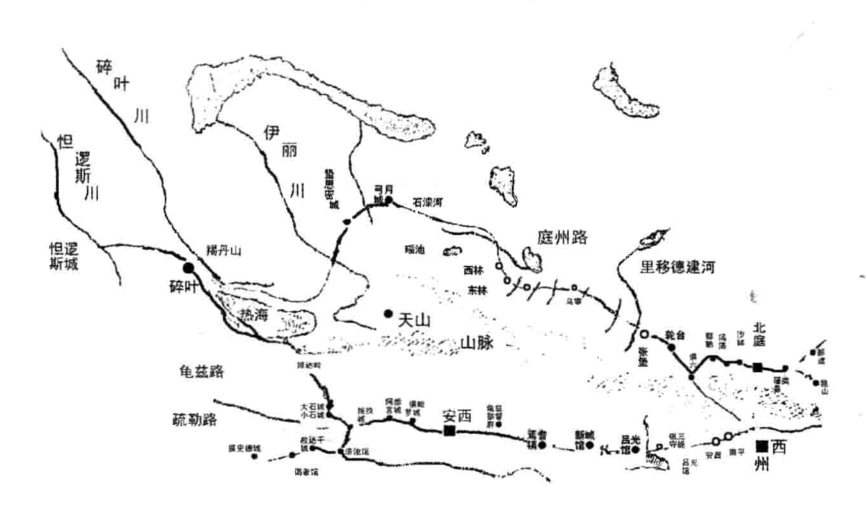


图 2-5-3　西州—安西—碎叶道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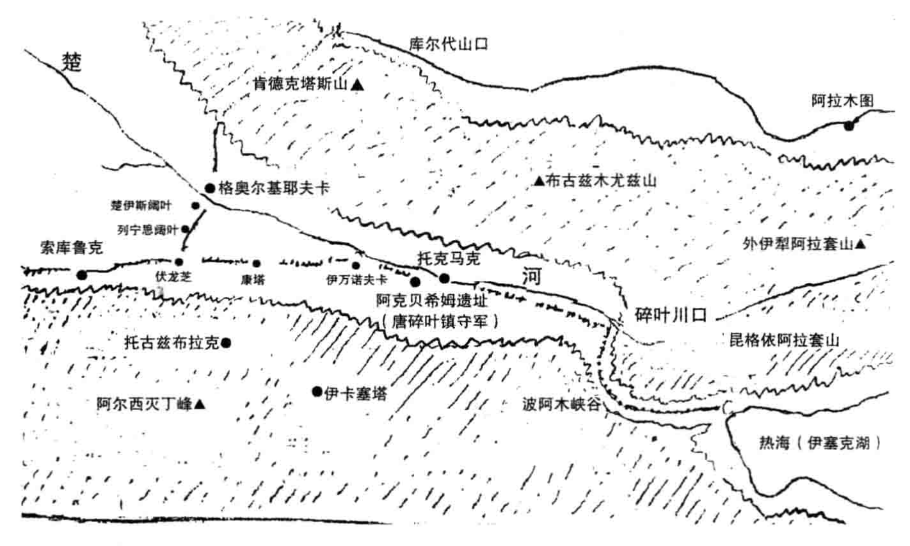


图 2-5-4 碎叶东西热海道

行。这是唐安西大都护府极盛时代的主要北道干线。

(2)疏勒路:疏勒为唐朝碛西中道的西部雄关,碎叶与此镇的交通由拨换城中转。其具体路线先沿热海南道之乏驴岭,过真珠河,越拔达岭,经大石城,南渡拨换中道而至拨换(今阿克苏稍北),其下段路程见于《新唐书》卷43《地理志》:"自拨换、碎叶西南渡浑河百八十里有济浊馆,故和平铺也。又经故达干城百二十里至谒者馆,又六十里至据史德城,龟兹境也……曰郁头州的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经岐山三百四十里,至葭芦馆,又经达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城。"限于篇幅,此路不拟细加考证了。

(3)庭州路:此路自碎叶建镇以后商旅来往频繁,沿途守捉、城、镇相望,自碎叶划归北庭管辖以后,驰名世界的"丝路北道"所指殆此。《太平寰宇记》卷156记载其总路程自庭州"西至碎叶至突骑施牙庭三千六百八十里"。《新唐书》卷40《地理志》西州交河郡条下更详记其沿途所经,十分具体:

> 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至张堡城守捉,又渡

里移得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民十里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蛰思蜜城，渡伊丽河，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水皆北流入碛，及入夷播海。

此路总里程有所缺漏，应以《太平寰宇记》所载为准。其所过城堡山川，据笔者考证，乃自庭州（吉木萨尔县后堡子古城），西经沙钵守捉（八家地古城）、冯洛守捉（滋泥泉古城）、耶勒守捉（良种场古城）、俱六守捉（米泉古城）、轮台县（昌吉古城），然后西渡里移得建河（又作曳咥河，乃其急读，今玛纳斯河）、白杨河（沙雅西之巴音沟河）、叶叶河（库尔图河）、黑水（精河），过黄草泊（艾比湖），渡石漆河（博尔塔拉河），逾车岭（自今洪别林山口翻过阿史那拉套山），经弓月城，过北思浑川（《唐书》之思浑川有二，南思浑川指塔里木河，北思浑川指卡腊塔儿河支流）、伊丽河（伊犁河），经热海（伊塞克湖）北岸，过碎叶川口（楚河河口）而至碎叶。

（4）怛逻斯路：突骑施汗国先建牙于碎叶，后来西移至怛逻斯，傍中亚名川怛逻斯河而建，自此西可直通大秦（东罗马），折而南，经河中地可达大食（阿拉伯）所据的呼罗珊。天宝十载（751）唐与大食之间的中亚历史性决战就发生于此。《新唐书・地理志》详记碎叶至此的具体里程：

自碎叶西四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日地至顿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曳建城，又五十里至怛逻斯城。

除此四道外，似乎还有一条通向漠北突厥牙帐的奇路，见于突厥儒尼文《阙特勤碑》：“余往征突骑施，越金山山林，至额尔齐斯河外，余扑击……突骑施可汗之军队如火如风而来，吾等战于 Bolca，余杀可汗于彼，暨其叶护及设。”此路乃由漠北，翻越阿尔泰山，渡额尔齐斯河，未经热海，翻肯特克塔斯山直插碎叶，沿途皆为荒原，并非正常畅通的大道。

关于碎叶城的具体地望,学术界现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以法国人沙畹为代表的传统意见认为即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吐虎玛克,另一法国人韩百诗更进一步确定即为吐虎玛克西南8公里的阿克贝希姆遗址。另一派意见乃近年吴震同志所主张。谓即伏龙芝北,格奥尔基耶夫卡之南的楚伊斯阔叶(чуиской),理由是"楚伊"(чуи)即"吹"河音译,亦即古碎叶水音译,斯阔叶(ской)乃词尾,则此音仍存碎叶古音。[1] 二者皆持之有故。然史书所记之碎叶城的具体地望特征有三:(1)热海西;(2)碎叶川南;(3)北有羯丹山。若以布古兹木尤兹山比定为羯丹山,阿克贝希姆遗址恰可比定为古碎叶城遗址,经吉尔吉斯考古学与民族学综合考察队清理,发现有东、西二城,其中西城上限恰可上溯至公元5世纪。衰落后,东城始建,此后西城又复兴,城垣尽加整修。其城周约2000米,其规模亦与轮台、蒲类诸城相侔,且有重建痕迹,正与《王方翼传》所记相合,所谓王方翼"筑城",不过整修而已,否则绝不会"五旬而就"。至于楚伊斯阔叶虽与碎叶对音相合,却尚未发现足资勘比的古城遗址,因此,仍暂守旧说。

碎叶既为唐朝西北边防重镇,此镇究属何等建置级别呢?

《新唐书》卷50《兵志》记载:"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又记"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据此,镇本唐朝最低级的边防驻屯军单位,其长官称镇将,官仅七八品,如郝遮镇使、蒲类镇使、咸泉镇使都是这样的单位。但安西四镇却乃各自统领数千乃至万人以上兵马的军事单位,其主军长官不称镇使,而称镇守使,或镇守军使。《唐六典》卷30记载:"凡镇皆有使一人,万人以上置司马、仓曹、兵曹、参军各一人,五千以下减司马。凡诸军镇每五百人置押管一人,一千以上置子总管一人,五千以上置总管一人。凡诸军镇使、副使已上皆四年一替,押官随兵交替的副使、总管、折冲以上官充,子将已上取果毅以上充。凡诸军镇大使、副使已上皆有傔人、别奏,以为之使,大使三品以上,傔人二十五人,别奏十人。"碎叶镇显然不同于上述低级

---

〔1〕《唐碎叶镇城析疑》,载《新疆历史论文集》,页131~175。

军事单位的“镇”，而是这种高级军镇，或“镇守军”，安西四镇实为安西四镇守军的简称。镇守使官阶三品，与都护平级，而与镇将品级悬殊。以故初期的碎叶镇守使皆由安西都护或金山都护兼领，如王方翼、杜怀宝等皆自兼镇守使，后始设为专职官员，而任此职者皆为品阶相当高的戍边大将。详见表 2－5－3：

表 2－5－3　碎叶镇守使

姓名	任职年代	官衔	史料根据
韩思忠	延载元年（694）	碎叶镇守使	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泥孰俟斤等万余人。（《资治通鉴》卷 205，延载元年）
周以悌	景龙二年（708）	中郎将、碎叶镇守使、四镇经略使	无何，娑葛擅杀御史中丞冯嘉宾，殿中御史吕守素，破灭忠节，侵扰四镇，时碎叶镇守使周以悌率镇兵数百人（应为数千人）大破之，夺其所夺忠节及于阗部众数万口，奏到，上大悦，拜以左屯卫将军，仍以元振四镇经略使授之，敕书簿责元振。（《资治通鉴》卷 209，景龙三年） ［宗］楚客又奏周以悌代郭元振统众，征元振入朝。（《资治通鉴》卷 209，景龙二年）
吕休璟	景云元年（710）	右领军卫将军，兼检校北庭都护、碎叶镇守使、安抚十姓大使	右领军卫将军，兼检校北庭都护、碎叶镇守使、安抚十姓大使吕休璟，心如铁石，气横风雷，始则和戎之利，先得吾卿，终而逐虏之功，方邀汉将，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命吕休璟等北伐制》，见《全唐文》卷 253）
刘遐庆	开元四年（716）	碎叶镇守使	开元四年……会安西都护郭虔瓘与西突厥可汗史献、镇守使刘遐庆不叶，更相执奏。（《旧唐书》卷 98《杜暹传》）

以上诸人中，韩思忠调返内地后，出任河东主帅魏元忠副将，守石岭要塞；周以悌一度曾被擢为四镇经略大使，取代郭元振；吕休璟曾以

北庭大都护兼任碎叶镇守使,后又调任安西副大都护。这足以确证碎叶镇守使乃属于都护一级的高官,旧说唐之藩镇之设始于河朔三镇,而安西四镇皆以显官而拥重兵,实开河朔三镇的先河。关于碎叶镇城尚须做如下补充说明:

(1)城之规模略同于州治。天授元年(690)武则天向全国颁发《大云经》,令诸州各置大云寺。而杜环西行,曾目睹该城也建有大云寺,《世界境域志》亦载:"Sayab 乃一大村镇。"乾陵蕃人石像中还记录了碎叶州刺史的官号与人名,可见碎叶除置镇外,还设有碎叶州。故气象非凡。

(2)城中设有高级驻屯军建置。《新唐书》卷40《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条下注称"有保大军,屯碎叶城",又唐制万人以上置营田副使一人,经营屯田,而《唐六典》载安西、北庭、疏勒、焉耆、伊吾、天山皆有屯田,可知碎叶屯田亦必数量可观。

(3)碎叶曾为北道设关税之所,征西域胡,以财养军。史载王方翼初置碎叶,即曾广招西域商胡"悉献珍货[1]",而《新唐书·焉耆传》载开元七年(719)"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此年碎叶已弃置,故改由轮台收北道税,说明以前这一收税功能本由碎叶承担。

(4)碎叶城中及其附近有不少汉族移民。《李白墓志》反映早在隋末已有汉族移民流寓其地,至唐人数更多。《太平寰宇记》卷383引《广异记》:"[豆卢]荣之妻即金河公主也,公主曾下嫁辟叶(碎叶),辟叶内属,其王率公主归来。"此公主应指阿史那怀道女,其人虽为突厥族,但生长在汉地,并已被唐朝册立为和亲公主,列属宗籍,依此规格,随其陪嫁者必定有大量汉人。唐人记碎叶西尚有数小城,为突厥虏去的汉人保聚其地,"尚华语[2]",耶律楚材《西游录》亦载碎叶西有唐节度参谋检校刑部员外郎、假绯鱼袋太原王济之碑。凡此种种,都反映出碎叶镇建置之后,显示出唐文明强烈光照的痕迹。

---

〔1〕《新唐书》卷111《王方翼传》,页4315。

〔2〕《大唐西域记》卷2。

5.6　吉尔吉斯斯坦发现的唐碎叶文献

前文所述，基本上都是根据我国传统文献所获研究成果，直至20世纪末，日本学者内藤みとり女士访问新疆，获其赠书，才初步接触到吉尔吉斯斯坦有关碎叶的考古学发现，其后，在《北庭历史文化研究》写作期间，上海古籍出版社资深编辑府宪展又寄来了有关俄文资料，知识上出现了新的飞跃。现将有关国外研究成果缕述如下：

俄文著述《素叶》的出版与大云寺的兴建：



2－5－5　**俄文专著《素叶》**

此书主要内容是全面叙述了苏联时期在阿克贝希姆和虎思斡耳朵两处遗址有关唐碎叶城与西辽帝国前期出土的汉文碑铭及西辽文书，其中最有价值的考古发现约有以下一些：

这一佛龛显然与武周时期全国各州普遍创建大云寺的政策有关，碎叶属于州级建置，说明碎叶大云寺必定初建于武周时期，这座佛龛就是大云寺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周时期册拜的封疆大吏安西都护杜怀宝就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推行者。

王方翼纪功碑乃是阿克贝希姆遗址另一重要考古发现。其内容为《全唐文》同名王方翼碑所不载，该碑刻字尚较清晰，全碑如下：



图 2－5－6　碎叶大云寺佛龛造像



Рис. 2. Стела из Ак-Бешима. Прорисовка

图 2－5－7　碎叶王方翼纪功碑

该碑总约6行：

[1]□滜无涯而

[2]前庭与后庭伊蕞尔之

[3]特急以成劳乃西顾而授

[4]逐别蹛林而已，远望阴

[5]天之旧物览□□之仙

[6]我指期于（下阙）

据此，该碑所记必为王方翼血战热海之役。

至于杜怀宝碑，见以下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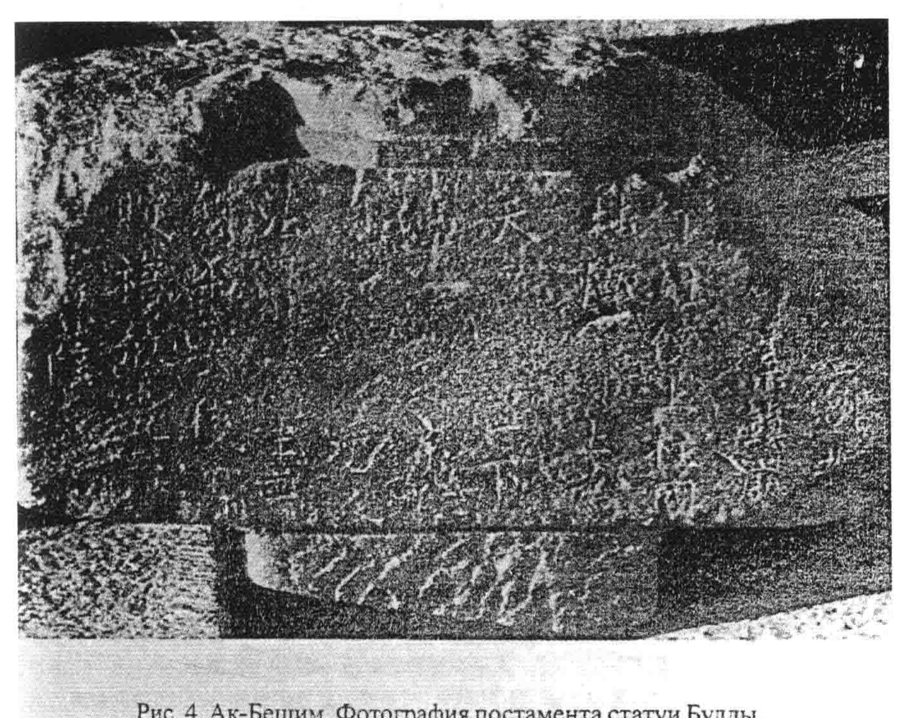


Рис. 4. Ак-Бешим. Фотография постамента статуи Будды

图2－5－8　杜怀宝为母祈福碑



图 2-5-9 碎叶镇杜怀宝碑文摹本

(《新疆社会科学》1984 年第 4 期同名文改写,照片、地图为今所增补)

6　唐轮台的定位与庭州—碎叶道

庭州—碎叶道是始辟于唐朝，贯通天山北麓的东、西交通大道，唐轮台县[1]即为地当此道的庭州下属重镇，开元七年(719)后更演变为征收北道商税的雄关，西辽、蒙元，直到准噶尔汗国时期仍在继续通行。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城名已改用突厥语，庭州改称为鳖失把，别失八里，轮台则改称为昌八里、彰八里，张堡改称为仰吉八里，地名虽改，故址依旧。解决唐轮台、辽、元时期的昌八里、彰八里的故址，必须由此入手，且须以具有断代价值的出土文物为主要佐证。对于这一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热议以来，至今已近40年，先后出现过米泉古城说[2]、乌拉泊古城说[3]、昌吉古城说[4]，此外，还有更早时间提出的

---

〔1〕我国历史上有三个轮台，一是天山南麓的汉轮台，乃汉军的屯田基地，位于今轮台县南大沙漠中，这个汉轮台地在天山南麓，不可能与天山北麓的庭州有关。二是唐轮台州都督府，《新唐书》卷43“轮台州都督府，金满州都督府永徽五年以处月部落置为州，隶轮台。”这个由西突厥游牧部落处月部改置的唐轮台州都督府，逐水草而居，根本不存在故址问题。本文研究的对象局限于庭州下属的轮台县。

〔2〕王有德：《岑参诗中的轮台及其他》，载《文史哲》，1978年第5期。同氏《再谈唐代轮台问题——兼与林必成同志商榷》，载《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3期，所言古城位于米泉市古牧地镇境内，东南距镇政府约8公里。一作下沙河古城。建于开阔地上，东临沙河。东西宽约310米，南北长约550米，周长约1740米。西墙、北墙保存较完整，东墙唯留偏北一角，南墙无存，夯筑，层厚0.05~0.1米，墙基宽6~7米。西墙和北墙有马面十余个，北墙中部开有城门。西南、西北、东北三面有角楼遗迹，西南角楼为遗址最高点，长约16米，宽约12米，高约6米，地面散有带花纹图案的残瓦片及青砖残块。出土文物主要有陶器、铜器、铁器、钱币等。

〔3〕林必成：《唐代“轮台”初探》，载《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4期。此后，刘维钧《轮台和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4期)，陈戈《唐轮台在哪里》(《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3期)，钱伯泉《轮台的地理位置与乌鲁木齐渊源考》(《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1期)，苏北海《岑参〈轮台歌〉的几个考证》(《人文杂志》，1984年1期)，徐百成《读诗试考唐轮台地望》(《新疆经济报》，1992年3月21日)等皆支持此说。

〔4〕薛宗正：《唐轮台名实核正》，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阜康古城说[1]，至今诸说俱寂，唯乌拉泊与昌吉古城二说争议尚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症结，必须从尊重轮台地当碎叶—庭州道这一基本史实出发，无视于此，无视出土文物是决定性物证，妄加臆测，只能误入歧途。

6.1　地当庭州—碎叶道的唐轮台县

关于唐轮台县的具体方位，《新唐书》卷40《地理志》中以下文字应是最明确的权威记载：

自庭州西延城六十里有沙钵守捉[2]，又有冯洛城守捉[3]，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守捉[4]，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日地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蛰失蜜城，渡伊丽河，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

据此，唐轮台县最基本特点是地当北庭（今吉木萨尔后堡子古城）至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古城）的大路，史称庭州—碎叶道。而自庭州经蒲类县东行入山，穿行赤谷山道，历独山守捉、龙泉、长泉出赤谷，翻乏驴岭，至罗护守捉，与伊西道合[5]，可直通中原。碎叶—庭州道又与翻越金山，直通漠北回鹘牙庭州的回鹘道相连，安史之

［1］陈澄之：《新疆行》，载《新疆日报》，1948年8月26日。

［2］《元和郡县志》卷40《陇右道》记云："沙钵镇在州西五十里当碎叶路，下郭下下，南至州十八里下，东至州四十二里。"

［3］《元和郡县志》卷40《陇右道》记云："凭落镇在州西三百七十里。"其说不可信，不取。

［4］《元和郡县志》卷40《陇右道》记云："俱六镇在州西二百四十里当碎叶路。"其说不可信，不取。

［5］《新唐书》卷40《地理志》："伊州伊吾郡，下。本西伊州，贞观六年更名……县三……纳职……自县西经独泉、东华、西华驼泉，渡茨萁水，过神泉，三百九十里有罗护守捉；又西南经达匪草堆，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与伊西路合。别自罗护守捉西北上乏驴领，百二十里至赤谷；又出谷口，经长泉、龙泉，百八十里有独山守捉；又经蒲类，百六十里至北庭都护府。"

乱后，伊州河西道阻绝不通，又可绕行回鹘牙庭，南下三受降城，直通长安，北庭、安西二府变为飞地之后，二庭将士都是通过此道与内地朝廷取得联系。别见于《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

> 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又五百里至鸊鹈泉，又十里入碛，经麚鹿山、鹿耳山、错甲山，八百里至山燕子井。又西北经密粟山、达旦泊、野马泊、可汗泉、横岭、绵泉、镜泊，七百里至回鹘衙帐。

碎叶归唐名义上始于显庆三年（658），是岁唐军荡平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在碎叶创立濛池都护府，册拜降唐西突厥首领继往绝可汗一世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1]。然阿史那贺鲁虽败，真珠叶护可汗势力尚存，志在复国，其时已攻入碎叶，阿史那步真仍未能真正赴碎叶就职，至显庆四年（659），唐朝所册兴昔亡可汗一世兼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千里驰援，"显庆四年三月，壬午，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与真珠叶护战于双河，斩真珠叶护"。可见唐朝所册继往绝可汗一世兼首任濛池都护阿史那步真正式主政碎叶始于此年。而唐朝所册兴昔亡可汗一世兼首任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就驻节庭州，自此碎叶—庭州道初步形成。

然至龙朔二年（662）吐蕃攻陷唐朝初置之安西大都护府，西域局势一度逆转，同年，兴昔亡可汗一世兼首任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死，其牙将阿史那都支叛唐附蕃，一度攻陷庭州，杀刺史来济。乾封二年（667）继往绝可汗一世兼首任濛池都护阿史那步真又死，其旧将李遮匐（阿史那遮匐）亦叛唐附蕃，庭州—碎叶道一度梗阻不通。

---

[1] 据《新唐书》《旧唐书》《通典》及《资治通鉴》所载，二羁縻可汗与二羁縻都护之置似乎皆为显庆二年（657）事，其实二者有先后之别。该年十月天皇下达诏书："……西域总平，贺鲁父子既已擒获，诸大部落，须有统领。卿等早归阙庭，久参侍卫，深感恩义，甚知法式。所以立卿等为一部可汗。"见于《旧唐书》卷，页5188。据此可知，唐朝册立二羁縻可汗时尚未创置二羁縻都护，故诏书中对后者只字不提。可见唐朝实乃先册西突厥两厢可汗，后册西突厥二羁縻都护。校以《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明记二羁縻都护府之置乃显庆三年二月"甲寅，西域平，以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复于龟兹国置安西都护府"事。可见阿史那步真以显庆二年十月份封继往绝可汗，至显庆三年二月甲寅日加拜濛池都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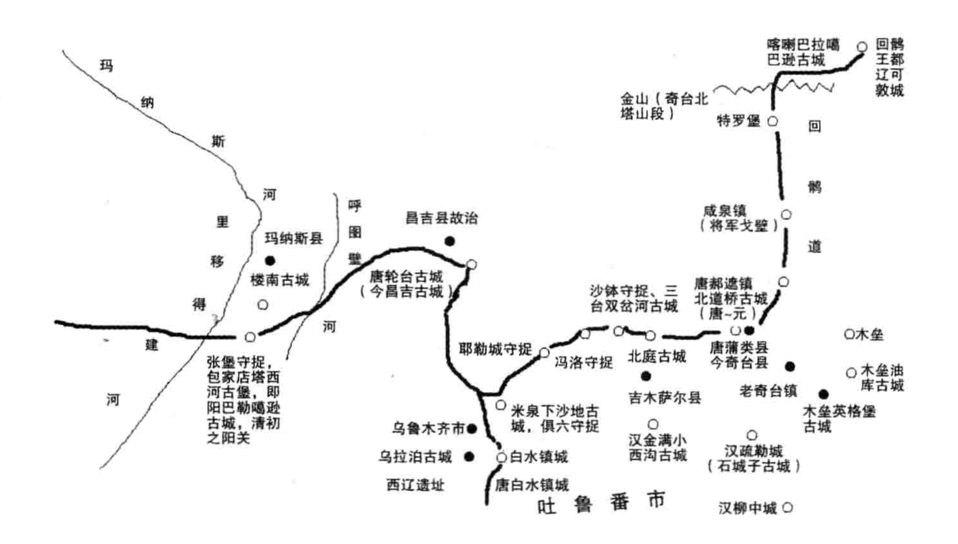


图 2-6-1 碎叶北庭道东段及庭州回鹘道



图 2-6-2 庭州碎叶道西段(张堡—碎叶)

碎叶—庭州道的再度畅通始自调露元年(679)裴行俭平定阿史那都支、李遮匐等附蕃西突厥两厢可汗之后,再置安西四镇,并以碎叶取代焉耆,重修城郭,备列安西四镇的历史产物。史载此年,裴行俭受任"册送波斯王,仍为安抚大食使。至西州,人吏郊迎,行俭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随己而西,扬言给其下曰:'今正炎蒸,热坂难冒,自秋凉之

后，方可渐行。’都支觇知遂不设备”。[1] 裴行俭遂以行猎为名，秘密募军，“蕃酋子弟投募者仅万人。行俭假为畋游，较试部伍，数日遂倍道而进，去都支部落十余里，先遣都支使，亲问其安否，外示闲暇，似非讨袭，续又使唤人从召相见。都支先与遮匐通谋，秋中拟拒汉使，卒闻军到，计无所出，自率子侄、首领等五百余骑就营来谒，遂擒之。是日，传其契箭，召诸部酋长悉诣命，并执送碎叶城，简其精骑，赍粮，晓夜前进，掩袭遮匐，匐闻都支就擒，据诣行俭降。于是将吏以下，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2] 奏凯还朝，留其副将王方翼为安西都护，驻碎叶。“行俭军还，方翼始筑碎叶镇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西域胡夷竞来观之，因献方物。”[3] 自此，天山北麓的东、西交通大道已畅通无阻。沿途守捉相望，驿马飞驰，所过山川，路途都非常清晰，显然是一条直线通道。兹举出自独山守捉至张堡守捉，结合迄今发现的考古遗址、出土文物，自东至西，屡列如下：

（1）独山守捉：应在今木垒县境，现新疆考古界已将木垒油库古城定为独山古城，位于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城南 2 公里处。全城周长 2800 米，呈长方形，现已残缺不全。南北城墙长 800 米，东西城墙长 600 米，夯筑，夯层超过 18 米，城外可见护城河遗迹。东面为照壁山，又名独山，乃唐初在天山北路所建 10 个守捉城之一的独山守捉城，直至蒙古西征，独山城仍具一定规模。其说的首倡者为戴良佐[4]，笔者初亦追随其说，然其夯层实已超出唐朝厚度，具有西辽特征，出土物亦无一可以印证为唐城者，且其城垣过大[5]，超出蒲类县规模，据笔者判断，该城有可能是《元史·哈剌亦哈北鲁传》所记之西辽所筑，元初再建之独

---

[1]《册府元龟》卷 366《将帅部·机略六》，页 4355。

[2]《册府元龟》卷 366《将帅部·机略六》，页 4355。

[3]《册府元龟》卷 410《将帅部·壁垒》，页 4874。

[4]戴氏原文名《独山城考察记》，载南京大学所辑《元史论文集》。

[5]木垒油库古城位于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城南 2 公里处。全城周长 2800 米，呈长方形，现已残缺不全。南北城墙长 800 米，东西城墙长 600 米，城外可见护城河遗迹。东面为照壁山，又名独山，以此戴良佐推断为唐独山守捉城，得到许多专家的认可。笔者先亦采纳其说，现在详考唐朝在天山北麓所建守捉城鲜有长达 600 米者，至于 800 米更是绝无仅有，且无典型唐朝出土文物佐证，疑此乃西辽时期所建。

山城,并非唐之独山守捉。

而在木垒新户另有一座古城,今已基本破坏,仅存一段城垣,难以判断全城规模,因此至今未引起考古学家注目。笔者自新疆博物馆王博先生处得到照片,参照出土的莲花砖、红陶单耳瓶、双耳缸,足以断定这座古城才是真正的唐代独山守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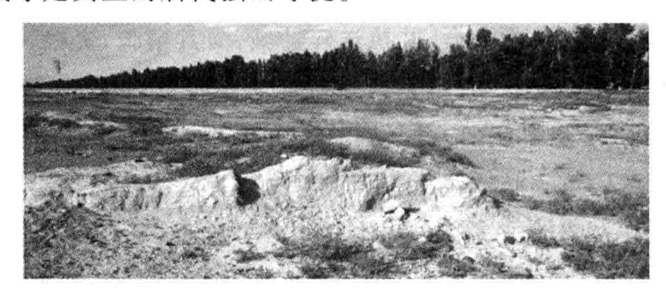


图2-6-3　木垒新户古城(唐独山守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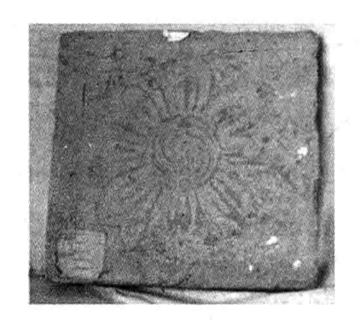


图2-6-4　木垒新户出土唐莲花砖1



图2-6-5　木垒新户出土唐莲花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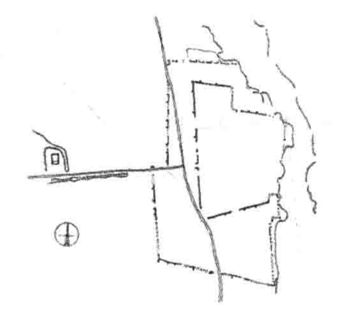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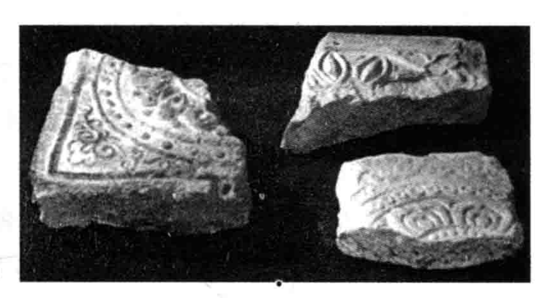


图2-6-6　北庭故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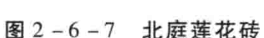


图 2-6-7　北庭莲花砖

图 2-6-8　北庭莲花砖残片

（2）唐蒲类县城：即今奇台县唐朝墩古城。别详他文，此处不赘述。

（3）北庭故城（别失八里）：别详他文，可参照，此处不赘述。

（4）吉木萨尔沙钵守捉城：本“庭州莫贺城”，也有的写作“庭州西莫贺城”，更为准确。

沙钵守捉遗址位于吉木萨尔县城西偏北 20 公里，庆阳湖乡镇双河街上村东北 2 公里的平原地带。遗址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四周残垣清晰可辨，南北长 100 米，东西宽 70 米，东、西二侧有城门痕迹。残高 0.8～1.2 米，宽 2～3 米不等。出土器物有红面素陶、灰陶和古钱。当地称“唐朝城”，确为唐代建造，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地望相符。本是唐朝一个守捉城，“沙钵城守捉”之名显然同阿史那贺鲁所领沙钵罗叶护名号有关。莫贺城应当是阿史那贺鲁降唐前的旧名，这座城规模很小，根本不足以作为瑶池都督府的牙庭。所谓“处之于庭州[西]莫贺城”所指应当理解为在此处举行了沙钵罗叶护降唐的仪式，亦即阿史那贺鲁的受降地点，自此后正式更名沙钵城守捉。

（5）吉木萨尔冯洛守捉：冯洛遗址位于吉木萨尔县三台镇冯洛村北部，南距三台镇约 6 公里。地理坐标：东经 88°54′49″，北纬 44°08′13″。海拔高度 620 米。源于天山深处的大龙沟河出沟口后支流甚多，呈放射状南流，三台镇及镇北部的平原地带渠流如网，水草丰茂。遗址

即位于三台镇北约6公里的一处三面临水的河间台地上,其东为东沟,西为蘑菇湖,北为东沟与蘑菇湖水相汇处。遗址墙垣尚存,广而大,呈长方形,东、西、北三墙垣平直,南墙呈内凹弧形。方向正北。墙夯筑,夯层为5~6厘米。北墙较高,今残高2.5米许,基宽约10米,西墙外侧可见马处外突的小土墩,似为马面,间距约40米,中部有一内突的大土墩,西南、西北角处有外突的土堆,疑为角楼残迹,南墙中段有较宽的豁口,似为城门所在。一条乡间简易公路由此南北穿越该遗址。遗址内地表有些夹砂红、灰陶片,其质地、器形与沙钵城守捉遗址和北庭古城的相似。其范围,南北长约260米,东西宽约150米。吉木萨尔县文管所认为,该遗址为唐代的冯洛守捉,1984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对于将该遗址定为冯洛守捉,尚似缺乏一些充足的证据。该遗址西南约1公里处的蘑菇湖西岸,有八家地遗址,文化面貌大致相同。有人认为应是八家地遗址。



图2-6-9　吉木萨尔沙钵守捉



图2-6-10　吉木萨尔冯洛守捉

(6)耶勒守捉城:据里程,应在今阜康县境内,该地有古城两座:一

座是距今乌鲁木齐—奇台公路线不远、天池乡的六运古城，新疆考古界大多数赞成该城就是耶勒守捉城；另一座在今阜康县北，今命名为阜北古城，紧傍九沟十八坡一带，旧有古路与冯洛守捉相连，20世纪末健在的老人称之为唐朝路，笔者多次想考察此路未果，近承王博先生赠所拍阜北古城照片及出土文物，确定这才是真正的耶勒城守捉所在地。戴良佐[1]则以阜康滋泥泉古城[2]为耶勒守捉，俱六守捉为六运古城，同样位居碎叶路上的米泉古城则无可位置，其说不全取。这些都是轮台之东的城堡。至于张堡守捉，《新疆图志》早就断定其地在今玛纳斯境内。凡此种种都已得到地面遗址的印证，都一律位于唐碎叶路上，无一例外。这就足以表明，唐轮台县的位置只能在这条大路上而不能在其他地点。

(7)俱六城守捉(米泉下沙河古城)：位于米泉市古牧地镇境内，东南距镇政府约8公里。一作下沙河古城。建于开阔地上，东临沙河。东西宽约310米，南北长约550米，周长约1740米。西墙、北墙保存较完整，东墙唯留偏北一角，南墙无存，夯筑，层厚0.05～0.1米，墙基宽6～7米。西墙和北墙有马面十余个，北墙中部开有城门。西南、西北、东北三面有角楼遗迹，西南角楼为遗址最高点，长约16米，宽约12米，高约6米，地面散有带花纹图案的残瓦片及青砖残块。出土文物主要有陶器、铜器、铁器、钱币等。



图2-6-11　阜康阜北古城(耶勒城守捉)

[1]戴良佐：《唐代庭州守捉城略考》，载《新疆文物》，1989年第1期。

[2]滋泥泉古城：阜康县东北10公里双泉大队、临河大队，东临双河岔，南北140米，东西120米，残墙高3米，厚10米。



图 2-6-12　阜康县阜北古城出土唐陶器 1



图 2-6-13　阜康县阜北古城出土陶器 2



图 2-6-14　米泉下沙河古城(俱六守捉)



图 2-6-15　米泉下沙河古城东北角楼(东南—西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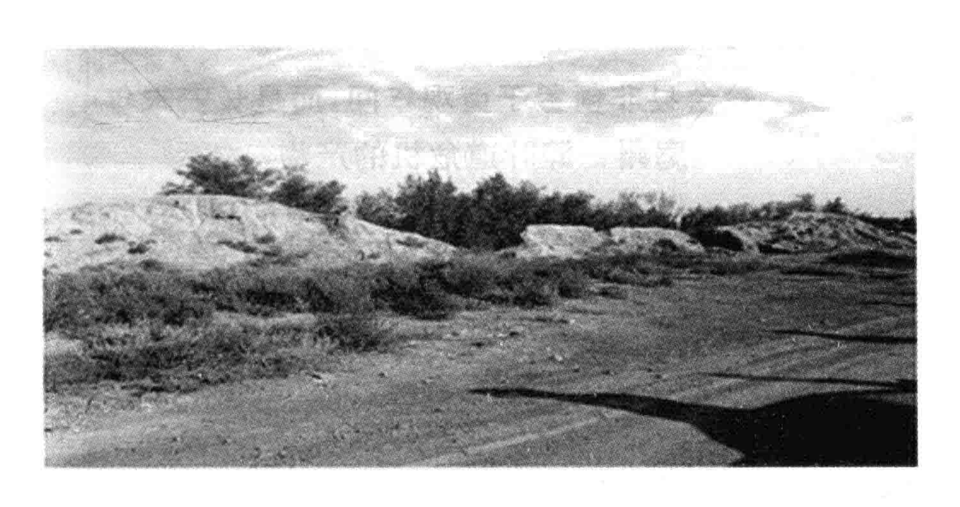


图 2-6-16　昌吉古城(轮台故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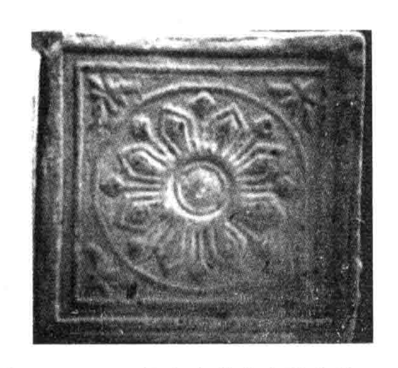


图 2-6-17　昌吉古城出土莲花砖 1



图 2-6-18　昌吉古城出土莲花砖 2

(8)轮台古城(辽、西辽、蒙、元时期的昌八里、彰八里古城,今昌吉古城)。

由此可知,北庭故城东可直通蒲类、独山,由此东接伊西道,既可出沙州,经河西走廊入长安,又可北接回鹘道,迂行漠北而直达唐廷。北庭以西诸守捉、县皆位于天山北麓庭州—碎叶道上,与史书所记方位正合,而乌拉泊古城则地不当庭州—碎叶道,而是地当白水涧道,与唐轮台根本不存在任何关系。

6.2 轮台县非创置于贞观年间，而是长安末年庭州—碎叶道危机的产物

关于轮台县始创时间我国史书历来存在着唐贞观年间和武周长安末年两种不同的记载，前者的根据主要是五代人刘昫主编的《旧唐书》卷40《地理志》：

轮台　取汉轮台为名。

蒲类　海名

已上三县，贞观十四年与庭州同置。

力主乌拉泊古城即唐轮台故址者大都支持轮台始置于贞观年间说，而另一重要正史《新唐书·地理志》却没有如上记载。唐轮台县始置于武周二年末的记载广泛见于《元和郡县志》卷40《陇右道·庭州北庭上》都护府条明确记载庭州领县三，所置时间却不尽相同。

管县三：后庭、蒲类、轮台。

后庭县贞观十四年于州南置蒲昌县，长安二年改为金蒲县，宝应元年改为后庭县。

蒲类县贞观十四年置，因蒲类海为名，先天二年为黙啜所陷，开元十四年复置。

轮台县长安二年置。

相同记载尚有《册府元龟》，如："二十二年二月西蕃沙钵罗叶护率众归附，四月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属于庭州。"[1]"二十二年西蕃沙钵罗叶护率众归附，以其俟斤屈裴禄为忠武将军。四月，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内属于庭州，拜为左骁卫大将军，赐其所部缯帛有差。"[2]可见三县所置时间不同，其中唐贞观年间仅置金满(后庭)、蒲类二县，轮台县则乃武周长安二年所置。

进而深究，以上金满、蒲类二县虽为庭州初建时期所置，然其具体

〔1〕《册府元龟》卷977《外臣部·降附》，页11480。

〔2〕《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来远》，页2052。

时间并非贞观十四年，而是贞观二十二年。对此，《唐会要》卷 73 安西都护府条下，页 1322 明确记载：

>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648 年 5 月 22 日)，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内附，置庭州。

《唐会要》为唐人所撰，可信程度显然远胜于五代人所撰《旧唐书》。同年同月同日并置金满、蒲类二县，可见唐太宗、高宗时期，轮台县皆未创置。证据如下：

(1)唐贞观十六年(642)“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既杀沙钵罗叶护，并其众，又击吐火罗，灭之。自恃强大，遂骄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将轻骑二千自乌骨邀击，败之。乙毗咄陆又遣处月、处密二部围天山；孝恪击走之，乘胜进拔处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降处密之众而归”。[1] 按此岁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入侵唐之伊州，显然兵发天山北麓，途中畅通无阻，如果其年庭州及其下属金满、蒲类、轮台诸县皆已创建，绝不会没有任何记载，足以说明其时庭州及其下属诸县尚未建置，且并无迂行乌鲁木齐峡谷的任何迹象。

(2)永淳元年壬午(682)“二月……西突厥阿史那车薄帅十姓反”，[2] 攻陷碎叶，唐安西都护杜怀宝东迁弓月，固守。“永淳元年四月：阿史那车薄围弓月，安西都护王方翼救之，三姓咽面与车薄合兵拒方翼，战于热海，分遣稗将袭破之，擒其酋长三百人，西突厥遂平。”[3] 时任安西都护为杜怀宝，王方翼时驻庭州，所领官衔非安西都护，而是金山都护兼庭州刺史，千里驰救，更绝无迂行乌鲁木齐峡谷之理，足证庭州—碎叶路乃是一条直线通道。

进须澄清庭州的前身虽为可汗浮图城，可汗浮图城归唐的时间虽然确与高昌改置为西州同为贞观十四年(640)事，但初置西州时唐朝并未在可汗浮图城留军屯守，不久复陷于西突厥，举可汗浮图城降唐之西突厥叶护阿史那步真亦应召入朝。其时天山北麓东段汉民很少，而

---

〔1〕《资治通鉴》卷 196《西突厥传》，页 4177。

〔2〕《资治通鉴》卷 202，永淳元年，页 6407。

〔3〕《唐会要》卷 94《西突厥》，页 1695。

创立庭州意味着天山北麓东段必须拥有足够编户纳税的汉民数量,可见唐贞观十四年庭州所在的天山北麓东段根本不具备置州立县的基本条件。史载唐贞观十六年郭孝恪继为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之后,始自西突厥手中夺取了处月俟斤所居之城,并大量迁徙汉民充实其地,只是此时,才有可能筹划创置庭州,但直至贞观十七八年间,天山北麓东段地区局势仍动荡不宁,易言之,这时的庭州也只能说是筹建阶段,而不能说业已创立。因此,五代人刘昫所著《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与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6《陇右道七》庭州条也都共同记载庭州的建置时间都与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降唐有关,易言之,阿史那贺鲁降唐之日,即为庭州创置之年,却错记为贞观二十年,然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降唐的时间实非贞观二十年,而是贞观二十二年。《唐会要》卷73,安西都护府条下明确记载:"[贞观]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内附,置庭州。"准确无误地记载可汗浮图改置为庭州的时间是贞观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即648年5月22日。同年同月同日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降唐。可见这一天既是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降唐之日,又是庭州初置之时。《唐会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断代典制体史籍,总100卷,虽题名宋王溥撰,实乃唐人苏冕《会要》40卷,崔铉监修、杨绍主笔的《续会要》40卷的增补,其中有关唐高宗至德宗九朝史事[1],皆出自唐人苏冕自写本朝史事的前40卷,较之五代,宋人所撰两唐书、《资治通鉴》应当可信得多。可见贞观十四年说的主要错误就在于将西突厥咄陆叶护阿史那步真与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混为一人。对庭州诸县的理解或即由此误导所致。

庭州始置于贞观二十二年,其中金满、蒲类二县皆与庭州建置同年,金满,地在今北庭故城,与北庭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及庭州同治,蒲类在庭州东,地在今奇台县东北角的唐朝墩古城,轮台地在庭州西,建置时间较金满、蒲类二县为迟。唐朝初年(指太宗贞观年间与高宗

---

[1]《唐会要》,中华书局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唐会要介绍,页1。

永徽、显庆、龙朔年间)犹为西突厥左厢咄陆诸部牧地,调露元年(679)裴行俭平定阿史那都支之后,始归隶唐朝治下,并在此经营民屯,故承袭汉屯田基地轮台旧名,[1]复据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40庭州条记云:“轮台县……长安二年置。”而《资治通鉴》卷207明确记载:“[长安二年]十二月……戊申(十六日,703年1月7日)北庭都护府于庭州。”说明唐轮台县的建置时间与北庭都护府的创置时间同时。此距长安四年(704)武曌退位之岁,依公历,仅余一年,依汉历亦仅二年,可见北庭都护府与轮台县创立之岁,并非武周皇朝盛世,而是这一皇朝行将灭亡,天山北麓形势空前严峻之时。且看以下史书记录:

> 长安三年……秋七月……时西突厥可汗解瑟罗用刑残酷,诸部不服。乌质勒本隶解瑟罗,号莫贺达干,能抚其众,诸部归之,解瑟罗不能制。乌质勒置都督二十员,各将兵七千人,屯碎叶西北;后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解瑟罗部众离散,因入朝,不敢复还,乌质勒悉并其地。

按阿史那解瑟罗乃武周所册主管西突厥右厢诸部的继往绝可汗二世兼第二任濛池都护,第一次主政碎叶为垂拱二年至天授元年(686—690)总五年,因东突厥西侵,失碎叶,而为其旧日部属,突骑施首领乌

[1]《旧唐书》卷40《地理志》,北庭都护府条下记曰:“轮台取汉轮台为名。”宋人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中亦记:“轮台县(西四百二十里,四乡)……以汉轮台为名。”

质勒所收复。[1] 曾建牙碎叶三年(天授元年至长寿元年,690—692)。第二次主政碎叶时间为圣历二年至长安三年(699—703),又是五年。这是阿史那斛瑟罗在碎叶威信扫地,突骑施首领乌质勒声名大振,而进入末世的武周皇朝举措失当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重要事件如下:

《资治通鉴》卷206,页6543~6544记圣历二年(699):

> 是岁,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匐为左厢察,骨笃禄子默矩为右厢察,各主兵二万馀人;其子匐俱为小可汗,位在两察上,主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馀人,又号为拓西可汗。[2]

匐俱,即默啜可汗之子泥涅,圣历二年受封为拓西可汗,昭示着东突厥再度进军西域,而处木昆部就游牧于碎叶城之东,匐俱既然降服了此部,说明碎叶城一度再被东突厥攻陷。而别据其他史料,此年

> 八月,癸丑,突骑施乌质勒遣其子遮弩入见。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3]

> 圣历中,突厥(应为突骑施)首领嗢鹿都督乌质勒移衙碎叶,

---

〔1〕天授元年(690)即武曌废唐立周之岁,东突厥颉跌利施可汗阿史那骨禄、裴罗达干阿史德元珍兴兵攻碎叶,《资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页646“冬十月,阿史那斛瑟罗部众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拜右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而至次岁天授二年(691)史书中却出现了两个存在密切关联的重大事件,一是“[阿史德]元珍等率兵讨突骑施,临阵战死,骨笃禄天授中卒。”见《太平寰宇记》卷196《突厥》下。二是斛瑟罗旧将突骑施首领“乌质勒善抚下,有威信,诸胡顺附,帐落寝盛,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叶西北,稍攻得碎叶,即徙其牙居之,谓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为小牙”。见《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下,页6066。说明东突厥可汗阿史那骨禄的负伤归国而死与阿史德元珍的阵亡,东突厥的全面退出西域与碎叶城的收复都是昔日阿史那斛罗治下异姓突厥部落突骑施首领乌质勒所建不世战功。长寿元年(692)王孝杰、阿史那忠节主持的武威道行军大败吐蕃,收复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等四镇时,碎叶犹为突骑施牙庭,至长寿二年(693)武周定置安西四镇时,四镇名单已不再是焉耆、龟兹、于阗、疏勒,而是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了,说明乌质勒已将碎叶归还武周。这一行动未必出自自愿,很可能是迫于阿史那斛瑟罗忠实党羽,同出阿史那氏的武威道行军副总管阿史那忠节的压力,当然这也同乌质勒始终忠于武周,不愿与之反目有关。而这也成为异姓突厥(黑突厥)首领的突骑施乌质勒自此与蓝突厥贵族阿史那氏结仇的主要原因。

〔2〕《唐会要》卷94《北突厥》,页1692则记为:“[圣历]二年,十月,默啜立其弟为左厢察,骨笃禄子默矩为右厢察,各主兵二万余,其子匐俱为小可汗,位在两察上,主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余,又号为拓西可汗”。此之“十月”,似为误记。

〔3〕《资治通鉴》卷206,圣历二年,页6540。《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页11341亦记:“八月突骑施乌质勒遣其子遮弩来朝。”

则天授以瑶池都督。[1]

据此，唐军撤离碎叶后，突骑施首领乌质勒成为抗击东突厥入侵西域的主力，此岁八月乌质勒之所以派遣次子遮弩入朝，必已收复碎叶，奏捷请功，以故大周神皇武曌立即遣使解琬，授以瑶池都护，并已许诺突骑施移牙碎叶，为其牙庭。这是周—唐皇朝放弃册立西突厥阿史那氏子孙，君临西突厥右厢部落的最初记录。然而突骑施乌质勒攻占碎叶的时间似乎非常短暂，同年冬，附蕃的西突厥首领暾叶护可汗[2]亲自入蕃请援：

冬，赞普驻于"兑"之"玛尔塘"，封赐忠心耿正文书，并颁赏物品，暾叶护可汗前来致礼。[3]

有学者认为这位暾叶护可汗应指阿史那俀子，而郭元振奏疏中云"吐蕃顷年亦册俀子及仆罗并拔布相次为可汗，亦不能招得十姓，皆自磨灭"。[4]笔者则认为此时之附蕃西突厥可汗早已不是阿史那俀子，或阿史那仆罗，而是阿史那拔布，而拔布与薄露同音，说明阿史那拔布出身于西突厥阿氏那氏派往西突厥右厢强部阿悉吉部，或阿悉吉部的监国吐屯，以故被吐蕃册拜为第三世附蕃西突厥可汗。至圣历三年庚子，武周改元为久视元年(700)：

及至鼠年……夏，赞普自蒙噶尔将牙帐下迁下枯零，孙可，遣送暾叶护可汗往突厥。[5]

据此，暾叶护可汗阿史那拔布(阿悉吉薄露)是在吐蕃大军护送下返回旧封，很快占领了碎叶，说明突骑施乌质勒不敌阿史那拔布与吐蕃的夹攻，通过苦战从东突厥手中夺回的碎叶又失守。这导致武周再度改变政策，再次拣起本已废弃的册立西突厥阿史那氏可汗子孙君临十姓的传统政策，再次发遣本已返朝的阿史那斛瑟罗第二次西返碎叶，并

---

[1]《册府元龟》卷967《外臣部·继袭二》，页11372。

[2]"暾叶护可汗"，王尧汉译本作"东叶护可汗"，必误。"东"应音译为"暾"，实指附蕃之西突厥可汗，与东突厥无关。

[3]《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载《大事记年》，页108。

[4]《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页3046。

[5]《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载《大事记年》，页108。

派遣汉将田扬名、封思业统兵护送,出现了武周久视元年,庚子“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罗为平西军大总管,镇碎叶”。[1]

同年闰七月与暾叶护可汗阿史那拔布在碎叶城外接战,汉将封思业先战,兵败,及田扬名与阿史那斛罗率武周蕃、汉主力到来,才转败为胜。九月,阿史那拔布势窘求降,诱而斩之,重新夺取了碎叶。

> 九月,左金吾将军田扬名,左台殿中侍御史封思业斩吐蕃阿悉吉薄露,传首神都。初,薄露将叛也,令扬名率兵讨之,军至碎叶城,薄露夜伏兵于城傍,掠官驼、马而去,思业追击之,翻为所败,俄而扬名与阿史那斛瑟罗、忠节率众大至,薄露据城拒守,扬名拔之,积十余日,薄露诈降,思业诱而斩焉,遂虏其部落。[2]

可见久视元年(700)阿史那斛瑟罗得以返回碎叶,主要得力于汉将田扬名、封思业,此二人官衔田为左金吾将军,封为左台殿中侍御史,皆乃原任虚职,其所领实职则史无明载。依笔者判断,封思业所领实衔应为碎叶镇守使,故攻碎叶由其打头阵,田扬名的实职应是安西都护,却未必是安西大都护。碎叶昔备安西四镇,而总统于安西,以上判断应是有根有据的。

阿史那斛瑟罗第二次返封碎叶,早已失去了初任继往绝可汗二世兼第二任濛池都护时期的锐气,这时,他的亲统部曲已残存无几,且久在汉地,战斗力低下,只有借助于曾出任武威道行军副总管,助王孝杰光复安西四镇的阿史那忠节,即胡禄屋酋长阿史那伽利支[3]的拥戴,而阿史那忠节早与西突厥右厢部落牧区的地方实力派首领突骑施乌质勒结怨已久,双方矛盾日益尖锐。显然双方各有理由:就阿史那斛瑟罗

---

〔1〕《资治通鉴》卷206,久视元年,页6545。《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页11341亦记圣历二年“司礼卿兼池州大都督竭忠事主可汗阿史那斛瑟罗为左卫大将军,仍充平西军大总管,镇抚碎叶”。

〔2〕《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五》,页11582。《资治通鉴》卷207,久视元年,页6550亦记是岁“阿悉吉薄露叛,遣左金吾将军田扬名、殿中侍御史封思业讨之。军至碎叶,薄露夜于城傍剽掠而去,思业将骑追之,反为所败。扬名引西突厥斛瑟罗之众攻其城,旬馀,不克。九月,薄露诈降,思业诱而斩之,遂俘其众”。

〔3〕薛宗正:《阿史那伽利支官符考释》,载《学术文萃》,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页172~178。

而言，他是主政碎叶的法定继承人；就乌质勒而言，曾受周封为瑶池都督，碎叶应为其牙庭所在。皆明载诏制，互不相让，双方矛盾激化，刀兵相向必定是迟早的事。

由此可见，北庭都护府的创立并非武周皇朝盛世的政治举措，而是这一皇朝即将灭亡，李唐皇朝即将全面复辟，碎叶—北庭道的军事威胁日益严重的历史产物。轮台与北庭都护府同置于长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戊申（703 年 1 月 7 日），说明轮台乃庭州的西部屏障，其位置必定位于庭州之西，扼碎叶—北庭道的正途，绝不可能远离此道，乃至位于庭州西南的，与碎叶无关的白水涧道上。

6.3 北道收税雄关的轮台及其考古学证据

上距北庭都护府与轮台县的建立仅两岁的长安五年正月初一壬午（705 年 1 月 30 日）改元神龙，正月二十一日癸卯（705 年 2 月 20 日）张柬之等率兵入宫，要求武曌交出政权，二十四日乙巳（2 月 22 日）武曌颁诏传位。二十五日丙午（2 月 23 日）李显再次登上皇帝宝座，"即皇帝位于通天宫"[1]，继续使用武曌所定神龙年号。二月初四甲寅（3 月 1 日）恢复唐朝国号。中宗的复位标志着武周国号的废止与唐朝的复辟，当年十二月武曌逝世。北庭都护府的存在时间虽然延亘于武周、唐和帝两朝，却仅有一任都护解琬，至唐中宗李显在位时期，其后任北庭主将杨何所领官职已不再是北庭都护，而是北庭大都护了，说明正三品的北庭都护府已正式晋级为从二品的北庭大都护府了。解琬何时自北庭都护任上征召入朝，虽然史无明载，然神龙二年十二月（707 年 1 月）犹以唐朝副使、御史中丞身份与安西大都护郭元振一起赴突骑施牙庭从事招抚乌质勒的活动，说明仍在北庭都护任上，而至景龙二年（708）唐与突骑施娑葛之间爆发战争，唐将张仁亶乘机挺进漠南，修筑三受降城，六旬而就。此与突骑施内争为同年事，相互必有联系。"六旬"即

---

〔1〕《旧唐书》卷 7《中宗纪》，页 136。

60天,自景龙二年三月默啜可汗扫境西伐之后推算,应当是当年五月末六月初,此与唐朝以周以悌代郭元振出任安西大都护,召北庭都护解琬入朝任监察御史的时间基本相合,且解琬以“与郭元振同官相善”著称,其免去北庭都护时间应与郭元振一度被免去安西大都护、金山道行军大总管是同一时间。以此判断,北庭晋级为大都护府,杨何出任北庭大都护就是景龙二年六月发生的事。可考的北庭大都护先后有杨何、吕休璟、阿史那献三人,其中杨何的事迹并未著录于两唐书,却见于元《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该书记丘处机奉诏西行谒见成吉思汗于阿富汗行营,途经鳖思马大城,即大唐时北庭都护府,城中仍存唐北庭大都护府杨公何的德政碑,景龙三年(709)立。[1] 按景龙二年突骑施娑葛与阿史那斛瑟罗余党,曾任武威道行军副总管的阿史那忠节,即阿史那伽利施开始兵戈相向,碎叶—庭州道动荡不宁,时任兵部尚书宗楚客力主助阿史那忠节,碎叶镇守使周以悌即其忠实追随者,时任北庭大都护杨何的“德政”,就是坚决不卷入这场冲突,从而避免了北庭、轮台的兵灾。此与时任安西大都护、力主“以和安边”的郭元振的政见殊途同归。终为唐和帝李显采纳,以故景龙三年杨何卸任北庭大都护之后,唐和帝李显已经明确改变政策,正式废弃了册立西突厥可汗家族阿史那氏子孙世代君临十姓故境的传统政策,改而正式册封了突骑施娑葛为突骑施十四姓可汗,并赐名突骑施守忠[2],开始任命张仁亶主持对后东突厥汗国的北伐,计划兵分三路,以杨何的继任者吕休璟为第二任北庭大都护[3],兼金山道行军大总管,任北伐西路军总指挥,突骑施娑葛则出任金山道前军大使。诏制曰:

> 金山道前军大使,特进、贺腊毗伽钦化可汗突骑施守忠,领诸蕃部落兵,健儿二十五骑,相知计会,逐便赴金山道。朔方道行军

---

〔1〕《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华道藏》47册,正一部,华夏出版社,页7:“景龙三年,杨公何为大都护,有德政。诸夷心服,惠及后人,于今赖之。有龙兴、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焕然可观。”

〔2〕《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页11342:“景龙三年,七月,遣使持节策授左骁卫将军兼卫尉卿金河王突骑施守忠归化可汗。”

〔3〕今存史料所记吕休璟的官号皆为“北庭都护”,而非“北庭大都护”,必漏一“大”字。则吕休璟实为第二任北庭大都护。

大总管、右武卫大将军、摄右台大夫、同中书门下三品、上柱国、韩国公张仁亶,文武将相,莫之与京,心腹大臣(一作爪牙),是所系赖,当分阃之任,受升坛之律……必能力簸穷海,声压大荒,刈谷蠡之庭,拔扶渠之垒,不遑渭桥之拜,已见阴山之哭,然则持旌节,执金鼓者,所以问不宾,诛首恶,而比夫不诫,复迷则凶,俾存开网之仁,预轸焚舟之叹,休璟所领兵马甲仗一事以上,仍依别敕处分,主者施行。[1]

这一北伐后东突厥汗国默啜可汗的诏制,说明唐朝计划于景龙四年(710)北伐东突厥,其中的主帅虽乃朔方军主将张仁亶,其西路军主将则乃第三任北庭大都护吕休璟,并准许原来以碎叶为牙庭的突骑施娑葛与突骑施遮弩穿行天山北麓碎叶—庭州道中的唐朝属境,即里移得建河以东的张堡—轮台—北庭地域,由唐朝控制将军戈壁的郝遮镇(今奇台北道桥古城)入将军戈壁,而后北上金山,会师漠北。可见娑葛、遮弩北征虽然通行唐之天山北麓地区,却也未曾经历白水涧道的乌拉泊古城,而这一诏制必定是绝密文件,不知为何,却绝密外露。至景龙四年北伐行动即将出师的前夕,唐和帝却突然崩逝,韦后专权,接着太平公主与李旦子李隆基武装夺权,杀韦后,易皇统,推举李显之弟、武曌之子李旦继位,是为睿宗李旦。此帝继位之后,立即废弃了北伐东突厥的雄伟计划,北征主帅张仁亶被免官致仕。默啜可汗乘机以求和亲麻痹唐朝,于突厥历猪年(景云二年辛亥,711,伊斯兰历93年,阙特勤26岁)遣将西征,击杀参加唐朝北伐计划的黠戛斯可汗于剑水流

[1]苏颋:《命吕休璟等北伐制》,景龙四年五月十五日,《唐大诏令集》卷130,页705。又见于《全唐文》卷253,页2562~2563,未署年代。《文苑英华》卷459《诏敕一·命将》,页2335~2336亦收此制,所署时间相同,文字亦基本相同。

域,接着攻入突骑施汗国,[1]突骑施娑葛、突骑施遮弩兄弟双双战败身死,[2]突骑施汗国一度解体,默啜之侄默棘连、阙特勤兄弟一度乘胜攻入大食势力范围的内亚地区,先胜后败,退返漠北[3]。大食乘胜反攻至七河流域,碎叶城一度落入胡禄屋部酋长都担之手,转臣于大食。这段史实反映出自景龙四年六月至开元元年间(710 年 7 月—713 年末)碎叶已非复唐朝所有,碎叶—庭州道梗阻不通。为了重新凿通这条直线贯通天山北麓的东、西交通干线,开元二年(714)唐朝第三任北庭大都护、兼首任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统率汉、蕃精兵远征碎叶,重新夺回了这座历史名城,斩都担,[4]唐明皇传令嘉奖。[5]这次战役,阿史那献发师北庭,直攻碎叶,亦不闻必须迂行白水涧道之说,可见其说本为子虚乌有。

阿史那献的西征业绩到了开元三年(715)已进入到辉煌的顶点,是岁,身兼碛西节使、北庭大都护两大要职的阿史那献又受命统一调度安西、北庭两道兵力,向大食发动了全面反攻。阿史那献亲统北庭汉、蕃健儿,别遣张孝嵩以监军身份,全权指挥安西四镇精兵,出拔汗那道,

---

[1]薛宗正:《唐伐默啜史事考索》,载《民族研究》,1988。

[2]突厥儒尼文《阙特勤碑》34 行末至 38 行:"当阙特勤二十六岁时,我们出击黠戛斯,从和矛一样深的雪中开道,越过曲漫山,我们袭击黠戛斯人于睡梦中。我们与其可汗战于浚鸡山。阙特勤骑拔野古的白牡马冲击……我们杀死了黠戛斯的可汗,取得了他的国家。那年为征讨突骑施,我们越过金山(Altun),渡过也儿唖斯河(Irtis,疑为《唐史・地理志》之里移得建河,即今玛纳斯河),袭击突骑施人于睡梦之中……阙特勤骑灰马进击。攻入[敌阵]……我们杀死了他们的可汗,取得了他们的国家。普通突骑施部众全部归顺了。"见薛宗正:《突厥稀见史料辑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页 511~512。

[3]突厥儒尼文《阙特勤碑》,39~40 行:"为了整顿粟特部众,我们渡过珍珠河,一直出征到铁门。[之后]突骑施部众叛,到达 Kaŋaras。当时我军马瘦,无食,坏人……袭击我们的勇士。当时我们很后悔只派了少数人随同阙特勤(下阙)。"见薛宗正:《突厥稀见史料辑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页 512。参阅《巴尔托里德文集》(俄文版)第 1 卷《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第二章《十二世纪以前的中亚》。

[4]《册府元龟》卷 133《帝王部・褒功二》,页 1606:"开元二年,六月丁卯,北庭大都护、瀚海军使阿史那献枭都担首献于阙下,并擒其拏及胡禄等部落,五万余帐,内属。帝降书谓献曰:'十姓部落,比多款附。蕞尔都担,独为背诞。卿以忠果,令其讨伐。遂斩首丧元,并儿及妇,兼复胡禄屋阙啜等五百余帐,壶浆塞陌,襁负而来。自非信著远蕃,何以翕然至此,边陲宁谧,繄卿是赖,虽郑吉之护南道,班超之临西域,无以过焉。言念勤劳,岂忘鉴寐。'"同样内容又见于《册府元龟》卷 358《将帅部・立功十一》,页 4244。《册府元龟》卷 170《帝王部・来远》,页 2053。

[5]《全唐文》卷 40,页 438,元宗:《赐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书》。

两军一度会师乌浒水北、米国南的铁门关要塞，而先胜后败，及大食组织了全面反攻，阿史那献的碛西节度使、北庭大都护、瀚海军使三大要职悉被罢免，仅保留了西突厥十姓可汗名号，早已威信荡然，张孝嵩返国后，不赏其功，反而获至牢狱之灾。加之开元四年(716)，唐朝又实行了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制度，自此以后，北庭大都护府降级为北庭都护府，安西虽然仍保持大都护府建置，但安西主将只能领正三品的安西副大都护官衔，与北庭都护平级。[1] 这一切都标志着唐朝反攻大食的败绩，但由于中亚大食名将屈底波已死，哈利发却迟迟未任新的呼罗珊总督，内亚局势一度陷入政治真空，原娑葛部将、车鼻施首领苏禄遂乘机复兴突骑施汗国。至开元四年，唐将薛讷、张知运、杨敬述三道出师，漠北回鹘、拔野古等部落乘机暴动，默啜可汗被杀于柳林，长期威胁唐朝北部边防的后东突厥汗国一度濒于危亡，大量东突厥部落远迁西域，苏禄乘机收容，实力顿强[2]，遂以“新来十姓大首领”[3]名义遣使通唐，并引起唐朝的高度关注，乃重建突骑施汗国，创建了这一汗国的车鼻施汗朝，又称黑姓突骑施。[4] 遣使通唐，却拒不接受阿史那献号令，阿史那献率所附之胡禄屋、葛逻禄部击之，全军败没，以上二部也并入突骑施汗国，迫使唐朝召阿史那献入朝，自此决心废止了册立西突厥可汗家族阿史那氏子孙主政西突厥两厢的过时政策，正式确立了册立突骑施汗国黑姓汗朝，以遏制大食势力东进的新政策。这一政策始于开元四年，此后急剧加快了步骤，开元六年(718)五月册封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员外置，封顺国公，金方道经略大使[5]，开元七年(719)十月，

---

〔1〕参阅薛宗正:《唐碛西节度使的置废——兼论开元年间唐朝对突骑施、大食政策的推移》,载《历史研究》,1993 年 6 月,页 16～33。

〔2〕《新唐书》卷 215 下《西突厥传》下,页 6067:“裒拾余众,自为可汗。苏禄善抚循其下,部种稍合。”复据《旧唐书》卷 194 下《西突厥传》下,页 5192,经此整合,“众至三十万”。

〔3〕《资治通鉴考异》,见《资治通鉴》卷 211,开元三年,页 6710,《考异》引《实录》。

〔4〕参阅薛宗正:《突骑施汗国的兴亡》,载《历史研究》,1984 年 3 月。同氏:《车鼻施的崛兴》,载《西北民族研究》,2000 年 2 月。

〔5〕《册府元龟》卷 964《外臣部·封册二》,页 11343。元宗皇帝:《封突骑施苏禄顺国公制》,《全唐文》卷 22,页 253 与此全同。

又"册金方道经略大使突骑施苏禄为忠顺可汗"。[1] 这意味着唐与突骑施之间已缔结了两国结盟共抗大食的密约,据开元十五年(727)吐火罗叶护奏疏中所言,两国间已达成了如下默契,为"防守天可汗西门""承天可汗处分突厥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其事若实,望天可汗却垂处分"。[2] 意即为了对抗大食,突骑施必须出兵,唐朝则必须给予全力支持,包括金帛军费等。同年,应安西节度使汤嘉惠奏,正式罢废碎叶镇,转交苏禄为突骑施汗国牙庭,仍以焉耆取代碎叶备列安西四镇,原碎叶—庭州道上所收商税,本在碎叶征收,此岁之后,改由位居庭州之西的轮台征收。[3] 这就是轮台取代碎叶成为丝路北道收取商税的西部雄关的深刻时代背景。轮台县在丝路北道的地位更空前提升,取代碎叶成为北道的征税雄关,吐鲁番阿斯塔那506号墓出土的一件题为《唐天宝十四载(755)郡仓中上载正月以后郡坊所请食料数牒》[4],背面编号97,右上角残存轮台县朱印一处,是现存轮台县印的文书复本。可知轮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仅次于北庭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或北庭节度府驻节地的庭州——今吉木萨尔县境内的北庭故城。轮台的位置必在碎叶—庭州道上,而不可能位于此道之南,否则粟特商人完全可以轻松逃税,北道商税怎能继续征收?可见这不仅是一条重要的军事通道,而且也是一条东西贸易极为频繁的商业大路。在开元七年以前,唐朝都是以碎叶作为收取过往商税的地点,至开元七年以后,则改以轮台作为商税的收取地点。商税为各镇军食所必资,故可断定关卡必设于大道正线的冲要地带。

进而列举轮台必位于庭州—碎叶道的考古学证据。

唐朝的州、县、守捉、城、镇规模依其级别的高低,存在着严格的区别。庭州即北庭大都护府所在地,城郭三重,规模宏大,故毋庸赘论,金满县与之同治,此外东有蒲类,西有轮台,其规模应当大体相当,其中轮

---

[1]《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页11343。

[2]《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页11723~11723。

[3]《新唐书》卷221上《焉耆传》,页6230:"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

[4]《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页158~169。

台的战略重要位置，决定了只能大于蒲类而不能小于蒲类，据《新唐书》卷40《地理志》记载："蒲类县百二十里至北庭都护府。"这一距离正与奇台县唐朝墩古城相当，当即唐蒲类县遗址。这座古城南北残长450米，东西残长400米，规模也远远大于乌拉泊古城。被林必成、徐百成等人力主的唐轮台故址乌拉泊古城至今保存完好，且是今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唯一现存较大古城遗址。据曾为新疆博物馆重要研究人员，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域考古权威之一的陈戈记述如下：

> 该古城位于乌鲁木齐南约15公里处，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约550米，东西约450米，周长约2000米。城墙夯筑，夯层厚6~12厘米。城墙基宽5~6米，残高5~8米。4个城角各有角楼遗迹，每面城墙均有密集的马面，东墙和西墙各有8个，北墙和南墙各有7个。每面城墙近中部开一城门，均系瓮城门。在城内偏北部又有两个小子城，靠西面的小子城呈长方形，南北约350米，东西约250米，周长约1200米。其北墙即外城北墙西段，上有四个马面和一瓮城门；西墙即外城西墙北段，上有七个马面；南墙有一个马面，并在偏东处开一城门；东墙有四个马面。靠东面的小子城呈正方形，边长约200米，周长约800米。其北墙即外城北墙东段，上有三个马面；东墙即外城东墙北段，上有三个马面；南墙无马面，但在中部开一瓮城门；西墙即西面小子城的东墙北段，上有三个马面。古城内陶片很多，其质地、风格与后堡子古城一致。同时还发现有完整的陶瓮、陶罐等，其形制与昌吉古城出土的基本相同。[1]

上述四座古城，除了在规模大小上有差别外，其余在构筑方法（均系夯筑，夯层厚薄基本一致）、形制结构（均呈长方形或方形，均有角楼和密集的马面，城门为瓮城门等）及出土遗物诸方面都是相同的，因

---

〔1〕陈戈：《唐轮台在哪里》，载《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考古研究所：《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此，它们的时代也是一样的。从各城出土的遗物来判断，这几座古城建于唐代，且均延续使用至元代。

引人注目的是，陈戈在论述乌拉泊古城建筑形制、出土遗物时都引证昌吉古城进行模拟，那么，昌吉古城究竟是怎样一座古城呢。

昌吉古城位于昌吉市东北角，老县城东侧，呈长方形，20 世纪 30 年代陈澄之来此考察，记其城垣尚全，且有二土墩，各高丈许。“本地人现在把这地方叫作唐朝城，如果有人在此从事一番考古发掘，必大有收获。但本地人至今极其固执地绝对禁止侵犯这一古城墉，他们的迷信是，犯则非雷雨交加，即本身病狂。即使真诚地告诉他们，这土中埋有黄金，这地下蕴藏着石油的苗脉，亦复不为之动。”[1] 1958 年笔者刚刚到达昌吉时，此城城堞俱全，巍然屹立，60—70 年代渐遭破坏。20 世纪陈戈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实测南北约 1000 米[2]，东西约 600 米，周长约 3200 米。城墙夯筑，夯层厚 6 ~ 8 厘米。城墙基宽 7 米左右，残高 3 ~ 6 米。4 个城角有角楼遗迹，每面城墙均有密集的马面。北墙保存较好，有 15 个马面，中部开一瓮城门。东墙北半部分残存 8 个马面，南半部分及南墙、西墙多毁坏无存，马面个数不明。城内陶片很多，其风格与后堡子古城相同。同时还发现有宋元时期的莲花纹方砖、阿拉伯文银币、元祐通宝铜钱和陶瓶、陶罐、陶碗等。[3] 20 世纪 80 年代后笔者再次到此考察时，遗址已遭严重破坏，仅余东墙约 500 米，北墙约 600 米，中心土墩尚存，残高亦不足 10 米。南部已为市区吞没，仅街南卫生学校院内尚残存土墩一座，与北墩相呼应。西部划为公园，当时尚有部分残墙，东、北二面城垣依稀可辨。城中不仅出土了唐朝莲花砖，而且发现了察合台银币 1370 枚，以及宋元钧窑碗残片、开元通宝、元祐通宝等。笔者曾在古城所在的昌吉食品厂院内发现莲花砖 200 余块，大部分成为居民家庭菜窖的窖盖，笔者曾采集两块，现已送

〔1〕陈澄之：《昌吉、奇台、呼图壁识略》，载《新中华》复刊 4 卷 14 期。

〔2〕1988 年昌吉市文物普查报告中已是南北长约 1100 米，东西宽约 600 米，城内仅余土墩三、土台二。

〔3〕陈戈：《唐轮台在哪里》，载《新疆大学学报》，1981 年第 3 期。

藏新疆考古研究所[1]。

考古文物是唐轮台城决定性的证据：莲花砖乃唐朝官府衙署的重要建筑器材，是据以断代的基本标识，北庭故城、龟兹故城中都出土了这种纹饰的红色方砖，根据现有发现，亘今昌吉自治州及乌鲁木齐市区，唯有吉木萨尔北庭故城和昌吉古城发现过这种高品阶的建筑材料。而在乌扎拉泊至今尚难以提供出典型的唐代遗物，那里的出土品中倒有一批属于西辽时代特征的文物，根本达不到唐代县级规模。两相比较，乌拉泊古城远逊昌吉古城。可见昌吉古城实为庭州下属诸县规模之冠，并有相应文物佐证，而乌拉泊古城的规模、出土文物也都与唐轮台难以挂钩。这足以说明乌拉泊古城根本不具备作为丝路北道商税雄关唐轮台县的资格。

6.4 辽宋蒙元时期的轮台已改称昌八里、彰八里

唐人所称的北庭，突厥语则另作别失八里，意即五城之地，早在唐玄宗时期，后东突厥汗国默啜可汗遣兵犯北庭，突厥儒尼文《毗伽可汗碑》第 28 行则记曰："我们在 Bolcu 开战，杀其可汗、叶护、设。占领其国，年三十，我出征别失巴里（bisbaliq），经六战，歼其全军，因［当地］部族求救（呼叫……），别失八里得免。"[2]按毗伽可汗 30 岁时，乃突厥历虎年，亦即唐开元二年甲寅，可见西域诸城自唐朝以来，就是汉名、突厥名、印欧语名一直长期共存，蒙元时期随着汉语的衰落和突厥—回鹘语的流行，沿途汉名已多废弃不用，改用其突厥—回鹘语城名。诸如北庭之名已改称为鳖失把、别失八里，张堡已改称为仰吉八里，余之蒲类、轮台等名称似亦发生变化。例如《元史》卷 63："［至元］二十三年，遣侍

〔1〕1980 年笔者考入新疆社会科学院以后，曾带此砖二块，移藏考古所，当时考古所长穆舜英见证此事。

〔2〕突厥儒尼文《毗伽可汗碑》，载薛宗正：《突厥稀见史料辑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页 518。

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失八里，置元帅府，即其地以总之。”条下，列有归属别失八里元帅府管理的以西军台名称，依次是彰八里（至元十五年，授朵鲁知金符，掌彰八里军站事）、古塔巴、仰吉八里。《新元史》卷44《地理六》所记略同而更详：“别失八里（《无经世大典》所附图在鲁古尘之北，本回鹘五城，为畏兀儿地。宪宗置行尚书省。至元二十年，改立宣慰司元帅。后为察合台后王属地）其西有彰八里。《大典图》在别失八里之西，由此而西为古塔巴，又西仰吉八里。” 清人徐松[1]、李光廷[2]、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松田寿男《论唐朝庭州的领县》[3]，寇田《唐代西域州县考》[4]都共同证实，彰八里、昌八里、昌八剌都是Janbalex城的不同汉译名。依旧使用汉名者，多为本地汉人或外来汉人，以故“轮台”汉名仍偶有重现。对此，全真派道士丘处机与契丹皇裔耶律楚材都曾沿唐朝庭州—碎叶路故道，西行谒见成吉思汗，并各自留有记录行踪的行记，其中丘处机弟子李守常所著《长春真人西游记》记鳖思马“西三百里有县，曰轮台”，耶律楚材《西游录》所记“别失把城西二百里为轮台县”。具体里程虽然不同，但皆记轮台位于庭州之西、碎叶之东交通孔道上始终未变。其中丘处机的行程所记最为清晰，内叙自鳖失马大城（北庭端府，即北庭都护府故城）沿庭州碎叶大道西行：

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轮台之东，迭屑头目来迎。南望阴山三峰，突兀倚天。因述诗赠书生李伯祥，生相人，诗云“三峰并起插云寒，四壁横陈远润盘。雪岭界天人不到，冰池耀日俗难观，人云，向此冰池之间观看则魂识昏昧。岩深可避刀兵害，其岩险固，逢乱世坚守，则得免其难，水汁能滋稼穑乾，下有泉源，可以灌溉田禾，每岁秋成（一作水众能滋稼穑乾）。名镇北方为第一，无人写向画图看。”又历二城，重九日，至回纥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儿与镇海

[1]徐松《西域水道记》：“昌吉县治……疑即彰八里地。”

[2]李光廷《汉西域图考》：“昌吉县，本宁边戍城……元之彰八里地也。”

[3]《天山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页292～323。

[4]《新亚细亚》10卷4期。

有旧，率诸部族及回绝僧皆远迎。既入，斋于台上。洎其夫人劝蒲萄酒，且献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许，其香味盖中国未有也。园蔬同中区。有僧来侍坐寸使译者问看何经典，僧一五，剃度受哇，礼佛为师。盖此以東，昔属唐，故西去无僧道。回绝但礼西方耳。[1]

此处明白记述，丘处机九月二日离开北庭故城，车行三日，至九月四日就已到达那个能南望三峰插天的博格达主峰所在地，其地应在今阜康县境内，其赋诗驿站必在唐耶勒守捉城，亦即今阜北古城，又历两城，其一必是俱六守捉，亦即今米泉县的下沙河古城，另一城唐时尚不存在，应是西辽时期所建，按米泉县尚有东河坝古城、铁厂沟镇八家户古城、潘家堡古城、苇子滩烂城子古城等，皆未全面考察，丘处机所经必为其中之一。

据此，丘处机西行，仅在耶勒守捉（阜北古城），沿山稍许南折，经米泉，遂即斜道北上，根本无须绕行位扼白水涧道谷口的乌拉泊古城，至九月九日已安抵昌八剌城（昌八里）。从行记内容判断，该城应是鳖失把大城之西，属于别失八里畏兀儿国西部重镇，可见昌八剌城亦即唐轮台，只是城名变了，但汉人仍习惯称之为轮台，以故将其所过之耶勒守捉称为"轮台东"。从中可知，丘处机自鳖失把大城（北庭故城）至昌八剌（唐轮台）整整走了八日程，参阅林则徐《荷戈纪程》、洪亮吉《伊犁日记》每日行程为60里上下。据唐墓中已发现的唐代铜尺，1尺平均约30厘米，1丈合今3米，唐1里合今450米，相当于0.9里。以此推算，则自鳖失把大城至昌八里的距离恰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记420里大体相符。

再以《海屯行纪》[2]证之。海屯乃亚美尼亚国王所遣赴蒙古使臣，当其成功完成出使任务以后，于撒合米月23日（10月1日），辞别了蒙哥大汗，自漠北翻越金山，穿越奇台北沙漠，30天后，抵达Humsγur，过

[1]《长春真人西游记》，收入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47册，华夏出版社，页8。
[2]何高济译：《海屯行纪》，中华书局1981年。



图 2-6-19　米泉东河坝古城



图 2-6-20　米泉潘家堡古城



图 2-6-21　米泉铁厂沟八家户破城子



图 2-6-22　米泉苇子滩烂城子

Derbalex,又至 Besbalex。《海屯行纪》为何高济所译,虽然总体无误,其所译地名却问题不少,例如 Humsγur 无疑是一座濒临沙漠的城堡,其

名音近于郝遮，无疑就是位于唐回鹘—北庭道上的沙漠边重要戍堡郝遮镇。回鹘路一作金山道，为庭州北至漠北回鹘牙帐的大路，经此可转赴长安。此路早在匈奴、柔然、突厥统治天山北麓草原时期业已存在，并成为“大北道”的一条支线。《册府元龟》卷994李德裕奏疏中反映，“自艰难之后（指安史之乱），河陇尽陷，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鹘路去”。贞元五年（789）悟空自天竺取经还国，亦因“沙河不通，取回鹘路”。其具体路线结合《太平寰宇记》卷156庭州“东北至回纥界一千七百里，至回纥衙帐三千里”；《元和郡县志》卷40庭州“东北至回鹘衙帐三千里”，又《元和郡县志》卷40，“郝遮镇，在蒲类县东北四十里，当回鹘路；咸泉镇，在蒲类县东北二百里，当回鹘路；特罗堡子，在蒲类县东北二百余里，四面有碛，置堡子处周围约二千里，有好水草，即往回鹘之东路”；又《新唐书·地理志》亦大体如上记载。据此可知，由漠北回鹘牙庭出发，逾金山（阿尔泰山），穿越今奇台县境内的将军戈壁中的特罗堡、咸泉镇，到达郝遮镇，走出戈壁，由此历蒲类县，而达北庭。

此路入清称大西路，直至20世纪初仍有商旅通行，号称包头至新疆旱码头的奇台县商业靠此维持。以此判断，被何高济错误译为胡木升吉儿的Humsγur应即将军戈壁南端要塞郝遮镇，据笔者考证应即今奇台县的北道桥古城。下一站Derbalex，何高济译为别儿八里，又是错误，此城应据哈密屯考释实乃唐蒲类县，即今奇台县唐朝墩古城[1]。下一站Besbalex无疑即别失八里，亦即唐北庭故城。阿儿里黑（Arlex）即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提到的Yarliy，距别失八里4法儿珊（每法儿珊合3英里余）。哈密屯把它考证为《唐书》中的耶勒守捉，并释其义为“有峭壁（yar）之地”。曲鲁格（Kullug）哈密屯考证为《唐书》中之俱六守捉，认为它是《霍杜德》中的Khlldg，kol是“湖”的派生词，意思是“有湖之地”。英格黑（Engax）哈密屯把它读作yongax，考证为《霍杜德》中的一座大驿站。彰八里（Janbalex）哈密屯把它考定为唐代的张堡城，在轮台西，似乎有误，但比定为今昌吉则是有道理的。古塔巴

〔1〕哈密屯原注误将唐蒲类县的地址定在木垒，该说有误，今更正。

(Xutapay)即今呼图壁。仰吉八里(Angibalex)依哈密屯说,应位于今玛纳斯附近。海屯显然没有把固定的(及信佛的)畏兀儿人当成突厥人,他只是在离开他们的土地,进入哈喇鲁的土地后,才觉得自己到了"突厥地界"。这种分界同北庭回鹘与哈剌汗朝之间的势力也完全吻合。今据综辑唐、元汉文史料及《海屯行纪》,自蒲类、北庭至玛纳斯河东的所经重要城堡见表2-6-1:

表2-6-1 自蒲类、北庭至玛纳斯河东所经重要城堡

《新唐书·地理志》	《元史》	《海屯行纪》	今地名
郝遮镇		Humsγur	奇台北道桥古城
蒲类县		Derbalex	奇台唐朝墩古城
北庭都护府	别失八里	Besbalex	吉木萨尔北庭故城
沙钵守捉			吉木萨尔庆阳湖乡镇双河古城
冯洛城守捉			吉木萨尔三台镇冯洛村北部六户地古城或八家户古城
耶勒城守捉		Arlex(Yarliy)	今阜康阜北古城
俱六城守捉		Kullug	米泉古城(一作下沙河古城)
		Engax	米泉八家户古城
轮台县	彰八里	Janbalex	昌吉古城
	古塔巴	Xutapay	呼图壁古塔巴古城
张堡城守捉	仰吉八里	Angibalex	玛纳斯阳巴勒噶逊古城
里移得建河	马纳斯河		玛纳斯河

通过以上唐朝和蒙元时期地名、城名的比对,发现唐代轮台的位置同蒙元时期的彰八里惊人的相似。是否唐代的轮台与蒙元时期的彰八里同为一城呢?这在《耶律希亮传》和《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元史》卷180《耶律希亮传》:"[中统]二年,至昌八里城,夏,逾马纳斯河。"《新元史》卷120《耶律希亮传》所记类似:"希亮逾天山,至北庭都护府,明年,至昌八里城,逾马纳思河,抵叶密里城,至于火

李之地。"以上两元史本传中所记位于马纳斯河(今玛纳斯河)之东的昌八里城显然就是彰八里的同名异译。同样证实,唐轮台城的故址就是今昌吉古城。乌拉泊古城则位于地理学上的乌鲁木齐峡谷,乃《西州图经》所载庭州南通西州的白水涧道北段出口处,与白水镇相距不远,乌拉泊古城的地理方位远离碎叶路,其说同唐轮台位于唐代丝路北道正途碎叶路的记载相左,根本不具备唐轮台县的地理特征。

顺便指出,古代碎叶路所选择的路线,相当于地理学上天山北麓泉水溢出带,北距沙碛带甚近。这条路线沿途水草丰茂,利于古代驼马往来,在沙碛带南沿似乎还分布着若干小城,起着屏卫商路的作用。今日大半已被沙丘淹没(如阜北农场古城)。至于烽燧则皆分布于古碎叶路南,以利于保护戍卒的安全。如果乌拉泊确为轮台故址,其沿线应分布着大量烽燧,但迄今并没有这种发现。

6.5　张堡(仰吉八里)定点的地里反证

据前引《新唐书》卷40《地理志》关于碎叶—庭州道的权威记载,唐轮台的位置在庭州之西、张堡守捉之东:"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而张堡的地理位置在里移得建河之东150里,这确定了张堡守捉的位置,足以确证唐轮台是否真的地当庭州—碎叶道正途。早在1984年笔者全家正式由昌吉迁往新建成的新疆社会科学院家属楼的当年,就曾自购车票,赴玛纳斯考察。当时玛纳斯文化馆还仅是一所简陋的平房小院,文物都堆在库房和院子里,有幸得到一位热心的文化馆工作人员的陪同,一起骑自行车考察了位于包家店的塔西沟古城,即多次见于清代典籍的阳巴勒噶逊古城。当时现存的烽燧至少高达2米,而与此唐城相毗邻的清城烽燧则更为高大,周围城垣轮廓基本尚存。笔者曾在地上随意拾到了开元通宝,但在奇台、吉木萨尔诸县古城中随处可见的大历通宝乃至乾元重宝都未曾发现。当时笔者仅带了一架刚买的红梅牌照相机拍了全景及其城垣形制,城为夯筑,夯层3～7厘米,属唐代典型夯层,原计划回到单位后

立即写文,因故拖延未成,后来相机中的资料也已曝光,全部遗失。2011年10月末,笔者又有机会赴玛纳斯,再次提出考察阳噶勒巴逊古城,得到支持,在史志办赵金华先生的全程陪同下,再次考察了该城。结论是,史书中所记的里移得建河,即今之玛纳斯河,今称之塔西河古城就位于玛纳斯河之东,与史书所记之位置正合,夯层符合唐朝的厚度,无疑就是唐城。具体而言,位于玛纳斯县包家店镇塔西河村村委会西,乌伊公路北侧200米。北纬44°14′16.3″、东经86°23′14.8″,海拔高度485米。原有古城今已消失殆尽,唯余两座烽燧,位于塔西河村西北200米处,台体平面方形,截面梯形,立面四棱台形,底南北长14米,东西宽12米,高8米。烽燧主体为黄土夯筑,夯层厚8~10厘米,恰合唐代中期标准。西侧面可见数个衽木穿孔。台体四周散布有夹砂红、灰陶片、大畜骨头、石器残片等。陶器器形主要为灰陶罐,具有唐代风格。这显然是唐之张堡守捉。别失八里回鹘时期,这一政权下属的五座最大的城市中就有仰吉八里之名,而仰吉八里就是张堡的音变,在天山北麓诸城中仅次于别失八里、昌八剌,位居第三,见于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突厥语词典》的“别失八里”词条。蒙古汗国时期海屯西返,所记行程中明确记载仰吉巴里就位于彰巴里(昌八里)、古塔巴(呼图壁)正西。这明明就是唐之张堡城。它与今昌吉古城的前身昌八里或彰巴里,发音颇有相似之处,却明显属于两地。早在清朝初年,研究西域史的两位大家徐松和李光廷,都不约而同地指出昌八剌、昌八里、彰八里、彰八剌诸城名就是清代的昌吉。[1] 而元称仰吉八里、唐称张堡的古城就是塔西河附近的阳巴勒噶逊古城。对此,广泛见于蒙元时期的一切有关记载,例如《元史》卷63《地理志》记云:

> 别失八里。至元十五年,授八撒察里虎符,掌别失八里畏兀城子里军站事。十七年,以万户綦公直戍别失八里。十八年,从诸王

---

[1] 如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称:“昌吉县治……疑即彰八里地。”李光廷《汉西域图考》进而明确肯定:“昌吉县,本宁边戍城……元之彰八里地也。”此外,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松田寿男《论唐朝庭州的领县》(《天山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页292~323)、寇田《唐代西域州县考》(《新亚细亚》10卷4期)等,皆宗其说。

阿只吉请，自大和岭至别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二十年，立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二十三年，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失八里，置元帅府，即其地以总之。

……

仰吉八里。

古塔巴。

彰八里。至元十五年，授朵鲁知金符，掌彰八里军站事。

据此可知，元于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北庭故城）设别失八里元帅府，彰八里（今昌吉古城）、古塔巴（今呼图壁）、仰吉八里（今塔西河古城）皆隶其治下，前文所引三城，乃由西向东顺序，由东向西，则应依次是别失八里、彰八里、古塔巴、仰吉巴里。易言之，蒙元时期的仰吉巴里乃是别失八里元帅府治下最西部边戍，这意味着元代的里移得建河（今玛纳斯河）已是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之间的界河。

《新元史·地理志》页632又记：

仰吉八里。古塔巴。彰八里。《大典图》[1]在别失八里之西，由此而西为古塔巴，又西仰吉八里。

《大典图》指《元经世大典图》，见《永乐大典》，清末犹存，今佚，然在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所收丁谦《元经世大典图地理考证》卷2中明确指出，彰八里与仰吉八里分列于古塔巴（呼图壁）之东西。足见彰巴里在东，即今昌吉古城、仰吉八里在西，应在今玛纳斯境。

此城直到清朝初年准噶尔盛世时期仍在使用，成为汗国的东部雄关。雍正十年，清使阿克敦赴伊犁议和，途经此城，称为阳关，见于其所撰《德荫堂集》，所赋诗注云："阳关之西，有河名玛纳斯，其流甚钜，南带天山，北据瀚海，设关以此为险。"据此足证，阿克敦所过的阳关，在玛纳斯河之东，其地正是清人所记的阳巴勒噶逊古城。对此广泛见于

[1]据云魏源撰《海国图志》卷3中收有魏氏所撰《元代疆域图叙》，内云"又有元经世大典地图，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并附其后。其元代西域考二篇，见北印度沿革后，元代北方疆域考，见俄罗斯沿革后"。但上海古籍出版社《续四库全书·地理类》所收《海国图志》并未查到该图，也许所据版本不同。



图 2-6-23　玛纳斯塔西沟古堡(张堡守捉)

清人记载,诸如:

(1)《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10《疆域三 · 安西北路二 · 绥来县治》。记载在今玛纳斯境,位于绥来县治正东30里的阳噶尔巴逊古城。

(2)《新疆图志 · 道路一》,记"谨案玛纳斯河,《元史 · 耶律希亮传》作玛纳思河,……河东有城墉旧址,周十余里,曰阳巴勒噶逊,即海屯纪程之仰吉巴里克,西书称为仰吉巴里,仰、阳音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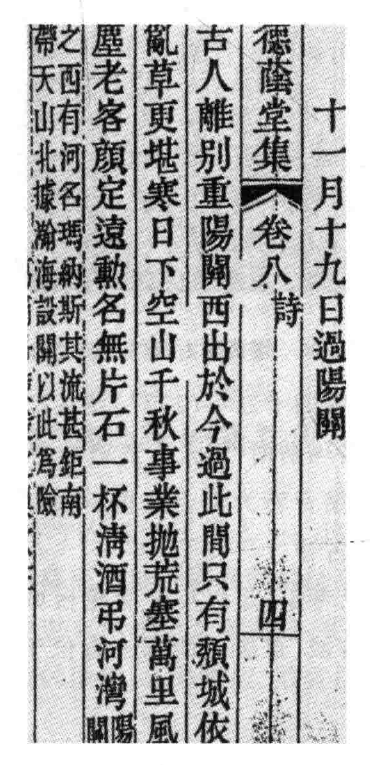
(3)清徐松《西域水道记》,朱玉麒整理,中华书局本2005年,页188:

> 塔西河西四十许里,为玛纳斯河,五源分出哈屯博克达山之卫和勒晶岭。过岭即裕勒都斯地方……即玛纳斯河源处矣。水清产玉又曰清水河,玉色黝碧,有文采,璞大者重数十斛,清水河北流,古尔班多邦水自东入之,古尔班沙扎海水自西不入之。出山焉玛纳斯河。准语玛纳,巡逻也,斯谓其人,滨河有巡逻者,是以名焉。河东岸里许,有城墉旧基,曰阳巴勒噶逊。阳,汉人语,巴勒噶逊,准语城也。地向阳,有城基,故名。乾隆四十二年於其东建南北二城,北曰康吉城,周三里七分六厘有奇,高丈六尺,门四,东迎盛、西兆成、南来熏、北庆丰,初驻县丞,建城之年,改为绥来县。

(4)《绥来县乡土志》:

> 乾隆四十二年于玛纳斯河之东岸、阳巴勒噶逊旧城西之里许,建南北二城,北城曰康吉,周三里七分有奇,高一丈六尺,门四、东曰迎曦、西曰兆成,北曰庆丰,南曰来熏,初设县丞员,后改绥来县,

其南城曰绥宁城，周三里五分有奇，高与康吉同，门四、东曰延旭，西曰巩遐、南曰丽端，北曰宁汉，玛纳斯营兵驻焉。两城中间筑城六十五丈九尺，于其西置门曰 靖远关，是为西行之大道。……唐贞观初年，于玛纳斯河之东筑阳巴勒噶逊城，又于河西七十里设乌宰守捉。


十一月十九日過陽關

德蔭堂集 卷八 詩 四

古人離別重陽關西出於今過此間只有頹城依
亂草更堪寒日下空山千秋事業拋荒塞萬里風
塵老客顏定遠勳名無片石一杯清酒弔河灣陽關
之西有河名瑪納斯其流甚鉅南
帶天山北據瀚海設關以此為險

图 2－6－25　阿克敦《德荫堂集》过阳关诗

细加勘校张堡、仰吉八里、阳巴勒噶逊三名，实为一地。

（1）地望相符。阳巴勒噶逊古城位于玛纳斯河东岸，今玛纳斯县正东，位于公路干线塔西河之北，西为燕窝水库、吕家庄，北为谢家下戈壁，东为东麦地，古城巍然尚存，该城东距今昌吉古城直线距离恰 150 里，距庭州直线距离亦大致与史书所记北庭至张堡的 500 余里相侔。

（2）对音相合。阳巴勒噶逊乃突厥、准噶尔两种语言的混合，阳巴勒噶逊即新，噶逊即城，合即新城，可见其寓意与张堡相同。这一带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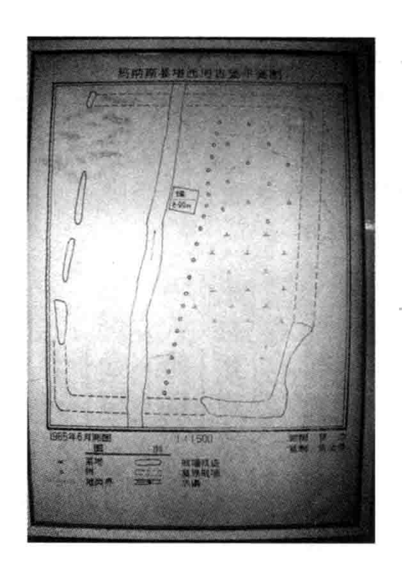


图 2-6-26　塔西河古城（张堡古城）实测图

准噶尔拉玛部牧地，乾隆四十二年（1777）清人于阳噶尔巴逊故城西筑城，命名绥来，今又改名玛纳斯，清人所建诸城中之康吉，亦取音阳噶尔巴逊，由此可以确证张堡音转为仰吉八里，再转为阳噶尔巴逊，再转为康吉，其地千余年犹存古音。

张堡守捉地望既已考定，足以反证唐轮台城的地望就在元之昌八里、彰巴里，今之昌吉古城，自唐至清都一直位于庭州—碎叶道上。乃是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

（原刊于《昌吉师范学院学报》，2011 年第 4 期，照片为今所增补）

7　唐蒲类县及其领城考

我国历史上的蒲类有二，一是汉之蒲类国，二是唐之蒲类县，二者同名异地。笔者曾在奇台县工作、生活20年，参加了有关本县境内一切古代遗址的考察，确信唐庭州下属蒲类县的准确位置就是今奇台县城东北角的唐朝墩古城，此外，两唐书中明确记载的唐蒲类镇城，郝遮镇城也都在今奇台境内。现对一座曾出土文物极为丰富，昔日两墩俱在，范围不小而今早已荡然无存，而年代长期未明，当地人称为“唐朝疙疸”的一座古代遗址，初步进行断代分析。

7.1　唐蒲类县址及其出土文物

蒲类县乃唐初始建时的庭州三县之一。这是唐置安西都护府和西、庭二州以后，向边疆移民和推行郡县制的结果。

关于蒲类县的建置史有两个重大问题必须搞清楚。一是蒲类、蒲昌、金满、后庭四县名实的区别，二是数废、数置的历史沿革。对此正史记载有讹，宜加辨证。

先叙蒲类、蒲昌、金满、后庭四县的区别。旧史所载大都十分混乱，例如《新唐书》卷40《地理志》双蒲昌于前庭治下：

> 北庭大都护府，本庭州，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以西突厥泥[伏沙]钵略叶护可汗阿史那贺鲁部落置，并置有蒲昌县、寻废，显庆二年复置。

这显然是蒲类、蒲昌相混淆的结果，因为同书西州交河郡条下也有蒲昌一县：

> 蒲昌，中，本隶庭州，后来属，西有七屯城、弩支城，有石城镇、播仙镇。

按蒲类、蒲昌各自为县,两不相涉。《旧唐书·地理志》载西州蒲昌县,贞观十四年于始昌故城置,县东南有蒲昌海,胡人呼为婆悉海,《通典》卷191则记蒲昌乃东镇城改置。始昌、东镇皆为侯君集平定高昌三州、五县、二十二城之一,理当位于天山南麓,可见此海乃蒲昌海的讹写。据《新唐书》卷43,"自蒲昌海南岸,经七屯城,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岸一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也"。以方位度之,即今罗布泊。可知传文中隶属于庭州之蒲昌乃是蒲类之误。又道宣《释迦方志》记由伊州西行,"七百里至蒲昌海,又西百余里至西州,即高昌故地"。则蒲昌距西州甚近,断无曾隶庭州之理。清人业已考证清楚,此蒲昌即宋之宝庄,明之北昌,清之辟展,历史上皆属高昌故地,足证《新唐书》"本隶庭州"之说纯出无据。该县自始至终皆应为西州领县,而与庭州治下的蒲类无关。

蒲类,因蒲类海而得名,可知当在天山北麓。《元和郡县志》载"蒲类,贞观十四年(640)置,因蒲类海为名",然在《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中,又把它同后庭混为一谈。

> 后庭,下,本蒲类,隶西州,后来属,宝应元年更名,有蒲类、郝遮、咸泉三镇,特罗堡。

隶属于西州的"蒲类"显然是蒲昌之误,此处不复置辩。传文中又说蒲类本名后庭,宝应元年(762)以后才改用今名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史载永徽二年(651)阿史那贺鲁曾"寇庭州,陷金岭,略蒲类[1]",可知其时蒲类县已设,不闻另有后庭之名,可见蒲类、后庭有别。而《元和郡县志》的记载更不准确,不但蒲类、蒲昌、后庭三名完全弄混,而且又出现了金蒲一名:

> 后庭:贞观十四年于州南置蒲昌县,长安二年改为金蒲县,宝应元年改为后庭县。

其实,据岑仲勉先生考证,后庭乃金满异名,金蒲则乃金满讹

[1]《新唐书》卷110《契苾何力传》,页4119。

写[1]，金满与庭州同治，而与位于庭州之东的蒲类无干。可见蒲类自建置以来一直为庭州领县，既不曾隶属西州，也不曾改用他名。

唐蒲类县的地望何在，自清代以来就有两派说法。陶保廉《辛卯侍行记》认为地在木垒，李光廷《汉西域图考》则认为在奇台。木垒说的主证乃对音，木垒之名确可与蒲类相应，因之从其说者颇不乏人。近人寇田《唐朝西域州县考》[2]无非是陶说的沿袭，日人松田寿男则以为蒲类第一次置县在金满，第二次移治于木垒，实际上也是陶说的变种。这几人都没有到新疆做过实地考察。岑仲勉正确地指出了其说的纰缪："木垒为蒲类县，则独山无可位置，金满（吉木萨尔）为蒲类县，更无解于《新书·志》所谓'又经蒲类矣[3]'。"笔者曾在奇台工作21年，对该县的大部分古代遗址进行过考察，同史书所载方位相对勘，证实李光廷的蒲类——奇台说是正确的。

先证木垒非蒲类而乃独山。

据《太平寰宇记》卷156，"蒲类，[庭州]东八十里"。今木垒乃傍山建城，城为清岳钟琪西征时所建，由此西经奇台县至北庭所在的吉木萨尔县后堡子，直线距离为百六十里左右，与上述记载难于契合。至于木垒与蒲类间存在的对音关系也不足为奇，这只能说明该县两汉时期属于蒲类国境，至唐朝则属蒲类县境，却未必是蒲类县治所在地，只能说明唐之蒲类县境要比今日奇台县大得多。

考木垒城南二公里龙王庙水库之北，确有一古城，范围约300米，然以其地望揆之，此应即唐之独山守捉，元之独山城旧址。且看《元史·哈赤北鲁传》：

> 喇亦哈赤北鲁，畏兀儿人也……子亦朶失野讷，从帝（成吉思汗）西征至别失八里东独山，见城空无人。帝问："此何地也？"对曰："独山。往岁饥，民皆流移之它所。然此地当北来要冲，宜耕种以为备。臣昔在唆里迷国（指焉耆），时有户六十，愿移居此。"

---

[1]《麴氏高昌补说》，载《西突厥史料补阙及其考证》。

[2]《新亚细亚》10卷3期。

[3]《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蒲类注8，页453。

帝曰："善。"……后六年，太祖西征还，见田野垦辟，民物繁庶。

据此，独山城位于别失八里（庭州）东，且当"北来要冲"，必在天山北麓东段可以南下东去的某一咽喉地段，故为成吉思汗西征的必经之路，这一方位正与木垒相合。又据《新唐书》卷40所记里程，自纳职县出发：

西经独泉、东华、西华、驼泉，渡茨萁水，过神泉三百九十里，有罗护守捉。别自罗护守捉西北上乏驴岭，百二十里至赤谷，又出谷经长泉、龙泉八十里至独山守捉，又经蒲类县百二十里至北庭都护府。

赤谷为天山北麓东段，斜亘于哈密、巴里坤、木垒之间的山间谷道，独山地扼赤谷通道北端，西去可至庭州、碎叶，南上可至山南罗护守捉，木垒龙王庙水库古城恰位于天山谷口，位置正合。据当地农民说，由此古城经三个泉，大致与今公路成平行方向，有土路可越色必口，翻山而至巴里坤，别有支路自古城南越博依勒克达阪，可通吐鲁番，与古西州相连，亦可沿旧公路东南至哈密。足证此木垒古城即唐之独山守捉，元之独山城。

进考蒲类县治即今奇台县城东的唐朝墩古城。奇台县台又名古城子，当由此古城废墟得名。清人在今奇台县境建有二城，南曰奇台，即今老奇台，北曰古城，而设县治于奇台，古城则为屯兵之所，光绪十六年（1890）始迁县治于古城，更名奇台，原县治则称老奇台。[1] 这座唐朝废墟就在今奇台县治（古城）北门处不远。由于镇区的扩展，其西、南面今已与街区相连，东、北两面城墙尚存，已被列入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名单，故旧墟基本上保存完好，犹存唐蒲类县治的雄浑气象，是庭州之东诸城中最大的一座。

奇台北门外昔日是一片开阔的平原，该城东临河，北面是郊区菜地，西、南两面由于市镇的扩展，已成为居民区的一部分。城为长方形，东西长314米，南北残长490米，仅有东门痕迹。城中心有一座圆土

---

〔1〕《奇台县志》手抄本，现藏奇台档案馆。

墩，大概是古代中央建筑物的遗留，北城墙中段也有一座土墩凸起，似为瓮城一类建筑。城墙仅东、北两段尚保存完整，均系版筑建成，北城墙版筑层厚约 8 厘米，城墙残高 8 米、厚 7 米。城内地势凹凸不平，笔者在奇台生活的 21 年中，许多古代房屋遗痕犹清晰可辨。

首须指出的是，唐庭州有蒲类县、蒲类州、蒲类镇等三种不同的军政建置。蒲类州，名义上似乎大于蒲类县，其实不过是以西突厥处月部落改置的羁縻建置，今蒲类州印已在北庭故城发现，显然是唐朝颁发给在蒲类县山间牧区游牧的处月部小首领的印章。这种州级建置，实际上仍是纳入唐朝官制系统的西突厥部落，名为唐朝刺史，实为部落头人，职务世袭，自理民政，所统民户，不报官府，不上隶户部，也不向唐朝纳税，实行地方自治，与作为真正郡县制单位的唐蒲类县两不相涉。

本文考察的奇台唐朝墩古城，实乃唐蒲类县故址，当年城中荒草遍地，人兽骨骸及古代残陶片俯拾即是，陶器多折唇，带耳，小平底，素面，也有带花纹的。历年来城中出土文物计有：

红陶盆　2 件。陶质夹砂，轮制而成，侈口，带唇，平底，壁厚，素面。口径 1.5～1.7 厘米。

陶瓮　厚唇，鼓腹，小平底，素面，呈黑色或青色。高 63 厘米，口径 20 厘米。

鼓腹罐　素面，呈红或青色，陶质夹砂，轮制，鼓腹。高 29 厘米，口径 15 厘米，底径 15.6 厘米。

单耳罐　已残，颈下饰有一圈唐代流行的水涡纹，耳下又有一圈交错的绳纹，腹部隆起。

以上陶器大约皆为唐代遗物。

绿釉鼓腹罐　鼓腹，侈口，小平底。红胎，釉色极不均匀，腹部有一圈弦纹。通高 11.7 厘米，口径 8.4 厘米，底径 7.1 厘米。

绿釉细颈瓶　红胎，甚粗糙。细颈，鼓腹，平底，距底 6.2 厘米处有一小孔。通高 22 厘米，底径 7.5 厘米。

青瓷碗　均残，敞口，圈足，壁内收。釉分青灰、宝兰二色，釉面密布细碎弦纹，碗底露赭色胎骨。这种碗我们在吉木萨尔北庭故城及奇

台东地都有发现。元朝奇台属别失八里元帅府辖区,故大致可以定为元代遗物。

宋元双鱼纹铜镜 2件。均饰双鱼纹,一件直径17.9厘米,圆纽。一件直径13.8厘米,圆纽。可能为西辽至元代遗物。

铁镟 已折断,梭形,无血槽,长13厘米。

铁剑 已残,仅余剑身,残长41厘米,宽4厘米。

西辽瓦当 已残。

察合台银币 出土于一处房屋遗址中,圆形,共分大、中、小三型。大型直径2~2.3厘米,共55枚。中型直径1.6~1.8厘米,共35枚。小型直径1.3~1.5厘米,共13枚。正反面都有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文字,正面书 allāh(安拉),反面书 mahemode(穆罕默德)akjbar(伟大的)。有的银币下部还有横书回鹘文题铭,其形大小不一,周边多已剪残。这是天山北麓东段唯一被发现的察合台银币,说明伊斯兰教势力至元代已扩展到新疆东部。

从以上出土之物判断,这座古城的使用时期大约上限为唐、下限为元,同邻县吉木萨尔境内的北庭故城相仿,以其规模而论,至少应为北庭下属四县之一。按庭州下属四县,其中金满与庭州东治、轮台、西海皆在庭州西,其在庭州东者唯有蒲类一县,《太平寰宇记》卷156记载"蒲类(庭州)东八十里",而自独山经蒲类至庭州则为160里,可知蒲类至独山亦为80里。今日公路干线略有绕道,清之驿道则更为纡曲,皆不足为据,若以直线距离计算,自奇台唐朝墩古城东至独山所在的木垒古城,西至庭州所在后堡子古城,皆恰为80里,与史书所记,若相符契。这段路程,恰好同北庭故城至今奇台县城的距离,由此可证,这座俗名唐朝墩的古城实即唐蒲类县旧址,且以规模、遗物证之。庭州故城之东,迄于伊州(哈密),已知古城废墟如表2-7-1:

表 2-7-1　唐蒲类县古城废墟概况

城名	所在县市	规模
贼疙瘩梁古城	吉木萨尔县	东西 300 米,南北 180 米
唐朝墩古城	奇台县	南北残长 450 米,东西残长 400 米
吐虎玛克古城	奇台县	南北 150 米,东西 150 米
北道桥古城	奇台县	南北 150 米,东西 150 米
东地唐朝疙瘩	奇台县	范围约 150 米
石城子古城	奇台县	南北 138 米,东西 194 米

唐朝设县城堡皆为区域性的行政中心,以规模论,此奇台县城附近的唐朝墩古城实居庭州以东、伊州以西诸城之冠,亦大于庭州之西的三台、滋泥泉、良种场、鱼儿沟、米泉、乌拉泊古城、二六工古城等诸城,而略亚于庭州古城及笔者考定的昌吉轮台古城(现存东墙 500 米,北墙 600 米),倘若设县,非此莫属。笔者在奇台工作期间,协助县文化馆在此城中收集出土文物很多,其中饰有典型唐朝水波纹图案的青陶瓮、开元通宝、大历通宝、残铁镞等都可证实此城的存在时间很长,上限为唐,下限则直到西辽至蒙古汗国与元朝前期。

7.2　唐蒲类县的建置沿革及其领城蒲类镇、郝遮镇考

蒲类县乃庭州重要的卫星城,其建置沿革、兴废变迁乃是唐朝西北边政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县乃唐朝在天山北麓最早推行郡县化的地区之一,中经数度废而复置的沧桑巨变。综合各种史料,该县应与庭州同置。而庭州始置的年代依笔者考证并非如前引史料所记之贞观十四年(640),而应是阿史那贺鲁降唐之年,亦即贞观二十二年(648),详考另见拙作别文。具体而言,此县永徽二年(651)陷于阿史那贺鲁,再置于贺鲁之乱平定之显庆三年(658),开元元年(713)又陷于默啜,开元

四年(史书中记为十四年,疑误)复置,上元元年(760)与庭州一起陷蕃,同年被收复,直至贞元六年(790)庭州沦陷。日本人松田寿男《论唐庭州领县》估为两次反复[1],依笔者判断,应是五次。这一变化反映了天山北麓唐朝统治日益巩固与逐渐动摇的全部历史进程。

第一次建县(贞观二十二年至永徽二年,648—651)。庭州的前身本为可汗浮图,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役,曾兵临其城,西突厥叶护曾举可汗浮图降唐,但其城不久似又被西突厥夺回,故贞观十六年(642)乙毗咄陆可汗兴兵犯伊州,庭州、蒲类皆在伊州西,皆未见于记载,说明其时皆未建置。庭州、蒲类皆乃建于贞观二十二年,而至永徽二年阿史那贺鲁叛,城陷。第一次建县不足三年。

第二次建县(显庆三年至龙朔二年,658—662)。阿史那贺鲁叛乱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平叛军事行动,史载永徽五年(654)程知节破处月,置金满州都督府"隶轮台[2]"。然此轮台尚可辖州,其非庭州领县可知,说明此时庭州、蒲类等州、县的建置都未恢复。直至显庆二年贺鲁之乱始被荡平,次年各种建置复置,可知蒲类县的再置亦必此年,而至龙朔二年西突厥首领阿史那都支叛,犯庭州,刺史来济战死,蒲类县亦必难保。此次建县不足五年。

第三次建县(龙朔三年至开元元年,663—713)。庭州失陷后,唐朝立即做出了快速反应,西州长史裴行俭立即统兵收复,并加速了庭州诸县的移民过程。《资治通鉴》卷201记龙朔三年三月"杨德裔以阿党流庭州",可知这时庭州又回到唐朝手中。《元和郡县志》卷40庭州条亦载"其汉户皆龙朔以后流移人也"。蒲类县的汉户大增及其繁荣也是此年以后的事。及后东突厥汗国默啜可汗之世,再犯西域,册其子匐俱为拓西可汗,兴兵西犯,开元元年攻陷蒲类,庭州几成孤城。这次建县时间长达五十年整。

第四次建县(开元四年至上元元年,716—760)。开元二年东突厥

[1]《天山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页321。

[2]《新唐书》卷43《地理志》,页1131。

大举犯庭州，为唐将郭虔瓘所败，斩其将同俄特勤，三年再败突厥、吐蕃联军，四年光复蒲类，再置县署。至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征调边兵入关，北庭边备空虚，上元元年蒲类与庭州同陷于吐蕃。此次建县，存在了四十四年。

第五次建县(上元元年至贞元六年，760—790)。庭州、蒲类的收复归功于河西将领杨志烈，亦即杨预。此人以关西兵马使身份，率本部兵于同年收复了庭州、蒲类，其后又以河已西副元帅，统一协调河西、安西、北庭三道联防，直至其身殁。其后北庭依靠同回鹘的结盟继续坚守本境，而北庭、安西与唐朝的联系全凭回鹘路，蒲类正位于回鹘路上，其地位更加重要。

李元忠、郭昕遣使入京奏事，悟空取经东归，无不途经蒲类。直至贞元六年庭州陷蕃，自此终结了唐蒲类县的历史。

唐朝庭州疆域甚广，而仅分金满、蒲类、轮台、西海四县，可知唐之一县相当于今日数县。唐之蒲类县大约西界金满(今吉木萨尔县)，南界天山，东至蒲类海(巴里坤湖)，北逾大漠，不但囊括今日奇台、木垒全境以及巴里坤的一部分，其北似已超出了我国今日国界，延伸到蒙古国境内了。据《新唐书·地理志》载蒲类县下辖三镇一堡，即蒲类镇、郝遮镇、咸泉镇、特罗堡。《元和郡县志》明确记载了诸城堡距县的方位、里程，其中咸泉镇在“蒲类县东北二百余里，当回鹘路”，特罗堡位于“蒲类县东北二百余里，四面有碛，置堡子处周回二十余里有好水草，即往回鹘之东路”，或者位于今蒙古国，或者位于今将军戈壁、北塔山一带，未及勘察，所余之蒲类、郝遮二镇都已考察清楚，它们皆在今奇台县境之内。

蒲类镇　此镇与县城同名，而未记其里数，说明相距甚近。今县园艺场场部附近尚有古城一座，位于奇台县城东南，距唐朝墩古城不过2.5公里。直至1979年笔者离开奇台之前，古城仍然保存完好，方形，东墙406米，西墙410米，南墙332米，北墙362米，有东、西二缺口，各宽6米，应为城门，城中心有土墩凸起，当为中心建筑物遗存。东墙靠北一段约101米已被拖拉机犁平，北墙西段已被部分挖残，其他部分保

存尚完好。城为版筑,版厚14厘米、9厘米、7厘米不等,其中以14厘米较为普遍。城墙残高2.7米,墙厚5米,城内地面遗物以青、红二色隔片为最常见,多侈口,带耳,平足,器形与唐朝墩、唐朝疙瘩所见略同。该城本应称为园艺场古城,但当地自有俗名为吐虎玛克古城,必定渊源古老。其意安在,需要深加分析。按明人茅以升《武备记》所收《四夷译语》,其意为槐树,槐树曾为我国国树,乃中原特产,晋末此树尚未逾河西;西凉李暠始植槐于河西,并作《槐树赋》以言志,可见槐树与汉人具有一定的关联。[1] 槐树城亦即汉人城之意。据《新唐书》卷40《地理志》记载蒲类县下属三镇一堡,其中蒲类镇当与蒲类县所距不远。《元和郡县志》卷40亦有蒲类镇“在县城西”的记载,其地望正与此吐虎玛克古城相合,应即唐蒲类镇旧址。

郝遮镇 即今北道桥古城,位于县城东北约20公里,北临沙漠,逾大漠可通蒙古人民共和国。城为方形,该城有内外二重,四周有护城河环绕,今河道已涸,虽辟为农田,城堑至今清晰可辨。外城犹存,东长158米,西长178米,南长135米,北长148米,其中南城墙保存最为完好。东西有缺口,似为城门,宽约14米。城墙皆为夯筑,版层厚8～12厘米不等,城墙残高2米、厚6米,护城河宽32米。城东北角有一大土墩,残高4米,似为瓮城角楼之类,是全城的制高点。内城已被破坏,唯留断断续续的痕迹,地面上分布的陶片与前述各唐代遗址相同,可以据以断定也是一座唐代古城,但完整器皿迄今尚未发现。我们采集到的遗物主要有以下几件:

石磨 青砾石制成,仅余半扇,直径28厘米,厚5厘米,除中心孔外,距边3厘米处有安装磨柄的小孔。

陶纺轮 红陶,直径4.8厘米。

饼形石器 黑色板岩制成,通体圆整平滑,直径19厘米,厚7.5厘米,边轮中间有一道极浅的凹槽,用途不明。

石印 高5.3厘米,宽3.2厘米。阳文篆刻“赤金营部阃府”六字,

---

〔1〕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3《西凉》。

赤金即赤斤异译，明哈密卫有蒙古赤斤营，此印应即明代哈密卫遗物。

清代军人铠甲　现藏于县文化馆。

此城有重城，有护城河，显然是一军事重镇。从出土遗物判断，上限为唐，下限为清，足见使用年限之长，归化城商人来疆贸易者仍取道于此。清代平定同治之乱中所拟开辟的“大西路”大约所指殆此。

关于郝遮镇，《元和郡县志》记其方位乃为蒲类县东北40里，当回鹘路。按回鹘路指唐朝连接庭州至长安的交通要道之一，须穿行大漠，参照《新唐书》卷40《地理志》，此路乃由庭州东经蒲类县、郝遮镇、咸泉镇、特罗堡，越大漠而至回鹘牙帐，然后东南越密栗山、燕子井、错甲山、鹿耳山、鸊鹈泉、呼延谷等，经中受降城而南至长安。唐代名僧悟空由天竺取经归来即取此路返长安，唐将李元忠守北庭，亦由此路得以同朝廷联系，其时回鹘牙帐在漠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而由北道桥越沙漠至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路。处此方位而里数不爽者恰为奇台县西地公社所属的北道桥古城。元代海屯曾奉使蒙古大汗，著有《海屯行纪》，其中明确记载其归程乃由蒙古大汗牙庭西行，翻越金山，即阿尔泰山，穿越将军戈壁，自 Humsγur 城出沙漠，由此一路西行，经蒲类、别失八里等地，西渡伊犁河返国。其中 Humsγur，应即郝遮镇故址，与今北道桥里程相合。据当地老人回忆，直至20世纪20年代依然畅通。

（原刊于《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唐蒲类诂名稽址》缩写，照片、地图为今所增补）

8　天山北麓几座西辽古城的定性研究

——兼论耶律大石的复国行动及其与别失八里回鹘的关系

自1958年新疆进行第一次文物普查以来，天山北麓地区已发现了为数众多的古城，对于这些古代城堡，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通常将时间久远者称为汉城，迟为唐城，再迟为蒙元时期城，较近者则称为清城。几乎忽略西辽帝国的存在。笔者曾在奇台任教，兼做文物工作21年，除了发现了汉疏勒城（麻沟梁石城子古堡）和唐蒲类县城（今奇台古城）、蒲类镇城（县园艺场古城）、郝遮镇城（北道桥古城）之外，还发现了一座出土文物众多、规模可观，而迄今未定性的东地东大墩古城。笔者虽早就产生了奇台之名或即源于西辽的创立者契丹族（Китай），却未敢将这座被俗称为唐朝疙疸的古城同西辽帝国联系起来，直至2011年10月末，应玛纳斯县委之邀，与新疆博物馆王博，新疆古迹保护中心成振国，新疆考古所张玉忠、张铁男诸先生一起，驱车赴玛纳斯参加该县楼南古城鉴定会，才突然发现这座古城出土文物怎么如此面熟。归来后，开始大量查阅近年来天山北麓各地遗址的考古报告与出土文物照片，细相比对，发现这类古城遗址还为数不少，实际上都是西辽为了东征复国的雄图大志与监视别失八里回鹘，防其为金诱降，断其复国之路而兴建的西辽屯城。且有一普遍规律，这就是这些西辽屯城都与别失八里回鹘的军政要塞相距不远，显然志在监视别失八里回鹘的政治动向，长期以来却被误断为唐代遗址。兹择其具有代表性者，论列如下：

8.1 玛纳斯楼南古城踏勘记

2011年11月6—7日,应玛纳斯县委之邀,笔者与新疆古迹保护中心主任成振国,新疆博物馆研究员王博,新疆考古所研究员张玉忠、张铁男诸先生一起,驱车到达玛纳斯,宿于玛纳斯宾馆。晚宴中主人重点强调这次邀请专家就为了确定已被县上定为唐乌宰守捉的玛纳斯古城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开发价值。笔者立即发言指出,这座古城未经复勘、审议,即定为乌宰守捉,为时尚早,须经专家们一起具体踏勘后,再做评议。次日,天雨雪,路泥泞不堪。每人发了一双新买的皮靴,踏雪先勘查了被县上定为乌宰守捉的楼南古城。

楼南古城,又称玛纳斯古城,位于今玛纳斯县城东北约2.8公里,楼南村附近,遗址位于玛纳斯县玛纳斯镇楼南村东北方向,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620米,东西宽520米,总面积约322400平方米。1990年12月被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公布名称为玛纳斯古城。该遗址城墙东、西、北三面保存较好,南墙残损严重。残存墙体高5米,残宽7~10米,夯筑,现已无法辨识城门等迹象,据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资料记载,城墙四角原来均有角墩,但现已很难观察到。城东南角150米外残存烽火台,直径约10米,高约5米。城墙外环绕有护城河,宽约15米。城内均为耕地,不见任何遗迹,地表散落有许多夹砂红、灰陶片和畜骨,石器等,陶器壁较厚,制作规整,器形有较大的缸、罐、瓮、盆等,为典型唐代遗物。石器种类有石杵、磨盘等。据此,《玛纳斯简史》的作者随即断定,该城就是唐乌宰守捉,并称这是"唐代十八个守捉中最大的一个"。我们此年考察此城之日,正是风雪交加之时,尽管如此,我们仍获取了重要的第一手信息,足以否定《玛纳斯简史》中类似天方夜谭的"学术判断"。

(1)方位、夯层、规模、出土文物都与乌宰守捉不符。

方位:据《新唐书·地理志》乌宰守捉应在"张堡城守捉渡里移得建河又七十里"的地方,而里移得建河即玛纳斯河,《玛纳斯简史》的作

者误将里移得建河定为呼图壁河，才得出了乌宰守捉的结论。而今之楼南古城就在今玛纳斯县城东北方向 2.6 公里处，东南距塔西河古城(张堡守捉)也远远不够 70 里，方位绝对不符。

夯层：唐代夯层一般是 3～5 厘米，因此，贵县介绍乌宰守捉的邀请信中就注明这个夯层数据，其实这一数据是虚构的。据当时实测，夯层高达 16～18 厘米，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这座古城并非唐城。

规模：唐城的规模等级分明，除北庭故城属于道级、州级建置，属于超大型城市以外，下一级就应当是蒲类县与轮台县，蒲类县建置时间与庭州建置时间相同，皆始置于贞观二十二年(648)，轮台县与北庭都护府同置于武周长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折合公元应为 703 年 1 月 7 日，唐庭州下属诸城中以轮台县最大，蒲类县次之，其中蒲类县，即奇台唐朝墩古城，位于奇台县城北，遗址大部分今已并入城区范围。南北长约 400 米，东西长约 235 米。

轮台县，即唐昌八里、彰八里，据笔者考证，即今昌吉古城，位于昌吉市东北角，老县城东侧，呈长方形，20 世纪 30 年代《新中华》复刊 4 卷 14 期载陈澄之文章《昌吉、奇台、呼图壁识略》记其城垣尚全，且有二土墩，各高丈许。"如果有全此从事一番考古发掘，必大有收获。但本地人至今极其固执地绝对禁止侵犯这一古城墉。"1964 年实测 3191 米。1979 年笔者考察时，遗址已遭严重破坏，仅余东墙约 500 米，北墙约 600 米，夯筑，厚 8～10 厘米。至于徐百成所考证的轮台(乌拉泊古城)，南北长 550 米，东西宽 450 米，小于昌吉古城。可考北庭下属之守捉城，如冯洛守捉古城位于吉木萨尔县三台镇东北 6 公里处的冯洛村北。城垣呈长方形，东、西、北三墙平直，南墙呈凹弧形，夯筑，残高 2.5 米左右，东西宽 150 米，南北长 260 米。沙钵守捉遗址位于吉木萨尔县城西偏北 20 公里，庆阳湖乡镇双河街上村东北 2 公里的平原地带，遗址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四周残垣清晰可辨，南北长 100 米，东西宽 70 米，东、西二侧有城门痕迹，残高 0.8～1.2 米，宽 2～3 米不等。当地称"唐朝城"。俱六守捉城即阜康县东偏北约 4 公里天池乡的六运古城。长方形，南北长 400 米，东西宽 300 米，三工河分绕城垣东西而过，河道

宽二三十米，起到护壕的作用。东、南城墙只余墙基，西、北城墙残高3米，夯筑，墙上有马面。而被玛纳斯县定为乌宰守捉的楼南古城位于玛纳斯县玛纳斯镇楼南村东北方向，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620米，东西宽520米，总面积多达322400平方米。其竟然超出了轮台、蒲类两大县级单位，更远远超越了守捉级的城堡规模，肯定不是唐朝遗址，且绝非守捉级别。

出土文物：笔者仔细观察了县邀请函所附文物照片，找不到一件足以代表唐代文化色彩的典型文物，其中被断代为唐代的铜镜，皆为宋元以后文物，连开元通宝都未发现一枚，至于至今难于断代的陶器，已找到相应对照物，皆属西辽时代文物。

(2)关于乌宰守捉城是"唐代十八个守捉中最大的一个"[1]严重违反史实。

长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北庭都护府及轮台县的创立已是武周皇朝末期衰世，仅仅一年后的长安四年(704)武曌退位，武周皇朝烟消云散，唐和帝李显(中宗)复位，大唐帝国复辟，是岁，武周所册主政碎叶的西部蓝突厥首领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阿史那斛瑟罗已同异姓突厥首领突骑施乌质勒刀兵相向，结果阿史那斛瑟罗不敌。次岁改元神龙(705)，唐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北庭都护解琬二人皆亲赴突骑施牙庭谈判，无果而终，同年，乌质勒死，子娑葛创建突骑施汗国，神龙二年(706)唐朝遣将牛师奖伐娑葛，全军败没于火烧城(今和硕)，玛纳斯河以西皆非唐有。因此，唐和帝李显采纳了安西大都护郭元振的建议，不再册立西突厥阿史那氏，改而册封突骑施娑葛为十四姓可汗，则玛纳斯河以西皆已并入突骑施汗国领疆。及娑葛迎战东突厥战殁后，里移得建河以西又属西突厥胡禄屋部首领都担领地，也非唐朝领疆。这一地区再次归附唐朝已是唐明皇李隆基继立的开元二年(714)，是岁北庭都护府升级正二品的北庭大都护府，首任北庭大都护乃唐册兴昔亡可

---

〔1〕玛纳斯县简史编撰委员会，玛纳斯县宣传部共同编撰的《玛纳斯简史》第40页大概早已察觉乌宰古城规模太大，不符合唐守捉级别的问题，于是大胆地提出了上述论断，此诚学术界人士不敢言。

汗兼昆陵都护三世阿史那献,开元二年率军西征,荡平都担之乱,得到玄宗嘉奖。然至开元三年西伐大食,始胜终败。开元四年北庭大都护府降级为北庭都护府,阿史那献的北庭大都护免职。此后突骑施汗国车鼻施汗朝强盛,开元七年唐朝为势所迫,割让碎叶城为突骑施汗国牙庭,先前天山北麓收税地点碎叶放弃后,改以轮台为收税雄关,自此,里移得建河以西都已成为突骑施汗国领地,早已与唐无干。由此足证,前引《新唐书·地理志》所记里移得建河以西的乌宰守捉、东林守捉、西林守捉等建置存在时间都极其短暂,至多存在于开元二年至七年间,亦即阿史那献出领北庭大都护、碛西节度使、定远道行军大总管时期。至迟汤嘉惠出任碛西节度使期间,乌宰守捉、东林守捉、西林守捉等里移得建河以西的守捉级建置早已裁撤。[1] 易言之,乌宰等守捉皆为开元二年至七年间匆匆而建、匆匆而撤的短命守捉,根本不可能规模如此巨大。中国古史记载有一大问题,早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这就是忌败扬胜,作为严肃的史学家,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匆匆建立的乌宰守捉存在时间不过数年,说明唐朝真正控制的地区,局限于玛纳斯河之东,其西则先为突骑施势力范围,后为葛逻禄势力范围,再后则为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域穆斯林势力范围,早已与唐无干。所谓乌宰守捉乃"唐代十八个守捉中最大的一个",殆为臆语。

8.2 楼南古城与奇台东地东大墩存在时间的文物对比研究

自从笔者造访了被定为乌宰守捉的楼南古城后,就萌生了同奇台东地东大墩遗址进行文物对比的联想。东地是奇台西地公社(今西地乡)下属的一个大队(今东地村),东地河贯流其间,当时隔河而立有两座大土墩,1958 年新疆第一次文物普查时发现,定名为奇台唐朝疙疸遗址。同年笔者自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奇台一中任教,当时由文化

[1]请参考薛宗正:《突骑施汗国的兴亡》,载《历史研究》,1984 年 3 月。《车鼻施的崛兴》,载《西北民族研究》,2000 年 2 月。《北庭历史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馆主管文物工作，因笔者学过考古[1]，早在1962年就应文化馆王希凡之邀，双双骑驴来此考察，遗址位于县城以东约20公里的平原地带，行政上属西地公社东地大队。所谓唐朝疙疸是指东、西隔河而立的两个大土墩，河宽1米左右，两墩相距72米，实际上为性质不同的两处遗址。

因两大土墩之外皆已辟为农田，原始遗址的范围早已无法确定。其中西土墩属东地五队，破坏不大，土墩是由夯筑而成，残高26米，版筑层厚6厘米，据当地老人反映，70余年前的西墩比现在要高得多，牧童可以爬上去监视远近羊群。这座土墩周围虽有许多人兽骨骸及残碎陶片分布，但完整器物迄今未收集到，大约是一座唐代烽燧遗址。

河东土墩属东地七队。1962年笔者至此勘察时还存在着一座高约2米的土墩，墩顶略圆。1972年复察时，此墩残高已不足1米。墩原为夯打，后加土坯砌成，与西墩形制迥异。据当地老人说，在此土墩周围本来还有许多断续的土坯砌成的小土墩，由于农民历年取土积肥，至今已一无所见。周围200米范围内的地面皆已凸凹不平，遗址基本上已全遭破坏。出土文物众多，皆以驴驮至县文化馆保存，现在大部分文物都已转交昌吉博物馆。

笔者在奇台期间，考察文物、遗址多处，大部分都已获得考释，如奇台石城子遗址即为汉疏勒城遗址，奇台唐朝墩就是唐蒲类县城，园艺场遗址就是唐蒲类镇城，北道桥故城就是唐郝遮镇城，独此出土最丰的东地东大墩遗址，却难于位置，遗憾至今。及至2011年，造访楼南古城遗址和参观玛纳斯博物馆之后，双方的对比联想却翩然而生。肯定奇台东地东大墩遗址与玛纳斯楼南古城皆为重要西辽古城，其名待考。今先对勘如下：

---

[1]20世纪60年代之前，中国高等学校还没有设立考古系，1953年北京大学最早设立考古专门化，并演变为考古专业，皆隶属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其时笔者已在北大历史系古代史专门化学习，同考古专门化的同学一起学习考古课程。中国所设第一个考古系是北大考古学系，首位系主任就是曾与笔者共在未名湖畔度过五年岁月的同班同学严文明。



图 2-8-1　奇台东地西大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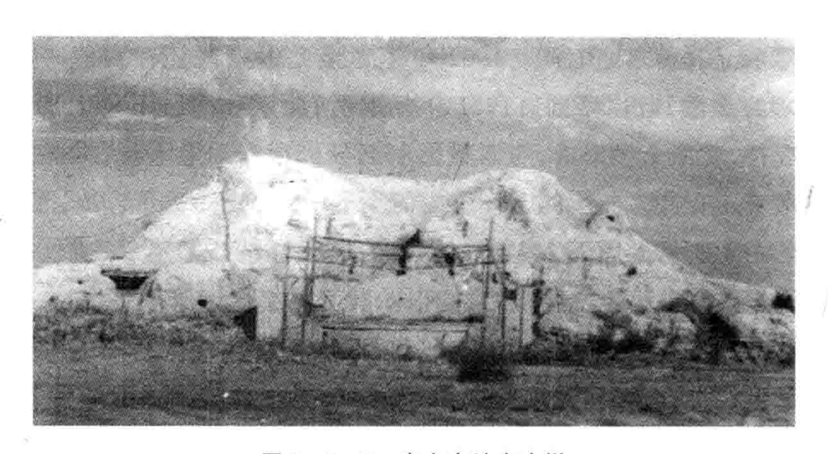


图 2-8-2　奇台东地东大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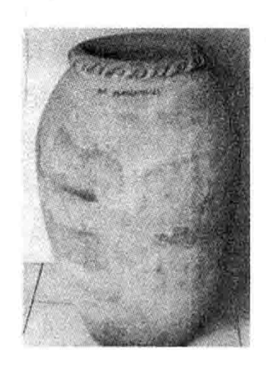


图 2-8-3　玛纳斯楼南古城出土附加堆纹陶缸



图 2-8-4　奇台东地东大墩出土残口沿陶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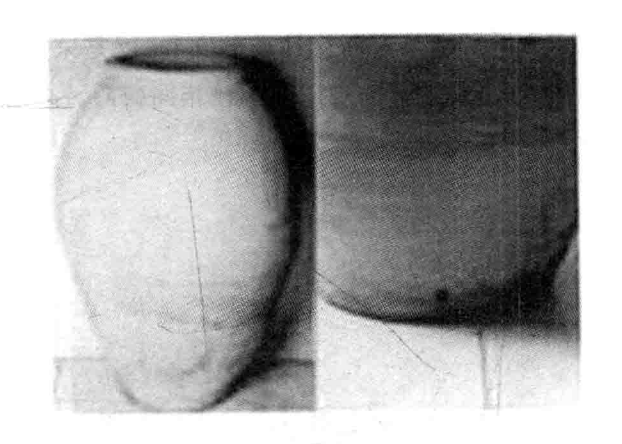


图 2-8-5　玛纳斯楼南古城出土有孔陶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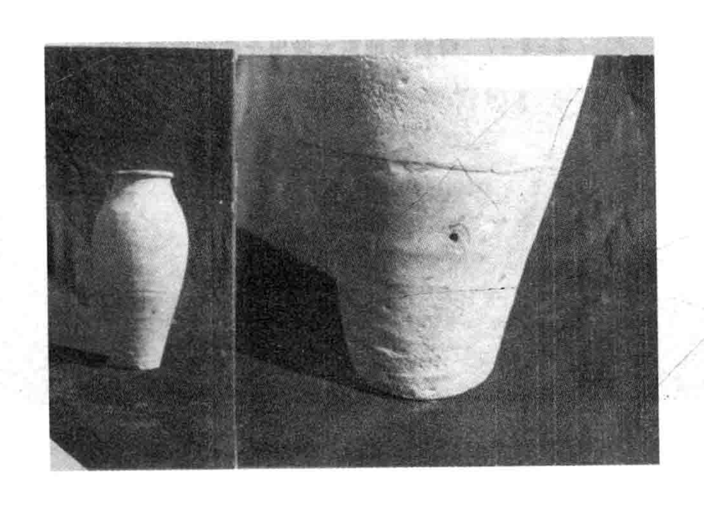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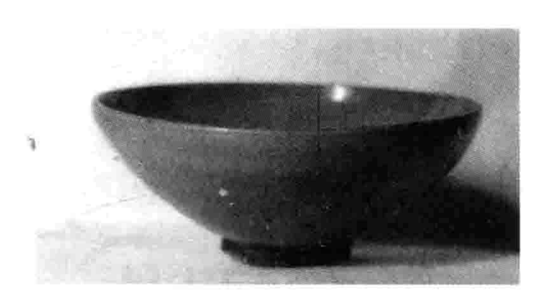


图 2-8-6　奇台东地东大墩出土有孔陶缸

通过以上文物器形比较研究，楼南古城出土陶器不能定性为唐代文物，而应与奇台东地东大墩属于同一时代。玛纳斯楼南古城与奇台东地东大墩出土的陶缸不但器形出奇相似，而且都具有附加堆纹的特征，区别仅在于东地口沿已残而已。二地还都出土了带孔陶瓮，明显是制醋工具，而史载西辽三军中的汉军，率多晋汾籍人，醋是他们不可须臾或离的佐食品。

此类器物的出土显然同西辽汉军存在着关联。

奇台东地东大墩所出具有断代性质的文物,就是宋元时期青瓷碗的出土,同与唐朝绝对无涉。而与宋朝年代相同的西域政权,唯有北庭回鹘与西辽帝国。



2-8-7　奇台东地东大墩出土宋钧窑青瓷碗



图2-8-8　博乐达勒特古城

这些文物都具有宋辽时期的基本特征,至少可以证明它们既不是唐代文物,也不是别失八里回鹘时期的文物,并晚于阿里麻里发现的龙泉窑瓷器,则昭示着这些文物非西辽时期莫属。达勒特古城是现今可以证实确为西辽时期兴建的古城,其中出土陶器也确与奇台东地东大墩及玛纳斯楼南古城出土物不乏类似之处。

进而深究,玛纳斯楼南古城与奇台两地都出土了以下类型的瓦当,这种瓦当绝非唐代遗物,然长期以来,学术界难于辨别其时代,据笔者判断,应当是西辽时期的典型瓦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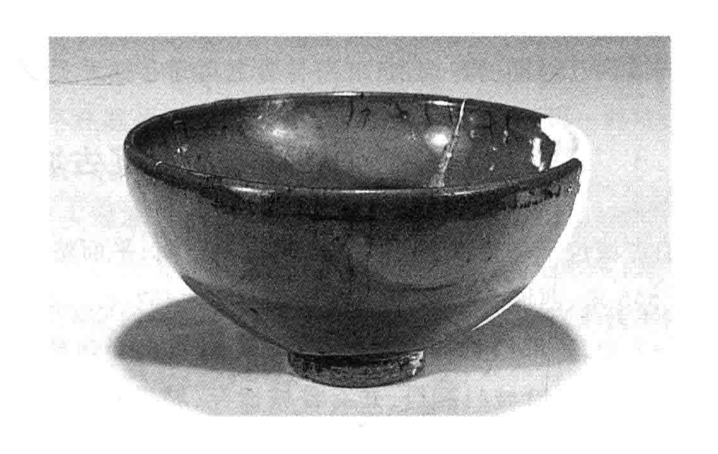


图 2-8-9　博乐达勒特古城出土瓷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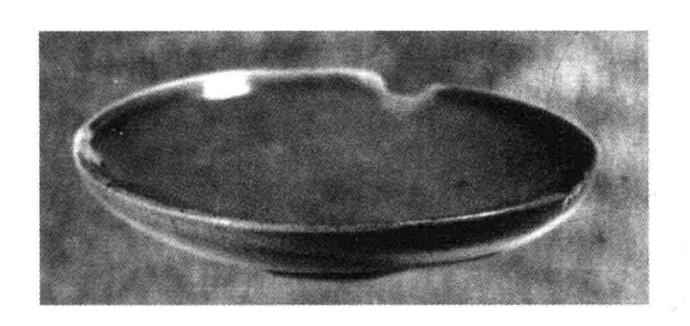


图 2-8-10　博乐达勒特古城出土瓷碟



图 2-8-11　玛纳斯楼南古城出土西辽瓦当



图 2-8-12　奇台东地东大墩出土西辽瓦当

通过以上文物器形对比研究,足以证实,玛纳斯楼南古城与奇台东地东大墩同属西辽时期的建筑遗存,而与唐之乌宰守捉无关。

8.3 乌鲁木齐乌拉泊古城实为西辽古城

乌拉泊古城位于乌鲁木齐县大湾乡乌拉泊村南,平面略呈方形,南北向,东墙546米,西墙530米,南墙475米,北墙487米。城墙夯土筑成,残高2~7米,底部厚约10米,顶厚约3米,有4个角楼和6个马面,城墙南、北、东各有城门豁口,并有瓮城遗存,城里有三道内墙将城一分为三,格局基本清楚,城内的建筑已不存在。出土的文物主要是陶器,有双耳罐、三耳瓶、瓮、壶、盆等,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长期以来,被众多的学者定为唐轮台古城遗址,然至今既找不到准确的文献根据,又没有出土的文物坚证,仅停留在以岑参诗作的分析、发挥中。此城保存完好,远胜于今已荡然无存的昌吉古城,从而也为我们找到了该城实建于西辽帝国时期的确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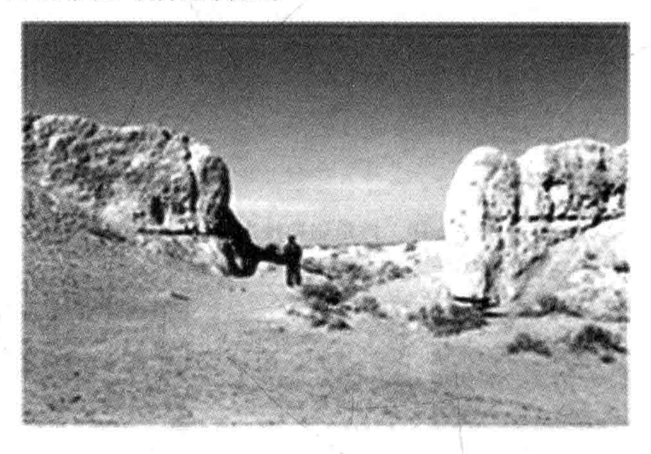


图2-8-13 乌拉泊古城东门

对于乌拉泊古城,首须排除其为唐轮台县故址的一切可能。

首先,据文献记载,唐轮台位当庭州—碎叶道正途[1],是唐北庭都

[1]见前引《新唐书》卷40《地理志》。

护府、大都护府、节度府及庭州的西部屏障，开元七年(719)碎叶罢镇后，又成为天山北麓唐朝收取商税的雄关。而乌拉泊古城深居乌鲁木齐峡谷，地不在庭州之西，而在庭州西南，地不当庭州—碎叶道，而当庭州—西州的白水涧道，见敦煌出土《西州图经》残卷：

白水涧道

右道出交河县界，西北向处月已西诸蕃，足水草，通车马。[1]

发自西州交河县，即北庭—西州路。处月本游牧于吉木萨尔一带，后渐西移，据《新唐书·突厥传》"永徽四年，罢瑶池都督府，即处月置金满州"，又《新唐书·地理志》"金满州都督府，永徽五年以处月部落置为州，隶轮台"，则白水涧道即为交河至轮台的通道。白水涧即今白杨沟，其具体路线乃由吐鲁番通过白杨河峡谷、达坂城、盐湖、柴窝堡，穿越乌鲁木齐峡谷，经白水镇城，而抵轮台的山间通道，裴行俭奇袭阿史那都支即取此路，岑参亦取此路由轮台赴西州。所赋"奉使按胡俗，平明发轮台。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巍。九月尚流汗，炎风吹沙埃"，充分反映出这条山路是发自交河，而抵庭州的主要通道。

其次，据《全唐诗》卷199，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按乌拉泊位居山间谷地，东、西皆山，如轮台在乌拉泊，封常清怎能在"车师西门"迎降。复据《全唐诗》卷198，岑参《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

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

大夫讨匈奴，前月西出师。

[1]据王仲荦著、郑宜秀整理：《敦煌石室地志残志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西郊候中军,平沙悬落晖。

驿马从西来,双节夹路驰。

乌拉泊古城东、西皆山,而唐轮台周围地势平阔,地控东西咽喉,且可出现驿马西来、平沙落日的景观,若其地在乌拉泊,则驿马当自北来,落日当与山衔了。证以丘处机、耶律楚材等人的西行记述,轮台一带明为一片坦荡的平原,何尝是乌拉泊这样的山间凹地?可见根据文献记载,位居庭州—碎叶路的唐轮台县与乌拉泊古城的地理方位完全不合。

进而深究,乌拉泊古城兴建的时间不但远迟于唐,而且迟于别失八里回鹘,即北庭回鹘或高昌回鹘,这一时期只能定为西辽帝国。

(1)唐朝退出西域之后不久,回鹘西迁,其中以仆固俊为首的一支占据北庭,亦即别失八里,创立了史书所记之北庭回鹘王国,因其以北庭为夏都、高昌为冬都,西方学者多称之为高昌回鹘王国,而回鹘人则自称为别失八里回鹘王国。别失八里乃与汉名北庭同时存在的突厥语名称,早在唐朝就已出现在突厥儒尼碑文上,原指庭州构成的五城,即内城、中城、外城、羊马城、西延城。及仆固俊建国北庭以后,其自称实为别失八里回鹘或别失八里畏兀儿亦都护国。及其吞并旧主怀建可汗庞勒特勤(汉文史籍多记为“庞特勒”,应据法国学者哈密屯考证改正)所建之安西回鹘国之后,势力更兼有天山南北东部地区,而与建国喀什噶尔绿洲之信仰伊斯兰教的哈剌汗朝及昆仑山北麓的佛国于阗形成三国分立之势,史称西域三国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主要由伊不拉音·穆提衣、乌提库尔等人,根据苏联乌兹别克文《突厥语词典》,参稽土耳其文本转译为今维吾尔文本的马哈木德·喀什喀里所撰《突厥语大词典》(今有校忠彝之汉文译本,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现了如下词条:

这个区域有五座城市,当地居民是最凶残的异教徒,也是技艺

高明的射手，这五座城市是：唆里迷（solmi），这个城市是祖勒开乃因[1]所建，火州（qozhiu），彰八里（qabalik），别失八里（baxbalik），仰吉八里（yajibalik）。

可见在别失八里回鹘，即北庭回鹘（高昌回鹘）统治东部天山时期，仰吉八里（yajibalik）乃是同别失八里（baxbalik，即北庭故城）、唆里迷（solmi，今焉耆）、火州（qotçiu，今吐鲁番高昌古城）、彰八里（qabalik，又作昌八剌，唐之轮台县，今昌吉古城）并列的五大城堡。其中既无玛纳斯的楼南古城，又无乌鲁木齐之乌拉泊古城，尽管楼南古城远大于唐之张堡古城（仰吉八里），乌拉泊古城的规模也远大于王炳华教授在白水涧道上考证成立的白水镇城，足以说明直至高昌回鹘时期，楼南古城与乌拉泊古城都不存在，则此二城最初兴建的时间只能是略晚于高昌回鹘的西辽帝国时期。

（2）乌拉泊的建筑规格，同真正的唐朝建筑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与西辽时代兴建的达勒特东城[2]、玛纳斯楼南古城非常接近。特点是虽以夯筑为主，但土坯增补现象非常普遍，唐代夯筑的特征是小夯窝、薄夯层，早期夯层多为3～6厘米，后期唐代夯层虽有所增厚，但绝不至于出现14厘米以上夯层。乌拉泊建筑夯层则极不均匀，其夯层有多至18厘米者，与玛纳斯楼南古城近似。

西辽古城规模一般都大于相同规格的唐城，乌拉泊古城东墙约

---

[1]文中的“祖勒开乃因”语出《古兰经》第18章《山洞》第94节，特指古希腊马其顿名君亚历山大大帝典故，此处则专指北庭回鹘的创始人仆固俊，即阿拉伯文《纪闻花絮》中庞勒特勤之异母弟kultegin，亦即汉文记载的仆固俊。仆固俊并非出身于异姓突厥的仆固氏，据《纪闻花絮》，仆固俊实乃kÜltegin，即阙特勤的汉语同音异译，其真正出身实乃冒名药罗葛氏的前回鹘跌跌氏王族成员。

[2]达勒特古城位于博乐市达勒特乡破城子村博尔塔拉河和大河沿子河交汇处。一条宽约200米的干枯河道横贯城中。分为东、西二城，其中西城较为古老，西部长约500米，宽约400米，由内、外两重组成。内城为方形，每边长约80米，城墙残高3～5米，宽3米，结构基本与外城相同。夯土版筑，层次清晰，夯层10～12厘米。东墙有瓮城，两墙保存有马面等军事措施，城内文化层堆积约3米。外城南墙高约3米，长约450米，黄土夯筑，中段有一5米的城门缺口，城门偏东处有一土坯望台，南墙外有一条宽约20米的护城河，西墙大部坍塌成坡状。似为唐双河都督府治所。河东则为西辽城，规模更大，且浑然一体，长约1000米，宽约300米，有3座红砖垒砌的建筑遗址。北侧为墓葬区，出土十余架人骨及随葬品。属博乐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00米、北墙约600米,同玛纳斯楼南古城南北长约620米、东西宽520米,博乐达勒特河东西辽古城长约1000米、宽约300米相似。

(3)考古学证据,这是对古代遗址进行断代定性的决定性物证。

其一,乌拉泊古城尽管名声极大,却迄今没有发现任何一件典型的唐代文物,甚至连一枚唐代通行的开元通宝也未发现,而这种古币曾广泛出土于新疆各地。

其二,据笔者所知,至今乌拉泊古城发现完整出土文物,一是双耳瓶,明显具有西辽特征,二是一灰陶缸,也同楼南古城、奇台东地东大墩出土同类文物极为相似,兹比较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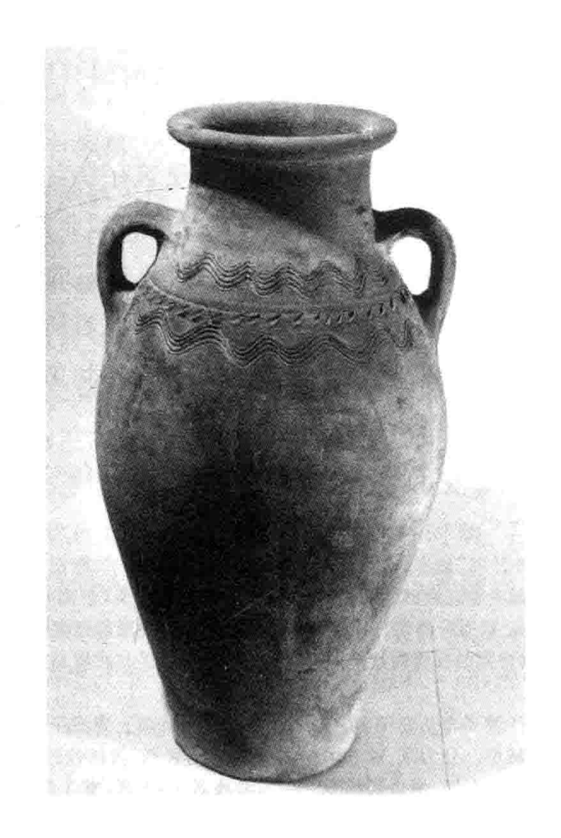


图2-8-14 乌拉泊文阿史那所藏本城出土双耳瓶
(乌拉泊文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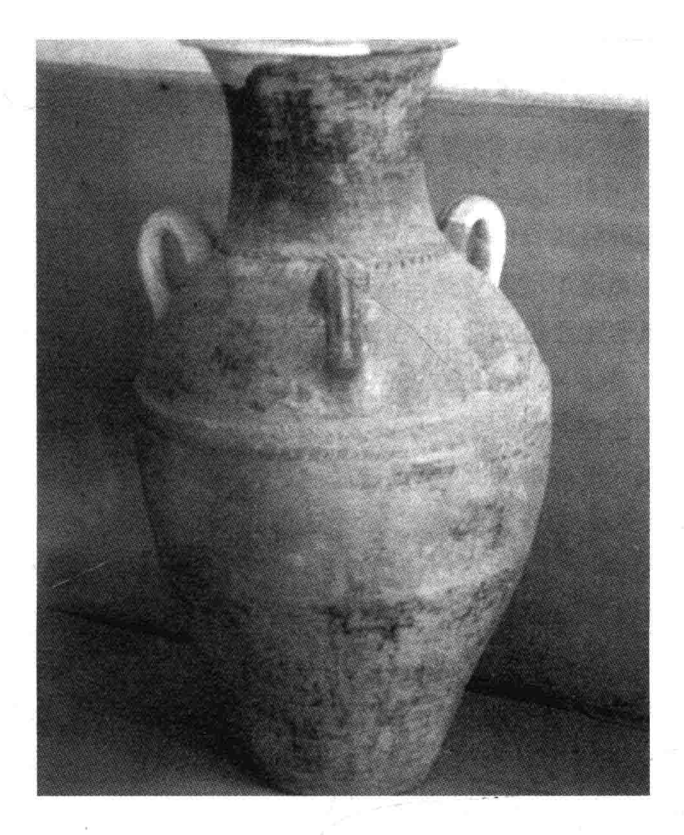


图 2－8－15　东地东大墩出土有耳瓶

以上文物同奇台东地东大墩、玛纳斯楼南古城、达勒特河东西辽城出土的同类器物详加比勘，应是西辽帝国同一时期文物，绝无异议。

此外，乌拉泊尚出土铜镜一，风格与唐风迥异，另有陶罐出土，亦与唐代陶器无关，不具述。

综合以上物证，乌拉泊绝非唐城，而是西辽屯城之一，设置于此，主要在于控制由高昌回鹘驻屯的白水镇城，控制白水涧道，以防止高昌回鹘的叛辽附金，为反攻内地、复兴故国，保持一个反攻基地与反攻通道。

8.4 西辽屯城是防止毕勒哥叛辽附金、维护东返复国通道的历史产物

西辽帝国是契丹族西迁后建立的政权,是我国辽朝皇统在西域的历史延续。无论是辽朝还是西辽帝国,除契丹人之外,汉人也是这一皇朝主体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辽朝的统治下,这些汉人也自称辽人,或契丹人。因此,Китаи(契丹)一词不仅是契丹的译音,而且赋予全体中国人或汉的含义。

唐哀帝天祐三年(906)唐朝灭亡,次岁(907)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建国称辽。十年后的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始建汉式年号,天赞三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耶律阿保机亲征天山北麓,一度攻占别失八里[1],北庭回鹘臣属于辽,后晋石敬瑭割让汉人聚居的燕云十六州之地予辽,自为其儿皇帝。可见辽朝国势的强大。辽景宗保宁三年(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始创西北路招讨使司[2],主持西域经略。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至雍熙元年间(辽景宗乾亨三年至辽圣宗统和二年,981—984)宋使王延德奉使北庭回鹘,志在重播宋朝影响于西域,这场争夺战以宋败辽胜的结局。辽朝存在时期,别失八里、高昌、龟兹、于阗乃至剑河流域的黠戛斯都曾是辽朝的属国,管理形式同唐朝推行的羁縻州府非常类似。[3] 但由西域穆斯林组成的哈剌汗朝则乃辽朝鞭长莫及之地。因为《辽史·本纪》中曾多次出现册封和亲公主远嫁中亚

---

[1]《辽史》卷2《太祖本纪》天赞三年。"冬十月……丙寅朔,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丁卯,军于霸离思山。遣兵踰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此处之"浮图城"属于辽国西部军政中心之一,所指显然就是可汗浮图城,亦即北庭故城、回鹘的夏都大城别失八里,自此确立了辽对高昌回鹘的政治主权。

[2]《辽史》卷46《百官志》,页748~750。

[3]《辽史》卷46《百官志》。"辽制,属国、属部官,大者拟王封,小者准部使。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恩威兼制,得柔远之道。考其可知者具如左,高昌国大王府:主管高昌回鹘,隶西北招讨使司官署,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于阗国王府:主管于阗国,亦属西北招讨使司署,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黠戛斯国王府:主管黠戛斯国,隶西北路招讨使司官署,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阿萨兰回鹘大王府:主管龟兹回鹘,亦隶西北路招讨使司官署,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

大石或黑衣大石的记载。[1] 可见辽朝存在之世,不仅曾为中国共主,而且其政治影响远播西域。以故辽灭于金之后,辽朝皇裔耶律大石率众远迁西域,绝不仅是简单的政治逃亡,而是志在西域站稳之后,反攻复国。西辽在天山北麓别失八里回鹘故境大建屯城,似即耶律大石防范毕勒哥叛辽附金、保卫东返复国战略交通线路的历史产物。

辽朝是一个汉文化色彩非常浓厚的我国契丹族创建的中央王朝之一,推行契丹、汉人双重官制,契丹官员称北面官,汉人官员称南面官,通行契丹、汉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字,使用汉式纪年和科举选士制度。西辽帝国创始人耶律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孙也。通辽、汉字,善骑射"。[2] 天庆五年(1115)耶律大石考中进士,殿试第一名,入仕翰林院,是岁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创立了金朝,大败辽天祚帝,进入辽、金易代时期。天庆七年十二月(1118 年 1 月)金军大败耶律淳所统辽军主力,辽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天庆十年(1120)南宋闻讯遣使北上,与金朝结成了南北夹击、共灭辽朝的海上之盟,约定事成后,燕云十六州归宋,辽朝总有五京。保大二年(1122)金兵已连陷辽四京、四道,正进逼其南都燕京,天祚帝弃城逃亡,不知所之,童贯统宋军十八万已兵临卢沟桥,耶律大石在迎击宋军的决战中与另一奚族将领萧乾以少击众,大败宋军,导致童贯全线溃退,直至金兵南下,燕京才最终失守。至此,金人已占领了辽朝的大部分领疆。仅天祚帝仍据天德军故地,耶律大石先往投奔,却深受猜忌,遂于其败亡前夕的保大四年(1124,金太宗天会二年)与天祚帝反目,"遂杀萧乙薛、坡里括,自立为王,率铁骑二百宵遁。北行三日,过黑水,见白达达详稳床古儿。床古儿献马四百,驼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3] 此处所记的北庭都

[1]对此,往日学者多将大石、黑衣大石等解释为中亚的萨曼尼朝,唯钱伯泉将它释为哈剌汗朝,见其所撰《大石、黑衣大石、喀喇汗王朝考实》,《民族研究》,1995 年 1 期,页 75 ~ 82。其说甚是,余从之。

[2]《辽史》卷 30《耶律大石》,页 220。

[3]《辽史》卷 30《天祚纪》,页 220。

护府，即辽朝西北招讨使司的治所，镇州可敦城[1]。可敦，突厥语为王后、王妃之意，始建于辽统和十二年（994，宋太宗淳化五年）。是岁，辽萧太后之姐齐王罨撒葛妃，率兵三万平定了西北叛乱，始建此城。统和二十二年（1004）辽圣宗置镇州于可敦城，置屯田，屯田兵约二万人，包括契丹，奚及汾、晋籍汉人等三军将士，名为建安军，成为节制西域高昌大王府、于阗王府、黠戛斯王府诸属国的大本营。耶律大石至此，“会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七州及大黄室韦、敌剌、王纪剌、茶赤剌、也喜、鼻古德、尼剌、达剌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纠而毕十八部王众……遂得精兵万余，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有战马万匹，兵力大盛。重置南北官属，其志不可小觑，早就引起金人的密切注视[2]。至金天会三年（1125，辽天祚帝保大五年）又分别遣使秘密交通南宋[3]、西夏[4]，反攻复国之志更为明显。此岁天祚帝兵败被俘，辽朝皇统中断，耶律大石其时虽仍称王，却独雄漠北，继续发展势力。金天会七年（宋建炎三年，1129）泰州路都统婆卢火奏：“大石已得北部二营，恐后难制，且近群牧，宜列屯戍。”[5]金之北部二营所指乃辽之旧日诸边虬军，至此皆纳入耶律大石麾下。这时金朝正忙于伐宋战争，至天会八年（1130）开始移兵北上，

[1]距上京西北3000余里，遗址在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南部喀鲁哈河下游南侧，喀拉喀河下游，哈达桑之东20公里的青托罗壁古城，周约6里，规模宏伟，遗址中出土有辽瓦、器皿、石碑座等。辽统和二十二年辽朝在可敦城建置镇州，设置屯田，派来二万余骑经营屯田，其中既有契丹人、奚人，也有汾、晋籍的汉人，称为建安军。实力冠绝辽朝北方的诸路纠军。

[2]《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页1589：“天会二年，辽详稳挞不野来降，言大石称王于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有战马万匹，畜产甚众。”又见于《金史》卷3《太宗纪》。

[3]《永乐大典》卷10876，虏字《张魏公奏议》：“又奏虏中事宜状，臣近居曲端中，契丹大石林牙自招州遣人持国书赴朝廷，为夏人截留，有原送文字汉儿走，透过泾、原，供析到上件事理。”转引自魏良弢《西辽政治史稿》，见《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4]《金史》卷3《太宗纪》，页43：“[天会]三年，都统完颜希尹言，闻夏人与耶律大石约曰：‘大金既获辽主，诸军皆将归矣，宜合兵以取山西诸部。’诏答曰：‘夏人或与大石合谋为衅，不可不察，其严备之。’”复据《金史》卷73《完颜希亮传》：“是时，夏人已受盟，辽主已获，耶律大石自立，而夏国与娄室书责诸帅弃盟，军入其境，多掠取者。希尹上其书，且奏曰：‘闻夏使人约大石取山西诸郡，以臣观之，夏盟不可信也。’上曰：‘夏事酌宜行之。军入其境，不知信与否也。大石合谋，不可不察，其严备之。’”

[5]《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页1589：“诏答曰‘以二营之故发兵，诸部必扰，当谨斥候而已。’”

耶律大石也认识到可敦城不可久居，遂于“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按此年应指金天会八年二月甲午（二十一日，1130年4月1日），大会七州[1]、十八部[2]，举行了最为隆重的皇帝亲征礼，临行时发表慷慨悲壮演说：“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二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惟尔众亦有轸我国家，忧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者乎？”[3]于是遗书回鹘王毕勒哥曰：“或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诏尔祖乌母主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尔祖即表谢，以为迁国于此，十有余世，军民皆安土重迁，不能复返矣。是与尔国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物致疑 。”[4]在这封国书中再次强调了自辽太祖天赞三年（924）“次古回鹘城”以来辽朝与北庭回鹘传统的宗藩关系[5]，“毕勒哥得书，即迎至邸，大宴三日。临行，献马六百，驼百，羊三千，愿质子孙为附庸，送至境外”。[6] 毕勒哥，时为北庭回鹘首领，亦即高昌回鹘或别失八里回鹘首领，其领疆西至仰吉八里，即唐张堡城故址，地在里移得建河以东，亦即今玛纳斯河之东，河以西已是哈剌汗朝地界。耶律大石致毕勒哥国书中明确许诺，此次西迁仅为借道，所赴者乃“大食”国境，亦即哈剌汗朝地界，进入今额敏县叶密立已越出毕勒

---

[1]七州名，辽史未载，前辈学者分析它们可能是“头下军州”。所谓“头下军州”，是当辽朝贵族的“部曲”（农奴或奴隶）达到一定数量（大约数百户以上）后，即可向朝廷申请给予州、军、县、堡等行政建制，按辽制，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中备兵书。头下军州是可以经常变动的。见《辽史·营卫志》卷31。

[2]十八部中，除五部居地无可考外，其余可考十三部：东起有位于五国、女真、敌烈之间的鼻古德部，有虎子泰州东北的大黄室韦部，西至有济木萨之东北的阿尔泰山一带的忽母思山番部，最南有称作唐古的党部，最北有居黑山北的尼剌都，其间又有居于克鲁伦河北的茶赤剌部，居于色楞格河与鄂尔浑河汇合处的密儿纪部，居子胪朐河的乌古敌烈部，以及绵直在贺兰山、阴山一带的西北最大部族——阻卜部等，皆是阿尔泰山以东的部族。

[3]《辽史》卷30《天祚纪四》，页220。原文这一演说词时间倒置于保大四年，应予更正。

[4]《辽史》卷30《天祚纪四》，页220。

[5]《辽史》卷2《太祖纪》下，页220。

[6]《辽史》卷30《天祚纪四·耶律大石》，页220～221。

哥辖境,可安其心,但又并未进入哈剌汗朝的腹心地带,正是耶律大石西迁叶密里之岁(金天会八年,1130),塞尔柱苏丹桑贾尔占领撒马尔罕,废黜西喀喇汗朝阿尔斯兰汗穆罕默德,立伊卜拉欣为桃花石博格拉汗。乘其朝政混乱之际,入其东境,并未进军其腹心地带,乘机休整,观察西域虚实,以筹划下一步行动。在此期间,已实际上占有了所过北庭回鹘之地,其领疆兼有唐里移得建河东西之地,沿天山北麓主要交通线,皆留军屯驻。并在哈剌汗朝东境的叶密立初步创建大辽西域政权,叶密里古城乃是在唐朝咽城的基础上经西辽改建而成的重要城堡,位于额敏县城东南7.5公里的也木勒牧场,在一块高且平的大台地上,面积约2.4万平方米。遗址东面是乌日喀夏亦山,西北300米处有一条基本呈南北向的公路。遗址上陶片、兽骨随处可见,破坏极为严重,今已荡然无存。而此城的建立标志着西辽帝国的正式建立,所占地域东至今奇台、木垒县,西至伊犁河流域,继承了辽朝的典章制度,正式揭开了西辽历史的首章。当年,金军遣军追讨至漠北,扑了个空,无功而返。[1]

耶律大石西迁必定引起流沙东西全方位的震动,金为辽之死敌,当然密切关注,势必加强了对毕勒哥的诱降活动。北庭回鹘首领毕勒哥虽然先世久已臣属辽朝,但耶律大石西迁时本以借道往"大食"为辞,实际上西迁后的西辽早已占据北庭回鹘的半壁江山,虽然都城设在哈剌汗朝东境,却并未立即向其宿敌发难,必定引起北庭回鹘对辽朝建国西域的不满。金朝得知耶律大石举众西迁,立即派遣辽朝降将耶律余睹率石家奴等统大军尾随追击,却扑了个空[2],遂又遣使前往招抚北庭回鹘,毕勒哥遂即叛辽附金。据《金史》卷3《太宗纪》,页43:

> [天会]九年(1131)……九月己酉,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撒八、迪里、突迭来献。

---

[1]《金史》卷120《世戚传》,页1576:"会契丹大石出奔,以余睹为元帅,石家奴为副,袭诸部族以还。"

[2]《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页1589:"[天会]八年,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离速追讨大石,征兵诸部,诸部不从,石家奴至兀纳水而还。余睹报元帅府曰:'闻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与夏人合,当遣使索之。'夏国报曰:'小国与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

此事发生的时间仅在耶律大石定都叶密立之次年，意味着西辽对天山北麓东段的统治权存在着严重的失控威胁。这时耶律大石已休养生息了整整一年，很可能在此之前，耶律大石也曾派遣小股部队，对东哈剌汗朝与昔日属国黠戛斯进行了试探性攻击，师出皆不利，却已对西域虚实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解决当前生存危机的唯一途径只有建立战功，形成对北庭回鹘强大的威慑力。这时，曾经击败西辽前遣军初次入犯的东哈剌汗朝阿合马汗已死，其子易卜拉辛继位，据志费尼记载，此汗为人懦而无断，哈剌鲁（葛逻禄）与康里突厥叛，易卜拉辛派兵镇压，二部请援于西辽，耶律大石遂应请出兵，不但顺利占领了东哈剌汗朝全境，而且进而挺进剑河流域，重新控制了黠戛斯。与此同时，在天山北麓大建屯城，这些屯城大都分布于北庭回鹘接收下来的唐庭州—碎叶道及其分支白水涧道原有重要城堡附近，却又保持一定距离，例如所建之玛纳斯楼南古城与北庭回鹘所控制的仰吉八里皆位于玛纳斯河之东，近在咫尺，奇台东地东大墩屯城位于唐蒲类县城与地扼将军戈壁出口的郝遮镇之间，乌拉泊古城则位于白水涧道，却又不像真正的唐白水镇城那样，地扼此道的正途，说明这些西辽屯城设置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北庭回鹘所属诸城的监控，确保天山北麓交通干线安全、东返复国之路畅通无阻。在取得了以上一系列初步胜利之后，开始与政教合一的中亚伊斯兰世界发生了激烈冲突，金天会十五年（1137）耶律大石先是取得了忽毡战役的胜利，接着又爆发了同穆斯林联军之间的卡特万决战。在中国史书中并没有这么细致的区别，统称为寻思干之战：

至寻思干，西域诸国举兵十万，号忽儿珊，来拒战。两军相望二里许。谕将士曰："彼军虽多而无谋，攻之，则首尾不救，我师必胜。"遣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招讨副使耶律松山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枢密副使萧剌阿不、招讨使耶律术薛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众攻其中。三军俱进，忽儿珊大败，僵尸数十里。驻军寻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1]

---

〔1〕《辽史》卷30《天祚纪四 · 耶律大石》，页221。

此战之后，西辽帝国不仅再次控制了北庭回鹘，而且事实上已成为西域共主，基本上结束了北庭回鹘、哈剌汗朝、佛国于阗三国分裂的局面，形式上实现了西域的政治统一，开始称帝建国："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以甲辰岁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号葛儿罕。复上汉尊号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1]学术界现已公认，《辽史》所记之甲辰岁，实为甲寅岁，则耶律大石称汗建国、改元延庆元年的甲辰年，应即金天会十二年甲寅(1134)。至延庆三年(天会十四年丙辰)，"延庆三年，班师东归，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号虎思斡耳朵，改延庆为康国元年"。这座西辽都城现已发现，就是今吉尔吉斯共和国距托克玛克以南15~16公里处的布拉纳废城。傍布拉纳河故道而建，中央废墟残存，北墙、西墙各570米，南墙约600米，东墙约500米，西墙近北城隅有城门，门宽15米，靠近东城墙的西北六七十米处有一个宽为100米的综合建筑，很可能是宫殿遗迹。它现在变为两个大土墩，其中出土了大量12世纪的釉陶，经苏联考古学家科热米雅科考证，现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公认。西辽帝国时期另一重要城市阿力麻里城现在也已发现，意为"苹果城"，位于霍城县城东北45公里处克干山南麓的六十一团场，范围很大，北依克干山南麓，南至克干色依，东至秃黑鲁帖木儿汗麻扎，西至卡纳威，欧洲史书称其为"中央帝国城"。始建于西辽，为葛逻禄部首府，后为蒙古察合台汗国都城，成为著名的国际都市、东西交往驿路上的枢纽。城内建筑均已破坏，今唯见土丘密布，断垣残瓦遍地，城墙尚存少许。废城中曾出土许多文物，有中原钱币、无孔金币、阿力麻里银币、阿拉伯文钱币、察合台金银币以及玛瑙、玉器、叙利亚文景教徒墓石、石刻、陶器、镶嵌银碗、青瓷碗、白瓷碗和西辽至元代的各类瓷器等。

---

[1]《辽史》卷30《天祚纪四·耶律大石》，页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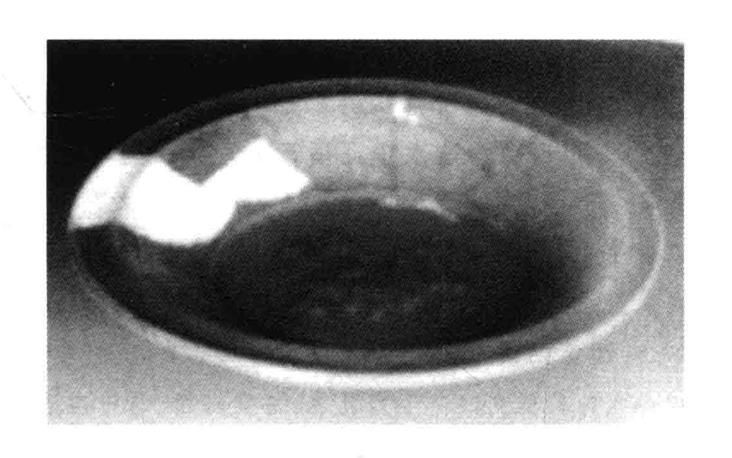


图 2-8-16　阿里麻里出土元代龙纹龙泉青瓷碗

西辽帝国正式建立之后，原先在中原实行的一切制度大都搬到了西域。西辽首领称皇帝、皇后，汉语文是西辽帝国的官方语言文字，使用汉式纪年、以干支相配的十二生肖历。所铸康国通宝，为大石的皇后塔不烟在称制时所铸，圆形方孔，寓有汉文化中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与辽朝古钱完全相同，为《古钱录》收录。西辽时期的西域实质上是汉文化的新恢宏。刘郁西行所留下的记载中还表明，汉人的分布地域西至邪米干城、阿里麻里城，南至赤木儿城、铁木儿忏察关，东至别失八里，他们到处聚居或与当地人错居，而且其籍贯多为并、汾人，以乡籍为部，编制在一起，主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并、汾籍汉人爱吃醋，以此判断，楼南古城发现的有孔陶器，大约就是酿醋工具。汉人兴修的灌溉水渠，不少已被考古学者发现。西辽时期的镔铁制造业、瓷器制造业的主要承担者都是这批汉人，亚历山大古城出土了一件带有护肩、护喉锁子甲的圆头盔，工艺精良，为西辽金属冶制水平的代表。西辽陶瓷器皿中不但包括了仿中原传统的杯、碗、盘、碟、罐、盆、盒等，而且有极具契丹特色的杯口长颈瓶、鸡冠壶、扁提壶、鸡脚坛、凤首瓶、海棠长盘等，其中上部有穿系和提梁、便于马上系带鸡冠壶亦必出自西辽汉人。可见双耳瓶就是西辽陶器的重要特征，此外，西辽境内还出现了同中原一样的纸。

西辽延庆三年（天会十四年丙辰）耶律大石亲镇西域，“三月，以

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为兵马都元帅,敌剌部前同知枢密院事萧查剌阿不副之,茶赤剌部秃鲁耶律燕山为都部署,护卫耶律铁哥为都监,率七万骑东征",[1]再次为这次东征举行杀青牛白马祭天的皇帝亲征礼:

以青牛白马祭天,树旗以誓于众曰:"我大辽自太祖、太宗艰难而成帝业,其后嗣君耽乐无厌,不恤国政,盗贼蜂起,天下土崩。朕率尔众,远至朔漠,其复大业,以光中兴。此非朕与尔世居之地。"申命元帅斡里剌曰:"今当其往,倍赏必罚,与士卒同甘苦,择善水草以立进量敌而进,毋自取祸败也。"行万余里无所得,牛马多死,勒兵而还。大石曰:"皇天弗顺,数也!"[2]

据此可知,耶律大石东征复国,绝非纸上谈兵,虽然没有成功,却也并未失败。宋人著作《三朝北盟会编》卷178收有一文题为《尼堪狱中上书》,尼堪无疑就是粘罕,其中提到一次粘罕为帅主持的征伐西辽兵败的战役,内叙:

臣用陈前日之罪:御林牙兵忽然猖獗,干冒陛下,用臣出师之任,臣受命欲竭驽钝之才,尽浅拙之谋,以狂孽指日可定。不期耶律潜伏沙党(漠?),复反交攻,凡三昼夜,其胜负未分,犹可为战,余杜充粮草已断,人马冻死,御林牙兵知我深入重地,前不樵苏,(后阙文)又断粮,所以王师失利。又副将外家将心生反逆,背负朝廷,外家之欲,反彼有其由也。知父兄妻子并在御林牙军中,两军发衅,其外家得将军下数千骑,自乱我军,使臣不得施,此大败之罪也。

说明金朝曾起用粘罕为帅,征讨西辽,在沙漠中大战三日三夜,因降部倒戈,军粮断绝,全军溃败。然粘罕生平未尝入狱,故西辽史学者多对这条史料不太相信,笔者则认为宋人所获金朝信息,必皆所遣入金谍人所得,必真伪共存。虽然粘罕实未入狱,但此战金军失败,必是史

[1]《辽史》卷30《天祚本纪四·耶律大石》,页221。
[2]《辽史》卷30《天祚本纪四·耶律大石》,页221~222。

实。可见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主持的东征虽然未能实现东返复国的梦想,却是以胜利结束,并未遭到失败。

（据玛纳斯县楼南古城复勘鉴定会论文补充、改写）





项目执行／施援平

责任编辑／武素珍　施援平

封面题字／冯天亮

装帧设计／张友乾


ISBN 978-7-311-04665-1

定价：136.00元(上、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西域史汇考　上
SS号=13800542